

泰国史

戴维·K. 怀亚特 著　郭继光 译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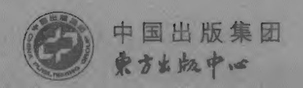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ISBN 978-7-5473-0073-2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泰国史

戴维·K. 怀亚特 著　郭继光 译



上海市版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2009 -199 号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Second Edition)
by David K. Wyatt
Copyright © 1982, 1984, 2003 By David K. Wyat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Mon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国史/(美)怀亚特(Wyatt, D. K.)著；郭继光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9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073-2

Ⅰ. 泰… Ⅱ. ①怀…②郭… Ⅲ. 泰国—历史 Ⅳ. K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6354 号

责任编辑：王卫东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1/16
印　　张：24.25
字　　数：340 千
印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第二版前言

我花费了20年的时间来修订这本书。我徒劳地认为将会发生一些事以致产生一个神奇的转折点或者是结束点，但是这样的时刻一直没有到来过。

我在计算机上重做了所有的地图并且大幅度地削减了全书的内容，从而为一个新的结论提供更大的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我欠了许多新的人情债。我要特别感谢 Rujaya Abhakorn、Aroonrut Wichienkeeo 和 Trasvin Jittidecharaks。我仍然要特别感激 Alene 和我们的儿子们，还有几个长期的朋友——Chiranan Pitpreecha、Takeko Iinuma、Kamala Tiyavanich、Tamara Loos、Betsy Schermerhorn 和 Teresa Sobieszczyk。

Adam Law 博士和 David Schwed 博士将会明白我为什么再次感谢他们。

戴维·K. 怀亚特

纽约 兰辛

2002年12月

第一版前言

尝试把几千年的事情包含在几百页的书里就如同尝试在一张单一的照片里面捕捉到一幅雕塑的本质一样。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很容易就可以扩展成几代学者的作品。不过,这本书主要是针对普通读者:那些不论什么原因只要是对泰国有些兴趣的人以及初学的学生。对这些读者来说,一个广泛的学术注释以及对泰语资料和鲜为人知的书籍的脚注,将是多余的和混乱的。严肃的泰国问题研究者或者可以辨认出我已经引用的资料或者可以通过书末的“进一步阅读建议”加以引导。由于主要面向普通读者,我相信我的专家同事们不会感觉我忽视了他们。

我的一个朋友建议,如果我能通过单独的章节来讲述每一个时期的经济问题等等,来重新组织本书结构的话,我将会做得更好。如果我这么做的话,这本书的内容将超过现在长度的许多倍。相反,我选择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组织好本书。我的想法是在一个基本的时间框架内贯穿各种各样的主题。只有当似乎有必要阐述那些主题的时候,它们才会出现;我担心,在我们所描述的许多世纪里面,那些卑微的泰国农民只能偶尔出现。

我相信这本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那只会损害我的名誉,而不会损害我赖依写作本书的那些人的名声。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已经持

续地从一大群朋友和知己那里得到了想法、信息、建议和灵感。特别的是有几个朋友随时都能提供帮助，即使其中一些人我三五年才能见到一次。过世的 Kachorn Sukhabanij 博士是这些朋友中的最好的一个，他既是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值得与之辩论的人。Tri Amatyakul、Praphat Trinarong 和 Kullasap Gesmankit 总是能够提供帮助。我认为 Charles Keyes、A. Thomas Kirsch 和 Lauriston Sharp 给了我人类学的敏感。Nidhi Aeusrivongse 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也是启发智慧的有价值的源泉。一些人慷慨地允许我阅读他们还没有出版的手稿，在这方面我尤其要感谢过世的 Chester Gorman。

我从我的那些研究生学生们那里学到的东西最多，主要是但并不完全是那些从事泰国历史专业研究的学生们。他们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放在我研究书架的显著位置，部分是因为我为他们自豪，更主要的是我经常使用它们；我已经把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列在本书的书目中了。这些人包括我有幸教学过的三所大学的校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密歇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当人们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地相互谈论和争论的时候，就很难回忆，以一种新方式观察一个复杂现象的这个主意和建议，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我感激所有的人。

一部分人花费时间和精力阅读并且评论了部分或者全部的手稿。Anthony Diller 在语言方面以及 Hiram Woodward 和 Lorraine Gesick 在早期历史的一些观点上对我帮助很大。整个手稿最有帮助的评论者是 Craig J. Reynolds、Nidhi Aeusrivongse、Benjamin A. Batson、David P. Chandler 和 Ruth McVey，他们是值得感谢的。这本书如果没能写得更好的话，这不是他们的错。

我是在 1973—1974 年作为国家人文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期间开始写作本书的。我感谢他们的支持以及康奈尔大学东南亚项目、历史系和大学图书馆 John M. Echols 东南亚收藏项目的一贯帮助。

得到图表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三个老朋友对我帮助尤其大：在泰国国家图书馆和文艺厅工作的 Kullasap Gesmankit 女士，Penelope Van Esterik 和 William L. Bradley。Stephanie Voss 按照我

的要求精确地绘出了地图。Douglas、Andrew 和 James Wyatt 多次把我从对电脑的无可名状的沉迷中挽救出来,而写软件将是我多年的兴趣。我尤其要感谢康奈尔 Savoyards 所提供的员工生活,以及一些好朋友的鼓励、恒久友情和灿烂笑容。

戴维·K. 怀亚特

纽约　伊萨卡

1983 年 10 月

编 辑 说 明

拼 写

在整本书里，我将使用泰国皇家学院的“音标的一般体系”来拼写泰国的名字和单词。发音符号已经降到最低，仅仅保留“ü”(来对应皇家学院的“U”)，因此就不再区分“O”、“œ”和“ǫ”。个人的名字和头衔根据相关已知个人的偏好来拼写。因此国王“Chulalongkorn”和王子“Devawongse”就如此拼写(而不是“Chulalongkon”和“Thewawong”)。地理术语通常按照美国地名委员会的标准形式，就如书中使用的国家地理学会的地图上所标示的那样。

送气的辅音“p”、“t”和“k”写成“ph”、“th”和“kh”，但是它们不像英语里面那样发音的。因此，泰语中的“phon”就如英语中的“cornpone”，而不是“telephone”，而泰语中的“that”发音为“tut”，而不是“that”。

姓名、等级和头衔

姓是 20 世纪泰国的一项创新。泰国人通常以他们的名字来称呼，而不是姓——甚至电话簿和图书馆目录也是如此。“Sarit Thanarat”是称呼“Sarit”总理，而不是“Thanarat”总理。

在前现代时期有各种各样的术语来称呼王室。最古老的是这样的术语如“chao”、“khun” 和“thao”。现代泰国王室受到一个后裔逐渐下降的规则制约，各代所用的术语在地位上依次下降一个等级，直到王室成员的第六代是平民。国王的子女和孙子女所用的术语是“chao fa”，或者 “phra ong chao”以及“mom chao”，通常是称呼王子和公主。再往下两代人则不是这样称呼。他们是“mom ratchawong” (M. R. W. 或者 M. R.)和“mom luang” (M. L.)。

直到 1932 年君主专制制度结束之前，等级和头衔是授予官僚和军事贵族的。一个等级和头衔是与一个职位相联系的。“Chaophraya” 等级的头衔是最高的，它相当于内阁部长、将军以及最重要省级城市的总督。再往下的等级是“phraya”、“phra”、“luang”和“khun”。尽管个人是被称呼等级和头衔的，但是个人的名字还是放在等级和头衔后面，来与同等级别和头衔的人区别开来。因此，“Chaophraya Yommarat (Pan，姓 Sukhum)”与“Chaophraya Yommarat (Thong-in)”区别开来。

货币和度量

本研究中唯一涉及的泰国货币是泰铢“baht”。它的价值在 1880 年前是 8 泰铢相当于 1 英镑，1880 年代期间是 10 泰铢等于 1 英镑，然后经历了一段波动期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稳定在 13 泰铢兑换 1 英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下降为 11 泰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大约稳定在 20 泰铢等于 1 美元，在 1980 年代中期下降到 25 泰铢，到了 1997—1998 年进一步下降到 56 泰铢，2002 年前则是 43 泰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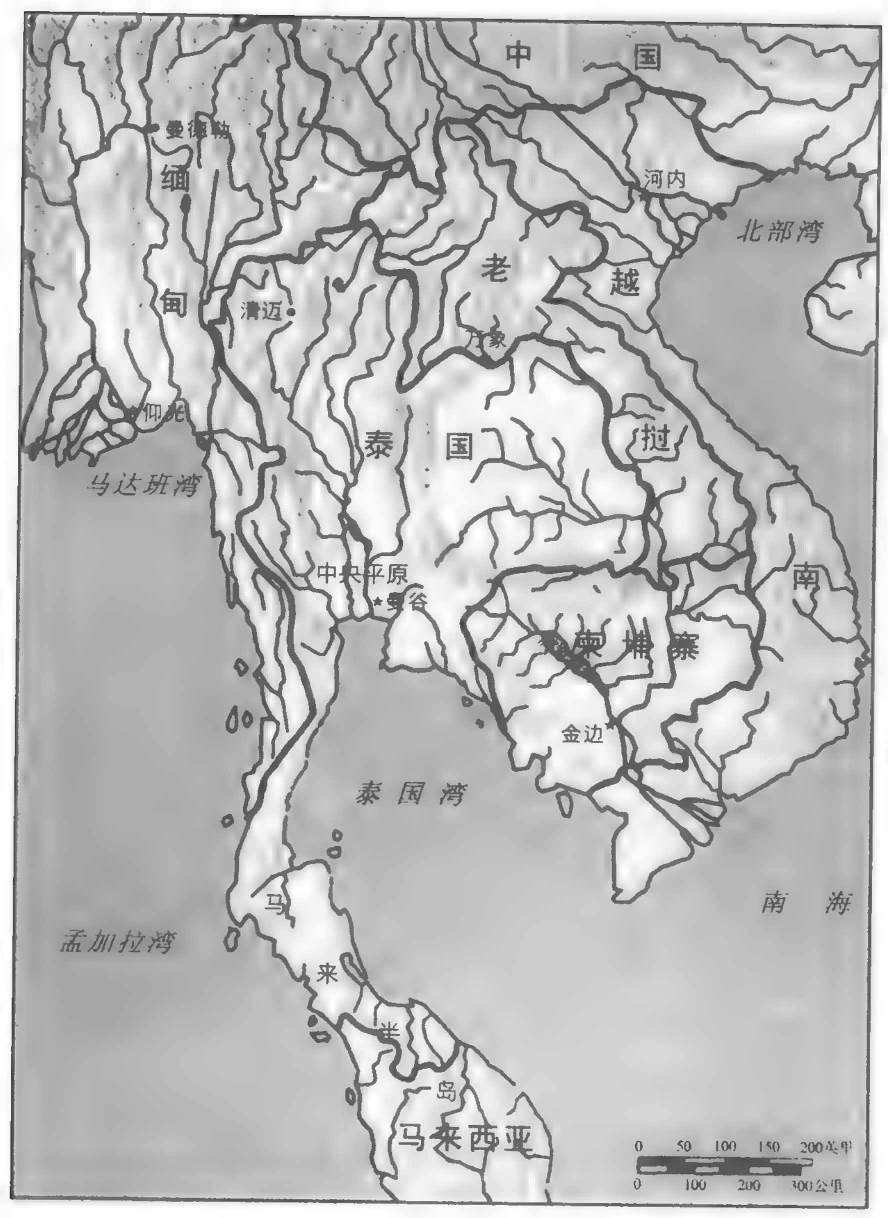
这里使用的唯一一个泰国的度量单位是“picul”，相当于 60 公斤或者 132 磅。

“Rai”是土地面积的度量单位，相当于 0.16 公顷或者 0.4 英亩。

年 表

所有的日期都使用西方术语，是从复杂的泰国日月历法中转换过来的。转换的关键参看 J. C. Eade 的书 *The Calendrical System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Leiden, 1995,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3rd pt., vol. 9),以及他的另一本书 *The Thai Historical Record: A Computer Analysis*(Tokyo,1996)。


中国
曼德勒
缅甸
河内
北部湾
老挝
越南
清迈
万象
仰光
泰国
马达班湾
中央平原
曼谷
柬埔寨
金边
泰国湾
南海
孟加拉湾
马来半岛
马来西亚
0 50 100 150 200英里
0 100 200 300公里

普通自然地理地图

目录 Contents

第二版前言/1

第一版前言/1

编辑说明/1

第一章　傣族历史的起源 /1

第二章　傣族和传统帝国 /17

第三章　1219—1350年间的傣族人世纪 /29

第四章　阿育陀耶王朝及其邻居:1351—1569年 /50

第五章　阿育陀耶帝国:1569—1767年 /87

第六章　早期曼谷帝国:1767—1851年 /123

第七章　孟固和朱拉隆功:1851—1910年 /169

第八章　高涨的精英民族主义:1910—1932年 /212

第九章　军人主导:1932—1957年 /235

第十章　发展和革命:1957—1982年 /270

第十一章　新的开始: 1976—2002年 /297

附录1: 素可泰历任国王 /313

附录2: 兰纳、清迈和兰王国历任国王 /314

附录3: 阿育陀耶、吞武里和曼谷历任国王 /317

附录 4：1932—2002 年泰国历任总理 /320

进一步阅读建议 /322

索引 /339

插图

图版

说明：WLB William L. Bradley 的照片
FAD 泰国文艺厅的照片
PVE Panny Van Esterik 的照片
DKW David K. Wyatt 的照片
DSW Douglas S. Wyatt 的照片
CUL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照片

班清彩漆的器皿(PVE) /4

陀罗钵地王国时期佛教寺庙的界石(DKW) /20

素可泰时期的青铜佛像(FAD) /47

19 世纪的一幅暹罗绘画——建造大城(藏曼谷国家博物馆，FAD) /56

清迈摩诃·柴迪隆寺(DSW) /70

19 世纪的绘画——侬萨莱战役(FAD) /91

1685 年法国耶稣会与纳莱王和他的朝臣一起观看月蚀(CUL) /102

曼谷城市图景(DKW) /153

一个暹罗贵族正在发号施令(WLB) /175

1865 年孟固王被皇家游行的仪式抬进卧佛寺内(WLB) /176

1865 年孟固王和皇子朱拉隆功(WLB) /177

1865 年的颂德·昭披耶·西素立亚旺(川·波纳) /179

1900 年治外法权下的司法体系(FAD) /194

1908 年朱拉隆功在大城对公众发表演讲(FAD) /210

1914 年国王瓦吉拉伍德在"摩诃却克里"号皇家游艇上(FAD) /216

曼谷王朝第七次统治期间警察的不端行为(DKW) /233
1932 年革命中推动者集团中的陆军成员(FAD) /236
元帅披汶作为战时领导向一个士兵授予勋章(FAD) /249
宽·阿派旺总理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FAD) /258
1951 年"曼哈顿"政变,"室利·阿育陀耶"号战舰受到空军的攻击(FAD) /262
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和总理沙立·他那叻(FAD) /276
1973 年 10 月革命时群众聚集在民主纪念碑前纪念 1932 年的革命(FAD) /293
泰国人民解放军 561 连战士 /304

地图

普通自然地理地图 /4
9 和 10 世纪的东南亚大陆 /14
主要的陀罗钵地王国地点 /18
传统帝国:1200 年之前的吴哥和蒲甘 /27
13 世纪后期主要的傣族王国 /31
1540 年的傣族世界 /76
1592—1593 年缅甸的入侵和侬萨莱战役 /90
1763—1767 年缅甸的入侵 /121
1785 年缅甸入侵暹罗 /136
1809 年的拉玛帝国 /144
1785—1909 年泰国的领土损失 /196
当代泰国 /272

表格

表 1 1958—1967 年美国对泰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278
表 2 1961—1978 年主要出口产品的排名 /287
表 3 1937—1980 年的教育成就 /289
表 4 1910—2000 年泰国人口数量 /305
表 5 1947—2000 年泰国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的人口数量级 /306
表 6 1978—2001 年泰国主要出口产品排名 /307

第一章　傣族历史的起源

现代泰国的民族构成同任何国家一样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民族拥有不同的体型、肤色和身高，并且包括农民和电脑程序员、士兵和公共汽车司机、商人和学生、公主和僧侣。实际上，所有人都称呼他们自己为“泰人”(Thai)，并且他们主要从政治意义上来定义“泰人”这个术语：作为“泰人”，他们是泰国的公民、泰国王的臣民。当然，这个术语也同样有文化和语言上的意义：作为“泰人”，他们是泰语言的使用者和泰文化的参与者。不过，由政治、文化和语言等意义构成的“泰人”身份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缓慢发展。现代公民意义上的“泰人”称谓只是在最近才存在。

事实上，直到大约 1 000 年前，那些把当代泰人身份的核心元素带到今日泰国来的民族才到达印度支那半岛的中部地区；我们为他们保留了最好的单词“傣族”——一个通常被用来表示各种各样傣民族的术语，而这些民族共享一个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上的身份，但是这种身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已经分化为许多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身份。现代的泰人可能是来自晚到的傣族人，但是也可能是来自该地区更早的孟族或者高棉族居民或者是更晚一些的中国或者印度移民。经过许多世纪的发展，“泰人”的文化、文明和身份已经演变成为傣族与原住民和移民文化互动的产物。

为了追踪泰人历史，我们必须关注民族、文化和社会，但是我们也

2 必须关注环境。泰人历史是复杂的，因为它发生在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在这里，我们首先考察11世纪之前泰国以外的傣族人的经历；接着，我们将探询他们进入了什么样的世界并且是如何蔓延到湄南河流域的。

今天的傣民族广泛地分布在亚洲大陆东南角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他们最常见的代表是泰国的3 500万到4 000万的泰人（暹罗人）。其他的民族尽管也讲相关的傣语言并且承认自己是傣族，但是他们用其他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种族和语言集团：老族、掸族、泐族、黑傣族、壮族和侬族。这个地区有1亿傣族人，因此这个语言和文化集团的人口数量与法国或者德国的人口数量相当。

用来区分傣族作为一个不同民族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他们的语言。傣语言家族与邻近的东亚和东南亚语言家族的关系尚未明确建立，而且明确地把傣族语言归类于任何更大的语言集团如“拉丁语系”，或者“印欧语系”目前也尚不可能。不过，傣族语言家族内部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明确的，甚至是相关的。例如，在老族、暹罗和掸族的讲话者之间在某种程度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不过，在傣族语言和其他邻近语言如缅甸语、柬埔寨语、越南语或者华语之间却不存在这种显著的关系。

傣族语言通常是单音节并且是有音调的，也就是说，任何傣族语言或者方言的基本词汇都是由单个音节组成的。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早期的傣族语言失去了许多帮助区别单词的辅音，相反，却留下了音调作为区别特色。因此，在曼谷傣语中“来(maa)”是平调发音，而“马(maa)”是高调，“狗(maa)”是升调。在每一个傣族方言或者是语言中声调的种类都是不同的，有的可能甚至多达九种声调。尽管这些变化，但是对于所有傣族语言来说，包含语法结构和词汇的基本语言是相同的[①]。

---

① 我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安东尼·迪勒博士(Dr. Anthony Diller)帮助我形成这一部分的观点。

傣族的文化身份不是那么容易定义的，因为傣族文化中的许多内容与其他的东南亚民族一致，但是这种文化却与印度和中国文化明显不同。如果要解释傣族的文化和语言起源的话，那么我们最好要提及存在于史前时期的东南亚文化集群或者心脏地带，这个文化集群大概位于东南亚的最北部以及中国中部和南部之间。

3

在距今 4 万年前，东南亚各民族的祖先居住在该区域大部分相对固定的定居地上。他们使用许多目前在东南亚地区仍然使用的木制和竹制工具，通过在小溪边和森林里打猎来获取食物。他们用石斧和石刀制作了很多的工具：吹箭管、弓和箭、动物和鱼捕捉器，以及篮子等。到了 2 万至 1 万年前，他们已经开始从事农业活动，培育豆类，驯化一些家禽如鸡等。直到大约 1 万年前，东南亚的各个民族才从文化和语言上区别开来，这些民族分布在从中国中部平原到印尼群岛的岛屿的广阔的区域上。不过，这个分化和分离的过程是发生在之前 3 万年的共同文化基础上。在这里让我们看一下东南亚文明的技术核心和其文化的许多内容。东南亚人驯化了猪、牛和家禽，培育了水稻，并且发明了独木舟，使得航行能够到达远至日本、美拉尼西亚、印度，甚至东非。就如早期的世界上任何地区一样，东南亚也发展了复杂的冶金术。在今日泰国东北部一个地点挖掘到的一个模具也证实了铜和青铜的冶炼，青铜轴在这个模具里被熔铸，这可以追溯到 5 000 多年前。在大约 3 000多年前，该地区也出现了铁的冶炼和陶器的制作技术。

2 000 多年前，东南亚各民族共享了一个共同的、独特的先进文明。与他们的邻居一样，傣族人主要以从事水稻农业来生存，并且以捕鱼和采集林产品为辅。他们以原子家庭的方式生活在小的村子里面，这些村子之间里面通常有定期的交流和一些物品的交易：纺织品、金属工具、陶器和盐等。由于该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受到高度重视，与中国和印度妇女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相比，这里的妇女肯定享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在确定继承权上，母系和父系享有平等的权利，儿子和女儿们通常获得同等份额的父母遗产。在整个地区，民间信仰一直存在着。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有好的神灵和坏的神灵，它们有能力

来帮助或者伤害人类。因此,要用仪式或者提供神物的方式来安抚它们。妇女经常被认为有能力在人类和神灵世界之间进行调解,而且她们被要求去治病或者去改变不好的天气。自然和世界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和敌对的,而且人类不得不尽全力去对付它们。

4

最早涉及傣民族的中文文献一般会提及代表史前东南亚文化的这幅图。中国人遇到的傣民族总是被认为是居住在山谷和低地,而不是居住在山坡和高地,而且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以灌溉水稻种植作为经济基础。许多傣民族非常看重黄牛(水牛),除了用来拖拉东西,它们更经常地被用来衡量地位和财富以及在各种仪式上使用。与他们的中国人和越南人邻居相比,傣民族经常被描述为居住在地面之上搭建而成的房子里面。习惯上,年轻人被允许自由地选择婚姻伴侣,而且在每年的春节被授予广泛的性许可。通过成年仪式,相关的刺字文身在男人中



5 班清彩漆的器皿(晚期·私人收藏·曼谷)

间普遍地施行,而且一种毒物玩偶形式的巫术也在傣民族中广泛地存在。

中文文献中曾经提及,在公元1世纪早期傣民族散居在中国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公元1世纪早期存在任何傣族"国家",当然也与公元第一个千年内出现在东南亚北部的傣公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些理论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在语言学家中间一种共识正在形成,而且在某些观点上与傣民族对自己起源上的解释非常近似。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最后几个世纪以前,东南亚民族的主要语言和文化家族已经各自区别开来。东南亚的岛屿民族,从菲律宾到马来半岛,使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南岛语系)。而在印度支那半岛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民族,从下缅甸到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都使用南亚语系,如孟和高棉语(柬埔寨)。缅甸人居住在缅甸的北部和中国的西南部,越南人则沿着越南北部和中国东南部的海岸居住。在越南语和高棉语使用者之间的越南中部和南部地区有一些南亚语系如占族语的使用者。

在同一时间,在中国最南部——今天的贵州和广西的内陆河流域有大量同类的人使用我们认为的"原始傣语"。这些人面对着来自他们邻居——北部的中国和东部的越南——的不断上升的人口、经济和政治压力。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各集团变得各自分离,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开始分流。中华帝国沿着南中国海岸向红河三角洲区域(今天的越南北部)的扩张加速了在基督教时代最早几个世纪里面原始傣族语言使用者的分散。这也许是巧合,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扩张加速了一些傣人向南迁移。他们迁移到了现在越南北部的高地和老挝的最东北部。在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和越南逐渐地加大了行政和军事控制,并且沿着红河河谷向西北方向移动。他们把早期的傣族分成了两个集团。第一个集团是那些留在红河河谷北部和东北部的民族,如广西的壮族和越南的土族和侬族,他们独立地发展出了自己的语言并且在中国和越南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6

在公元5到8世纪的时候，第二支南部傣族集团应该位于黑河河谷、老挝最北部和中国邻近的地区。在概念上，我们可以把这个傣族集团与奠边府地区相联系，他们是位于老挝、泰国、缅甸、印度东北部和云南南部的老族、暹罗族、掸族和高地傣族的祖先。面对着新环境，他们的关注焦点、习惯和想法也开始侧重于新的方向。他们逐渐与其北方的亲戚脱离关系，最后甚至忘记与他们的亲戚关系。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面，也许是7到13世纪，他们向西和向南扩张了大约1 100－1 600公里。不过，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都保存了他们的民间记忆和传统，一种被他们语系所证实的共同血统感。

傣族村落和村落联合体(müang)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时候，傣族人生活的基础是由单一原子家庭组成的农户。通过种植水稻和蔬菜，养育牛和家禽，在附近的小溪里面捕鱼，在树林里面狩猎，编织衣物以及制作陶器和工具，这些家庭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在收获的季节或者修建桥梁和建造房屋的时候，一些家庭共用一些劳动力。一个非正式的乡村长老议事会来协调这些活动，这些长老也调解争议，安排社区节日。

这些村落不能够孤立地存在。比如，傣族人乡村间进行盐和金属等物品的贸易。在战争的时候，单个乡村的力量是极其脆弱的。村落联合体(müang，音译“蒙”)是单个村落之上的主要单位。“müang”这个词很难翻译，因为它不仅表示社会关系也表示空间关系；它不仅表示位于相互关联的乡村网络中心的镇，还表示镇和被单一的昭控制的乡村的整体。这样的村落联合体源自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在最强大的村落或者家庭领导下，傣族人村落联合起来进行共同防御。这些村落或者家庭的资源能够武装起来并且供给军队。为了报答这种保护，村落向他们的领主提供劳务或者偿付大量的本地产品或者手工艺品。

7

这是一种互惠的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方的优势将会增加。那些起初并不比他们周围村落面积大的村落联合体中心将会变

得更加繁荣和强大。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高地傣族人的组织形式也被认为是有利于帝国如中国和越南的统治的,他们更喜欢与几个村落联合体打交道,而不是无数的村落。越南和中国都采纳同样的模式,认为傣族人的领主是他们社区的领导,或者是敌人,或者是同盟,或者是藩属。为了回报他们对中国优势的认可和每年的朝贡,领主被允许独自控制一个相对隔绝的(从邻近中国官员的观点来看)同时也不那么重要的社区的生活。这也是另一个层次上的互惠关系。通过这层关系,已经开始在内部整合的乡村傣族人社区,至少也松散地卷入了更大的外部世界。

另外还有一个他们更接近的世界。很明显从远古时期开始,傣族人就不是内陆高地的唯一居住者。他们的灌溉水稻农业使得他们必须居住在低洼的山谷里面,而其他的各种种族和语言的民族则居住在他们上面的山丘上。从很早的时候,傣族人的领主就与这些邻近的团体建立了联系,把他们作为奴隶和卑贱的劳工,把他们的头领作为"藩属",就如他们是中国统治者的"藩属"一样。这些模式不仅对他们早期高地生存的直接环境有意义,同样这些模式作为高地傣族各民族内部发展政治技巧和模式的早期阶段也是有意义的。这些政治技巧和模式后来成为他们国家建设"技术"的一部分。

高地傣族人村落联合体的结构是渐进发展的。成功的村落联合体能够自己防卫来自邻近的村落联合体、山顶民族和主要大国的攻击。他们在自己的区域内维持秩序,并且通过惩罚罪犯和解决乡村间如土地或者用水权利和家畜偷盗等等争议来履行一些正义。他们提供了一种能够产生产品交易和生产的经济框架。他们肯定能从那些通过缴纳税款来换取安全和秩序中获得好处。村落联合体的统治家庭能够获得在周围村落之上至少一个层次的支持。一个领主能够建立自己掌握的用来征收税收收入和解决法律申诉的行政机构,他经常任命他的后代(通常是但不一定总是他的长子)到一个高的管理位置,这样,年轻人能够使自己熟悉并且能够掌控村落联合体所依靠的个人关系。通过这种方式,领主能够使继承问题规范化。

8

在一个土地丰富但是劳力短缺的地区，傣族人的村落联合体能够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在这个世界里，家畜、贵金属或者谷物等财富可能由于强盗的袭击或者战争而一夜之间消失。安全、财富和生命都必须依靠个人和能够提供秩序的家庭之间的关系。尽管村落联合体社区是有等级的，但是很明显，人们是相互依靠的。在面对着对抗的时候，领主可以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但是乡村农民也可以诉诸于逃离到周围的荒野或者急切需要劳力的周围的村落联合体。由于倾向于相互适应和妥协，双方都避免这些极端的求助方式。

在公元纪年(Common Era)的第一个千年期间，东南亚高地内陆的傣族人社区的人口获得了稳定的增长。在当时的生态和政治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增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组织良好和强大的中国和越南居民控制了并且密集地定居在东部和东北部的海岸低地，那些在技术、武器和社会及政治组织都不好，从而无法成功地与傣族人相竞争的民族，则零星地定居在西部和西南部的高地河谷中。

傣族集团的编年史充满了人口和政治运动的故事。典型的例子，如，一个统治者把村落联合体的男人集合起来，组成一个通常由他的儿子们领导的军事远征队。他们征服或者殖民于一个遥远的地区，并且与来自原来村落联合体的家庭一起定居下来。他们将把"森林变成水稻田"并且在由一个年轻王子统治的有组织的社区里定居下来。那个统治者可能组织他所有儿子的继承活动，在增强原来村落联合体力量的同时，给予每个儿子一个单独的领地去统治。儿子们可能按照资历大小被派出去，这样最小的儿子就可以继承父亲的领地。在越南和老挝的北部地区，适合种植水稻的山谷都是狭小的，并且被艰险的多山区域所分割。傣族的人口和政治中心迅速地向西面和西南面转移。等到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兄弟们发现很难把他们的领地维系在一起，而且无法轻易地保护自己免受试图控制他们的中国人或者越南人的攻击。而且，一个王子经常想为他的儿子们提供和他自己一样被提供的东西。按照这种方式，傣族领地的范围可能缓慢地延伸到印度支那的北部。

一些早期的传说如老族人讲述的坤博隆故事传达了傣族人早期扩

张的民间记忆。根据这个故事，在地球历史的早期，人类是未开化的、粗鲁的和野蛮的，并且还没有定居下来从事农业。人类对天堂精神的忘恩负义激怒了众神之长，他在地球上释放了一场洪水，仅有三个首领得以逃脱。他们向众神之长申请并且留在他身边直到洪水消退。然后，他们携带着一头水牛回到地球，这头水牛帮助他们在奠边府周围的大平原上耕种稻田并且随后死掉。死去的水牛的鼻孔里面长出一个巨大的结出葫芦或者南瓜的植物，并且不久有噪音发出来。当葫芦被刺穿，人类就蜂拥而出居住到了地球上。老族人认为那些被拨火棍刺破的葫芦的洞里出来的人是黑皮肤的土著人，而那些从用凿子刺破的洞里出来的是淡颜色皮肤的老族人。

在神的帮助下，他们的首领教傣族人（只有傣族人）如何建造房屋和种植水稻并且遵守适当的行为和礼仪。人口增长得很快，人类在治理方面需要帮助。于是，众神之长派遣自己的儿子坤博隆来到地球，伴随他来到地球的还有朝臣、教师、工具和有用的艺术。经过 25 年的繁荣统治，坤博隆任命他的七个儿子去治理傣族地区——大儿子去琅勃拉邦，其他的分别去川圹、大城、清迈、西双版纳（今中国云南南部）、汉纱瓦帝（下缅甸的勃固的一个孟邦）和一个明显在越南北中部的地区（义安省?）。根据另一个版本——川圹版本，这个传说发生在公元 698 年。

坤博隆的传说对傣族的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它提及的许多国家都是在几个世纪后才建立的，不过考古学材料表明傣族文化出现得更早一些。然而这个传说传达了相对分散的傣族人之间的一种空间关系，这也与当代学者的发现相一致。语言和文献上的证据表明在 7 世纪到 10 或者 11 世纪之间，傣族人的一些这样的分裂和分散沿着与该传说相一致的地理线发生了。我们注意到，尽管在传说中坤博隆是到了奠边府地区，但是这个区域并没有留给他的儿子们去统治。而且，他的儿子们被派遣去统治的区域名单中忽略掉了今日越南北部的高地傣族世界。在很早的时期，黑傣族、白傣族、红傣族及其他类似的团体已经从老族和暹罗族语言的母语里面分离出来，而且在 8 到 11 世

10

纪之间，它们也从西北部的语言如掸族、阿洪族、泐族和北部傣族(泰原语)分离出来。

在公元 8 世纪以前，傣族世界已经扩展到了东南亚的北部，而且分化成五个语言集团。第一，留在中国的北部集团演化成今日壮族的祖先。第二，在越南北部的另一个高地傣族集团是黑、白和红傣的祖先。第三，另一组在老挝东北部和邻近越南区域的傣族人则是川圹和暹罗阿育陀耶的祖先。第四组在老挝的北部，也许是琅勃拉邦的邻近地区。最后一个也是第五个在他们的西边，位于泰国的最北部和老挝、云南与缅甸的邻近地区。

我们是如何知道在这么早的时期，这些傣族语言的使用者居住在这些特定的区域呢？我们如何知道在 8 世纪以前他们没有进一步北移到也许是云南？自从上个世纪交接以来，许多人认为直到 13 世纪傣族人才进入东南亚，在那以前，他们已经在云南建立了强大的王国南诏。这种观点认为当 1253 年蒙古人征服云南的时候，傣族人被驱散了。为了应对这个观点和考察早期傣族人发展他们的文化和制度的环境，我们有必要去探询“南诏问题”和描绘在傣族人历史中一个重要时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

南诏

在公元 2 世纪的时候，中国人控制了现在的云南省地区。在那里，中国人发现了各种各样他们称为“蛮人”(man)的民族，其中的一些接受了中华文明。其中的一个当地统治家族是爨(Zuan)家族，他们控制的中心区域从昆明向南扩展到越南边疆。在公元 3 世纪汉朝灭亡后，他们成为这一地区的世袭酋长，这个地区居住着傣族和苗—瑶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省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由中国人称之为“乌蛮”的民族所控制，这些民族使用那些类似于目前仍然居住在该地区的黑彝族(倮倮族)和拉祜族所使用的藏缅语言。这些 7 世纪的云南西部的乌蛮人处于南诏王国的中心位置。

11

到了公元 7 世纪，中国人控制了云南的一半面积，并且向西扩张到

湄公河流域。但是不久中国人就处于防御的地位,因为西藏人的扩张威胁到中国人在云南和四川的疆域。中国人通过与当地的王公建立同盟来保持疆域安全。其中的一个这样的同盟是与皮逻阁建立的。他是蒙舍诏的统治者,蒙舍诏是当时在云南西部大理湖周围的六个小的王公国之一。在8世纪30年代,皮逻阁统一了这六个小的王国,并且在738年被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在整个8世纪40年代,“南部王(南诏)”与唐朝保持了友好的关系,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也就是在皮逻阁之子阁逻凤统治期间,两者的关系迅速恶化。在752年到754年间,唐朝曾经四次派遣军队去进攻南诏,但是每次都被阁逻凤的军队击败。于是南诏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云南的东部和贵州的西部。一旦唐朝的境内充满了反叛活动,唐朝对南诏的压力就减轻了。随着764年第二个首都在今日昆明的建立,这个西南部的新帝国的根基就建立起来了。

对南诏最广泛的同时代的描述是一个中国官员在9世纪60年代写的一本书:《蛮书》[①]。它描述了一个组织良好、半军事化的以及统治了许多少数民族的王国。这个王国通过六个“委员会”来进行管理,“委员会”相当于今日的部,分别负责战争、人口、税收、接待外国客人、惩罚、工作和集会。权力和地位在这六个委员会之上的是十二个“大将军”,他们“每天朝觐南诏王并且研讨(公共)事务”,而且六个“纯洁和正直的官员”作为国王的枢密院成员[②]。行政管理还包括一系列不同等级的官员,从负责100户的役员到负责1万户的主管。男性户主每年要缴纳18升(16品脱)的稻米作为税收,而且有义务被征召去服兵役。军队对农村小伙子有它的吸引力,这些小伙子“在农闲的时候”练习技能。南诏的军队在战场上是非常熟练的、有力的、纪律严明和有效的。

12

① 《蛮书》:又名《云南志》、《南夷志》、《南蛮志》,10卷,唐代人樊绰撰。——译者注

② G. H. Luce 翻译, *Man Shu* (*Book of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Ithaca, 1961), pp. 83–84。

几个世纪以来,南诏在东南亚北部和东亚南部的各种事务中是个主要的大国。它的军队给缅甸中部的骠国造成了压力,攻击了今日的缅甸南部和泰国的北部,并且发起了对高棉人的真腊王国的攻击,据说已经"攻击到了海边",还发起了对中国保护国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的多次远征。但是这以后,随着中国的复兴,越南的重新独立(从939年起),以及开始重塑东南亚北部的新情况的发展,南诏的力量开始衰退。

南诏的意义对傣族来说并不是其统治者的身份,因为它的统治者不是傣族人。在选取他们名字的时候,南诏的统治者遵照父系制度,每个统治者的名字的第一音节与他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相同,如皮逻阁、阁逻凤、凤伽异、异牟寻等等,这种模式在黑彝族(倮倮族)和其他藏缅语系非常常见,但是在傣族人中间却见不到。而且,在《蛮书》中提及的南诏词汇可以在黑彝族(倮倮族)中找到,但是在傣族中却找不到。也没有傣族的传说或者纪年提及南诏或者它的任何一个统治者,但是19世纪云南中部的黑彝族(倮倮族)首领把他们的祖先历史追溯到南诏的统治。相反,南诏的意义在于其对生活在该帝国中部和边陲地区的傣族人的影响。

南诏开辟了印度和中国之间陆路交流的路线,因此,它的知识和文化意义是重要的。南诏变成了一个佛教政体,因此它一定对佛教和印度艺术及科学在其统治区域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但是,南诏的兴起阻碍了内陆东南亚北部与中国的直接交往。与此同时,南诏的力量促进了中国与印度的陆路贸易,也刺激了东南亚北部的当地贸易。当地的王国抓住了这个政治机会。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人或者保护国的庇护,从而利用这种关系来对抗他们的邻居。他们也模仿南诏的一些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的特点。为了保卫自己,那些即使没有受到南诏直接统治的傣族领主也受到压力不得不去动员他们的劳动力。南诏不是第一个侵犯傣族世界的主要大国,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它是第一个卷入大陆东南亚内陆高地的主

13 要大国,这些内陆高地包括今天的缅甸掸邦、泰国和老挝的北部、越南

的西北部。不过，南诏的势力在8、9世纪处于全盛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面，它受到了来自南方几个不同类型的帝国的压力。

有关南诏的存在记录没有提及任何可以被认为是9、10世纪东南亚高地的傣族政权的任何东西。不过，这些记录提及了许多政体，这些政体将是南方的邻居，并将是接下来几个世纪傣族人的对手，将对傣族的文明形成作出关键性的重要贡献。从东到西，这些政体包括位于红河河谷和越南北部三角洲的一个越南王朝，位于越南中部海岸的占婆王国，吴哥的高棉帝国，泰国中部和北部的王国，缅甸的孟族和骠族王朝。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王国面向海洋，对高地的傣族人形成了包围圈。尤其从9世纪开始，这些王国在力量和领土面积上获得了增长，傣族人也逐渐地卷入他们的生活和政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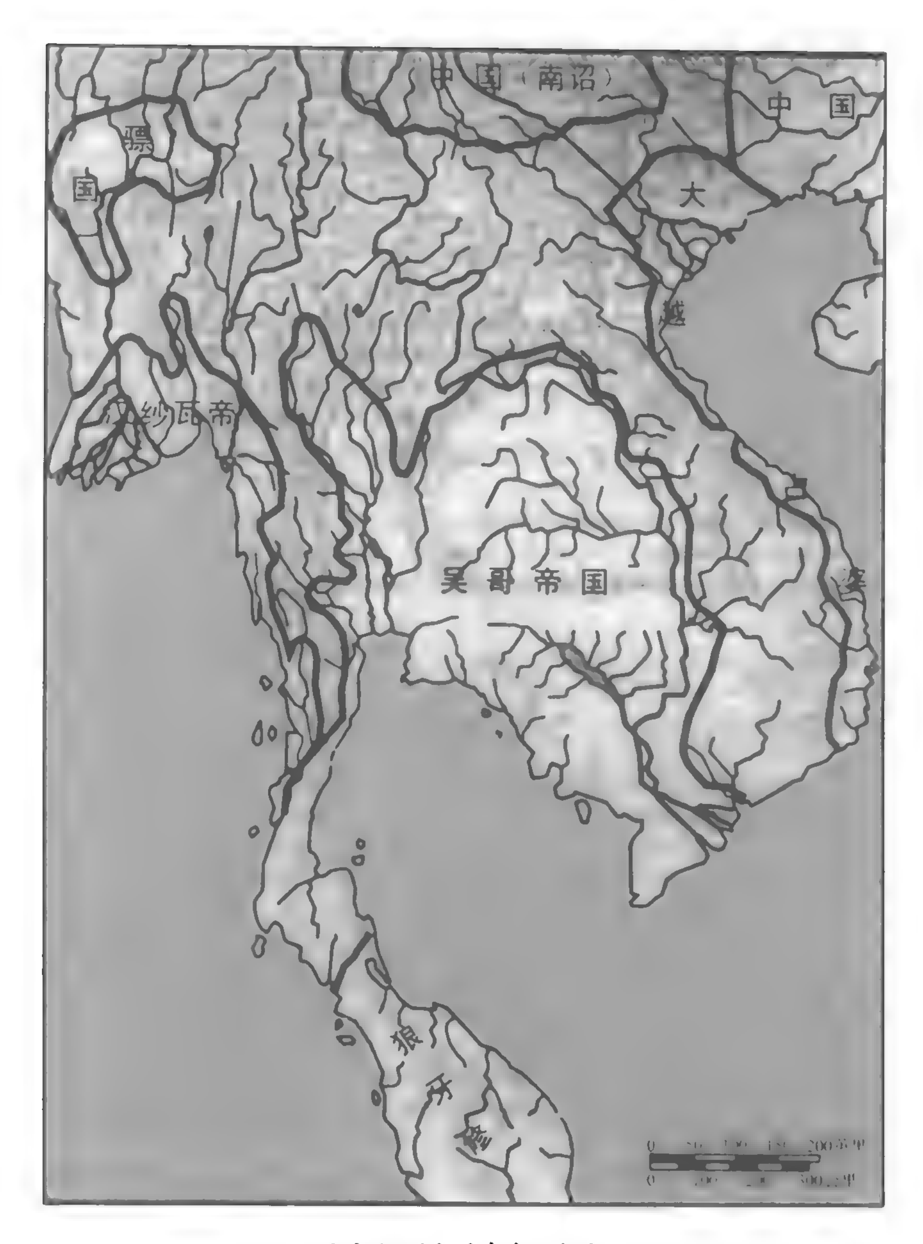
9和10世纪的东南亚大陆

在越南北部，939年从中国管理和控制中独立出来的越南人王国以沿海平原和红河三角洲作为自己的基地。它的周围被主要的大国包围：北面的中国，西北面的南诏，南面和西南面的柬埔寨的吴哥和占婆。把越南人与他们的竞争对手隔离开来的高地地区居住者是第三方的居民，尤其是傣族人。历任越南统治者的力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至少保持了中立的态度。在北部疆域，越南发起了主要的外交攻势，通过赐予越南公主，越南与当地的首领建立了联盟。

在9和10世纪，占婆对其强大邻居的侵犯展开反击。在9世纪的初期，它能够短暂地威胁到中国、越南和柬埔寨的统治，但是不久它就处于防御的地位，它的领土也缩小到中部越南的不断萎缩的一小片。它与湄公河中游和今天的老挝北部及泰国东北部有陆路交流。1050年的一个碑刻提及，正是通过这些涉及贸易和战争的联系，傣族人奴隶被运到占婆。

14

在该地区的所有帝国中，吴哥帝国扩张的速度最快，其扩张是在802年阇耶跋摩二世登上王位后开始的。在两个世纪里，他和他的继任者，尤其是耶输跋摩一世(889－900)，建成了使它的所有竞争对手



9和10世纪的东南亚大陆

都相形见绌的帝国。从腹地开始，它占据了包括以洞里萨湖为中心的柬埔寨核心地区以及呵叻高原的南半部。它向所有的方向扩张。在东面，它控制了湄公河流域，把占婆人赶到了越南海岸。在北面，它至少扩张到了今日老挝的万象平原，甚至可以对琅勃拉邦和清盛地区施加影响。而且通过清盛地区，它进入与南诏接壤的西双版纳地区。在西面和西北面，它控制了泰国湄南河流域较低的河谷地区，并且加强了对接近今日清迈的孟王国诃梨朋阇耶的宗主国地位。耶输跋摩一世甚至在马来半岛建立了强大的统治，通过马来半岛，吴哥王朝也许可以控制在加罗希和单马令[①]的定居者或者军营社区。

在西面，在今天的缅甸地区，在 9 和 10 世纪，那里没有强大的单一帝国。来自南诏的压力已经减小了。以卑谬(后来以北的瑞波)为中心的骠国已经倒塌，居民散居到他们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洛瓦底江河谷，而缅甸人也正在往这里迁移。在 9 世纪中期，缅人以曼德勒地区的灌溉稻谷土地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小的以蒲甘为中心的新王国。在海边，由于 835 年南诏的再次入侵，一个新的王国也正在马达班湾北岸的勃固兴起。所有这些王国看起来都与高地山谷里面后来的掸王国没有关系。

最后，经过几十年在缅甸、越南和四川(在 880 年与中国缔结和平条约结束)的让人精疲力尽的战争，南诏在 9 世纪中期后把它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限制在其位于今中国西南部的心腹地带。在接下来的 120 年里，南诏有 12 个国王，其政治上陷入了不稳定，但是看起来没有一个国王对南部的区域有积极的兴趣。

在 9 和 10 世纪期间，我们可以想象到傣族人生活在一个基本上不受骚扰的、处于各个大国之间的东南亚高地区域。由于南诏在早期通过该区域来对缅甸各王国、柬埔寨真腊王国和越南进行军事征伐，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同一时期吴哥也对该地区有兴趣，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这一时期的傣族并没有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被孤立。也许与骠族和缅族人

16

① 单马令(Tambralinga)今天泰国的洛坤府。——译者注

一样,各种各样的傣族人被征召进南诏军队,远离家园服兵役。傣族人也许被冲突的各方当作战俘和奴隶,有些人可能前往遥远的首都去贸易或者宗教朝圣。傣族人已经开始成为东南亚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仍然还没有一点自己的历史。只有当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和帝国的时候,这一刻才能到来。

第二章　傣族和传统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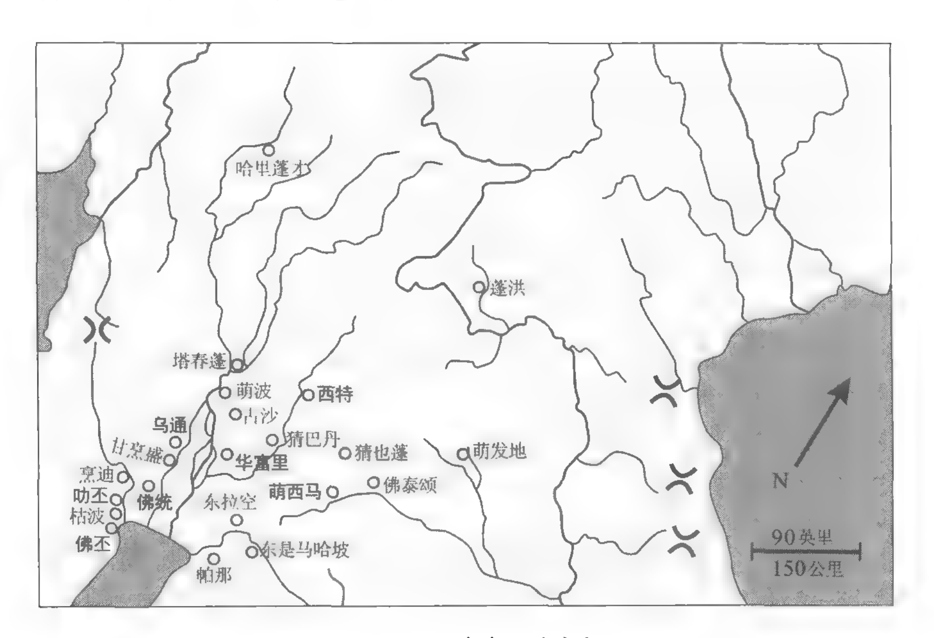
11 和 12 世纪是大陆东南亚传统的印度化帝国的黄金时代。17
在这一时期，他们建造了最伟大的纪念碑，留下了许多石头雕刻来证明他们的学习能力。这是吴哥和蒲甘王朝的伟大时代，这是国王苏耶跋摩一世、苏耶跋摩二世、阇耶跋摩七世、阿奴律陀、江喜陀的时代，这是吴哥寺、吴哥城、巴戎寺和蒲甘王朝无数寺庙的时代。而且吴哥和蒲甘文明不仅仅是个精英现象，也不仅仅局限在远离普通人生活的首都地区，它传播到遥远的乡村并且渗透到傣族人和其他种族居住的边远地区。考虑一下 11 和 12 世纪的传统文明和傣族人的关系，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们的印度化以及融合到东南亚低地文明的情况。

即使在今天，在经历过印度化的和没有经历过印度化的傣族人，佛教和非佛教傣族人，那些从梵文和巴利文吸收词汇的傣族人和没有吸收的傣族人之间，都有一个鲜明的分界线。很明显，那些在 11 和 12 世纪受到吴哥和蒲甘文明影响的傣族人与没有受到影响的傣族人之间，也有同样的分界线。

陀罗钵地王国

中部东南亚的一种佛教文明的根基在 6 世纪和 9 世纪之间得以奠

18 定。在这期间，一个独特的佛教文化综合体在泰国的中部和东北部发展起来，这个文化与孟族和陀罗钵地这个名字有关。但是我们对它的历史、地理范围，甚至其首都的位置（如果它有一个首都的话）一点都不了解。不过，它的许多碑铭是用孟族语雕刻的，而且一般认为 6 世纪后期利用马达班湾和泰国湾（通过三塔关）之间内陆贸易而兴起的陀罗钵地王国与其说是一个帝国，不如说是一种文明。陀罗钵地王国的这些地点密集地聚集在一起，能够追溯到最早的时期，并且分散在泰国中部平原的边缘。西边在佛统和素攀武里附近的地点尤其出名，因为这里出土了上面有题名“陀罗钵地王国大王”的硬币，这是这个国家的名字曾经存在的唯一一个当地证据。



主要的陀罗钵地王国地点

陀罗钵地王国各个地点的分散和在这些地点发现的东西的本质都提供了有关陀罗钵地王国文明相当多的信息。陀罗钵地文明的核心地点环绕着泰国中部平原，并且沿着陆路贸易路线向外扩张，向西到缅甸，向东到柬埔寨，向北沿着湄南河到清迈以及沿着帕萨河到老挝北部，向东北到呵叻高原。这些地点的特殊的构造表明了一种商业趋向，

19

而且发现的物品也不是东南亚当地的,如珠子、硬币、灯和进口的雕塑等,这些都表明了它们的对外联系,这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重要的。

陀罗钵地文明的东北部从呵叻府的蒙西马沿着呵叻高原至少延伸到加拉信省的蒙法岱,而且也许扩展到万象平原北部边缘的蓬洪,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很有特点的陀罗钵地佛像。这不禁让人猜想这些地点位于连接泰国湾和越南北部的一条陆路贸易线上。最后,以南奔和清迈为中心的北部的一小部分地点传统上被认为是在 8 世纪建造的,并且是在华富里的陀罗钵地王国主要中心的一个分支。这些北部的地点涉及湄南河河谷与云南的陆路贸易。

实际上所有这些地点(甚至包括在蒙法岱的那个地点)的共同点是:碑铭都是使用的孟族语言,城镇(平面通常为圆形或椭圆形)由土城墙和护城河来加固,大量的佛教遗迹,包括宗教建筑、佛教塑像、雕刻和烤黏土或金属还愿片。孟族的碑铭没有给该地区的政治史提供任何信息,因此必须根据其他的证据来进行推断。加固的城镇城墙里面往往多达 10 平方公里之广,这表明人口的众多。这些城镇居民可能不依靠周围乡村农民的劳动来生活,他们参与了运输贸易如金属、香料、木产品和纺织品。他们支持大量的宗教机构,但是不一定是佛教。通过云游的僧侣和进口的神圣的经文和艺术作品,他们与印度保持着联系,因此他们的宗教生活得到不断的更新。陀罗钵地的宗教雕像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是由当地的工匠从当地的岩石雕刻出来或者在赤土陶器或灰泥中进行塑造。以欧洲时尚风格来供以座位的石佛像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被广为传布。最不常见的是放置雕刻的石头来标记神圣寺院区域的界限,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蒙法岱。很多陀罗钵地王国的地点都有大量的小的烤黏土制作的有佛像的还愿片,这些还愿片有时候用孟族字母以巴利文宗教的方式来题写。这些考古遗迹证明了在今日的泰国和老挝部分地区曾经存在一个广泛的、人口众多的和繁荣的佛教文明。也许部分由于其孟族种族和语言身份,陀罗钵地文明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与邻近的高棉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0

傣族人生活在陀罗钵地王国的边缘地带,也许已经开始卷入他们

的生活。因此,也许与傣族人历史有更直接的关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陀罗钵地王国期间,中部东南亚当地区域的一些关系模式已经很好地建立了。在陀罗钵地王国繁荣时期,泰国湾和上湄公河(通过清迈和南奔)和中部湄公河区域(通过呵叻高原),更远甚至到云南,真腊和越南的首领之间的固定交流已经建立。



陀罗钵地王国时期佛教寺庙的界石

21 两个例子表明这些关系的重要性。第一,根据泰国北部编年史体现的传统,诃梨朋阇耶王国是由一群与南边的华富里保持联系的前宗教僧侣于公元 661 年 2 月 19 日在南奔建立的。(这个日期明显是假的,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这个日期应该是 9 世纪初期。)他们要求华富里王国的佛教国王给他们提供一个统治者。于是,国王派遣了自己的女儿加玛德薇

前去。她与一大批孟族随员到达诃梨朋阇耶,建立了一个持续到 11 世纪中期的王朝。在这个孟族王朝统治期间和之后,华富里继续作为诃梨朋阇耶和北部地区的文化和宗教中心。佛教僧侣前去训练和学习,这样,一些商业和政治联系从而可能得以维持。

由于关于其政治宪法与种族构成的很多问题没有答案,6 至 9 世纪的陀罗钵地王国还有很多疑问。我们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它所统治的疆域范围,我们也不知道它统治下的民众是谁。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有一个首都以及它的位置。但是当傣族人开始出现在低地帝王统治者的碑铭上的时候,傣族人很有可能已经进入到与陀罗钵地王国文明有关系的区域的北部。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建立而且与"外部世界"已经形成强大联系并且得以持续。

吴哥和傣族

这让人很容易地在描绘吴哥王国时期的时候与早期的陀罗钵地王国进行对照。在 11 和 12 世纪,吴哥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首都,还留下了很多的碑铭,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它的政治史看起来如陀罗钵地王国政治史那样是不清楚的。我们知道 9 世纪早期阇耶跋摩二世在吴哥地区建立首都之后,这个帝国迅速向西部和北部扩张。我们有理由认为在 9 世纪末期,通过攻破陀罗钵地王国的首都或者征服其统治的疆域,吴哥成功地代替了陀罗钵地王国在中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我们也有理由得出结论:到了 9 世纪后期,吴哥已经成为大部分地区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

在评估吴哥王国对该地区的意义的时候,对该王国的核心高棉人省份与那些也许是非高棉人居住的周围边缘省份作出区分尽管是武断的,但却是有用的。从这个王国统治后期(13 世纪初期)的状况看,我们可以猜测在 11 和 12 世纪,高棉人已经在如下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居民:今天的柬埔寨境内,湄公河下游向北到沙湾拿吉,齐河河谷北部到黎逸,整个孟河河谷西到呵叻地区,以及今天曼谷的北部和西部。仍然存在的孟—佛教—陀罗钵地人口也许主要集中在西部,也就是在中部平

22

原下游和南奔一清迈地区的平河盆地的上部。在这一时期,在今天泰国东北部以东的他们的同类也许已经被吸收进高棉人口,或者进入到开始迁移到他们中间的傣族人行列中。

根据主要的纪念碑遗迹和高棉的碑铭,我们可以看出吴哥统治者采用了很多的方法来控制其帝国的边缘地区。通过武力或者外交手段建立霸权后,吴哥在最重要的省份派遣省长,有的时候甚至派遣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子过去。他们通常有大量的随从官员跟随:巡官、税务官、军需官、文士、法官、法律学者、陪审法官和军事卫戍部队。同时跟随他们的还有宗教人士,来维持他们既有的宗教如婆罗门教或者佛教。在吴哥帝国核心区域之外的省份中心主要包括:湄公河流域中部的塔帕侬、沙功那空、赛凤、呵叻地区的碧迈,湄南河下游的华富里、素攀武里、那坤猜席、叻丕(也许是碧武里),和泰国中部平原北部地区的彭世洛、宋加洛、素可泰或者撒查那来。

尤其是从国王阇耶跋摩七世(1181 — 1219)统治开始,但是更明确的应该是更早的时期,吴哥帝国通过影响其统治区域的一个沟通和制度网络把整个帝国维系在一起。通过在平原之上几米高的地方并且在经过水道的时候建造桥梁,这样的一个公路系统把帝国的核心地区联系起来。人们在碧迈和吴哥之间以及塔帕侬和赛凤之间发现了这个公路系统的遗迹。我们也许可以假定类似的公路至少修到了华富里,因为从那里向北和向西的水路曾经存在。在远处的吴哥国王和当地统治者的资助下,主要的宗教机构在遥远的省份得以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是寻求灵感的大乘佛教,从这种形式的佛教在朝廷中成为一种时髦开始,它就成为最重要的宗教。但是相当多的人信奉婆罗门教的僧侣和教师指导的湿婆教和毗湿奴教。无论哪一种情况,建立一个宗教机构对周围的民众意味着更多的付出,而不仅仅是在他们中间建造不可否认的辉煌建筑。他们的资源,无论是劳力还是实物,被号召去建造这些巨大的纪念碑。许多家庭成为寺院的永久奴隶来支持这些机构,通过保养楼宇或宗教服务的工作来获得免税和征兵义务。这些机构的目的是来表示对神和宗教的效忠以及用来把社会与作为统治者和神

23

(湿婆、毗湿奴和佛陀三个印度神)的国王联系起来的宗教和政治工具。因此,参与这些围绕在庙宇周围的宗教仪式是一种政治和宗教行为。

吴哥帝国边缘地区的人口构成主要是傣族人,在湄公河中游的老挝地区和泰国中部的暹罗地区。在这两个区域,尽管目前的当地宗教仪式和信仰受到了上座部佛教(或者小乘佛教)的影响,但是仍然留有早期大乘佛教的一些印记(例如,保留有一些梵文的佛教术语,而不是小乘佛教的巴利文),尤其是婆罗门教的一种混合。在确保一个好收成、恢复健康、庆祝成年仪式(成年、结婚和死亡)等这些宗教仪式中,他们使用非佛教的仪式,对信仰的表达来自已经在吴哥统治时期实行的婆罗门教的大众形式。而且,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直到最近,对湿婆林伽像——湿婆神的阳具崇拜,在许多的村子和很多的乡镇里面得到尊重。我们必须假定,为了证明他们生存得很持久,暹罗人和中部老挝人对这些宗教经历了一个甚早的漫长的接触和卷入。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当他们作为一些大工程的兼职劳工、士兵或庙宇奴隶逐渐地融入到吴哥人的一些省份社会里面,而且他们还没有成为它的统治阶层的时候,这些接触和卷入就发生了。

24

但是谁是这些吴哥人省份社会里面的统治阶层呢?统治阶层的大多数一定是高棉人。他们作为神和国王的代表从遥远的首都被派遣到这些省份。例如,华富里无疑是这期间最重要的边缘省份。华富里早期作为陀罗钵地文明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大概拥有自己的统治建筑,直到 11 世纪的头几年还保持着独立。当时它被诃梨朋阇耶王国的一支军队攻击。吴哥的国王优陀耶迭多跋摩(1001 － 1002)前来帮助华富里,发起了对诃梨朋阇耶王国的攻击。随即,来自古代单马令(位于马来半岛的洛坤)的柬埔寨王子阇耶跋摩得到了华富里,并且继续控制了吴哥。他引发了帝国东部和北部省份的反击,在那里有一个对吴哥王位的要求者苏耶跋摩一世(1007? － 1050)。通过一个主要的军事攻击,他控制了首都地区并且把华富里纳入帝国的版图。

作为吴哥的一个省份,很明显华富里是由省长统治的,但是至少曾

经由国王阇耶跋摩七世的一个儿子统治过。不过,华富里通过派遣外交使团到中国要求认可,多次试图确立其独立地位。第一次派遣外交使团是在1001年,然后在1115年柬埔寨内部冲突之后,在1155年苏耶跋摩二世(1113－1150)去世后再次派遣使团。在1167年,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华富里国王在那空沙旺留下了一个碑铭。不过,阇耶跋摩七世在1180年之前重新建立了吴哥王朝对中部暹罗的控制权,甚至向南部的马来半岛推进了一些距离。

华富里多次寻求独立的尝试不仅仅反映了吴哥帝国内部的政治宗派主义和地区主义。华富里毕竟维持了作为陀罗钵地继承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同时也表达出了一种以早期孟族人意识为基础的非高棉人的种族身份,尽管目前这种身份被一种自我意识的佛教和傣族人身份所减轻。对于吴哥王国来说,华富里似乎是代表了人口的中心或者更可能是作为这些人口的管理责任。12世纪中期雕刻在吴哥寺浮雕上的一幕场景清楚地传达了这个意思。在描绘苏耶跋摩二世检阅军队的一系列的大量壁雕上,某些阇耶跋摩人领导着华富里的军队,在他们的指挥下还有一组暹罗雇佣军。与那些有序、纪律严明甚至严肃的华富里士兵形成对照的是,那些排在他们前面的暹罗雇佣军更为轻松,纪律松弛和狂热。在吴哥帝国里面,他们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25

暹罗人和老挝人如何看待他们正在接触的帝国社会呢?无论是傣族人的碑铭还是纪年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但是有一些迹象:早期傣族人王国几乎是顽固地设计了与吴哥制度形成强烈对比的公共制度,在吴哥统治规则的沉重勒索以及吴哥法律的非人性和武断,吴哥社会的严格等级下,傣族人的生活受到煎熬。所有这些都与傣族人自己社会的更简单、更人性化的生活品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保存在傣族早期纪年里面的对吴哥的主要记忆,仅仅是一场为了维护他们的独立而不得不卷入冲突的战争的印象。

湄公河上游的如诺国家

在所有的早期傣族人纪年里面,只是很少地保留了与吴哥帝国交往

的一些民间记忆。这些内容大多数来自受到关注的清盛地区的如诺王国。那里是今天泰国的北部与湄公河接界(还包括河的北部边界)。7世纪后的某个时期(纪年的混乱无法确定确切的日期),一个政权在这里崛起。它与东边的越南、北边的南诏、南边的吴哥或者其前朝进行交往。一个纪年提及这个地区的一个政权曾经被来自乌蒙赛拉(平河的源头)的高棉族(?)军队攻击并征服。高棉族统治者"是反对佛教的,愚蠢的。他没有遵守十条皇家戒律中的任何一条,通过税收来压迫老百姓。他为了对前来该国的外国商人施加罚款和惩罚而寻找借口。后来在素万纳·考姆·卡姆发生了很大的混乱。该城陷入了迷惘的阴影中"①。

另一个纪年两次重复了一个傣族人首领进入该地区的类似故事。这个首领来自西双版纳,有一大群傣族人随从,召集了当地山地各种族的首领来认可他的统治。当来自乌蒙赛拉的高棉族人首领拒绝屈服他的权威的时候,傣族王子在战争中击败了他,并且继续征服了整个的兰纳地区——泰国北部的传统名称。这个王国因此形成了自己的边界,在东边与越南,北边与南诏,南部与拉瓦阿萨(Lavarattha)(很明显是诃梨朋阇耶,尽管名字是华富里的一种形式)分别接界,西部扩展到萨尔温江上游的掸族地区。在第二次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情形:傣族人受到来自乌蒙赛拉的高棉族人统治者的折磨。傣族王子攀被高棉族人击败并且被送到清盛地区西北迈赛(Mæ Sai)附近的一个拉哇族村子里面做村长。王子攀被要求每年上缴四斗的黄金给高棉人作为贡品。编年史家记录道:"我们傣族人受到迫害,不论王子还是平民,为了交给高棉人贡品都不得不淘洗黄金。"②王子攀的第一个儿子在一年后(918?)出生,被命名为"受难的王子"。大约经过20年的受难,攀的另一个儿子——王子卑谬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击,把高棉

26

① "Tamnan Suwanna Khom Kham" [Chronicle of Suwanna Khom Kham], in *Prachum Phongsawadan* [Collected chronicles], pt. 72(Bangkok, 1961), p. 46(后面的引用则简写为 PP); Camille Notton 将此翻译成法语,*Annales du siam*, vol. 1(Paris, 1926), p. 121。

② "Tamnan Singhanawati" [Chronicle of Singhanawati], in PP , pt. 6 (Bangkok, 1973), p. 75. 法语翻译在 Notton 的,*Annales*, vol. 1, p. 186。

人从清盛的如诺镇驱逐出去。他们逃到了南方，在北部山区部落的村子里面，他们被追逐了一个月，“一直到旧的拉瓦阿萨边界”。在那里，因陀罗神同情逃跑的高棉人，树立了一个石头墙来阻止卑谬王子，高棉人得以回到吴哥。在重新把他的父亲立为清盛的统治者以及他的大哥为继承人之后，卑谬王子于是隐退并且在今天的芳县地点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旺·猜帕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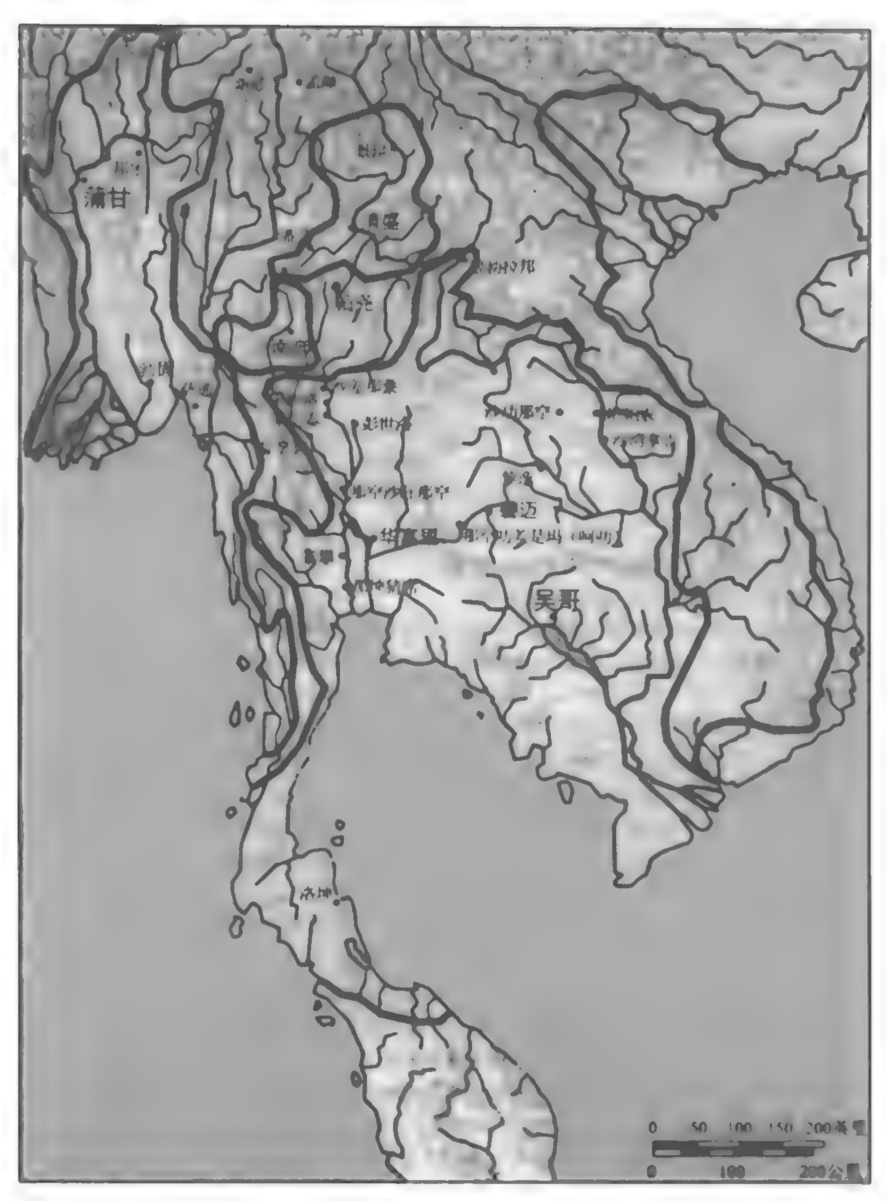
大约10世纪晚期或者11世纪初期的时候是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时代，一种宗教的复兴席卷了如诺王国，也许带来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看起来已经经过诃梨朋阇耶王国到达了缅甸海岸的孟族城市萨通(古称金地)和勃固(汉纱瓦帝)。这是一种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发展，因为它把一种弱小的、地方化的、以孤立的隐士而不是寺庙为特征的民间佛教转化成了一种普遍的、制度化的宗教传统，把孟族和锡兰的小乘佛教联系在一起。它把傣族人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傣族人能感觉到归属感的“信仰社区”。它用更普遍的价值观取代了当地的灵物论并且鼓励一种社会层面超越乡村和乡村共同体的伦理标准。

泰国北部的佛教化一定与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同时进行。在他们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迁移到大片的适合灌溉种植水稻的低地平原。这样，城市中心的发展和一个摆脱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城市统治阶层的按比例增长得以可能。不过，这些仍然是通过义务和责任的个人互惠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家族和自由民的社会。城市国家是在社会组织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领土控制的基础上建立的。例如，当卑谬王子迁移到芳县地区并且建立了旺·猜帕甘的时候，他大概带领着他的随从和他们的家庭并且在控制他们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村落联合体。在那里，他建造了住房和工事，通过向社区的佛教僧侣的支持来获得整个社区的道义安全。

27

1200年时期的傣族人世界

在11和12世纪，傣族正在整个东南亚北部组织新的国家。他们自己的纪年和低地帝国的记录都表明了这一点。那些帝国的雄伟的宣



传统帝国：1200 年之前的吴哥和蒲甘

称和由各个傣族国王和王子亲自或作为代表的征服，都意味着关于傣族人控制的范围要比这些宣称实际上少得多。尽管有许多的战争和战

役,但是我们必须避免用20世纪的术语来解释它们。吴哥、蒲甘和越南征服了很多领土,然后通过军事要塞和防御工事,他们在其获得的土地上设立了民事管理。傣族人发起了突袭,他们跨在马匹和大象上,迅速通过农村,进行抢劫、掠夺并俘虏人员,然后继续突袭或者返回家园。他们在返回的路上所遭遇到的威胁也许是:一个被击败的首领定期向征服他的王子进贡,宗主国和附属国的互换女儿也许能够形成个人之间的和政治上的联系。不过,无论以何种方式形成的"帝国"都是脆弱的和短命的。

在这些世纪里面,没有一个傣族的统治者发展出一种把遥远的领土纳入自己国家的集中化管理,因此,单个的领地比把那些他们暂时合并进去的大的单位更重要。直到12世纪晚期,还没有一个区域性的傣族国家能够主导他们的邻居。尽管如今傣族人广泛分散在该地区,但是,当时还没有一个傣族村落联合体迁移到大平原。大平原能够支撑人口扩张和充实到一定数量上,这个数量能够形成一个与吴哥和蒲甘一样规模的主要王国的基础。不过,那一天正在迅速到来,因为傣族人开始在吴哥和蒲甘帝国的农村省份和老挝上部的平原定居。

29 傣族地方首领和王子在这些地区所拥有的是对劳力的控制,劳力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总是短缺的。他们对人口的动员能力对中央帝国来说是个威胁,但也是潜在力量的来源。傣族首领被认为是地方统治者或者地区首领并且在帝国的社会内获得一个位置,这是自然的,但是,他们甚至在婚姻里也许能够得到"皇帝"的女儿(不止一个这样的例子)。不过,与高棉相比,他们保持了一个单独的种族身份。与此同时,一个单独的语言,一个单独的社会组织,一个特别的宗教传统——小乘佛教,进一步加强了这个种族身份。在他们与他们迁移进去的当地人的关系中,佛教在当地人融合到傣族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低地的农村逐渐缓慢地变成了傣族人和佛教徒的居住地,他们将在平等的条件下挑战古老的帝国,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第三章　1219－1350年间的傣族人世纪

在13世纪的早期的几十年里，伟大的印度化帝国如蒲甘和吴哥仍然保持着稳固的地位，它们的荣耀依然不减。在这一时期，伟大的建筑纪念碑得以建造，艺术品得以生产，赞美伟大君主功勋行为的石碑得以雕刻。然而，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吴哥帝国势力开始崩溃了，不久之后是蒲甘帝国。到了这个世纪的末期，两个伟大的帝国再也无法恢复对过去的美好回忆。 30

1300年左右大陆东南亚的转型与三个事件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傣族人从高地山谷迁移到平原而且他们努力尝试模仿和移植对手的模式，并且建立了新的强有力的国家。这些新国家遍布在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平原到东边的中部老挝，到南边马来半岛的洛坤。它们早期的活力本身足以使这一时期成为"一个傣族人世纪"。与傣族人崛起相关的第二个主要的发展是，通过与僧伽罗佛教交往傣族人已经信奉的佛教得以复兴，以及在该地区得到有力支持并且强大的佛教寺院制度的建立。最后，尤其是在13世纪后半期，大陆东南亚的转型是和中国内部蒙古势力的兴起以及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扩展到东南亚平行发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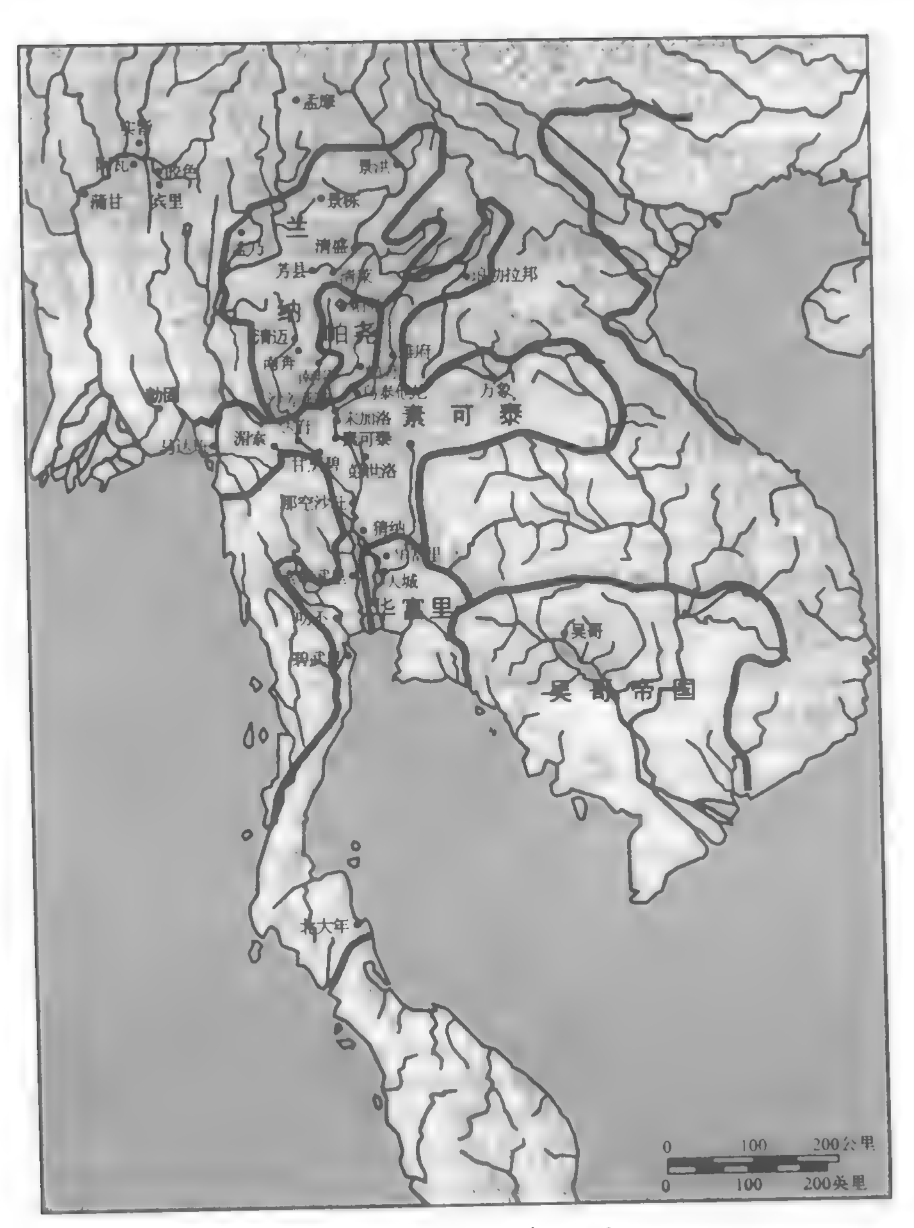
当时大陆东南亚最显著的特点是权力的分散。在上一个世纪，这 31

个区域由两个主要的帝国蒲甘和吴哥主导,目前该区域的政治版图裂变成许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相对平等的小国。而且,这种权力的分散同样涉及文化和宗教权力。在宗教和文化决定权上,许多小的社区重新获得了自主。这些新的社区按照僧伽罗类型的小乘佛教来生活,把它作为他们自己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在表演艺术方面,他们展示了自己的风格。在文学艺术方面,他们表达了自己的习俗和语言。通过一个半世纪的迅速和根本性的变化,大陆东南亚的政治和文化版图得以转型。当时建立的许多模式持续到现代早期。这不是与该地区早期伟大传统的临时割裂,而是一个根本转变。早期传统的因素仍然持续存在,但是它们被当时的时代特点和傣族传统的特点重新塑造。

没有比邦·山努(Bang Sanuk)附近地区(现在的帕府)能够更清楚地表达出这种意义来了。在这里,一个当地的统治者在1219年展示了一种被认为是暴露和奉祀佛陀遗物的勇敢行为。人们通常认为只有纯粹的统治者才能敢于触摸佛教遗物。他在这一年的石刻里面可以足够自豪地吹嘘自己的行为,这从1292年素可泰王朝开始的一个字母表可以看出来。我们将看到,他的宗教的无畏行为不久就在这个世纪中叶的政治的无畏行为中表现了出来。

并不是所有的傣族人集团都经历了同等程度的这样的变化,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立即发生了。受到这些变化最大影响的傣族人是那些已经有能力从蒲甘和吴哥王朝衰落中获利的民族。对那些居住在传统帝国边缘之外的傣族人来说,13世纪也许没有打破其历史的连续性。

对大多数傣族人来说,他们真正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从13世纪开始的,因为在当时几乎每一个纪年都在特征上发生了变化。而在那个时候之前他们的大多数纪年仅仅是罗列国王的事情或者是收集一些通常是无日期的传说。到了13和14世纪,这些纪年已经变成了国家的史册,充满了对宗教事件、战争、王朝冲突和大众运动的详细描述。尽管远不那么完整可靠,辅以石刻的傣族人纪年却已经开始以人类的色彩来描绘一个傣族人世界。



13 世纪后期主要的傣族王国

33

兰纳王国

清迈纪年把兰纳王国的统治地点追溯到湄公河大拐弯处如诺地区的清盛。根据传说,在大约12世纪中期,那里被坤幢统治,也许是第二章提及的国王攀的继承人。他被来自胡蒙帕坎(或者是帕坎)的凯敖(Kæo)统治者的大批军队进犯,这个地方明显的是位于西双版纳或者是黑河上游河谷。由于汇集了来自北部暹罗和掸族王国的广大地区的军队,他击败了凯欧并且给毗提诃王国(明显地位于西部和西北部)和越南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们前来向他朝贡。由于谨慎地期待他的王国与凯敖的将来的关系,他免除了他们的朝贡并且提升了一个凯欧成为蒙王的统治者。他在1140年树立了一个碑刻。在他1172年去世之前,他任命他的五个儿子分别去统治他王国的一部分——大儿子在清盛,二儿子成为凯敖村落的首领,三儿子统治整个老族的琅勃拉邦,四儿子统治东南部的所有村落联合体的猜纳莱(川圹?),五儿子在西双版纳的景洪。

即使去掉其过分夸张的成分,对这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进行评价是困难的,但是也没有必要去这么做。在暹罗北部和老挝的地方纪年里面,这个故事被广泛地复制,这个故事传达了另一个地理上限定的世界的形象,这个世界与在阿洪族和掸族纪年遇到的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这是上湄公河的世界,自称为老族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受到越南和云南的大理的威胁。纪年在那个世界的主要的傣族中心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清盛(或者是位于湄公河对岸的相同名字的另一个更老的城市);景洪,南部云南的泐族首都;琅勃拉邦,老族人世界的早期中心;位于黑河河谷的一个黑傣族人中心。许多后来的王国都把他们的起源追溯到这些中心之一。无论王国之间的这些准家谱的联结是否反映了真正的血缘或者甚至是文化和语言关系,但是他们都表明了政治上的持续性。在这里,清盛是重要的,它不仅作为兰纳王国和内部许多联合体的祖先,而且作为有些人声称的将来在最伟大的傣族人首都统治的阿育陀耶王朝的来源。

满哥瑞,作为清迈的兰纳王国的建立者,于1238年10月2日出生在清盛。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他的母亲是景洪统治者的女儿。当他于1259年继承他的父亲成为清盛的统治者时,据说当时他已经看到,这个区域的所有傣族人的藩属相互之间正在进行争斗,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痛苦,在这些首领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来自一个合法的王室,并且举行了完全印度式的加冕仪式并拥有皇袍。他决心把自己的权威强加给他的邻居,他迅速地征服了他们,并且派遣自己的官员来统治他们。他先征服了蒙莱, 清堪和清郑,然后,他把自己的势力向南扩展。他首先于1262年在清莱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并且把首都迁移到那里,然后他控制了清孔地区并且在芳县(两个世纪前卑谬王子放弃的一个镇)周围经营了一段时间。 34

当1274年满哥瑞居住在芳县的时候,一群来自诃梨朋阇耶王国的商人拜访了他。这些商人以夸张的词语向他描述了他们的国家,他决心去征服那个古老的藩属。他的官员向他建议,诃梨朋阇耶王国太强大了很难征服,并且得到佛像遗物的强有力的保护。但是受雇掌管朝廷的文牍和会计的一个孟族,而拉哇族官员则认为,通过计谋可以征服诃梨朋阇耶王国。于是满哥瑞派遣这个文牍官艾法到诃梨朋阇耶王国的国王伊巴手下去服务,并且秘密工作为满哥瑞获得这个王国开辟道路。

满哥瑞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进行准备工作。出乎意料的是,在第二年,蒙帕坎的凯敖统治者来到清盛,并且解释说他来这里帮助满哥瑞加冕,满哥瑞与他一样都是坤幢的后裔。满哥瑞喜出望外地去会见他,后者在最新的家庭新闻里面提及这件事情:“在你的叔叔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卡颢的,他成为琅勃拉邦的统治者。另一个叫春桑的,成为兰王国的统治者。我自己是蒙·凯敖·帕坎(Müang Kæo Phrakan)的帕攮曼卡凯(Pha Ruang Mæn Kham Kha)的儿子。当他去世的时候,我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为统治者。天下之王(中国皇帝?或者是大理的统治者?)召集了所有(周围)的统治者在哈特山为我加冕,就如他的前任给坤幢加冕一样。因此我是你家庭的一员,希望今天给你加冕,希

望你能愉快地统治。"[①]然后，在完成这些以后，他回到了凯敖王国的蒙帕坎。

在等待他在诃梨朋阇耶王国代理人艾法的消息的同时，满哥瑞接着决定去获得东南部帕尧王朝的国王昂蒙统治的领土。根据一些描述，昂蒙也是坤幢的后裔，与满哥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生于1238年。当他还是一个16岁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到华富里跟一个博学的人学习。在那里他认识了另一个王子，后来这个王子成为素可泰王朝国王兰甘亨。昂蒙回去后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在1258年成为帕尧王朝的统治者。1276年满哥瑞带领军队来到两国边界的时候，他仍然在王位上。昂蒙前去会见了满哥瑞，他们没有进行战斗，而是缔结了一个友好和互利同盟。尽管如此，昂蒙把一个居住着500个家庭的边界区转给了满哥瑞。

35

几年以后，当满哥瑞被请求去调解昂蒙和素可泰的兰甘亨之间的争议的时候，他与其邻近的傣族王子的关系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昂蒙有权利处死兰甘亨，因为他引诱了自己的妻子。但是满哥瑞认为这样做的话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昂蒙可能进一步招来洛坤和大城统治者的怨恨，因为他们是"兰甘亨的亲戚"。满哥瑞因此让兰甘亨给昂蒙道歉，并且支付给他99万件玛瑙贝壳作为补偿。昂蒙和兰甘亨之间得以和解，聚在一起的三个统治者签订了一个条约，发誓保持永恒的友谊。为什么这些传说强调和谐呢？至少清盛、清莱和素可泰的统治者们在从事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经不起拥有彼此不同的利益和目标的统治者之间在地方上的不同纷争。更重要的是，当时还存在着由于蒙古人入侵缅甸以及越南和吴哥威胁所带来的更大的危险和机会。在这个不确定的氛围下，三个统治者强调他们的相互联系，甚至他们共同的血统——简而言之，即他们作为傣族人的共同身份。

不久以后，满哥瑞破坏诃梨朋阇耶王国的计谋获得了成功。艾法

---

① *The Chiang Mai Chronicle* (2nd ed.), trans. David K. Wyatt and Aroonrut Wichienkeeo (Chiang Mai, 1998), pp. 22－23.

已经得到国王的信任，并且把国王与他的民众和朝廷孤立开来，然后以国王的名义发布激怒大众的命令。当他们背后议论对统治者的不满的时候，艾法鼓励他们去寻求满哥瑞来作为他们的统治者。最后，他向满哥瑞传达消息：他采取行动的时机到了，他应该马上派遣军队。

满哥瑞马上召集了大批的军队并且向诃梨朋阇耶王国进发。由于艾法在城市里造成了混乱，满哥瑞很容易就征服了诃梨朋阇耶王国。1281 年 4 月 21 日，满哥瑞登上位于南奔的古老诃梨朋阇耶王国的王位，从而掌握了所有的北部地区。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巡游北部的乡村，建造新的城市、军事工地、佛教纪念碑和寺庙，并且建立起自己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大约 1289 年，他决定通过征服勃固来进一步扩展他的帝国。勃固是下缅甸孟族人地区的首都，当时正在反对蒲甘的统治。他带领自己的军队来到萨尔温江的夜丰颂的附近，在那里他会见了勃固的国王苏陀萨玛，接受了苏陀萨玛的女儿作为联姻。两个国王缔结了同盟，而且"从那时起，大的和小的村庄的泰阮族人(北部傣族人)，泰人和孟族人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当时的一个编年史家写道[①]。

36

也许是在接下来的那一年里，满哥瑞开始卷入蒲甘的事务。纪年里面曾经记载，满哥瑞在 1290 年对蒲甘一阿瓦地区进行了一次仓促的征伐。到达蒲甘的南部边界后，他会见了国王派来确定他目的的特使。他向特使保证他不是来掠夺的，而是来为他的王国获得一些阿瓦著名的金属工匠。最后他获得了 500 个家庭的金匠、银匠和铜匠。他把他们安排在王国的不同地方，包括景栋。

与此同时，一群佛教僧侣携带着准备献给满哥瑞的两颗舍利来到这里。国王以豪华的方式奉祀舍利，并且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国王专门提供了大量的大米和土地，包括 500 个来自勃固的孟族家庭。

最后，在 1292 年 3 月 27 日，满哥瑞在现场仔细挑选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住所来作为他的首都的新地点，这就是"新城"清迈，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泰国北部的中心。对于城市的计划、规划布局和防卫，满哥瑞

---

① 引自 Notton 的关于清迈纪年的一个变体读本，*Annales*, vol. 3, p. 49, n. 2。

详细地咨询了他的兄弟统治者昂蒙和兰甘亨。但是,这个城市实际建设直到1296年4月19日才开始。

为什么清迈的建设推迟了四年?因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满哥瑞几乎是不断地关注着蒙古人对傣族世界的威胁。对蒙古人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中国人了解他对蒲甘的支持,这可能是起源于满哥瑞与勃固的孟族人的结盟,这也反映了他希望在萨尔温江东部的掸族人中间保持一定的活动范围。云南的中国人统治者已经把满哥瑞看作是从萨尔温江东部的掸族邦,到湄公河的傣泐族和老族地区的最重要的傣族人首领。毕竟,满哥瑞的母亲是景洪统治者的女儿,而且他在那个王国拥有持续的影响力。从他处理与帕尧、素可泰、勃固和蒲甘的关系的方式上看(排除贫穷的诃梨朋阇耶王国,他实际上征服了它!),满哥瑞看起来推行了这样的政策:为了应对蒙古人带来的共同威胁,最大程度地减少傣族人王国与其邻居的冲突,加速他们之间的合作。

37

这一时期,蒙古人对缅甸、越南、真腊甚至爪哇的征伐,对东南亚历史学家来说是众所周知的。较少了解的是蒙古人对满哥瑞和其盟国的征伐。我们只能猜测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也许是在1290年蒙古人获得景洪的臣服之后。它当时的统治者陶艾(满哥瑞的二表哥)仅仅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他一定向满哥瑞寻求帮助。当景洪因此造反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在1292年发布命令征伐满哥瑞和景洪。中国人在1296年攻陷了景洪,但是满哥瑞迅速派遣了一支军队,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中国人的还击延迟了,直到1301年才准备对这个傣族人地区发动一次主要的侵犯,汇集了一支包括2万人和1万马匹和蒙古人弓箭手的军队。这次征伐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灾难。他们的失败只能是增加了傣族人的勇气,因为到了1309年,清迈和景洪采取联合行动向北突袭到威远,并且持续到1311年。由于厌倦了战争,中国人转向了外交,在1312年收到了景洪和清迈供奉的驯服的大象和当地产品。清迈分别于1315年、1326年(当时使团由国王的儿子带领)、1327年、1328年、1329年和1347年向中国派遣了使团。景洪在放弃对中国边

界的突袭上稍微有点慢，直到1325年才停止。

人们很容易就忽视这种可能性：满哥瑞的权力是建立在高度多样化的人口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在他王国的南部地区，很大比例的也许是大多数的是孟族人，也包括相当数量的拉哇族社区、其他的山地人和许多不同的傣族人。统治精英的核心层是傣族人，尽管由于一些与古老的当地统治家族妇女的通婚和为了皇家服务而征召专家如拉哇族的文书和会计艾法，使这种状况得到缓解。满哥瑞尤其对孟族人采取和解的态度，甚至允许战败的诃梨朋阇耶王国的国王伊巴在南邦居住了十多年，直到伊巴造反(1296)被迫向南部逃亡。满哥瑞尤其尊重孟族人的文化和佛教，并且在早期展示了皇家对宗教的支持。不过，由于在这个世纪后期鼓励传播一种新的、更博学的和看起来更加地道的僧伽罗佛教，满哥瑞能够开始建立一种新的共同的在宗教基础上的不容易识别孟族人或者傣族人的社会和政治身份。不久，通过宗教上的虔诚以及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兰纳王国的居民可以表达一种共同的身份，这种身份逐渐地成为今天我们所称呼的泰阮人，“北部傣族人”。 38

在他统治的后期，满哥瑞已经70多岁了，他开始考虑他强大和繁荣王国的继承问题。许多年前，他的大儿子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被杀死了，他的三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是个一事无成的人。1311年，满哥瑞派遣他的三儿子坤如到位于孟奈的新首都去管理掸族人，而他的第二个也是他最喜欢的儿子坤卡去管理清莱。最后的时刻到来了。1317年坤卡被召唤到清迈，及时地回来继承他父亲死后的王位。

在他作为国王的60年里，满哥瑞已经从村落联合体聚集区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和强有力的王国，并且主导了东南亚内部高地的中心地带。他已经在西部的掸族和泰艮人(Khoen)、北部的傣泐族、北部和东部的谷族(Kao)和老族地区获得影响力。他已经在蒙古人20年的征伐中获得立足。他几乎已经开始了建立行政和政治制度的工作，他几乎已经超越仅仅派遣他的儿子、孙子和信任的官员去管理在高地山谷新的附属地的战略。直到1317年，仍然没有来自清迈的中央控制的传统，

也没有建立能够保证从一个统治者向他的后代和平传承的牢固的规则。但是他开始了一种法律传统,也许是孟族人的灵感,也许是人道的和理性的法律,今天仍然是依照他的名字来命名——“国王满哥瑞判决”。下面的断言很好地代表了这些判决的精神:“按照古训,只有依靠自由人的帮助,国王才能够保持他的王国。自由人是稀少的,因此不应该浪费掉(通过允许他们成为奴隶)。”[①]

满哥瑞的继承人所生活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没有其所生活的世界那么危险。北面来自蒙古人的威胁已经缓和,南部的素可泰王国开始崩溃。既没有统一的动机也没有军事和外交成功的衣钵来维持满哥瑞曾经带来的清迈的巅峰状态。一个王朝的权力斗争在满哥瑞的后人中间爆发了,每个人都运用他自己的地方或者地区权力来争夺首都的王权。在 11 年里更换了 6 个国王,直到满哥瑞的曾孙加入后,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才回到兰纳王国,不过当时它的影响力和范围已经衰退了。

39

暹罗人、素可泰和南部

当 1287 年满哥瑞、帕尧王朝的昂蒙和素可泰王朝的兰甘亨会面并签订对抗蒙古人的同盟的时候,素可泰已经在南部和东部获得大量的土地,至少与北部的满哥瑞的兰纳王国的面积一样。我们对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条件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知之甚少,只能依靠猜测。对 13 世纪期间有关中部暹罗傣族人历史关键的两个因素是:第一,在那个时候大量的傣族人人口已经居住在陀罗钵地王国和华富里的古老的核心土地上并且贯穿整个中部平原;第二,他们已经大量地接触了古老吴哥帝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

我们已经看到,在 1017 年一个如诺统治者卑谬王子如何被一支来

① A. B. Griswold and Prasert na Nagara, “The ‘Judgments of King Man Ray’: Epigraphic and Historical Studies, no. 17,” *JSS* 65, pt. 1 (Jan. 1977): 153. Griswold 和 Prasert 把 *phrai* 翻译成“公民”,而我更喜欢“自由民”,因此相应改变了翻译。

自西部的侵犯军队驱赶出自己在芳县的小领地。根据传说，他逃亡并在甘烹碧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地，然后在吴哥帝国的边缘建立了一个王朝并且统治了好几代人。很明显还有其他这样的领地，它们是由富有野心的傣族人王子在他们的随从和战争中俘获的奴隶的帮助下建立或者逐渐控制的。从纪年里面提及的传说来判断，与当地统治精英的联姻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傣族王子逐渐获得权力。如果这样的纪年传统是可信的话，那么最重要的王朝间的联系在湄南河西边乡镇的当地统治者与卑谬王子建立的领地之间就形成了。由于这种政治和亲缘关系网络，在以素攀武里和佛丕为中心的地区吸引了一批首领和王子，他们建立了新的社区如南至马来半岛的洛坤，并且统治着已经成立的乡镇和省如猜纳、彭世洛和那空沙旺。

最令人费解的早期傣族人的出现是洛坤王朝，在13世纪，它在半岛上一定是一个繁荣的地方政权。两个世纪以来，它已经成为国际激烈竞争的焦点，因为高棉、马来、缅甸、孟族和南部印度的统治者都想通过在这里建立统治来寻求控制国际海洋路线。它混乱的当地纪年根本没有任何傣族人到来的线索，但是它表明至少在不迟于13世纪中期，一个傣族统治王朝在那里建立了。由于统治着与附属地历史一样复杂的人口以及肯定包括了大量的高棉人、孟族人和马来人，洛坤的统治者通过努力来干涉锡兰的政治，容忍了王朝传统的国际利益。他们重新与洛坤的邻居建立了古老的宗藩关系，如南部和西部的马来属国、彭亨和吉打。而且，在13世纪中期以前，洛坤已经成为一个传播一种新的以锡兰大佛寺寺庙教诲为基础的小乘佛教。僧侣们从洛坤携带佛教前去吴哥帝国、华富里、素可泰和兰纳。尽管以不太引人注目的方式，但是大约在同一时间，类似的对傣族人力量的传播似乎通过该地区已经普遍发生。 40

大约1220年，吴哥帝国的国王阇耶跋摩七世去世后，吴哥的力量开始减弱，因此上述政治发展运动一定获得了力量。这通过1200年和1205年之间派遣外交使团到中国去寻求政治认可和贸易中可以反映

出来。中国称之为"真里富"[1],也许位于碧武里地区。不过,在13世纪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面,这些国家明显地看起来只是地方性的,从一个单一的镇和其腹地建设开始,与他们邻近的镇保持着松散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这些王国可能零星地与他们的邻居或者吴哥帝国进行战争。但是在和平的间歇,他们似乎专注于在乡村安置移民或者俘虏以及建立行政网络。由于吴哥高棉人的统治和影响,他们经历了相对比较发达、复杂、精致的环境,这些给湄公河流域和半岛的傣族精英带来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在某些方面区别于他们北部的亲戚。这些北部的亲戚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老族人和掸族人。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比北部傣族或者老族人相对复杂的、更注重等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对于他们原生的动物崇拜宗教,他们增加了相当多的印度婆罗门教的信仰和惯例,尤其是与成年礼和国家危机等有关的仪式。这些傣族人(他们也许有孟族人或者高棉人血统)历史上被认为是暹罗人、占族人,是高棉和蒲甘碑铭上的单词"Syam"的一个地方变种。接近13世纪晚期的时候,中国的文献里面把其中的一个王国素可泰称为"Siem",也就是暹国,那么这个术语就具有了政治意义。

41

在高棉人强盛的时候,吴哥王朝征服了湄南河河谷的傣族王子和当地首领,为了使他们团结在帝国周围,给予他们官方称呼甚至把女儿嫁给他们。最出名的一个例子是帕蒙,他是城逸(?)附近一个小的村落共同体拉特的领主,吴哥国王把室利·因陀罗迭多的头衔授予他。跟这个头衔一起,还有相当于国王或者总督的一个高棉人等级,一柄神剑,吴哥统治者的一个"女儿"。帕蒙也许宣誓效忠吴哥并且发誓定期向首都朝贡,来换取他能够不受干扰地进行统治。

也许在大约1247年的某些时候,帕蒙召集了一支军队并且和邻国暹国统治者邦扬村落联合体(也许位于素可泰附近)的邦克朗豪的军队汇集在一起。邦克朗豪当时还没有臣服于高棉人。在攻陷附近的邦康

[1] 《文献通考》卷332《四裔考九·真腊》:"真里富,真腊属国也。其国在西南隅,东南接波斯蘭,西南与流登眉为邻,所管聚落六十余处。"——译者注

和撒查那莱之后，他们向素可泰地区的一个世纪前建立的高棉人军事基地进发。高棉人进行了还击但是被击败了，帕蒙攻进了城市。也许他冒犯了他对吴哥的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他认可了邦克朗豪的超级力量或者资历，帕蒙于是把征服的土地和他自己的头衔和神剑都送给了他的盟友邦克朗豪，并且他主持了新室利·因陀罗迭多成为素可泰国王的加冕仪式。

这些人是谁，他们来自哪里？因为他们相信居住在北方楠河河谷和老挝北部南乌河谷的洞穴和山上的某些神灵保护他们，人们一般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这些地区。他们最早期碑铭的语言也同样表明他们与白傣族人的一种姻亲关系。不过他们自己本身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们的背景或者早期生涯的记录。

在室利·因陀罗迭多和他的大儿子班蒙（？—约 1279）统治期间，素可泰仍然是一个处于平原边缘地区的地方政权。这些地区的地形从平原到丘陵，然后马上又是山区。这些国王好像不太关注任何来自吴哥的持续威胁，反而是关注其他邻近的傣族王子的野心，比如其中之一的索（湄索附近）的统治者侵犯了素可泰位于达府的西部军事前哨。当因陀罗迭多的军队在混乱中逃离战场的时候，国王 19 岁的儿子拉玛坚守阵地，他挤过人群，冲到攻击部队的指挥官前，击败了他，最后获得了称号“英勇”——也就是兰甘亨——英勇的拉玛。 42

当 1279 年左右兰甘亨继承他的大哥成为素可泰国王的时候，他的王国的面积仍然很小，也许局限于今天的素可泰、宋加洛、城逸、甘烹碧和达府地区。他的祖先，他对素可泰权力的牢固控制，他在战场上的声誉都使得他在邻近的和北部的傣族人中间获得了一些地位。很显然，由于他的母亲或者他与南部统治家族的联姻（也许是甘烹碧地区的卑谬王子的谱系），他在南部也有一些地位。对一个拥有抱负和关系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时机正确，机会丰富。作为一个大国，吴哥很明显已经奄奄一息，湄南河河谷的政治地位很难预料。满哥瑞正处于在北部和西北部构建一个大国的过程中，而且孟族人也正在从蒲甘获得独立。不论是有意还是必需，兰甘亨专注于拥有最大机会的区域，与

既有的大国保持距离，避免与北部和西北部的傣族邻居满哥瑞、昂蒙以及东南部的华富里发生冲突。

我们把 1292 年的一个碑铭当作是他自己的话，兰甘亨描述了他的统治类型和原则，并且列出了他非常小心地但是迅速地构建一个庞大帝国的方法：

> 在国王兰甘亨统治时期，素可泰这片土地正在蓬勃发展。鱼儿在水里游，稻米在地里成长。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不向他的臣民征收道路通行税。他们驱赶着他们的牛或者骑着自己的马去交易；谁想买卖大象都可以；谁想买卖马匹都可以；谁想买卖金银也可以。当任何平民或者任何等级的人去世后，他的遗产——他的大象、妻子、孩子、谷仓、家臣、槟榔林和蒌叶林，都全部归他的儿子。当任何平民或者任何等级的人存在分歧的时候，(国王)会考察事情的真相，并公正地解决它们。他不纵容窃贼或是(窃贼的)窝赃犯。当他看到别人的大米的时候，他不垂涎它，当他看到别人的财富时候，他不生气……他在门口悬挂了一个铃：如果任何平民有了冤屈，而且他想让他的统治者知道，就去敲铃，这样就变得很容易了。他过去敲响国王悬挂在那里的铃，王国的统治者兰甘亨国王听到铃声，就会出来询问他，考察他的案子，然后公正地解决它。因此素可泰村落联合体的人民都赞美他。[1]

43

通过自我宣传，兰甘亨描绘了一个无拘无束、充满了田园诗般的王国，这个王国由一个公正、善良并受到他的人民喜爱的国王统治。他通常被认为是我们翻译成的"上帝父亲"，而且碑铭里面描述的总是隐含着一种家族风格。通过那些被引述的段落，国王父亲般的仁慈和平易近人，与通过那些其他未详细说明的规则表现出来的相反品质，在它们

① Griswold and Prasert, "The Inscription of King Rama Gamhen of Sukhodaya(1292 A. D.): Epigraphic and Historical Studies, no. 9," *JSS* 59, pt. 2 (July 1971): 205－8.

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相反的品质包括严格的社会等级、任意执法和重税等等，这些也许是吴哥的统治特点。兰甘亨似乎急于向他的民众尤其是暹罗人展示另一种统治方式，这种方式是暹罗人的或者是傣族人的。国王展示自己是一个尊重流行于傣族人超自然世界的动物教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大力地促进宗教事业和支持僧侣。通过向他的臣民提供正义和繁荣，他保证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是他同样表明了他对心灵的关注。最重要的是，素可泰是一个佛教国家，慷慨地支持僧侣社区。由于一个来自洛坤的出名的方丈，僧侣社区重新焕发了活力。素可泰的民众遵守佛教戒律，狂热地庆祝宗教日历上的各种节日。国王在王座上听取他的臣民的投诉和请求，每周他还把王座让给博学的僧侣宣讲佛法。由于国王和僧侣共用王座，因此佛教与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国家是佛教国家，但是宗教也是政治上的，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团结和身份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

（兰甘亨的碑铭被非专家攻击为是19世纪的伪造。伪造它需要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的技术。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最好还是认为它是真实的。）

通过武力和外交的明智结合，兰甘亨国王建立了一个广阔的王国。 44
他提到他曾经攻陷乡镇和村庄，获得大象、贵金属和他没有杀死的犯人。但是与此同时，通过他的道义和军事声誉，他鼓励小的统治者和地方首领听从他。

> 任何人骑着一头大象来见他并且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都会给予帮助，慷慨地加以对待和照顾。如果（来见他的人）没有大象，没有马，没有年轻的各种等级的男人和女人，没有金银，他会给他一些，帮助他直到他建立起自己的王国。[1]

兰甘亨的碑铭包括了一段死后才加上的文字，这段文字列出了“归

① Ibid., pp. 207－208.

顺他的地区”,从素可泰向四个基本的方向扩展。向东包括彭世洛、仑沙地区和万象。向南,包括从那空沙旺和猜纳到素攀武里、叻丕、佛丕和洛坤的一连串的附属区。向西甚至到达勃固和马达班,从 1287 年到 1306 年,一个曾经娶了兰甘亨女儿的孟族雇佣兵在那里统治。向北,碑铭上记录的是帕府、难府和琅勃拉邦。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面,素可泰的势力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张很难与暹罗王国相比,因此不应该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理解。在征服其碑铭里面所提及的所有王国的时候,兰甘亨并没有发起大规模的军队并且进发几千里。通过题铭记录,我们仅仅可以确切知道当他还是一个王子的时候,他带领军队到了达府。中国的记录则表明在 1294 年他攻伐了叻丕—佛丕地区。尽管洛坤的纪年声称兰甘亨曾经到过那里并且从 1274 年至 1276 年在那里统治,但是我们最好把这个传说当作是后来的添加。更有可能的是,兰甘亨宣称对马来半岛的控制是来自于佛丕或者素攀武里统治者对他的屈从。我们也许可以猜测洛坤反过来把自己在马来半岛上的附属国带进素可泰的势力范围,这样也许可以向南扩展到彭亨。

通过这种模式,政治关系以金字塔的形式得以确立,如从附属到霸主等。这种政治关系似乎不仅对这一时期的傣族国家来说是非常典型的,而且对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是非常典型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朝贡体系。不过,与高度形式化的中国体系不同,傣族世界的政治忠诚是倾向于个人的。例如,洛坤的统治者可能个人效忠于佛丕的统治者,后者反过来又效忠于更有权力的素攀武里王子,而王子自己又效忠于兰甘亨。这就意味着王国所有的核心仍然是分化成小的部落联合体,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统治者;而且地方统治者与国王的关系是由有关个人的相对权力来确定的,也只是局限于他们的一生期间。极具诱惑力的是,人们认为兰甘亨的南部帝国是与长期建立在素攀武里和洛坤之间区域王国通婚或者亲缘关系的产物。

如果他的祖先看起来像是来自东北部,那么类似的,兰甘亨帝国向北的扩张可以被解释成亲缘关系。他的碑铭其中一段声称:

> 苍穹（云南最南部）下的土地上的所有谷族人（楠河河谷的傣族人），老族人和泰族人以及生活在南乌河和湄公河的泰族人都前来听从国王室利·因陀罗迭多的儿子兰甘亨国王。[1]

这段话表明是自愿听从而不是征服。兰甘亨包括军事和道义威望的权力从他的首都向外辐射，那些认可他的优势和领导的就会听从他。

在兰甘亨的附属国名单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忽略了那些与素可泰平等的邻国：满哥瑞国王的兰纳王国，国王昂蒙的帕尧王朝，佛统和旧华富里。兰甘亨在1287年与前两个统治者签订了同盟条约，使得他的北部边界得到保护，而满哥瑞（也许在昂蒙的帮助下）面对着持续几十年的蒙古人进犯，则首当其冲。也许兰甘亨与华富里的统治者达成了一些类似的妥协？在大约13世纪中期，华富里动摇了自由的吴哥王朝，并且在1280年左右开始不乏定期地派遣外交使团到蒙古王朝，这样一直持续到1299年。亚历山大·B.格里斯沃尔德和普拉萨特·纳·纳伽拉认为华富里的统治者一定与素可泰比较友好，因为1296年一位到吴哥的中国访问者曾经报道，暹（我们认为是素可泰）近期一直在获得吴哥王国的大片荒芜土地并且强迫高棉国王实行普遍征兵制。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兰甘亨的军队不通过华富里的疆土怎么可以接近吴哥的边界。也许为了报答素可泰对其对抗吴哥的帮助，华富里让出了其曾经对湄南河河谷西半部的影响力。不过，华富里坚持独立并且牢固地保持对湄南河河谷东半部以及湄南河东面和东南面地区的控制。

46

兰甘亨的素可泰被人们记住，不仅仅因为其政治成就，还因为其艺术和思想。尽管国王时期知名的雕塑很少保留下来，但是现存的零星碎片表明在13世纪末期以前，经典的素可泰风格的典型特点已经得以发展。例如，佛像形象就有傣族人面相的独特印记。处于走动姿势的佛像以流动的风格来雕刻，看起来好像是观察者的眼球在

---

[1] Ibid., p. 216.

走动。在描述他自己的首都的时候,兰甘亨提及几个在他统治期间建造的重要的纪念碑,其中许多废墟在今天仍然存在,是他宏伟首都的无声证明。如同创造一个家长式的政府和在社区生活中为小乘佛教提供空间一样,素可泰的民众在形成艺术作品上也是具有独特的创意。尽管忠于他们的傣族传统,他们仍然不放过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提供给他们的最好的东西。他们的艺术受到锡兰和洛坤艺术的强烈影响,他们被认为从中国进口了瓷器,然后创造了精美的青瓷作品和著名的宋加洛陶瓷。不过,不管它的起源和影响,素可泰艺术就如素可泰生活一样,是它自己的事情,不仅仅是兼容并蓄和独特的暹罗艺术品。

图片上出现的是一个强大和繁荣的首都之一,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时候表现出沉着和自信。王国的文化价值观本质上仍然是傣族人的,尤其是政治文化。素可泰已经从高地山谷到大湄南河平原的边缘移植了高地村落联合体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仅仅存在相对较少的社会和政治分化,在领主和平民之间有根本的区分,王权牢固地建立在个人和亲缘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非个人的、正式的关系上。不过,素可泰生存的环境是新的。那儿有相当多的非傣族人口,由他们自己的领导来统治常年存在的孟族和高棉人社区,以及对傣族人来说陌生的文化和宗教传统。

47 所有这些新的元素都对素可泰统治者构成了政治问题。如高地的统治者所做的那样,他们似乎努力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在社会和行政上,先前的人口以奴隶形式或以亏欠服务的各种等级的平民的形式,以附属国的形式或以附属统治者的形式融入素可泰社会。暹罗傣族语言正在成为行政和声誉语言。在1283年兰甘亨自己也声称发明了一种当地文字的变体,这种变体特意地使没有音调的语言讲述者能够理解书面的、有音调的傣族语言。长期在该地区实行的婆罗门宗教也受到了朝廷的庇护,朝廷的雕刻家甚至以类似于素可泰佛像所表现出来的风格雕塑出了毗湿奴和湿婆青铜像。最重要的是,通过创造某种“超级村落联合体”,兰甘亨对远距离扩展自己权



素可泰时期的青铜佛像(高 2.2 米，藏曼谷宾札寺)

力的新可能性作出了回应。这种“超级村落联合体”依靠金字塔形的个人忠诚结合在一起，就如高地村落联合体在更小范围上的整合一样。他没有把所有的权力，如政治、经济或者文化权力都集中到首都，而且素可泰和它的主要边远诸侯的实力差距不是太大。甚至兰甘亨的碑铭也表明他的权力主要依靠他的道义权威和领导力。因为他是善良的并且公正地进行统治，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认可他的仁慈。

在1298年兰甘亨国王死后，他的儿子卢泰(1298－1346或1347)继承了他的位置，而且整个帝国迅速分裂了。素可泰对城逸北部的管辖几乎是马上就倒塌了。许多小的附属国之间相互争斗并且努力保持独立于兰纳王国。琅勃拉邦、万象和中部湄公河流域同样很快获得独立，并且处于一片混乱中。在西面，1319年后，集中在勃固的孟族王国不再认可素可泰的宗主权。到了1321年甚至，作为素可泰的最古老的一个附属国之一的达府，也处于兰纳王国的支配之下。在南面，作为核心城市的素攀武里在卢泰统治初期就脱离出来。因此，它阻止了素可泰通向其南部附属国的通道并且同时启动了该世纪中叶前在阿育陀耶产生国家的一系列发展。这个国家最终吸纳了素可泰。因此，最迟到大约1320年，素可泰再次成为一个相对较小并且不再具有地区意义的地方王国。

到了1340年代，傣族人已经成为大陆东南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尽管他们努力尝试，但是相反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再次建立以过去古典帝国为模型的主要的帝国。掸族兄弟没有原封不动地接管蒲甘帝国，兰甘亨也没有完全移植吴哥的高棉帝国。也许这样的帝国野心不是他们的目的。由于每个地区的特定的原因，更大的帝国建设野心可能是机会主义的争夺空置的权力或者是危险时期成立的防卫联合体。兰纳王国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保持持续权力的主要国家，但是在1350年，它控制的范围仍然比满哥瑞统治期间要小。

49

到了14世纪中期，小的傣族地方王国零星地散布在从西部的东阿萨姆到南部的洛坤和东部的湄公河的版图上。再往北和东，就如同几

百年前一样，那里有无数小的老族和高地傣族王国。这些王国不时地陷入到更大的王国事务中或者受到他们成功故事的启发。不过，他们没有与他们南部和西部的堂兄弟处于同样的位置来利用旧传统帝国崩溃的机会，他们也没有相同的在稻米土地和劳力上的潜力基础上来开始充当王国的位置。同样地，也许时代精神更缓慢地到达他们那里——一个激动人心的对变革的预期和一种新思想潮流以及包括小乘佛教技术的这样的政治机缘结合体。在这种精神被抓住的地方，它驱使无数的傣族人采取巨大的行动，但是到了14世纪中期，它更多的是破坏大陆东南亚的旧秩序，而不是建设一个新秩序。

第四章 阿育陀耶王朝及其邻居：1351－1569年

50　到了14世纪中期，尽管许多傣族人的小的王国布满了大陆东南亚的中部地区，但是仅仅只有极少数的可以称作"王国"。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面，一个主要的傣族人的王国出现了：阿育陀耶王国，而且另外两个傣族人竞争者挑战其领导傣族人世界的野心，这样做风险是很高的。在傣族人历史上，国王和他的官员们第一次不仅仅是把高地王国联合体结合起来去对抗那些统治他们的野心勃勃的领主以及非傣族人帝国。此时存在着几个傣族人王国，在超越傣族人世界的各个国家形成的一个国际框架内，每一个王国都认为自己是合法的政治和文化实体。

傣族人国际观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前几个世纪的傣族人国家在有限的范围内运作。他们的统治者很少关注他们近邻边界之外的非傣族人的事务。他们的政体在小规模的、个人化的程度上进行统治，很少受到中央帝国侵犯的打扰。

当一些傣族人政体承担了帝国意图和野心的时候，他们的统治者不得不在观察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方式上做出根本性的变化。在各个民族组成的国际社区内，他们努力去让传统帝国控制的地区内的他们过去的"上级"以及以前的同伴但眼下是其附属国，来认可他们的大国

地位。

为了适应这些变化，新的傣族人“帝国”不得不去创造新的身份。51 他们正面对着已经获得认可的、外部世界用来区分文明人和野蛮人、国家和部落、国王或者帝王和首领的国际行为和价值标准。新的傣族统治者面对的压力与几个世纪后在实行那些令人鼓舞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时所面对的压力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类似的是，新的标准可能被认为对傣族价值和传统是不合适的和不利的。官僚行政，成文的和非人格化的法律，国家组织和征税的经济——所有这些可能被看作是外来的而遭到拒绝，实际上，在13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素可泰的兰甘亨也是这么做的。不过，他们也可能被认为是有用的思想而受到欢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认为仅仅是新的和“改进”的政治或者管理“技术”。

这是一个好的时机。中央帝国正处于混乱之中，他们长期以来根本无暇顾及印度支那半岛的南北内部地带，而这一地带正是傣族人最集中生活的地方。蒙古人控制的中国正处于衰退时期，1368年明王朝登上权力宝座。正在从13世纪末期蒙古人的侵犯中复苏的越南几乎不断地卷入到与占婆王朝的战争中，而占婆王朝本身由于在1313年受到一个傣族势力的侵犯(也许是素可泰?)而过分薄弱。素可泰的兰甘亨的大联合体在其死后也已经解体，兰纳王国（清迈)也处于混乱状态，组成蒲甘王国的各个成员之间也在争吵中。

在14世纪中期，一个稳定的新秩序开始从这种混乱中迅速出现。为了寻求这种发展之下的条件，国际局势的发展可能有一定的重要性。第一，在大约这个世纪的中期，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国际长途贸易流动开始激增。这将给东南亚统治者带来经济机会，同时这将激发中国的外交创意：支持在东南亚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第二，这是 52 一个主要的宗教和文化的变革时期，大陆东南亚最明显的特点是一种新的更有活力的僧伽罗教派的小乘佛教形式的传播。这种特殊形式的有组织的宗教是受到皇家庇护和操纵的，并且与此时该地区崛起的帝国有关系。国际潮流青睐的是与其接触最多的傣族人地区——在湄南河河口和暹罗湾顶部的阿育陀耶。

阿育陀耶的崛起

以前曾经属于吴哥帝国的华富里地区现在成了阿育陀耶的核心地区。在大约 1290 年吴哥对该地区的控制减弱了,因为在这个时间素可泰成功地从吴哥手中夺取了位于湄南河平原西部边缘的小王国,而华富里则保持了其对平原东部的影响力。通过在 1289 年和 1299 年之间派遣使团到中国,华富里表明了自己对国家建设的尝试。1296 年访问吴哥的中国特使周达观[①]的报道强烈地表明吴哥的丧钟在平原西部已经敲响。他写道:"在与暹罗人的作战中,所有的人被号召参与战斗",另外的地方还记载到"最近,在与暹罗人的作战中,(乡村)被完全摧毁。"[②]他也提及其他的更和平的进犯证据:佛教僧侣都获得一个傣族称号,而且令人好奇的是,他还提及了精美的傣族纺织技术:

> 近年暹人来居,却以蚕桑为业。桑种蚕种皆自暹中来,亦无麻苎,惟有络麻,暹人却以丝自织皁绫衣着,暹妇却能缝补,土人打布损破,皆倩其补之。[③]

提及的这些"暹人"几乎肯定是湄南河河谷西边的傣族人,他们与吴哥和华富里发生了冲突和竞争。不过,在世纪初素可泰的兰甘亨国王死后,巨大的湄南河平原的政治地位必定是处于混乱状态。作为平原东部的古老的吴哥文化和行政管理中心,华富里似乎仍然独立于素可泰和吴哥。它的文化代表了一种模糊的混合体:大乘佛教和一种更古老的吴哥人婆罗门教的小乘佛教以及印度的艺术和科学。它的人口

53

---

① 周达观(约 1266－1346):字草庭,号草庭逸民,元朝人。1296 年随使团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在真腊国都吴哥城逗留,一年半后归国。最迟于 1311 年写成《真腊风土记》。——译者注

② Paul Pelliot, trans., *Memories sur les coutumes du combodge de Tcheou Ta-Kouan*, Oeruvr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 vol. 3(Paris, 1951), pp. 32,34。

③ Pelliot, Memoires, p. 30;翻译自 J. Gilman d'Arcy Paul, *Notes on the Customs of Cambodia by Chou Ta-kuan* (Bangkok, 1967), p. 37。

主要是居住在已经长期建立的并且依赖于华富里的乡镇——例如因武里、信武里、猜纳、那空那育和巴真武里——的高棉人，但是除了不断增长的傣族人口，它还一定包括一些基本的孟族因素。这个地区的傣族人与素可泰的傣族人在语言上必有区别，因为他们的语言表明了经过今天碧差汶的帕萨河谷从北部和东北部以及从呵叻高原移居到该地区的迁移运动。无论这三个语言集团的比例是多少，我们至少可以假定在他们中间有一些文化异质性存在。

在这一时期，湄南河平原的西边主要是由素攀武里王朝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只能对这个王朝更早期的历史进行猜测。素攀武里被认为是从北部猜纳到南部春蓬这一地区的一个政治统治上的传统继承者，这个地区的核心在几个世纪前可能在佛统，后来在碧武里。至少早在13世纪初期，这个地区与半岛上的洛坤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1290年代，整个狭长的领土至少名义上受兰甘亨控制。当1300年左右兰甘亨不再控制该区域的时候，素攀武里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并且保持了对周边甚至向南的地区影响力，如果不是控制力的话。素攀武里很明显是一个暹罗人、小乘佛教国家，这个王朝的力量在于其统治者能够得到湄南河平原西部不断增长的傣族人的忠诚，以及对那些拥有浓厚的兴趣保持独立于吴哥统治的叻丕、碧差汶、北碧和佛统等王国的号召能力。

然而，到了1340年代，湄南河平原仍然缺少兰甘亨和早期吴哥所提供的政治重点和领导素质。尽管华富里和素攀武里还是权力和影响力的中心，但是当时该地区还有许多的小镇，每一个都对自己的将来没有把握并且他们都没有足够的组织来抓住时代所提供的政治和经济机会。可能产生的王朝之间的联盟和结盟是脆弱的，因为它们是个人和家庭之间关系的产物，要么是由政治婚姻建立，要么是由暂时的军事不平衡所迫使。

14世纪中期一个不出名的称为乌通王（“金色摇篮王子”）的冒险者提供了该地区转型的领导力。乌通王1314年也许出生于（根据参威特·卡赛思瑞的猜想）曾是位于碧差汶的一个强大的华人家庭。 54

我们知道他娶了素攀武里的一个女儿，而且他也许娶了一个与华富里统治集团有关系的公主。这种关系的结合——两个有权力的王朝和一个逐渐商业化的社区——在象征意义上至少代表了乌通王将去建立和发展自己政治野心的根本力量。

阿育陀耶的皇家纪年的一个版本把乌通王描述成了一个"柬埔寨"国王的继承者(也许最好理解为是华富里)，并且叙述了他在大城的根基。

> 国王去世了，没有皇家成员来继承他的位子。因此所有的人都推举乌通王子为国王来统治王国，他是查都赛提(华人商业社区的领导)的儿子。在当时有一场严重的天花爆发，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于是国王让军队驻守首都，他带领老百姓在夜间迁出了城市，为了躲避瘟疫向南移动。他(他妻子?)的大哥和他的部队暂时地居住在素攀武里城。而国王和他的军队继续行军几天，一直到他们来到一个大的河流边，看到一个圆形和平滑的岛屿，而且看起来很干净，位于该地区的中心地带。于是他命令他的军队趟过河，在东赛诺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
> 712年，虎年，第二个十年，星期五，第五个月的月圆的第六天，黎明之后的三点和九点，阿育陀耶的首都第一次建立(也就是1351年3月4日星期五，早上九点后不久)。①

以拉玛铁菩提的名义，乌通王派遣王后的大哥帕努去管理素攀武里，这是他的家庭传统势力的地点，而且他的大儿子拉梅萱"也在华富里登上王位"。他自己的首都则在大城，虽然两个主要的城市之间有一

---

① Richard D. Cushman, trans., *The Royal Chronicles of Ayutthaya* (Bangkok, 2000), p. 10. 所有的西方对阿育陀耶的研究者都记录其建立时间为1350年。暹罗的文本都说是*culasakkarat*时代的712年——那一年开始于1350年3月28日，结束于1351年3月27日。712年开始于第5个月的残月的第4天，因此第5个月的月圆的第6天直到1351年的3月4日才可能发生。

些距离，但是通过水路则容易到达。而且作为一个拥有一些文物和繁荣的国际贸易的港口城市，拉玛铁菩提处于具有强大自然优势的位置。利用这些优势以及他与该地区领导人和王国的政治与血缘关系，他很快建立了一个不久就超越其附近竞争对手的王国。 55

在它存在的第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构成阿育陀耶力量的实力和利益的混合体暴露出其变化无常的内部政治、波动的外交政策，以及制度所采取的形式。在每一个领域都展示了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和强有力的领导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的紧张和冲突潜力。

阿育陀耶的拉玛铁菩提一世和他后来的继承者们根据以下各方之间不稳定的同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础：来自王朝西部的傣族劳工，来自华富里和东部省份高棉人的声誉和权术，集中在港口首都中心的华人(及其他亚洲人)的商业权力。作为一个外来的居民社区，华人据说拥有政治影响力而没有政治权力，而且很可能他们通过帮助各种王朝派系去扩展他们的财富或者是与国外的外交联系来努力行使其影响力。西部平原的傣族首领的力量主要在于他们声称他们控制了该地区的劳工，这种声称主要建立在个人忠诚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为战争招募军队的时候。华富里的民众和东部地区与他们一样的民众被认为最好是在正式的政府内服务。这里有为新的和正在扩展的王国服务的熟练工匠、官员和专家。这些因素(经济的、军事的和管理的)所代表的三种力量源泉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且也许经历了几代人在，他们之间才达成了一个可行的妥协。 56

阿育陀耶的政治冲突主要集中在对王位的继承上，在素攀武里和华富里之间交替了好几代人。第一个主要的继承危机发生在1369年，拉玛铁菩提一世死后，他的儿子拉梅萱王子从华富里赶来继承了王位，但是他在位时间很短暂。第二年，年轻国王的舅舅波隆摩罗阇来到首都城前，也许率领着军队。波隆摩罗阇是他母亲(或者是后妈)的大哥，曾经统治素攀武里。可能是在他的大臣们的建议下，他放弃了王位，回去统治他父亲统治过的华富里。在那里，32岁的拉梅萱也许没有什么经验，对公共事务也漠不关心，也不支持军事行动。而他的63岁的舅



19 世纪的一幅暹罗绘画——建造大城(藏曼谷国家博物馆)

舅据说是个“喜欢军事,喜爱兵器的统治者,而且对他的士兵和社区很关心”[①]。他们的敌对关系也许不像纪年上记录的那么和平。其中一个消息来源描述道:“在(波隆摩罗阇)统治下,国内战争把土地都变黑了。但是他能够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解决所有的事情,使每个人都能听从于他。”[②]

18 年后,局面改变了。当波隆摩罗阇在 1388 年死后,他的 17 岁的儿子通赞(Thong Chan)王子登上了王位。前国王拉梅萱秘密在华富里及周围召集了拥护者,围攻了在大城的王宫,处决了年轻的王子,并且恢复了王位,从而恢复了华富里派的权力。

国王拉梅萱的第二次统治持续了仅仅七年,直到 1395 年。他 21 岁的儿子拉玛继承了他的王位,拉玛似乎做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来调

---

① Jeremias van Vliet,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Siam*, trans. Leonard Andaya (Bangkok, 1975), p. 61.

② Ibid.

解素攀武里派。他任命通赞王子(他的父亲从他手中篡夺了王位)的弟弟来统治素攀武里并且允许他与中国朝廷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中国朝廷认可他为阿育陀耶王位的当然继承人)。直到1409年，这项政策都运作得非常好。由于不明的原因，拉玛与他的丞相发生了一次争吵，丞相逃离了首都并且邀请那空膺和他一起罢黜国王。他们的军队把国王放逐，那空膺以国王因陀罗阇的名义登上了王位，丞相也被奖励了一个皇妃的女儿。

1409年的王朝危机似乎标志着华富里和素攀武里对抗的结束，因为这以后华富里很少再出现在纪年里面。不过，纪年可能模糊了拉梅萱这一支的消亡，因为一个资料来源描述道："在国王(因陀罗阇)统治时期，土地背负着内部战争，但是他对两派进行了调解。"[①]他一定声称他对华富里进行直接的行政控制，因为他安排了他的三个成年的儿子到北部和西部省份：素攀武里、讪卡武里(Sankhaburi)和彭世洛。而且后来对王位的挑战是来自遥远的北方而不是华富里。

在阿育陀耶王国建立不到60年的这个点上，它已即将成为东南亚大陆大国关系之间的一个主要的大国。国王拉玛铁菩提一世(1351－1369)关注于他王国的腹地并且为了获得东部边界的安全而与吴哥高棉人对抗。在这次战争中，其间吴哥本身可能暂时被占领了，相当多的人被捕并且重新安置在阿育陀耶的疆土内。在这一时期，由于与素可泰的摩诃达摩罗阇一世(立泰，Lüthai，1346/1347－1368/1374?)的某种个人条约或者同盟，拉玛铁菩提的北部边界的安全得到了保证，这也给双方巩固各自的王国提供了机会。

但来自素攀武里的波隆摩罗阇一世(1370－1388)登上阿育陀耶的王位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北方。这个国王，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60岁的粗暴的老战士，似乎把素可泰看作是与阿育陀耶争夺傣族世界主导权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摩诃达摩罗阇统治下，素可泰确实恢复了元气并且重新获得了许多在兰甘亨死后疏远的附属国。波隆摩罗阇

① Ibid., p.63.

几乎在统治期间一直与素可泰处于交战状态,也许是希望从摩诃达摩罗阇一世死后1368年和1374年之间素可泰的政治不确定中获得好处。到了1378年,他获得了那空沙旺、彭世洛和甘烹碧并且迫使国王摩诃达摩罗阇二世(1368/1374－1398?)宣誓向他效忠并屈从于阿育陀耶的统治。随后,他首次与兰纳王国交战,1386年南邦臣服;然后,他与兰纳王国结成同盟,重新与素可泰交战。不过,他被甘烹碧的叛乱挫败,死在1388年对该城市的征伐返回去的路上。

国王拉梅萱重新获得王位(1388－1395)标志着对素可泰仁慈政策的一种回归。如果纪年是可靠的话,那么拉梅萱曾经与兰纳王国和吴哥交战。根据这些纪年的报道,拉梅萱发动了攻击并且使清迈在1390年臣服。他抓了大量的俘虏并且把他们重新安置在芭他仑、宋卡、洛坤和尖竹汶(不过,兰纳王国的纪年没有提及这次征伐)。这之后不久,当柬埔寨国王为了劳工而攻击春武里和尖竹汶的时候,拉梅萱派遣了一支军队进入并且重新控制了吴哥。不过,所有这些战争都没有可靠的资料来证实,关于拉梅萱统治时期的对外政策的所有结论只是它似乎避免了与素可泰的对抗。

拉梅萱的儿子拉玛拉查(1395－1409)试图更有力地维护他在北部的权威。在1396年,一个阿育陀耶的特使暗杀了兰王国的统治者,而且在接下来的年份里,阿育陀耶把自己的法律体系强加给素可泰和它的属国。素可泰不久进行了反击。在被称为他的"独立宣言"里面,素可泰的国王摩诃达摩罗阇三世(赛·立泰,Sai Lüthai, 1398－1419)在1400年从阿育陀耶手中夺取了那空沙旺,从而在一个关键点阻断了河流交通,把自己的权威扩展到兰王国和帕王国,而且,他甚至努力尝试干涉兰纳王国的王位继承。有学者认为阿育陀耶在北部声誉受到的损害造成了拉玛拉查和华富里分支的衰落[①]。

① A. B. Griswold and Prasert na Nagara, " 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Epigraphic and Historical Studies, no. 1," *JSS* 56, pt. 2 (July 1968): 207－49.

当来自素攀武里的因陀罗阇(1409－1424)登上阿育陀耶王位的时候,他采取行动在素可泰疆域建立王国的权威。早在1412年,经过一系列没有记录的事件,一名大城的居民头领被安置在素可泰,而且摩诃达摩罗阇三世被降为附属国统治者的地位。在1417年的某个时期,因陀罗阇自己亲自访问了素可泰。当摩诃达摩罗阇三世在1419年去世后,因陀罗阇再次去了那空沙旺,去裁决素可泰的王位继承问题并且立了摩诃达摩罗阇四世(1419－1438)。后者在大约1430年把他的朝廷所在地迁移到了彭世洛,而且1438年他死后,素可泰作为一个省并入了阿育陀耶王朝。就如阿育陀耶的拉玛铁菩提国王派遣自己的儿子拉梅萱去管理华富里一样,此时国王波隆摩罗阇二世(1424－1448)也派遣自己的儿子拉梅萱(后来的波隆摩罗阇国王)去管理彭世洛。 59

波隆摩罗阇二世可能没有预料到自己能够继承父亲(因陀罗阇)在阿育陀耶的王位,因为他有两个哥哥比他更有资格获得王位。然而,在他们的父亲于1424年去世后,他的两个哥哥为了争夺王位在象背上进行了决斗,最后两人都死了。目前作为一个35岁的成熟男人,波隆摩罗阇二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效的和强有力的国王。他继承了一个疆域辽阔的王国,而且其军队在与高棉、素可泰和兰纳王国的战斗中历经磨炼。由于战争俘虏,他的臣民人数迅速增加了,编年史对臣民的记录是变得富裕和繁荣。波隆摩罗阇二世和他的儿子的任务是完成巩固王国的过程并且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强国。

波隆摩罗阇二世恢复了与吴哥的战争,但是拉玛铁菩提和拉梅萱并没有结束它。那些已故的吴哥国王们,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到这一时期他们似乎已经保持了从尖竹汶到春武里和呵叻(Nakhon Ratchasima)的边界,并且沿着这条边界有零星的抢夺劳工和洗劫财物的袭击行动。到了1420年代,吴哥明显地处于衰落。位于东部经常袭击其腹地的占婆和西部的阿育陀耶之间,吴哥的资源被压榨到了极点,以至于国家繁荣赖以为根基的复杂的灌溉系统的保养都受到了损害。最后,在1431－1432年间,波隆摩罗阇二世派遣了一支征伐队攻击吴

哥，最终成功地攻下了这座城市。首都遭到了洗劫——包括王宫，而且波隆摩罗阇二世的儿子被暂时留下作为王国的附属统治者，相当于素可泰的摩诃达摩罗阇四世的地位。不久这座城市被放弃，最后一个吴哥国王的继承人逃离并在东部的金边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现在经过几乎一个世纪的冲突之后，阿育陀耶至少对它的东部边界暂时地感觉到安全了。

对素可泰和中部平原的北部扩张是接下来的事情。在 1438 年摩诃达摩罗阇四世死后，波隆摩罗阇对自己的权力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安排自己 7 岁的儿子拉梅萱去那里做总督，大概跟随了一群行政人员和一支军队。

最后，在 1442 年，波隆摩罗阇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兰纳王国，开始了一个世纪的不间断的战争。1448 年波隆摩罗阇死在征伐清迈的途中，他的儿子拉梅萱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为包若玛特罗卡纳（或崔洛克，Trailok）国王。这样战争的重担就沉重地落在他儿子身上。由于目前王国纳入了比他父亲 1424 年继承王位的时候更大的领土和更多的人口，并且发动了野心勃勃的遥远的全面战争，崔洛克国王必定面对着一些压力，来系统化和加强自己王国的行政管理。为了更好地从事对北方的军事征战，他发现有必要暂时把首都迁移到彭世洛。

60

从阿育陀耶王朝的初期开始，它的核心省份至少受到严格的组织和控制。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国家都声称是建立在对居住其疆土上的劳工的统治之上。所有自由民都有义务每年向王室提供六个月的劳动力并且可能受雇于公共工程或服兵役。他们的劳工是由政府任命的疆土官员组织和协调的，这些官员负责追踪分配给他们的自由民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出来。这种对劳工的地域和官僚的控制与傣族传统的自由民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一种模式通常向单个的庇护人提供服务，而没有所谓的领土管辖权或者官僚控制，这是北部的素可泰和其他的傣族王国的系统特点。从 14 世纪下半期对阿育陀耶和直接依赖于首都周边区域的劳工的官僚控制，是赋予阿育陀耶优于其邻居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力量源泉。不过，它是一个既不容易也不能够完全

获得的创新。自由民自然而然地喜欢传统庇护关系的弹性和个人化特点，而不喜欢新的官僚体系的非人格化和蛮横，因此他们经常想办法逃避它。一些人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有权势的官员的庇护对象，而另外一些人则逃离到其他的疆土上或是无人居住的荒野，或是把自己卖为债务奴隶。对劳工的个人和官僚控制之间的内在紧张被证明是阿育陀耶历史上的持续动力。

早期的阿育陀耶王朝的官员正处于转换成官僚的过程，也许是按照早期建立在华富里和中部平原的吴哥模式。拉玛铁菩提必须从华富里、大城、卑谬府、因武里、讪卡武里和那空那育等地的高棉化的城市精英里面征召他的专门人员，如文书、婆罗门法庭、法官、侍从、会计师、医生、占星家等。这些人讲高棉语，并且从一开始就用以高棉语和梵文为基础的一种特定的王朝词汇来支持王位的权威。对他们来说，一个真正的王国国王应该高高在上，远离他的臣民，通过与各层官员的联系而同臣民隔离开来，并且要笼罩在一种来自湿婆和毗湿奴崇拜的婆罗门宗教的神秘和神圣中。

61

拉玛铁菩提和他的继任者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远离大众和管理国王各个省份的省级官员。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也许开始是国王的家臣、挚友和被庇护者，后来则被赋予管理各种疆土。这些官员也许最初来自某个镇的统治精英，随着王国的扩展被吸收进国王的服务。目前作为政府各个部门和首都的一部分，他们被从他们曾经拥有的个人庇护关系里分离出来。他们对劳工的非人格化、官僚化的管理只是为了国王的满意。他们也许被派遣到一个特定的地方一两年，来作为劳工的管理者或者登记者、巡视者和税收者。然后他们可能被转换到其他的地方，获得晋升，增加薪酬，或是相反。他们的行动都由书面文件、法令法规和皇家法令作了仔细的规定和限制。

拉玛铁菩提和他的继任者在作为立法者方面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同时代人。与缅甸、柬埔寨和爪哇的国王一样，他们都对有关宇宙不变的自然法则的佛法有共同的信仰，通过归因于圣人摩奴的印度法律文本的《法论》(*Dharmasastra*)版本，几代东南亚人对此已经熟知。尽管其

他的国王只是简单地根据他们对佛法的知识来做出司法判决，阿育陀耶的国王们发布了真正的立法、民法和刑法的正式条文——根据定义法律是可变的、世俗的和多变的。可以归因于拉玛铁菩提一世的阿育陀耶王朝法律的各种名称包括证据法、反政府法、接收抱怨法、绑架法、侵犯人权法、抢劫法和夫妻法。尽管人们对最古老的暹罗法律的确切日期有争议，我们确定的是抢劫法的部分内容至少在1397年前已经在使用，因为那一年在素可泰树立的一个碑铭中包含了它的部分内容。

早期国王通常任命有血缘的亲属去管理最重要的省份。这个事实表明王国的管理尤其是对省份的管理在阿育陀耶王朝的第一个世纪不是完全顺利的。因为拉玛铁菩提家族通常派遣年轻的王子去治理华富里，而波隆摩罗阇家族通常派他们去素攀武里，我们可以假定，一些以地方或区域为基础的、代表着与地方精英和自由劳工的个人关系的权力，是持续存在着的。这样，政治和经济权力可以对关键事件如皇家继承等施加影响。因此，尽管制度化的官僚管理为王朝提供了位于中心的一种持续的有效的力量，但是王位的继承往往由能够最好地从主要的省级中心召集劳工和组建同盟的那些人来控制。

62

包若玛特罗卡纳国王（1448－1488）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尝试来加强王国的行政管理制度。他颁布了两个重要的立法：公务等级法和军事及省级等级法，其主要关注的是等级结构和功能分化。根据王国长期建立的原则和做法，这些法律实际描述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每个个体的位置和立场都做出了仔细的规定。法律赋予每个人一些单位的萨克迪纳（sakdi na），字面的意思是“场域能量”。尽管起初这也许至少象征性地代表了用莱（rai）表示的实测的稻田面积（22莱＝1英亩），但是15世纪以前它并没有这意思，因为甚至佛教僧侣、家庭主妇、奴隶和华人商人都配给了萨克迪纳。普通的农民自由民有25个萨克迪纳及5个奴隶，为政府服务的工匠50个，小官吏50至400个。从400个萨克迪纳开始是官僚贵族（“坤”），这些成员从有400个纳的小部门的头目到有1万个纳的高级部门的首长。贵族上层的排名从王室成员的年轻成员开始，大多数的王子在他们上面，然后

直到事实上的王位继承人，他的等级拥有10万个纳。在崔洛克统治时期详尽的法律里面，读起来就像整个社会的一个目录，每一个可能的位置和地位都作了排名并且配给了一定的萨克迪纳，因此明确说明了每个人的相对位置。而且，民法和刑法进一步加强了萨克迪纳的地位。罚款和处罚与涉及的个人的地位相称。如果一个农民谋杀了一个有权势的官员，罪行就比谋杀一个奴隶要严重，因为这种犯罪是对社会秩序和国王的一种侮辱，官员不过是有赖国王才获得自己的身份的。法律中表达的王室权威最重要的关注是为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来管制天然的人类不平等。

63

国王崔洛克的等级法律的其他关键性特点是为了有效开展政府管理而作了一些规定。法律把官僚划分为两个大的部，国防部负责军事，内政部负责民事。然后每一个部再分成许多分部、次部等等，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特定的功能责任。例如民事部门，在内政部下面有四个分部：首都、王宫、农业和国库。每一个分部再分成小的部门和更小的单位。负责外贸、外事和管理移民贸易社区的单个部门在财政部里面，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在15世纪的后半期当阿育陀耶参与到几乎不断的战争中，这种管理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因为官僚们为了王国的持续必须定期地提供军队、物质供给和领导。

战争是崔洛克国王40年统治的一个特点，但是战争不是王室狂妄自大的产物。相反，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傣族世界内部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的结果。到了1450年代，主要的新的傣族王国已经在三个独立的区域崛起：阿育陀耶王国和此时加入的复兴的兰纳王国以及新的澜沧王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每个王国的统治者都发现有必要也都期望能摆脱他们前任和邻国狭隘的地方性的关注，重新确定他们国家在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国际化的星球上的存在。在领导傣族世界上，阿育陀耶现在有两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兰纳王国的复兴

14和15世纪的清迈纪年里充满了战争，战争的发生几乎像是日

常生活的一个特色了。兰纳王国与它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有冲突,甚至常常自己内部也发生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兰纳王国能够成功地对抗阿育陀耶军队更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提出了兰纳王国如何保持其持久力量的源泉问题。

一个纪年里面报道了兰纳王国于1329年在清盛建立了一个新城市,这只是表明了兰纳王国力量的一个方面。纪年首先提及清盛的行政管理边界如何把它与所有方向上的主要王国分割开来,如清莱、芳县、塞特、景栋、景洪和清孔。然后纪年列举了在各个方面上与该城市有一些距离的哨所,接着讨论了村落联合体的内部管理。王国,也许是以清盛为省府的省,是由10个区组成,有些区被认为是村落联合体,每个区由几千纳或者是稻谷地组成。包括所有区的整个清盛王国拥有32 000个稻谷地(兰纳王国的名称翻译出来就是"一百万稻谷地")。如阿育陀耶的萨克迪纳一样,兰纳王国的稻谷地可能也只是名义上而不是实际测量的,但是它们似乎已经作为一个摊分税收征收和测量王国组成部分相对力量的一个有用的工具来运作。

纪年继续考察清盛王国的中心管理。它解释了清盛有12个负责管理的首长,加上一个负责司法,一个负责谷仓,一个负责发起战争,两个负责统治者的家庭,一个负责城外服务的首长。没有什么可以表明清盛的省长(或者其他地方的与其相对应职位)直接参与管理他藩属内的区和镇。尽管在主要藩属的统治者或者省长的全面控制之下,这些似乎表明他们已经保留了自己的领导和统治者。也许根据他们的稻谷地的评价比例——他们的纳——他们必须为劳役和军事服务提供人员,根据土地和灌溉的基础上的产品上交税收,这是统治者拥有的权利。兰纳王国的力量在于它有能力通过其在藩属中间层次的代理人来控制生产、忠诚和半自治地区的数以百计的劳工。而且因为这些藩属对王国的命运是极其重要的,清盛的国王们非常重视通过个人关系来控制他们。他们经常派遣自己的儿子、兄弟、亲密随从或者有时候是退位的父亲去统治这些主要的藩属:清莱、清盛、清孔、景栋、塞特、芳县、南邦,而其他的则通过战争来获得。

从1320年代到1350年代，国王满哥瑞的继任者似乎在整合王国的藩属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国王盛富（1318－1319，1324－1328）退位去管理清盛，留下自己的儿子卡福王（Kham Fu）（1328－1337）管理清迈。在他的父亲1334年去世后，卡福王似乎从来没有休息过。他统治了清盛一段时间，但是没能够成功地征服那些独立的兰王国藩属的统治者，从而消除帕尧王朝的竞争，他对帕王国的征服也失败了。

与他的父亲一样，国王帕于王（1345－1355）在治理清迈省上花费了几年的时间，而卡福王则负责清盛。与他的父亲不同的是，他致力于对他的王朝进行信仰工作。

直到国王库那（1367－1385）统治时期，兰纳像一个王国那样发展，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似乎才重新获得一些动力：库那被认为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和有效率的统治者，他显然是他那个时代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他非常熟悉古典的印度的艺术和科学，包括占星术和象术（为了在战争中的应用），而且他有浓厚的兴趣为居住在森林的佛教僧侣在兰纳建立一个新的、禁欲的和学术的派系。在1369年，他邀请了"尊敬的苏马纳"在南奔建立他的僧伽罗秩序，苏马纳是一个素可泰僧侣，他曾经在孟国的马达班学习。库那为他在清迈建立了一个新的寺院，1371年这个僧侣成为该寺院的主持，直到1389年他在那里去世。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行为的文化意义以及库那和他的继任者对此的持续庇护。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世纪里面，苏马纳在兰纳建立的佛教分支成为王国领先的知识和文化力量。它的成员负责撰写了许多目前仍然在世的书面文本，而且他们建立的寺院在文化和宗教上影响了北部傣族的几代人。与清迈逐渐增加的政治优势一起，僧伽罗派施加的文化影响激发了王国的中央集权和傣族在其人口之中一种区域身份意识的发展。

在接下来的兰纳两代统治者期间，随着其内部政治权力的利益增长，清迈的国际参与再一次变得更加密集。在国王库那死后，他的儿子盛蒙玛（1385－1401）登上王位。库那的弟弟摩诃·卑谬与南邦的省长密谋夺取王位，失败后逃亡到阿育陀耶。然后他极力劝说阿育陀耶的

波隆摩罗阇一世派遣一支军队征伐兰纳，但是被击退了。当后来他在王宫里出丑之后，他回到兰纳，接着被派遣去治理他 1385 年前曾经治理过的清莱。很明显，他拥有一批不容忽视的地方追随者和支持者。盛蒙玛统治期间也有一次在 1387 年或者是 1388 年对素可泰不成功的征伐，而且国王也许征伐了傣禄地区，因为 1389 年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山芳坎(1401 － 1441)出生在那里。

66

尽管他的一个哥哥(13 岁)声称拥有继承权，但是年轻的山芳坎登上了王位，他的哥哥被派遣去管理清莱。也许是接管了摩诃·卑谬旧的支持者并且向目前获得暂时独立的素可泰寻求帮助，这个哥哥展开了一次企图夺取王位的活动。冲突涉及双方在整个地区的军队，而且最后他被击败并逃亡到素可泰。接着在 1404 年，兰纳不得不去面对来自中国云南的挑战，在 1404 年和 1405 年，云南的首领派遣军队征伐了清盛。通过征召来自清迈、清盛、芳县、清孔、汤县和帕尧等地的 30 万人(?)，兰纳击退了进犯者。山芳坎似乎在和平中度过了他接下来统治的大部分时间，而且通过把自己的儿子们安排到主要藩属的政府(包括清盛、帕尧、清莱和芳县)，他逐渐加强了对其王国的控制。

1441 年一场终结山芳坎统治的危机暴露了兰纳长久存在的制度脆弱性。国王被一个王宫小官吏山德尧推翻，他偷偷地把国王的第六个儿子从省里带过来，迫使老国王放弃王位并流亡到塞特。于是这个儿子被加封为提洛克罗阇国王(1442 年 5 月 19 日－1487 年 5 月 27 日)，后来他被认为是兰纳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提洛克花费了几乎十年的时间来反击其他声称有王位继承权的人，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权威。那些声称有王位继承权的人包括野心勃勃的山德尧，不过最终那些他寻求援助的人向他告知因为他没有王侯血统，所以他不能成为国王。(由于缺乏长子继承制的规则，密切兰纳民众只能通过血缘来建立皇家的稳定!)可能是受到早期成功的鼓舞，提洛克想从他的父亲那里夺取塞特。但是当芳县的省长加入到山芳坎的抵制行动中的时候，这场袭击只是挑起了内战。看到一个侵犯的机会出现了，于是阿育陀耶派遣了一支征伐队去攻击兰纳。在迅速制服了国内的敌人后，国王提洛克

在距离清迈仅仅几个小时路程的南奔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击退了阿育陀耶的军队。最后在1443年，仍然独立的兰王国的统治者决定挑战提洛克，开始了两个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帕府和琅勃拉邦也参与其中，1449年战争结束，兰纳建立了对兰王国的主权控制。

到了1450年，兰纳的提洛克已经巩固了其领土并且开始向远方军事和政治冒险。那一年他对孟雍的泐族进行了一次征伐。在那次征伐中，就如后来对琅勃拉邦(1454)和景洪(1455和1456)的征伐一样，提洛克也许是为了努力去加强其储备的劳力和畜力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与阿育陀耶的主要战争。阿育陀耶1438年吞并素可泰古国和1442年对南奔的攻击暗示了这场战争的到来。争议的问题是广大中央平原北边的小的附属国以及傣族世界的霸权。

1451年，提洛克在自己的王宫接见了一个素可泰的王子，这个王子曾经被阿育陀耶派往彭世洛，不过后来他认为自己被国王背叛。那一年帮助他重新夺取素可泰地区的兰纳军队被击败。经过长时期的准备，当阿育陀耶的崔洛克派遣一支军队去攻击帕府和南邦的时候，战争在1456年或是1457年重新开始，持续了将近30年。简单来说，阿育陀耶最初在1456年和(或者是)1457年的攻击被击退了。

1459年，提洛克转为进攻，围攻彭世洛。很明显，阿育陀耶的军队经受住了这次围攻，因为在第二年北方人再次攻击了相同的地区，这一次是在撒查那来省长的帮助之下。提洛克1460年对彭世洛和甘烹碧的攻击都失败了，他再一次空手回到清迈。战争年年持续。1462年，古老的素可泰以自身之力挑战阿育陀耶，被暹罗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镇压。由于意识到需要在中央平原北部地区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和政治存在，阿育陀耶的国王崔洛克在1463年把首都迁移到彭世洛并且任命他的儿子因陀罗阇为其在阿育陀耶的代理人。

1464年，一幕让人感动和好奇的情节发生了。那一年，崔洛克在彭世洛的正南边建造了一个新的寺庙。在向清迈的提洛克请求建立同盟或者休战并遭到拒绝后，为了支持他的儿子，他正式退位并且在那里剃度成为一个佛教僧侣。提洛克和琅勃拉邦以及孟人勃固的国王送给

他所要求的僧侣,但是拒绝他后来的请求:为了他的生计提供施舍,把撇查那来省归还给他。尽管他公开作出敬从的样子,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计划对抗兰纳。他派遣了一个巫师僧侣到清迈去作为一个间谍,极力从这个北方国家内部去破坏和削弱它。

兰纳的提洛克也不是无动于衷。他也派遣了间谍去对抗彭世洛和阿育陀耶,而且他也发动了对掸族王朝(如莱卡、锡袍、蒲和孟奈)的进一步的军事征伐,这也许是为了他的军队获得更多的劳力。同时,崔洛克派遣的巫师间谍所造成的损害也开始产生影响。排除其他的不说,提洛克唯一的儿子巴让被错误地指控为阴谋造反从而被处死。

在 1466 年早期,阿育陀耶的国务部长说服崔洛克不再做僧侣,恢复他的王位并且回到阿育陀耶。这之后不久,崔洛克派遣了一队使者去清迈,表面上去寻求和平,同时也去查明他的间谍项目进行得如何了。在这次出使过程中,一个阿育陀耶的特使企图从提洛克的王宫里盗走一个金瓶,不过提洛克也知晓了阿育陀耶巫师间谍的背叛行为。巫师被殴打致死,特使们也在回阿育陀耶的路上被杀死。让人奇怪的是,战争在逐渐地减少。不过,仅仅有两次进一步的交战。第一次是在 1474 年,当时素可泰想获得撇查那来但是被击退。另一次是在 1486 年,当时阿育陀耶派遣了一支军队攻击兰王国,但是没有攻下该城市。接下来,这些主要的傣族大国之间的斗争陷入了僵局。

对清迈的提洛克罗阇国王来说,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里,他专注于更多的地方事务。在 1475 年和 1478 年之间,他建造了巨大的摩诃·柴迪隆寺——树立在清迈中心的一个伟大的佛教尖塔。在这之后不久,当提洛克正在发起对掸族王国的征伐的时候,一个新渠道传来了威胁的消息。当时越南人在 1478 — 1479 年对琅勃拉邦的一次主要侵犯威胁到了兰纳在兰王国的东部哨所。唯一的困难是如何遏制威胁。兰纳军队俘获的俘虏被送到云南的中国官方那里,也许其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军事和外交上的帮助来对抗越南活动在该地区的复兴。第二年,中国朝廷派了两个使团到清迈要求服从于中国的朝贡体系,提洛克显然屈从了。最后,在 1480 年代中期,一群拉哇族人攻下了孟雍,然后

他们逃离到景洪的时候，兰纳就开始卷入到北方的战争中了。提洛克派遣了一支军队跟随在他们后面，最后至少暂时地成功攻下了景洪。这之后不久，国王提洛克罗阇粉碎了一些省的高官帮助南邦省长篡夺兰纳王位的一场阴谋。他在统治了 46 年后于 1487 年 5 月 27 日去世。尽管对抗阿育陀耶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兰纳王国此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他已经使兰纳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成为一个其影响力在每一个方向都向外延伸的国家。在这方面，提洛克已经超过他的任何前任，提洛克的主要竞争对手阿育陀耶的崔洛克仅仅比他多活了一年，他于 1488 年期间死于彭世洛。从长远来看，他的立法带给阿育陀耶的制度力量使他的王国带来的优势超过兰纳，但是这种优势要经过几代人才能显现出来。 69

17 年前他唯一的儿子由于叛国被处死，所以提洛克的孙子育清莱(1487－1495)继承了王位。这个统治者非常不受欢迎，以至于他的大臣们罢免了他，推举他 13 岁的儿子蒙·凯敖(1495－1526)登上了王位。这一时期的纪年没有表明这两个国王是否能够保持他们祖先最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传统。从 1507 年之后，尤其是蒙·凯敖统治的国家，几乎经常在素可泰地区与阿育陀耶交战，兰纳的军队经常在战争中被击败。1515 年，阿育陀耶甚至攻陷了南邦，但是仅仅是带走了战利品和俘虏。阿育陀耶在这些年里并没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许是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加强清迈的防御能力上。这里的纪年记录了大量的掸族人口迁移到兰纳地区，这也许表明兰纳正在遭 70 受战争损失带来的劳工短缺。只有到了 1520 年，年轻的国王才进行了完整的加冕仪式，那时他已经 38 岁了。兰纳王国在这之前所获得的政治集权化看起来充其量是岌岌可危的。然而兰纳似乎制度上是强大的。王朝的高级官员在政治和军事事务上保持了一定的活力。

军事征伐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进行的，当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们会被授予省长的或朝廷的位置。非常有意义的是，那些纪年记录了在 1520－1521 年期间政府为公务建造了建筑物，尤其是王宫广场，中央行政管理在那里进行。



清迈摩诃·柴迪隆寺

只有到了蒙·凯敖国王统治的末期,他才积极地卷入到一个在景栋的外部冒险,景栋也许是最重要的掸族王国。在那里两个王子对王位产生了争议,他们向新威(Hsenwi)和兰纳寻求帮助。1523 年,蒙·凯敖派遣了两支军队去进攻景栋,每支军队都超过 2 万人,一支借道清盛,另一支借道塞特。由于那种被蒙·凯敖视为蹩脚的领军能力,这次的远征是个灾难,他处死了有罪的将军。

不过在其他方面,蒙·凯敖统治时期是兰纳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在这一时期,他去世之前在清迈用巴利文写成的编年史《胜纪絮语》(*Jinakalamali*),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编年史相当详细地阐明了国王进行的许多体现佛教优点的工作——建造寺庙、印制巴利大藏经、铸造佛陀图像以及他的非常慷慨的施舍,但是特别强调了他对严格的僧伽罗佛教等级的强烈支持,这种等级在一个世纪以前也被引进到库那统治的王国里面。这是一个具有相当宗教和文化重要性的政策,因为在皇家声誉的支持下,它重申了一种博学的、以文本为倾向的佛教的优势地位。这种佛教中许多有教养的、受过教育的僧侣将长期

向兰纳社会提供有力的智力领导。

蒙·凯敖国王在1526年初死后，他的弟弟继承了王位，成为克特·查他拉特国王(1526－1538，1543－1545)。他的继位标志着兰纳国运开始迅速下降。在经过一段毫无特色的统治以及部分官员在1535年企图罢免他之后，国王克特由于任命了一个新的清盛省长而激怒了他的官员们，1538年他被罢免。他的儿子猜(1538－1543)"没有按照十条皇家戒律来进行统治"[①]，因此高级官员们处死了他，并且召回他的父亲恢复了他的王位。1545年国王被暗杀也许是由于他的宗教政策，因为他尝试要求用另一个等级的仪式来重新授予一个等级的僧侣。不论是什么原因，他的死亡标志着兰纳独立地位终结的开始。

71

首先，一些兰纳的高级官员要求景栋的统治者来就任兰纳的王位，而且当他表示不乐意的时候，他们又邀请了孟奈的掸族统治者。不过在他到来之前，所有来自藩属国的一组官员在清盛会面并且决定邀请琅勃拉邦的统治者前来治理。在混乱中，被忽视的新威的掸族统治者侵犯和攻击了清迈。由于被城市有力的防御所阻止，他退回到南奔并且派遣一个使团到阿育陀耶的统治者那里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来自清盛的主要官员聚集在清迈并且立皇后吉罗婆罗帕为王(1545－1546)。

随后的事件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破坏。首先，一支来自阿育陀耶的军队进入到清迈，并且为已故的国王克特举行了夸张的或许是刻意追求完美的葬礼之后，他们回到了阿育陀耶，现在清迈被认为是一个附属国。几个月以后，孟奈的掸族统治者围攻了该城但是没有攻下。接着，来自琅勃拉邦的两个高级官员"前去保护清迈"。而且几天以后一支阿育陀耶军队到达南奔附近商讨清迈的投降问题。不久该城被重重包围，但是经过激烈的战斗后包围被解除了，暹罗军队也于1546年初撤退了。

在1546年的几个月里，兰纳的民众也许认为混乱的时期正在结束。在令人印象深刻的盛况和排场中，琅勃拉邦国王的一个年轻儿子

① *Chiang Mai Chronicle* (2nd ed.), p. 114.

从清盛到达清迈王国,然后被立为国王赛塔提腊(1546 年 7 月 17 日—1547 年 8 月 20 日)。但是 13 个月后,他的父亲去世,赛塔提腊回去统治琅勃拉邦。尽管属于一个更大的老族王国澜沧王国的一部分并且被同一个国王统治,清迈和兰纳还是很快陷入到国内战争中。官员和藩属为了权力的战利品而相互厮杀。经历了四年的混乱统治。由于不能恢复秩序,赛塔提腊把兰纳的王位转给了他在清迈的王后,但是她不是王国里那些对其不满的显要人物的竞争对手,于是他们罢免了她并且立另一个人为王。

72 到了 16 世纪中期,兰纳再一次失去了其重要性并且成为以北方高地山谷为基地的各个派别孤立无援的猎物。

澜沧的崛起——琅勃拉邦

中部印度支那的东北部组织起来相对缓慢,也许不是因为讲傣语的人相对缓慢地定居在这里,而是因为该地区长期以来处于吴哥帝国的统治之下。当琅勃拉邦的法昂王子最终在 1353 年成功地组合成一个王国的时候,他王国的中心位于琅勃拉邦的最北部,但是那儿已经有大量的使用傣语的老族人居住在川圹地区、万象平原周围,甚至是佛统以及再向南的沙湾拿吉地区的湄公河河谷。在西边的黎逸地区也许有更多的老族人。

与西边的兰纳、景栋和兰王国民众一样,老族人的政治组织服从于他们的社会组织。如他们的社会单位一样,他们的政治单位非常小。慢慢地到了 16 世纪中期,澜沧("百万大象")的引力的中心向南延伸到湄公河河谷。于是,不久以后湄公河的老族人将参与到中部印度支那的大国政治中去。

再往南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在马来半岛的中部有大量的讲傣语的人口。洛坤的统治者长期以来对半岛的西海岸实施统治权,而且再向南他们拥有大量的附属国,尤其是在芭他仑和宋卡主导的地区。再向南,在半岛的东海岸,他们的权力落入到北大年的马来统治家族手里并且向南延伸。森林和矿产到处都是,并且短期内能够应付该地区的政

治上的分散，尤其是在15世纪马六甲的发展刺激了该地区的国际贸易之后。这些贸易诱发了阿育陀耶的入侵和干涉，因为它有助于为满足阿育陀耶对日益增长的对从国外进口产品的要求来筹措资金（包括枪支和雇佣军）。

全能的君主，遍布的战争

从1488年崔洛克国王死后，阿育陀耶王国作为傣族世界的大国保持了稳步的发展。在崔洛克的儿子因陀罗阇（1488－1491）和拉玛铁菩提二世（1491－1529）统治下，阿育陀耶获得了繁荣。到了1460年代，王国已经在马来半岛和孟加拉湾海岸建立了权威，因此能够从剧增的国际贸易中获得好处。这个世纪初期，在马六甲建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后，国际贸易剧增。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六甲的统治者承认阿育陀耶王国的宗主权，而且在世纪中期崔洛克把马六甲包括在他的附属国的名单上。不管他们关系的实际内容是什么，也许这种关系要通过洛坤来进行，但是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建造商业和经济联系。阿育陀耶是马六甲稻米的主要供应者并且它从马六甲进口了奢侈品和印度棉布。阿育陀耶控制对丹纳沙林（Tenasserim）（1460年代前）和土瓦（Tavoy）（1488）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直接进入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的国际贸易，而不是间接通过马六甲。

73

在这个时期，国王们垄断控制国际贸易在整个亚洲是一个惯例。直到国王已经按照自己的价格购买了他需要的东西之后，来访的贸易商才能销售商品。而且直到国王的供给（通常是从他的各种臣民收集来代替实物税的）在国王的要价下被用尽之后，其他人才能购买主要的贸易商品。这种安排自然加强了王室相对于统治精英的支配关系、首都以乡村生产者为代价的对立关系以及拥有非常便捷出海口的国家与内陆国如兰纳和澜沧的关系。

15和16世纪，在国际贸易大幅度增加刺激下的经济发展对阿育陀耶崛起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它们时常以循环的方式在运作。国王通过贸易获得的财富越多，他就更有能力来吓住或者战胜国内和邻国

的竞争对手并且把它们的疆土合并到自己里面,因此能够进一步改善其贸易能力。拉玛铁菩提国王的公共和虔诚的作品项目中有显示皇家财富的明显迹象。整个1490年代,他在他的首都建造了几个重要的宗教纪念碑。而且在1500年和1503年之间,他命令铸造有史以来最大的金属佛陀立像,这个佛像16米高并且覆盖了将近173公斤的黄金。与此同时,在不断增加的财富的帮助下,国王采取步骤来加强军队的力量。他为成年男子的义务兵制进行了隆重的登记和注册,并且为了控制军事劳力重组程序和制度。最后,为了指导他的军队,他汇编了一本《论战争胜利》的书,列明了战争的原因、军事战略、战争艺术和战略。以这种方式书写的文本表明军事成就已经被接受为一个文化人值得做的事情。

74

当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后,他们立即派遣了一个使团到阿育陀耶,这部分是出于政治考虑,因为他们认为马六甲是暹罗的附属国,部分是为了确保马六甲巨大海上商业的持续,相当大的部分则包括暹罗的稻米。杜阿尔特·费尔南德斯(Duarte Fernandes)作为访问暹罗的第一个葡萄牙特使,乘坐一只中式帆船相当谨慎地抵达,但是受到了较好的接待并且携带着送给葡萄牙国王的豪华礼物被送回到马六甲。后来在同一年,另一个葡萄牙使团到达阿育陀耶。这一次一个使团成员被指控收集商业情报,而且在1518年,第三个使团证实在1511年签订了和平条约。为了回报暹罗人授予其在暹罗的居住权和宗教自由以及特定的商业特权,葡萄牙人向暹罗人保证供应枪支和弹药(以及不久后征召葡萄牙雇佣兵来帮助他们使用枪支和弹药并最终让他们能够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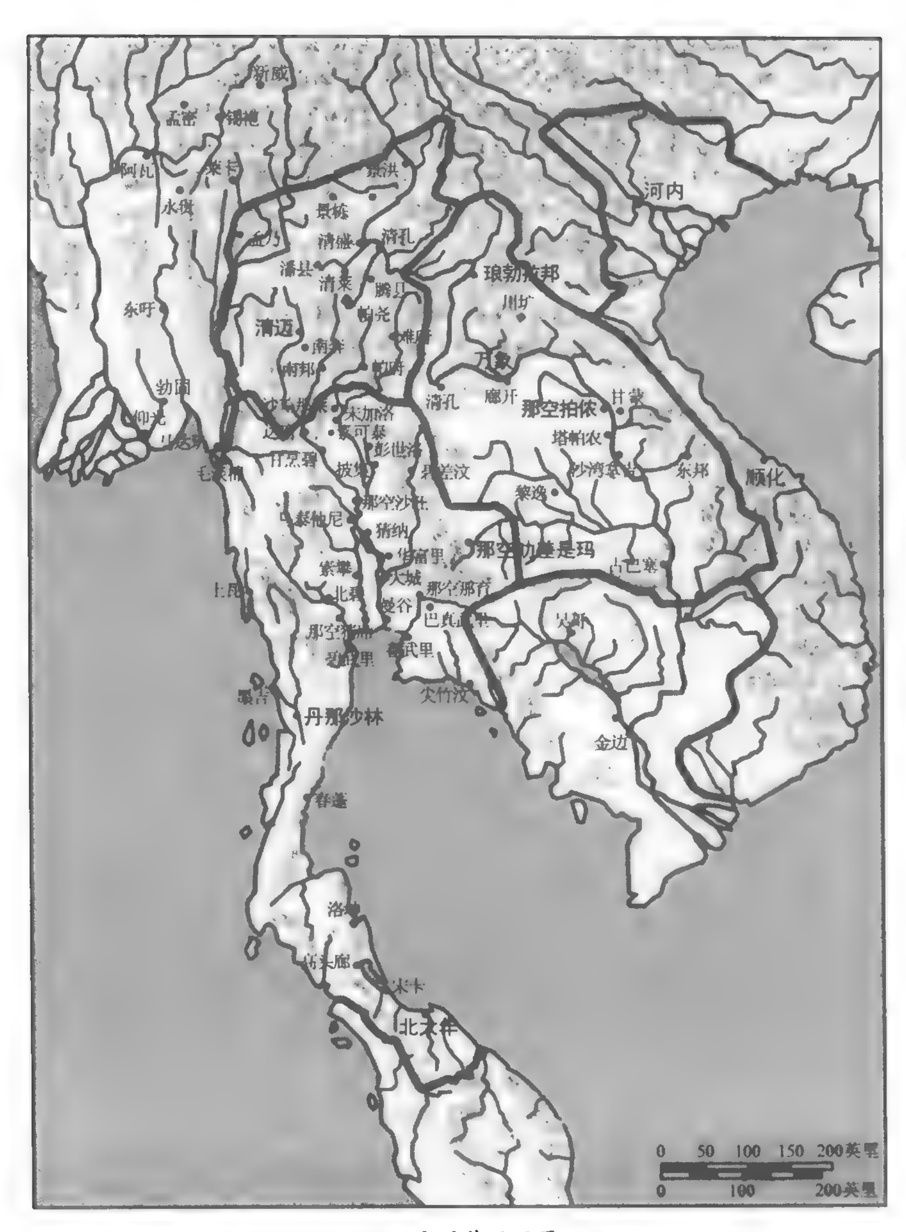
至少短期来看,葡萄牙人的到来并没有给阿育陀耶带来物质上的影响。商业关系只是简单代替了早期阿育陀耶与马六甲的交易关系,并且尽管暹罗人的国际商业在海运贸易上保持着稳定的增长(1500年到1560年间增长了两倍),他们的成功更多地归因于与那些组织起来同马六甲的葡萄牙人竞争的穆斯林国家〔如北大年、亚齐(Aceh)和巴淡(Bantam)〕的新贸易联系和与葡萄牙人的条约关系。

在曼谷和洛坤发现的已经失去光泽的几百个老炮的炮筒，也许证明了一个由葡萄牙人引进的能够“现代化”战争的有意义的创新。不过，葡萄牙人也与阿育陀耶的竞争对手进行枪支和弹药的买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创新。无论如何，学者已经认为由于通过阿拉伯人和中国贸易的进口，枪支已经存在于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发展过程中。

16世纪大陆东南亚不断变化的版图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发展演化而来的，葡萄牙人在其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相互关联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通常有利于该地区海岸国家的发展并且加速了他们的中央集权化。这些发展反过来又与我们可称之为“资本文化”的社会和文化凝聚力的缓慢发展形成对比，这些资本文化在语言、文学以及宗教生活的公共仪式上有他们独特的表达。在这里，随着王国的精英受到世界性文化的影响并且他们更自觉认同自己的文化，沿海王国的财富加速了港口城市首都的领导力。随着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和不断增加的商业的推动，城市精英的文化开始渗透到乡村。以阿育陀耶为例，由于该地区孟族、高棉族和傣族背景的文化混合，首都的风格、品味和价值被明确地界定，但是它们开始呈现出具有它们自己的特色的“暹罗”形式，这与兰纳的“傣族”和澜沧的“老族”文化不同。

75

与葡萄牙人带来的挑战相比，国王拉玛铁菩提还有直接的政治挑战。1507年，兰纳国王侵犯了素可泰地区，重新挑起了上个世纪的战争。阿育陀耶通过转守为攻作出了回应，1508年攻陷了帕府以及南邦，1515年，攻击到甚至仅仅距离清迈8公里的地方。阿育陀耶在那次攻击中获得了北部的成功但并没有继续发挥它的优势。在他统治的剩余时间里，拉玛铁菩提在北部采取防御的政策，1526年派遣他的大儿子——他的法定继承人，或以总督(副国王)的名义，去管理彭世洛。他的这个大儿子诺·普单坤，在1529年继承了阿育陀耶的王位成为国王波隆摩罗阇四世。作为一个在位很短的国王，在他1533年死于天花病之前，他仅仅能够通过派遣大使与兰纳谈判和平条件来重申他父亲的政策。


新威
孟密
阿瓦
永衡
景洪
景栋
清盛
清孔
河内
琅勃拉邦
东吁
清迈
清莱
帕尧
南奔
南邦
万象
勃固
仰光
廊开
那空拍侬
甘蒙
塔帕农
毛淡棉
甘烹碧
彭世洛
披集
沙湾拿吉
东邦
顺化
黎逸
那空沙旺
猜纳
华富里
那空叻差是玛
占巴塞
大城
北碧
曼谷
那空那育
巴真武里
吴哥
尖竹汶
丹那沙林
金边
春蓬
洛坤
宋卡
北大年
0 50 100 150 200英里
0 100 200英里

1540 年的傣族世界

波隆摩罗阇5岁的儿子罗萨达王子仅仅在位五个月，因为他父亲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帕猜[1]处死了他并且在1534年初登上了王位。

尽管篡夺王位让人质疑，但是帕猜国王(1534－1547)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和明智的国王。与他的父亲一样，他从建造公共工程开始他的统治，他通过改进今天曼谷地区的湄南河河道来加速海洋贸易。同样与他的父亲一样，他雇佣了120个葡萄牙雇佣兵来作为他的保镖并且给他的军队讲述如何使用火器。随着军队的改进，不久他开始与缅甸和兰纳发生冲突，这成为不久摧毁整个傣族世界的长期战争序幕的一个部分。

13世纪晚期随着蒲甘的倒塌，旧缅甸分裂了。1290年代由三个掸族兄弟建立在阿瓦地区的王国很快就丧失了其曾经拥有的掸族或者傣族特点，也丧失了其对东部掸族藩属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以勃固海岸为中心的孟族王国获得了独立和参与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繁荣。渐渐地，一个新的和富有攻击性的缅甸王国在东吁崛起了，它从海边沿着锡当河向上有一些距离，因与阿瓦和勃固足够远故而是安全的。几个世纪以来，东部高地的掸族按照自已的方式发展，而且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仅仅举出一些国家如锡袍、莫因、永贵、孟密和孟拱都获得了完全的独立。用G. E.哈维令人难忘的短语来说，16世纪早期之前，“高地缅甸到处是咆哮的掸族王国”[2]。在1540年代，随着锡袍统治者获得王位和其他掸族首领的积极参与，在阿瓦的掸族力量复兴了。但是这个掸族同盟很快瓦解，进而变成战争，而且到了1555年，阿瓦成为缅甸军队的猎物。

77

在这一时期，东吁存活下来并且渐渐地繁荣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它远离勃固和阿瓦曾经卷入的主要战争，它还悄悄地接收了来自北部的大量的缅甸移民。到了1490年代后期，东吁的统治者获得阿瓦、勃固和兰纳以及东部与它接壤的克伦人的认可，甚至是官方的确认。他

---

① 帕猜，又译“查拉佳”、“蔡拉加”。——译者注

② G. E. Harvey, *History of Burma* (London, 1925; reprint, 1967), p. 106.

的武装实力足以让其所有的邻居们提出结盟,他巧妙地操控这种情况来达到自己的优势。东吁的国王德彬瑞蒂(1531－1550)在他生涯的早期就利用了他的力量和对手的弱点。他首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南方,在1530年代末期消灭了勃固的古孟族王国,获得了它的财富和丰裕的劳动力。

在征伐勃固的过程中,德彬瑞蒂攻占了毛淡棉地区的一个向暹罗朝贡的村落联合体清克莱。于是,阿育陀耶的帕猜国王在1538年底召集了一支军队,把缅甸军队从该地区驱逐出去。缅甸人没有对此作出有意义的和迅速的反应,而且帕猜国王可能也认为他的征战达到了目的:警告潜在的竞争对手和不安分的朋友,他能够迅速和有效地处理任何挑战其权威的各省。

但是,也许帕猜国王也关注到其两翼主要大国不祥的崛起。且不说德彬瑞蒂统治下的勃固与东吁的结盟,兰纳正在瓦解并且有可能处于与阿瓦结成松散同盟的掸族或者澜沧的控制之下。因此,在1545年中期,国王率领一支军队一直向北进发到清迈,在那里他们攻击了该城但是没有成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得不退回到阿育陀耶。他一回到首都,为了回应或者是澜沧加强了对兰纳统治者攻击的消息,或者是一方或另一方的求援,帕猜国王立即组织了另一支军队杀回清迈。1547年早期他们攻下了南奔并且向清迈进发。但是由于没有攻下该城,军队再次返回。几乎是在就要回到阿育陀耶的时候,国王去世了。

78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阿育陀耶似乎正在走向兰纳和澜沧同时正在经历的同样危机,一个自相残杀的牵涉首都大多数政治精英的继承危机。帕猜留下两个儿子,两个人都是王妃西·素丹赞生的,并且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提安拉查王子。两个儿子中的老大育华(1547－1548)王子当时11岁,在他母亲作为摄政的情况下登上了王位,而他的叔叔提安拉查王子为寻求政治避难,剃度为僧。与此同时,摄政王后痴情于一个小的宫廷官员,并且与他生下一个女儿,她决心把他推上王位,凡贵族中胆敢对这些事情表达不满的则被处死。摄政王后最后在1549年6月毒死了年轻的国王育华,而她的情人,此时的头衔是坤·卧

拉王萨则登上了王位。他在位仅仅六周。领头的贵族们策划了一个阴谋，暗杀了新国王，并且从一个寺庙召回了提安拉查王子，他在 1548 年 7 月末期成为阿育陀耶的国王，其头衔恰“可拉发特”来自巴利文—梵文的称号：转轮全能君主，一个以其正义与力量使全世界皆环绕而转的国王。

在几个月内缅甸人决心向他们见到的已经陷入混乱的阿育陀耶发动攻击。在召集了一支也许有几十万人的军队之后，国王德彬瑞蒂带领他们向南进发到马达班，然后通过三塔关越过山脉，横扫北碧和素攀武里后向首都进发。如果这还不足够的话，拉瓦克（柬埔寨境内的金边附近）的高棉国王趁着混乱在巴真武里府省攻击暹罗人的东部边翼。当阿育陀耶被击溃的时候，他们以突袭来获得战利品和战俘。恰可拉发特国王成功地经受住了这场短期战争，这场战争仅仅在 1549 年持续了几个月。从被围困的城市里突围出来的军队，在某些时候由王后素丽瑶泰和她的女儿领导，这动摇了缅甸人的信心，而阿育陀耶的北部军队将从彭世洛到来的消息也进一步打击了他们的信心。尽管在他撤退的初期，德彬瑞蒂的军队极力捕获了暹罗国王的大儿子拉梅萱王子和他的女婿摩诃·达摩罗阇（彭世洛的督抚）。暹罗保证不会干扰缅甸军队继续撤军，在得到这些条件后，他们归还了这些囚犯。

79

恰可拉发特没有从这个轻易的成功中得到虚假的安全，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开始准备缅甸人不久将重新开始的战争。首先，在 1550 年早期，首都旧的土墙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坚固的砖城墙。在接下来的年份里，他改进了他的海军舰队，在许多战略上属于重要的省级镇设防，重组了军事指挥，审查了登记册上符合军事服务资格的男子，并且开展了一项运动来增加军队的大象储备，大象可以作为前现代时期东南亚军队的装甲坦克。在 1555 — 1556 年，他发起了一场打击拉瓦克的强大的陆路和海路征伐，来保证高棉不侵犯阿育陀耶脆弱的东部边翼。

缅甸在 1549 年攻击阿育陀耶后的后续行动上的长期延误不是因为不断增长的暹罗人的力量，而是因为其内部的混乱。在从阿育陀耶

回来后，德彬瑞蒂沉迷于饮酒，挥霍无度，在治理中也变得越来越专制和古怪，最后被他的孟族朝臣杀死。他的内弟莽应龙(1551－1581)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继承了王位，因为他首先要去镇压他的男性亲属和孟族党羽的叛乱。与德彬瑞蒂相比，莽应龙是一个更有组织、更积极的将军。1555 年他派遣攻击阿瓦的纪律严明的大规模军队毫不费力地征服了缅甸北部。在那次征伐之后的 1550 年代后期，他发动了对掸族国家的另一次征战，并且甚至接收新威和景栋为附属国。这些征战对他的王位来说不仅仅是荣耀。除了贵重的进贡品和强迫劳役征收，他也获得了穿越傣族世界北部边翼的战略位置，这增加了对阿育陀耶的压力。

当 1548 年赛塔提腊离开清迈去继承澜沧的王位的时候，兰纳正处于国内动乱的痛苦中，因此是非常脆弱的。竞争对手争夺王位，1550 年派遣前去恢复秩序和帮助赛塔提腊重申王位的一支澜沧征伐队失败了。1551 年，当赛塔提腊不情愿地把兰纳移交给他的清迈王后的时候，王国的一些著名人士反而立一个孟奈的掸族王子为王，这个王子是满哥瑞国王的直系后代。在奈统治的新国王的兄弟在芳县藩属国的帮助下，想夺取兰纳的湄公河地区。到了 1555 年，尽管受到兰纳和澜沧统治者的反对，他已经取得了清莱和清盛。1557 年当奈被莽应龙的缅甸军队侵犯的时候，国王起初并不倾向于听取他的兄弟的呼救声。不过，莽应龙不会放弃清迈的无助提供给他的机会。获得奈以后，他迅速向清迈进发，1558 年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他获得了该城。默库提作为缅甸的一个附庸被保留在兰纳的王位上，并且由一支驻军把守。

1558－1559 年当国王意识到澜沧目前所面对的不是弱小的兰纳，而是强大的缅甸在其西部边界存在的时候，赛塔提腊尝试恢复其地位的努力中止了。不过，当兰纳国王的阴谋失败而无法取代缅甸人的时候，1564 年他被推翻了，而兰纳仅仅是缅甸军队对抗阿育陀耶和澜沧的一个军事前哨基地，这样兰纳所保留的自主迅速地消逝了。随着 1558－1564 年国王满哥瑞王朝的终结，北部傣族人历史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兰纳从此将永远无法恢复。

得到阿育陀耶北部的一个稳固的位置之后，莽应龙能够继续进行与恰可拉发特国王还没有结束的战争。阿育陀耶和澜沧都意识到缅甸人攻陷兰纳所带来的不断增强的危险。不过，他们的反应是更加防守而不是进攻性的。意识到他的首都处于暴露的位置，并且远离中部湄公河地区更多的资源和更方便的交通，赛塔提腊国王在1563年把他的首都迁移到万象并且很快开始用砖墙来加固它。他还向特帕萨提公主提出了与阿育陀耶建立婚姻同盟的问题。特帕萨提公主是恰可拉发特国王和王后素丽瑶泰的女儿，她在1549年曾经穿上士兵的衣服来抵御围困阿育陀耶的缅甸军队。赛塔提腊国王值得得到比恰可拉发特国王所给予的更好的对待。借口特帕萨提病了，暹罗人试图用她的妹妹凯敖·法(Kæo Fa)公主来搪塞赛塔提腊。

在这些微妙的交易过程中，缅甸人突然再次进犯暹罗，这次是越过山脉进入了达府附近的王国内，获得了一个从清迈沿着平河的很容易巩固的位置。莽应龙的军队很快不费力地攻下了王国北部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暹罗人内部一个有影响力人物的个人支持。这个人是摩诃·达摩罗阇，他是彭世洛的督抚或是省长。达摩罗阇出身高贵，并且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他的母亲是帕猜国王的一个亲戚，他的父亲是素可泰国王们的后裔。作为宫廷护卫队的一名官员，他曾经在1548年领导了把恰可拉发特国王推上王位的阴谋政变，并且娶了新国王的大女儿作为奖赏，还被授予半皇家头衔，成为以彭世洛为基地的北部省份的督抚。考虑到他的素可泰血统和他也许未实现的抱负，人们不禁怀疑他落入缅甸人手里的明显意图——第一次是在1549年的攻击中，现在是1564年。恰可拉发特国王由于突然失去了他的北部省份以及面对一个巨大的优势力量，他温顺地答应了莽应龙的要求：他发誓保持皇家友谊并且把他的儿子拉梅萱作为人质。

81

尽管前一年恰可拉发特国王是多么地蔑视赛塔提腊国王希望得到公主特帕萨提的请求，现在他屈服了并且准备送她和大量的随从到万象。彭世洛的摩诃·达摩罗阇迅速采取行动来破坏这个可能发展成一件紧密的联盟的事情。他告诉了缅甸人公主将要经过的路线，于是，一

小撮缅甸军队在碧差汶伏击了她的队伍并且把她秘密地挟持到缅甸。赛塔提腊国王感到羞辱和愤怒，而恰可拉发特国王对他的女婿也越来越不耐烦并且承诺帮助攻击达摩罗阇，于是他派遣了一支军队去攻击彭世洛。不过，摩诃·达摩罗阇通过呼吁缅甸军队，吓唬他的两个对手后退，这样他智取了他们两个。接着缅甸人派遣了一支军队来攻击万象。他们围攻，然后进入了城市，才发现赛塔提腊国王已经逃跑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展开掠夺性的突围来对抗缅甸的巡逻和供给线，一直持续到 1565 年中期缅甸人放弃并撤回到缅甸。

傣族世界此时处于混乱中。阿育陀耶的恰可拉发特国王已被羞辱。他被迫屈从于缅甸人，他曾经搞糟了与澜沧的一个可能的同盟，并且他展示了他无法控制彭世洛的摩诃·达摩罗阇。一群来自北大年的马来叛军竟然在 1564 年他失败后短期控制了他的王宫。在清迈，国王和清盛的省长在同一年卷入到一场对抗缅甸人的阴谋当中，两人都被送到缅甸。新的统治者王后威素提特薇(1564 － 1567)在缅甸人手里是个无能的工具，甚至无法防卫 1566 年掸族叛军对其首都的洗劫。这次洗劫使北方陷入混乱并且开始了三年的饥荒。澜沧的赛塔提腊国王到目前为止落到缅甸人手里的东西最少，不过当时他有更少的东西失去。在至少经历了缅甸人对万象的第一次攻击而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的情况下，他这时开始通过资助建造或者翻新佛教神庙来建立全民的士气和政治认同：尤其是在万象树立大规模的塔銮尖塔和翻新佛统南部的古代塔帕侬纪念碑。

82

面对着缅甸人的威胁，恰可拉发特国王努力尝试把他的王国整合在一起，1568 年他利用摩诃·达摩罗阇离开缅甸的时候想尝试重新获得他的北部省份。他获得了彭世洛，但是没能得到甘烹碧，转而回到他的首都。最后在 1568 年末期，缅甸人发动了对阿育陀耶的最后一次攻击。带领一支征召来的孟族、掸族、泐族和老族以及兰纳组成的巨大军队，国王莽应龙借道达府和甘烹碧横扫了阿育陀耶，摩诃 · 达摩罗阇的军队也从北部省份参与进来。国王集中首都防卫的努力遭遇到了某些对皇家领导力量的缺乏热情或者是信心的局面。

> (国王)让所有外部城市的军队都进入到首都中去。但是他们仅仅接收了四个靠近首都的一部分军队进入首都。那些没进入首都的相当多的人居住在树林里面。而且，没有一支小城市的军队进入到首都，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则是居住在树林里，只有城市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个人军队才进入首都。[①]

恰可拉发特国王这时年老且心力交瘁，终于染病在 1569 年 1 月末去世，他的儿子马欣继承了王位。由于缅甸人形成了对城市的一个紧密的包围圈，国王表明自己是一个无效力的领导者，他被动地把城市的防卫留给了他的部长们。由于双方相互炮击，旱季的这几个月过得很缓慢。缅甸开始的时候通过挖战壕来接近城市周围的护城河，然后开始建造跨越护城河的通道。由于有效的领导和坚决的抵制，暹罗人有可能坚持了一年。最后，一群缅甸人在暹罗队伍中的背信弃义者帮助下通过一个阴谋诡计进入了城市，1569 年 8 月 8 日城市沦陷了。莽应龙于是立善于拍马屁的摩诃·达摩罗阇为阿育陀耶的附庸国王，然后带着不幸的马欣动身前往勃固，不过马欣死在路上。

莽应龙的主要傣族竞争对手，现在只有赛塔提腊国王还在位上。1569 年 2 月，在马欣国王的呼吁下，澜沧派遣了一支军队去解救阿育陀耶，但是在到达阿育陀耶之前，这些军队在碧差汶的帕萨河河谷被击败了。莽应龙于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派遣了一支征伐队攻击万象，但是尽管他们暂时占领了该城市，赛塔提腊国王再一次逃脱了，随后指挥了一场对抗他们的游击战争，促使他们在 1570 年 4 月后退。从他统治的早期卷入清迈到他干涉缅甸与阿育陀耶的战争，赛塔提腊国王在傣族世界的国际政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已经超过老族王国所拥有的资源和能量的极限。而且，澜沧的首都从琅勃拉邦迁移到万象已经引发了中部湄公河河谷部分地方和区域领导人的一些仇恨。他们中的一员，佛

83

① Cushman, *Royal Chronicles*, p. 60.

统统治者在 1570 年引诱赛塔提腊进入了一场对老挝最南部山地居民的军事征战,在这期间国王消失了。内战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了,直到另一次缅甸人侵犯万象才结束。这一次,缅甸人在 1574 年夺取了城市和它的统治者,自我加冕登基的国王和赛塔提腊的婴儿继承人都被囚禁在缅甸。此时勃固的莽应龙的领地从阿拉干和曼尼普尔一直到越南边界。在 1548 年曾经有三个国王都称呼自己为"全能国君"(阿育陀耶的恰可拉发特国王和兰纳及澜沧的赛塔提腊国王这样的头衔包含在他们的即位名字里面),目前只有一位了。莽应龙在他们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使傣族世界的统一成为现实。

暹罗人、老族人、傣族人或掸族人不能够轻易接受莽应龙的帝国统一,因为它违背了在前两个世纪一直在傣族王国里发展的独特的身份意识。在恰可拉发特和赛塔提腊努力尝试对自己的人民进行道义上的领导,这通过公民的佛教仪式得以体现,他们还设法创造有秩序的制度来管理和平的生活,而莽应龙所设立的仅仅是粗糙和将就的命令以及顺从的秩序,并且这些是由傣族人认为是粗鲁的外国士兵带来的。几十年的战争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阿育陀耶的纪年里面包含了许多生动描述痛苦的战争荣耀的内容:

> 勃固的国王让其英勇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前去距离恰可拉发特国王军队正前面 4 公里的水稻田里占据位置,并且停下皇家大象等待一个吉祥的时刻。然后他命令骑兵们上下摇动其带穗长矛,步兵则戏弄前面的敌人。士兵们……在混乱中跳舞和呼喊。而那些人携带着剑和盾,或剑在每个手里面,车轮式地来回并伴随着嘲弄手势。在那个时刻,勃固的国王抬头眺望天空,看到太阳并没有被云或雾所遮挡。然后一只秃鹫之王飞在军队的前面。当(勃固)国王看到这样一个庄严吉祥的征兆,他命令胜利锣、海螺号角和因陀罗鼓的声音一起响起来。他命令士兵们去攻击恰可拉发特国王的军队。恰可拉发特国王命令军队分成两翼。双方的士兵,一些兴奋地高喊,前进并相遇在战场上,劈、砍、刺、搏,枪支齐射以至于

84

空中弥漫着烟雾。双方的士兵，一些死了，一些受伤了，大量人员横七竖八地在水稻田里翻滚。[1]

人员伤亡、财产和生计的损失是巨大的。绝望的防卫者和自信的征服者的负担都是一样沉重的。许多人——当他们知道战争就要来的时候，逃到山里和树林里或者如摩诃·达摩罗阇一样随波逐流——为了自我的生存而有必要实行最低限度的谋划。

为什么莽应龙的军队相对容易成功？为什么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发展的傣族制度和国家迅速崩溃了？

尽管傣族统治者几代人的制度建设，但是 16 世纪中期的国王们仍然把他们的权力建立——和毁灭——在金字塔形的个人关系之上。在历史时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傣族国家的内部精英存在着分裂，这削弱了其力量。无论是阿育陀耶、兰纳还是澜沧都未能着手去促进这样的安全架构，即贯穿于君主与国家的全体忠诚，从而能够超越形成集团和派别的个人关系——生理上的接近或者由共同追求建立起来的联合，并且通过婚姻或者亲缘或者相互的义务得到加强。国王们通过那些帮助其登上王位的朋友和盟友来治理，同时国王在可怕的、暴露其脆弱的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也依靠他们。例如，在 1564 年前，恰可拉发特和摩诃·达摩罗阇的关系就是如此，或者赛塔提腊与帕亚·单·素林将军的关系，后者在 1571 年成为前者婴儿继承人的摄政王。只有他们的团结和成功的领导才能使得朝廷和省级乡镇和城市中的其他派别长期处于困境中。

85

在这些伟大王国的早期世纪里面，造成王宫和王朝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是长期存在的对劳动力的控制问题。兰纳和澜沧对这个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法是形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个人关系。不过，这种管理结构意味着傣原族和老族的统治者严重依靠地方的君主和统治者来获取劳动力，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抵御来自缅甸人的攻击。掸族人从来

① Ibid.，pp. 33－34.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老族国王镇压地方和区域君主的努力很少遭到失败。在崔洛克统治下的前一个世纪,阿育陀耶的国王们已经通过任命来自首都的官员去负责所有自由民的劳役和兵役,从而开始对劳动力作制度化的控制。不过,只有当君主对他的主要官员的忠诚有绝对的把握的时候,这个对问题的官僚化的解决方法才能发挥作用。在王朝统治的初期,这组人员将由新国王的最亲密朋友和同盟组成。不过,随着几个统治者的交替,一个强大的繁荣的贵族阶层同历任的君主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自然将失去一些他们开始拥有的个人特点,直到最后贵族阶层中一个或者更多的派系将积累起必要的能够罢免国王的劳力和资源,然后他们与一个新王朝一起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到了1560年代,在阿育陀耶王朝内部这种制度联系分化的过程已经到了一个高级阶段。摩诃·达摩罗阇在彭世洛实际上是独立的,并且在1569年,"只有城市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个人军队"或者随从才来到大城的城墙里面进行最后的城市防卫[1]。

---

① Ibid., p. 60.

第五章　阿育陀耶帝国：1569—1767年

当缅甸军队在1558年和1569年攻陷并洗劫了所有主要傣族行政首府，他们留下了广大的无人区域，不久就长满了藤蔓和杂草。植被长满了曾经热闹的街道，这反映了类似的被打断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不过，在几个世纪里面，损害已经得到修复并且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权力与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整个傣族世界在这方面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17世纪，以大城为中心的大都市政体与更狭隘的王国和东南亚大陆内部的藩属之间的制度分歧迅速地扩大。 86

一个有效的军事组织对生存来说尤其重要。缅甸所带来的挑战，由于足够强大而能够刺激他们迅速行动，但也由于过于空阔隔膜，以至于阿育陀耶和澜沧能够有时间来动员其分散的资源并且开发新的领导力。两百年后，在1760年代，傣族世界再一次被缅甸军队破坏，但是这次不是因为阿育陀耶和澜沧的发展在此期间停滞了。相反，两个国家都发展成熟了并且还经历了能让后代人充满自豪地记住的黄金时代。不过，他们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阿育陀耶在傣族世界中非常独特，它目前经历了使它的精英变得比老族和泰阮族的精英更都市化的社会变化，这种社会变化也成就了这些精英，实际上，这种社会变化是成为一个全国性精英的核心因素。

87

阿育陀耶、缅甸和西方

阿育陀耶的历史如果没有纳黎萱国王将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他是暹罗历史上那些罕见的人物之一。由于其充满活力的领导、个人英勇和果断性格，他成功地完成了前无古人的任务。纳黎萱与其他人的差异显得非常明显，因为在他突然打破一个灰心丧气的阿育陀耶场景之前，阿育陀耶长期以来已经遭受了十多年的失败和耻辱。

1569 年大城陷落后，缅甸人把摩诃·达摩罗阇(1569 — 1590)推上王位，彻底洗劫了城市，并且驱赶几千囚犯(包括平民和贵族)到缅甸囚禁起来。为了控制他们新的附属国，他们不仅依靠达摩罗阇对他们的义务，还依靠一个小型军事要塞，而且，如果暹罗蛮横的话，缅甸承诺将迅速采取报复行为。大城此时实际上没有什么防御能力，因此处于其邻居的摆布中。柬埔寨人多次利用这个时机，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侵犯了暹罗六次(1570 年、1575 年、1578 年、1582 年两次和 1587 年)，为了让人口充实他们自己的领土，每一次都从尖竹汶到碧武里的富裕的东部和海湾省份席卷大量的战争俘虏。由于资源如劳动力、武器和畜力的稀少，暹罗应付这些袭击非常困难。而且，缅甸已经夷平了他们的许多军事工事。不过，他们遭受的高棉人的掠夺能够帮助暹罗向缅甸提出充分的理由，来允许改进他们的武器和工事。在 1580 年，大城的城墙再次被拆除并且重建得比以前更结实。

从事件的流程来看，人们能够感觉到暹罗在 1580 年左右经历了一个转折点。城墙的重建暗示了他们与缅甸关系的一些变化。这展示了一种采取有效措施来掌握他们自己的安全的新决心以及动员大量的劳力和任务所必需的供给能力。在接下来的年份里，朝廷被一场神秘大众造反搞得心烦意乱。这场造反由一个在大城与华富里之间乡村的自称圣人的人来领导。在这次造反中内务部长被杀害。当一个“外国人”——也许是一个印度人或者葡萄牙人——射中了造反的领导人，其追随者四散而逃，造反就在这样的偶然情况下被平息了。几个月后，由于在另一次柬埔寨人的侵犯中失去了碧武里，暹罗人丢脸了。在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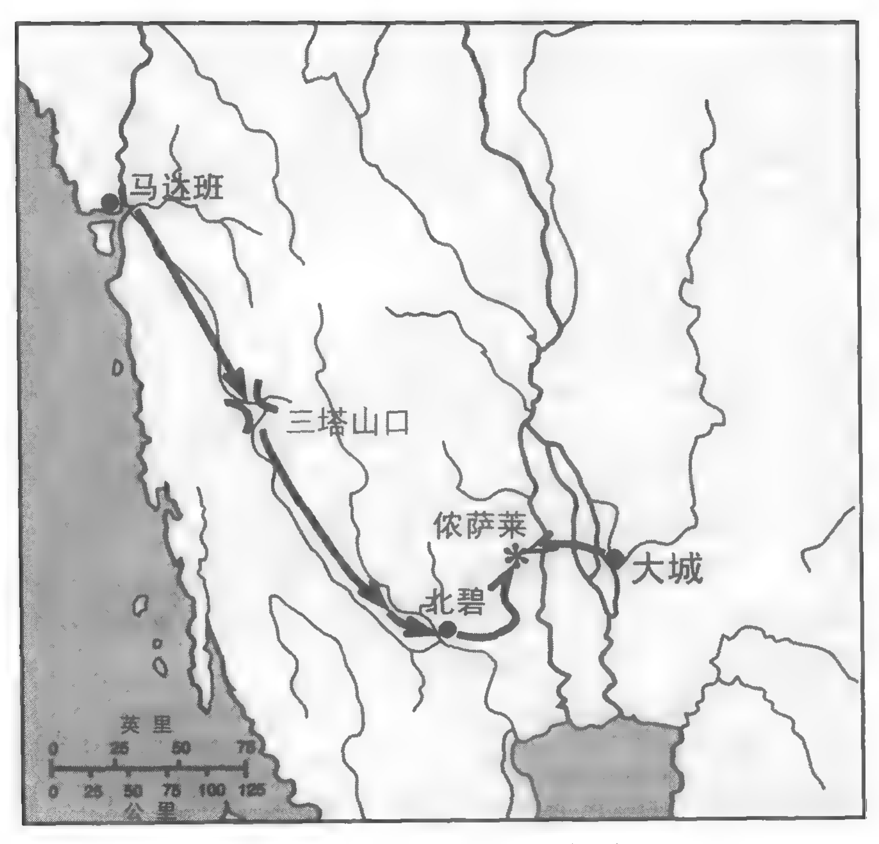
中，纳黎萱开始树立其王国20年来缺少的领导力。 88

纳黎萱出生于1555年，是国王摩诃·达摩罗阇与王后的儿子，王后是恰可拉发特国王的女儿。在1564年他曾经作为人质去缅甸，只有当他的妹妹嫁给了莽应龙国王以后，他才于1571年回国。尽管纳黎萱在当时只有16岁，他却被他的父亲送到北部来管理彭世洛。纳黎萱当时被指定为副国王和阿育陀耶的推定继承人。接下来的十年，他在对抗柬埔寨的行动中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在1581－1582年阿育陀耶的困难时期，年轻的王子被派遣到勃固去代表他父亲向国王莽应里朝拜，莽应里在1581年底继承了莽应龙的王位。传说中提到纳黎萱与他的军队一起参与了缅甸征伐一个掸族国家的一次战争，在缅甸王储攻打一座城市失败后，他成功地将它攻陷了下来。他因此引起了王储的敌意和嫉妒。这两人之间的个人竞争和敌对使得阿育陀耶纪年中对随后的泰—缅冲突的报道变得生动。

不久，勃固和阿育陀耶的关系恶化了。在1583年，纳黎萱接到消息，缅甸人正在修建一条通往阿育陀耶的公路，而在1584年，纳黎萱被召唤去帮助莽应里征伐在阿瓦的竞争省份。纳黎萱依从了他并且与他的军队一起从彭世洛向低地的萨尔温江的孟族地区进发。在那里他被告知，缅甸人计划伏击杀死他。他返回到彭世洛，然后转移到阿育陀耶，很多人跟随着他来支持首都的防御。此时纳黎萱很瞧不起缅甸人朝廷。当1585年派遣去惩罚他的一支小部队被轻易地击退之后，缅甸人在1585－1586年和1586－1587年派遣了军队来征伐阿育陀耶。但是这两次进攻，纳黎萱都能够抵挡住他们。在后面的一次，他也成功应付了一次小规模的柬埔寨人的攻击。在1590年6月摩诃·达摩罗阇死后，纳黎萱正式成为阿育陀耶的国王，也许他还任命他的弟弟厄迦陀沙律为他的共同统治者，这之后不久缅甸再次发起了攻击。

年年的征战在缅甸1592年底的攻击中达到了高潮。由纳黎萱的老对手王储领导，缅甸军队越过三塔关到达北碧，并且从那里向素攀武里进发，从西边接近阿育陀耶。纳黎萱率领一支军队出城与缅甸人相遇在距离素攀武里西北23公里(14英里)的依萨莱。两支军队的一场

战役在 1593 年 1 月 18 日发生了。缅甸军队在起初的混战中获胜并且
89 给纳黎萱军队造成很大压力。纳黎萱坚守自己的阵地，而缅甸军队则向前冲向正在崩溃的先锋队。纳黎萱和他的弟弟厄迦陀沙律于是登上战象投入到战斗中，当看到缅甸王储的大象的时候，他们奔杀过去。纳黎萱向王储高喊："来啊，让我们为了我们国王的荣耀来进行大象决斗。"[①]很快决斗就结束了。当两头大象接近的时候，王储用他的战争大镰刀从侧面击向纳黎萱，但是他的身体受到纳黎萱剑的突然一击。



1592—1593 年缅甸的入侵和侬萨莱战役

① Cushman, *Royal Chronicles*, p. 131.

王储被杀死，缅甸军队随之陷入混战并退回到北碧。阿育陀耶军队紧随其后，给他们造成了重大伤亡。阿育陀耶的独立此时得到了保证，并且对下一代人来说，缅甸人的国王在对抗阿育陀耶中处于防守地位，在30 年里，战局如今第一次翻转过来。 90

在依萨莱战役之后，纳黎萱和厄迦陀沙律的行动和政策展示了将要贯穿下个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一种信心。战争的前半个世纪强调了阿育陀耶位置所带来的危险和机会。缅甸人已经统一了勃固、东吁和阿瓦并且把他们的权力扩展到兰纳甚至澜沧。柬埔寨人经常利用阿育陀耶的无助从东面袭击它。



19 世纪的绘画——依萨莱战役

由于被敌对的邻国所环绕，阿育陀耶的统治者对可能影响他们安全的内部发展保持警惕，他们还寻求机会来分化他们的竞争对手。阿育陀耶此刻已经发展了其能对邻国占据优势的力量。阿育陀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并且商品和贸易的价值增强了国家的力量。阿育陀耶从葡萄牙进口火器，从日本进口其他的武器。在 16 世纪和17 世纪初期王国还有一个强大的海军——也许是在 1471 年占婆落入

越南人手中之后从占人征召的——而且阿育陀耶的舰队广泛地部署在
91 东亚海域里面。随着国际贸易而来的是外交和政治情报。不过,如果
没有智慧和治国能力来最大化地从这些源泉中得到的优势,那么所有
这些力量的源泉也许仅仅是潜力。

早在 1575 年,阿育陀耶就派遣了一个使团去要求一枚新的官方印章来代替被缅甸破坏掉的那枚,从而获得中国对暹罗独立的认可。1592 年一个特别的情节谈及纳黎萱对于暹罗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观点。日本已经开始了扩张主义的政策,威胁到整个东亚的贸易(包括暹罗的),并且在 1592 年中侵犯了朝鲜。纳黎萱了解这些发展。尽管他专注于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后者在 1587 年侵犯了暹罗,但是纳黎萱在 1592 年 10 月派遣了一个使团去中国,提供派遣暹罗海军去对抗日本。这不是空头的表示。纳黎萱理解国际关系的相互关联性,而且他想保持一种权力的平衡,这有利于开放国际商业以及中国在一个有秩序的亚洲国家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最后,中国在 1593 年 2 月拒绝了他的好意,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纳黎萱已经在侬萨莱击败了缅甸并且开始了对柬埔寨和缅甸沿海省份的成功征战。在这个十年的剩余部分,他对缅甸的征战持续着,包括这个十年中期征战到勃固以及 1599 — 1600 年对东吁的征战,和 1598 年一次使兰纳成为附属国的征战。在 1599 年国王莽应里死后,缅甸人的统一瓦解了。当阿瓦的新国王决定去恢复缅甸在掸族国家中的位置的时候,纳黎萱通过率领一支军队进入该地区阻止了他。但是当抵达芳县西北 30 公里的蒙航的时候,纳黎萱患病并且死于 1605 年 4 月 25 日,终年 50 岁。

纳黎萱的弟弟厄迦陀沙律继承了一个强有力的王国。王国是安全的,由于来自孟族国家和柬埔寨的难民和战俘,它的人口得到了增加。由于与葡萄牙、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1598 年纳黎萱与其签订了一份条约)、中国、日本和琉球王国等国持续的友好关系,它的国际贸易得到了繁荣。随着再次取得丹那纱林和土瓦,它此时在孟加拉湾有一个重要的港口。缅甸关注其内部的问题,因此构不成对暹罗的威胁,而柬埔寨王国则处于混乱中。总之,这时期的阿育陀耶的纪年作出了这样

的结论：纳黎萱单枪匹马在战场上复兴了阿育陀耶。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领导能力是建立在更广阔的基础上的。纳黎萱是古代的素可泰统治王朝的一个继承人，保持了阿育陀耶能够超越省级身份，不过他似乎始终设想在更广泛的框架内把暹罗统一起来。他积极鼓励阿育陀耶的贸易并且采取步骤来组织王国内的劳工。他的远见、治国能力和政治家手腕加上他的军事天才和英勇，这些意味着他能够创造使他获得成功的政策所需要的安全感。这些品质集中在一个优秀的个体上使他获得了“伟大”的称号，他与其他的五个暹罗君主共享了这一称号。

在纳黎萱死后，17 世纪的阿育陀耶的历史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与欧洲强国不断加强的关系和由此加剧了制度的不均衡发展。这两个发展到了 1688 年所谓的光荣革命的时候达到高潮，因此我们能够对早期现代暹罗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看得更清楚。

非常明显的是，在 17 和 18 世纪的几乎所有阿育陀耶的王位继承都是不规则的，许多情况下是伪装的或者是真正的篡夺。为什么这些都是事实？而且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厄迦陀沙律继承纳黎萱的王位没有产生任何问题，因为他和他的兄弟已经共同统治了 15 年，而且尽管在国王死的时候他们两个距离首都 650 公里，没有证据表明其他的任何人在这个时刻企图夺取王位。不过，这之后故事完全不同了。

厄迦陀沙律的统治是短暂的。我们知道他至少有四个儿子。其中的两个，素塔特和西骚哇帕是王后所生，因此比其妾所生的两个儿子通和西辛更有资格继承王位。厄迦陀沙律指定素塔特为继承人，但是一个官员与一群有实力的日本雇佣兵和贸易商人串通一气，谴责素塔特阴谋造反。他的父亲在临死之前处死了他，这大概发生在 1610 年 10 月和 1611 年 11 月之间的某个时期。大多数的阿育陀耶纪年认为当时西骚哇帕继承了厄迦陀沙律的王位，但是一年两个月后他被僧侣披·皮蒙昙(Phra Phimontham)处死，该僧侣成为因陀罗阇国王或者宋当王(Song Tham，“正义国王”，1611 － 1628)。不过，这些事件不久之后，当时在阿育陀耶的外国访问者声称宋当王是厄迦陀沙律与一个妃

子所生的儿子并且直接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他们没有提及西骚哇帕。我们不得不接受独立的外国证据并且认为继承是合乎规则的。不过，别忘记素塔特王子过早地去世了。

93 接下来的继承危机发生在宋当王长期统治的末期。很明显，他从来没有任命一个他的继承人，但是他的弟弟西辛通常被认为是他的继承人。宋当王的表兄弟披耶·西·瓦拉旺促成宋当王的大儿子策陀成为候选人。而且当国王在 1628 年底弥留之际，他提名 15 岁的策陀继承他的王位。西·瓦拉旺的诡计在 12 月 13 日把策陀带上了王位，西辛和其他的王位的潜在竞争者被西·瓦拉王(或者是素立牙旺)清除了，而他则成为国防部长。不久以后，西·瓦拉旺处置了策陀王子(1629 年 8 月)和继承其王位的策陀的弟弟阿提塔牙旺(9 月)。最后他自己登上了王位。作为巴萨通王，也就是"黄金宫殿国王"，他统治了 27 年。他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篡位者，因为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来登上王位，尽管有一个故事声称他的母亲与宋当王的母亲是姐妹，而另一个故事则怀疑地认为他是厄迦陀沙律的一个秘而不宣的儿子。能够使他进行无情的和延长的争夺王位的斗争力量在于他作为国防部长的官僚职位以及这个职位给他带来的对劳动力的庇护和控制。他遭遇到的最强抵制来自王朝中一群由山田长政领导的日本雇佣兵。西·瓦拉旺通过派遣山田去洛坤镇压叛乱，这样没费什么力就清除了山田。不过，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人在继承争斗中的作用。

然而，1656 年巴萨通王去世后另一场争斗随之而来。这次又与 1628－1629 年间的争斗一样，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三个国王登上了阿育陀耶的王位。首先是巴萨通王的大儿子猜王子"率领武装人员攻占了朝廷并且登上了王位"[1]。然后他的弟弟纳莱王子罢免了他，接着把巴萨通王的兄弟素塔玛拉查推上王位。最后，大约十周后，在 1656

[1] "Report from the Council at Batavia (Jakarta) to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Jan. 21, 1657," in *Record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iam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17th Century*, vol. 2 (Bangkok, 1916), p. 20.

年10月26日，纳莱自己夺取了王位。他政变的条件很难解释。乔治·韦奈·斯密斯注解道，纳莱在8月初期曾经向荷兰人寻求帮助，然后声称："在10月，纳莱在他的支持者和泰国的日本人、马来的北大年和穆斯林的波斯人的帮助下发动了政变。"① 30年后的一本波斯人著作声称波斯人对其同胞的主要作用并且提及纳莱作为国王的第一个行动是任命一个波斯人来做他的首相②。这再次暗示了外国的参与愿望是强烈的。

最后，伴随着纳莱国王的去世，有一个著名的1688年的阿育陀耶"革命"。由于无法考察其细节，我们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使披叻差登上王位的阴谋主旨是针对一个已经成为首相的希腊冒险家，这个冒险家以首相府这个同外国人、外贸和外部世界最没有直接关系的官僚部门为基地。

这四代继承危机使我们产生一些对17世纪阿育陀耶继承政治的看法。首先，就如这一时期王室权力是绝对的一样，政治继承仍然是个人格化的而不是制度化的。国王没有权力去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在继承王位上，与武力相比血缘不是那么有效的。王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值得争斗。在牺牲省份利益的基础上，纳黎萱加强了首都的力量。而且厄迦陀沙律已经开始扩张国际贸易来加强王室的财富和权力。这些发展给他们带来新的不稳定。通过消减省级权威的权力，实际上消除了一些省级统治家族，以及直接控制很多省级的劳动力，纳黎萱和厄迦陀沙律做了很多工作来弥补导致王国衰落的军事弱点。不过，控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如国防部和内政部比中央行政管理的其他部门从这些发展中获利更多。西瓦拉旺在1628年控制内政部后准备去夺取王位，这表明这个部是多么有权力。

在控制省份和保持军事实力方面，国王存在着持续的困难。早期，

---

① George Vinal Smith, *The Dutch in Seventeenth-Century Thailand* (DeKalb, III, 1977), pp. 94－97.

② Ibn Muhammad Ibrahim, The Ship of Sulaiman, trans. John O'Kane (London, 1972), pp. 94－97.

从阿育陀耶劳动力控制体系之外的外国人里面征召皇家护卫就是这种尝试。当然这可能适得其反,就如在1610年左右日本人参与废除素塔特以及反对巴萨通王。巴萨通王通过分别控制国防部和内政部之间的省份来尝试减少贵族的权力,前者控制南部省份而后者控制北部省份。这至少划分了两个部门对劳动力的不同控制,而第三个部则保持对适合服务的自由民的集中登记。在这一时期,国王们通过控制商品和贸易建立一种新的财富来努力加强他们相对于那些以控制劳动力为基础的部门的权力。阿育陀耶的统治者们开始了一种创新的政策。他们反复雇佣外国人来从事他们的对外贸易,这些人拥有阿育陀耶相对短缺的商业技巧。作为他们的所谓的首相,这些人加速了暹罗参与到更广阔的世界中。不过,对他们的雇佣就如雇佣外国的雇佣兵一样,使这一时期的政治复杂化。

95

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是一个单一的波斯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是由在1602年来自波斯湾的一对兄弟建立的,不久他们娶了暹罗妻子。老大谢赫·艾哈迈德(Sheik Ahmad)被任命领导金融和外国事务部(Phrakhlang),来应付来自群岛、印度和近东的穆斯林贸易商人。在宋当王统治初期,他领导着金融和外国事务部,到了末期,他同时担任内政部的部长,拥有昭披耶头衔。1630年左右,他的大儿子昭披耶·阿拍拉查(Chaophraya Aphairacha)〔个人名字是春(Chün)〕继承了他的位置,他在那个位置一直服务到大约1670年,然后他的大儿子昭披耶·占南帕克迪(宋巴)继承了那个位置。家族对内政部的控制只有在1685年被打断,当时纳莱任命希腊冒险家华尔康担任了那个职位。谢赫·艾哈迈德的弟弟穆罕默德·赛义德,同样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官方家族,他的儿子阿加·穆罕默德·阿斯塔拉巴迪在纳莱统治初年尤其有权力。于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内政部及金融和外国事务部拥有商品和国际贸易资源的外国人与在国防部控制劳动力的传统精英之间的一种平衡。因此,外部人不仅能够迅速升到很高的官职,而且能够建立起垄断某些国家官职和发挥重要政治作用的王室官员王朝。他们的后代能够持续在这个位置上直到20世纪。

国王厄迦陀沙律据说“非常倾向于陌生人和外国”，并且对通过引进新的税种来“丰富他的国库”非常有兴趣[①]。这两项政策都是非同寻常的。几十年的战争使王国变得非常贫穷，它的人口很难承受重新建设的高成本。由于和平及对其权力的信心，国王能够培育与外国大国的关系并且希望能够改进其王国的国际商业。

经济考虑而不是政治考虑主导着暹罗在接下来四分之一世纪的外部关系。厄迦陀沙律接收了第一艘荷兰船只停靠在阿育陀耶，他还派遣了第一个暹罗外交使团去欧洲，1608年到达荷兰（一支在1606年去了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暹罗关注葡萄牙人在整个孟加拉湾的影响，尤其是对缅甸海岸的影响，因为这威胁到来自丹那纱林海岸港口的他们的贸易。宋当王甚至要求荷兰设防于丹老，从而与阿育陀耶建立同盟来对抗葡萄牙人，但是荷兰更感兴趣的是把阿育陀耶和北大年作为与中国和日本贸易的进入通道。16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第一次来到阿育陀耶，并且不久在阿育陀耶和北大年建立了贸易站（“工厂”）。不过英国人无法与荷兰人竞争，到了1623年从暹罗退出。甚至荷兰人也对他们在暹罗贸易的收益感到失望，在1620年代的某个时间考虑全部撤出。中国人和外部穆斯林所从事的亚洲贸易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而且在规模上容易受到为了公私利益的阿育陀耶官僚的管理和操控（大多数官员不区分公私利益）。 96

在巴萨通王统治初期，由于条件的变化，阿育陀耶和荷兰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国际上对暹罗出口的需求增加了，尤其是鹿皮，日本对此有很高的需求。荷兰和其他的亚洲贸易商人需要把鹿皮卖到日本来获取利润，从而购买日本的商品。当1633年日本重新开放其国际贸易，阿育陀耶的鹿皮出口的价值增加了。国际上对其他的暹罗产品有强烈的需求，如稻米、香料和各种各样的森林产品如苏木、沉香木、胶和安息香。反过来，暹罗进口印度布匹、奢侈品、火器、金属尤其是银。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利用亚洲贸易商人如中国人和暹罗的华

① Van Vliet, *Short History*, pp. 87－88.

人以及来自印度甚至更西的穆斯林，暹罗自己能够管理好这种复杂的国际贸易。通过委托载有中国人和暹罗华人船员的皇家船只到中国和日本贸易以及邀请欧洲人参与贸易能够获得一些额外的经济优势。这能够刺激推动暹罗出口物的价格的竞争，从而进一步刺激需求。

到了1630年代，巴萨通王也由于政治上的考虑来鼓励荷兰。这些政治上的考虑主要是阿育陀耶与马来半岛上的王国的关系有关，尤其是北大年和洛坤。洛坤在一个世纪左右之前已经成为暹罗的一个省，由首都派出的省长治理，在16世纪后期，它成为暹罗与缅甸战争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不过，它拥有相当多的财富，使得它在国际商业中发挥独立的作用，而且它与首都的距离使得阿育陀耶国王对其严格控制非常困难。当1629年巴萨通王派遣山田长政去镇压洛坤的一次造反的时候，民众不久就起而反对山田，接着抵制巴萨通王的篡位。

97

由于其自己的原因，北大年，一个马来王国，作为阿育陀耶的附属国繁荣起来了，不过它也反叛并且和葡萄牙人结盟，它在1630年攻击了芭他仑和洛坤。不久，宋卡同样与北大年发生了战争。更糟糕的是，已经被巴萨通王赶出阿育陀耶的日本人前去帮助柬埔寨来攻击暹罗，而且缅甸人正在威胁其西部边界。国王渴望能够用贸易特权来换取荷兰的军事援助，尤其是鹿皮出口的垄断权和苏木买卖合约。到了1634年这些谈判结束以后，阿育陀耶本身已经把洛坤置于控制之下，所以其主要担忧是北大年和柬埔寨。1634年中期一个小的荷兰舰队被派去帮助一支暹罗军队去对抗北大年，但是它到达得太晚了，以至于不能挽救暹罗失败的命运，不过国王感激他们的帮助，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的外部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危机，他仍然认可荷兰的友谊。

但是与荷兰的关系也有波折，如1636年当荷兰在柬埔寨开办了一个工厂的时候就激怒了暹罗人，或者当荷兰1644年提出与暹罗建立同盟对抗柬埔寨的时候，或者在1647年和1655年间帮助国王对抗宋卡反叛的时候。巴萨通王统治时期的一个标志就是荷兰大量卷入到阿育陀耶的事务中。巴萨通王与荷兰有几个共同的利益。他们之间的贸易是有价值的并且在逐步增长中，双方都把阿育陀耶看作是暹罗湾地区

稳定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焦点。巴萨通王感觉被邻国和附属国孤立了并受到他们和葡萄牙的威胁，因此需要比他通常能够调动的要多的海军力量。他似乎意识到荷兰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所以通过发放商业特权，能够控制荷兰。

在纳莱国王(1656－1688)统治时期，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有点让人反感但可行的荷兰与阿育陀耶的关系扩大了，并包括了许多其他的大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复杂的，牵扯到各方和许多利益。尽管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纳莱统治时期主要特点是他与外部大国的关系(最明显的是法国)，但是认为内部考虑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也不是不合理的。地方上的个人和集团最终从事了为了防卫或者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政策和行动。

98

考虑一下统治开始的方式。在巴萨通王死后，纳莱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没能成功地得到荷兰的帮助。几个月后，他在"泰国的日本人、北大年的马来人和也许是波斯穆斯林"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①]。他在接下来的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兰纳和缅甸战争，在1662年甚至征服了马达班、仰光、勃固和周围的地区。在抗击早先为领地的南方的时候，这场战争必定非常需要劳动力和财政资源而且也要涉及不同的贵族和省级的因素。为了资助这些战争，国王的波斯人控制的金融和外国事务部在从事暹罗国际贸易的方式上进行了许多改变。在1662年后期，皇室对所有贸易强加了王室垄断权，尽管荷兰仍然垄断鹿皮。而且，国王派遣自己的贸易船队去日本。

荷兰的状况恶化了，而且他们在1663年初期关闭了他们在阿育陀耶的贸易运作。纳莱于是意识到他走得太远了。疏远荷兰是危险的，王国将会失去一个很有价值的贸易保护，因此他派遣了一个使团去荷属爪哇，以寻求重新谈判恢复他们的关系。通过一个1664年的条约，荷兰在类似以前条款而未作多少改动的情况下回到了阿育陀耶。荷兰拥有有限的对鹿皮的垄断权和新的治外法权的特权，在这种治外法权

---

① Smith, *Dutch*, p. 35.

下，在暹罗被指控为有罪的荷兰人由荷兰自己的法律和法庭来审判。对暹罗人来说，他们获得了荷兰的良好意愿：暹罗的船只在孟加拉湾贸易中遇到麻烦的时候将依靠荷兰，暹罗将保证欧洲货物的供给和欧洲工匠的服务。纳莱和荷兰都不期望荷兰在政治上卷入到暹罗事务中，而在这个世纪余下来的时间里面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纳莱政府的稳定，王国的经济繁荣起来。不过，内部的精英并没有均匀地享受到发展的好处。随着皇家暹罗船只逐渐变得更积极地参与南中国海和孟加拉贸易，随着英国(1661)、丹麦(1620)和法国东印度公司进入到阿育陀耶贸易，随着私人贸易商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开始经常停靠在阿育陀耶和其他的暹罗港口，包括丹那纱林和丹老以及洛坤和北大年，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大的欧洲贸易公司由于沉重的间接费用和对巨额利润的需求，无法成功地在同等条件下与皇家垄断或者是私人贸易商竞争。而且，在这种新的商业环境下，在暹罗常驻的外国人社区——或者更准确地说，驯化或者同化的外国人社区，由于他们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几代——更有能力从他们的国际联系和知识中获利。在这些环境下，在 1680 年代以前没有一个欧洲公司繁荣起来。

99

在 1680 年和 1688 年之间，阿育陀耶和法国的路易十四的关系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它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冒险家华尔康(1647－1688)。华尔康在英国商业船队上度过了自己的流浪的青年时光，包括在伦敦的一段时间，然后在 1678 年跟随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阿育陀耶。在两年内，他已经学会流利地讲暹罗语。华尔康进入金融和外国事务部成为翻译和会计，在 1680 年他也许带领一个暹罗外交和商业使团去了波斯。在牺牲了许多其他人的利益后，他在皇家服务中上升得很快。由于只是迎合私人贸易者的利益但不能促进公司的利益，他激怒了荷兰和英国公司，而且他还威胁到在金融和外国事务部有长期影响的穆斯林贸易社区的利益。他透露这些贸易商人(大概是已经提及的波斯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伪造了金融账目，而且他还指控他们尝试推动王国转变成伊斯兰国家。纳莱非常喜欢他并且听从他的

意见。

纳莱对法国早期的政策创意要早于华尔康，而且似乎来自一种使他的王国在国外出名并且得到认可的渴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经常派遣使团去波斯、印度的戈尔孔达、中国以及许多邻国。法国耶稣会传教团1662年后就在阿育陀耶建立，对朝廷非常有用，因为他们在军事工程和王宫的设计和建造方面能够提供技术帮助。纳莱非常支持他们，允许他们宣扬基督教以及在首都经营一个神学院。在1673年，一个法国教会团给纳莱带来了教皇克莱门特九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信，1680年末，当他派遣一个使团去法国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回报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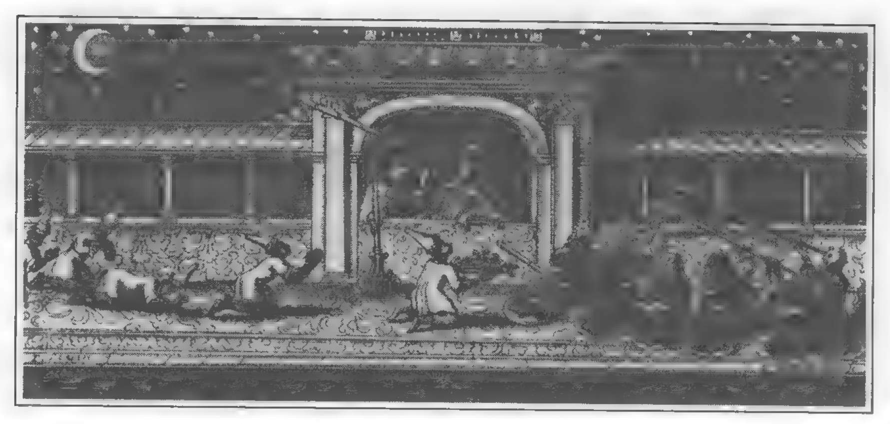
尽管纳莱派遣去法国的第一个使团在海上失踪了，法国在1682年派遣了一个小的商业使团来到阿育陀耶。这个由巴禄主教带领的使团发现了一个乐于接受的王朝，在那里华尔康的地位在持续上升，此时已经到了金融和外国事务部执行部长的位置，不久又升至民事官僚最高的位置——内政部长。华尔康最近已经改信耶稣会的天主教，成为巴禄的翻译并且很快认为自己与法国和耶稣会的利益一致。大多数人同意华尔康对转化纳莱和暹罗人改信天主教的想法感到兴奋。考虑到国王和其王国信仰佛教而且华尔康不能够公开地追寻这个目标，因此这个目标是很难达到的。相反，通过与纳莱扩展哲学讨论，他刺激了国王去理性的考察其信仰并且鼓励他去和顶尖的僧侣在朝廷上辩论佛教教义的观点。华尔康至少说服了耶稣会和他自己：存在使纳莱改宗的真实可能性。意识到这种行为的政治后果是严重的——纳莱可能被废黜并且其他外部大国可能被邀请来帮助这件事，华尔康推动了与法国的更密切关系，甚至是建立一种同盟。

100

因此，第二个使团在1684年被派遣到法国，要求法国派遣大使到阿育陀耶签订一个同盟条约。1685－1686年的法国使团由谢瓦利埃·德·肖蒙率领，它的主要目的是让纳莱改变信仰。〔它面对着一些竞争：在同一个时间来自萨非王朝(1666－1694)统治下的波斯的沙阿苏莱曼的一个使团正在阿育陀耶尝试使国王改信伊斯兰教。〕他们谈

判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条约：允许法国享有与荷兰及其他国家一样的商业特权，加上在宋卡驻扎军队。纳莱似乎主要关注的是加强涉及荷兰反复的战争和战争恐慌造成的半岛防卫。大多数情况下，纳莱关注的是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国王，而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总督。

101



1685 年法国耶稣会与纳莱王和他的朝臣一起观看月蚀〔From an engraving by C. Vermeulen in 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des pers Jesuites envoyez par le Roy aux Indes et a la chine...(Paris, 1686)〕

尽管在 1686－1687 年，另一个暹罗使团正在法国，但是暹罗发生了两个危机。首先，1686 年 7 月，当纳莱和华尔康在华富里国王的夏季行宫的时候，首都一组望加锡人正在酝酿一场推翻国王的阴谋。当荷兰人取代了他们在爪哇海的贸易地位之后，这个小组就在阿育陀耶成立了。他们极力反对荷兰。他们的阴谋由一个望加锡人王子和几个占婆王子共谋组织，并且他们计划烧掉大城，然后推举纳莱的弟弟登上王位，但是前提是他要成为一个穆斯林。他们计划的消息被泄露给了华尔康，于是他组织了一个军事征战队，在 1686 年 9 月包围并销毁了大城的望加锡人驻地。华尔康进一步讨好国王，而他在官僚中的主要对手披叻差，当时大象部的部长，利用这个机会去诋毁纳莱的弟弟们并且减少他们继承王位的机会。

第二，1687 年 7 月发生了丹老大屠杀，60 个英国人在丹那纱林海

岸的港口丹老被杀。这次事件的起因与东印度公司、私人英国贸易商(尤其在孟加拉湾的)、华尔康和暹罗政府之间的复杂的关系有关。东印度公司、华尔康和暹罗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一直不好。公司在阿育陀耶的事务一直管理得不好，且一直面临着赤字。另一方面，华尔康一直在暹罗的服务中大量使用英国私商，甚至武装他们去对抗望加锡人，委托英国私人船只去劫掠南印度戈尔康达王国的船只。因为公司在努力保持与戈尔康达的良好关系，它认为这样的劫掠是海盗行为，到了1686年它决定向暹罗发动战争。英国人企图发动战争的消息不久传到暹罗，政府变得非常小心和猜疑。华尔康已经任命了两个英国老朋友理查德·伯纳比和塞缪尔·怀特去治理丹老，他们在那里进行劫掠活动，聚集了大量的财富。

当公司在1687年4月要求纳莱赔偿6.5万英镑的损失、威胁要报复暹罗船只和船员并且封锁丹老，事态到了紧急关头。6月，两艘公司护卫舰出现在丹老执行索赔。伯纳比和怀特由于担心被英国法庭指控为海盗，通过拖延和提供豪华娱乐来搞定公司征战队的指挥官。由于猜疑英国人可能联合起来并接管该镇，当地的暹罗当局在7月14日突然向战舰开火并屠杀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英国人。下一个，纳莱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宣战并且把丹老转交给了一个法国总督和一小队法国士兵。 102

在1687年9月，一个规模庞大的法国使团来到阿育陀耶，由克洛德·塞贝雷·迪布莱和西蒙·德拉卢贝厄率领，前者是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董事。使团包括六个大的战舰和大约500名士兵以及各种各样的耶稣会士、外交官和工匠。法国人已经决心把他们的军队驻扎在曼谷，而不是宋卡。在那里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王国的贸易。他们很高兴有机会派遣一些人去丹老，那里可能成为他们在孟加拉湾的一个制高点。他们与华尔康的谈判非常困难并且拖延了，他们震惊地发现华尔康目前没有给他们希望国王改信基督教带来任何鼓舞人心的消息。他们在1687年12月11日签订的新条约与1685年的商业条约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规定法国军队在曼谷和丹老的地位。法国大使很快就

离开了,拉卢贝厄也许写了对17世纪暹罗最好的报道。法国与暹罗的关系迅速地恶化了。

暹罗在几个月内就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被当时的外国人称之为“革命”的动荡。问题当然是权力和其如何行使。那些率先强迫解决问题的人包括最出名的披叻差和他的儿子琅·哨拉萨克(Luang Sorasak)。披叻差来自乡村,来自素攀武里省的披卢琅(Phlu Luang)村,并且与以前的国王们有一些不明确的血缘关系。不过,他把自己的崛起之路归于这样的事实:他的母亲曾经是纳莱的奶妈,而且他和国王曾经是养兄弟。作为大象兵团的首领,他在国王统治早期的作战中展示了军事领导能力和勇气,他与国王保持着持续的密切关系。到了1680年代,他已经成为反对华尔康的负责人,在没有破坏华尔康与国王的密切关系的情况下,他在促进自己的利益方面比王朝里的其他官员做得更为成功。而其他的许多官员由于破坏了华尔康与国王的关系遭到了毁灭。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地辨别他们的动机和行动,但是披叻差的儿子琅·哨拉萨克比他的父亲更有野心也更无情。到了1688年初期,他们已经着手进行一项推翻华尔康和在纳莱即将死亡的时候夺取政权的方案。

103

排外尤其是排法的情绪在增加。人们已经看到,国王的最有权势的部长是个希腊人,他娶了个日本基督徒做老婆,并且生活方式是欧洲风格,周围是法国传教士和英国商人。华尔康似乎更关心外国人以及基督徒的利益而不是国王的利益。法国军队傲慢的和淫乱的行为激怒了许多人。佛教僧侣及其信徒对不断增加的基督教传教士持怀疑态度,许多外国人的贸易社区的利益也被华尔康支持私人英国贸易商和他们认为的公司的政策所伤害。所有这些因素有可能引发仇外的爆发,但是实际的发生却是复杂得多。

在1688年3月,国王纳莱身患重病,所有人都知道那将是一个绝症。在争夺王位的人中有纳莱的两个兄弟:阿拍稍特王子和诺艾王子,以及一个收养的儿子玛披。披叻差和琅·哨拉萨克向这三个人做出了妥协。他们设法让王子们与望加锡人起义有牵连,然后使人看起

来玛披是为了改进自己的时运而责备他们。一旦主要的官员劝说纳莱奏效，使披叻差在国王生病期间成为摄政，披叻差就谋杀了玛披。接着，他指控华尔康叛国并逮捕了他，并且很快在1688年6月5日处死了他。在下个月的17日纳莱死后不久，琅·哨拉萨克就杀死了阿拍稍特和诺艾。即使披叻差希望不去篡夺王位，他现在也没有选择，不得不成为国王。法国在曼谷的军营此时被暹罗军队围困，最后他们同意撤离这个国家，在此期间法国传教士被拘禁，天主教徒被迫害。不过，新的王朝绝不是盲目地排外和反基督徒。英国人仍然自由自在，而且披叻差在7月与荷兰签订了一个新的条约。不久，传教士被释放，而且他们重新开始了他们以前的传教。

阿育陀耶的1688年革命肯定是由排外情绪引发的，尤其是在某种程度上披叻差在这种排外呼吁的基础上动员了一部分的民意支持如佛教僧侣和下级官员。不过，这次阴谋的积极领导人是出于更复杂的理由或者有时候是更简单的权力考虑而采取行动的。他们不太害怕基督教，因为在一个世纪里它只是成功地使仅仅一小部分的暹罗人改信，他们害怕的是少数个人过分地使用它来影响社会的文化和文明。他们忧虑的是国王或者是有权势的部长滥用权力去支持那些缺少对暹罗有持久承诺的个人和集体。而且也许有些人认为阿育陀耶已经步入大国政治斗争的危险和阴暗的水域里太深了。在一个商业和国际关系更简单规模更小的世界里，他们也许感到更舒服。他们不想拒绝外部世界，但是他们想在一个更容易管理和更传统的层次上处理对外关系。

104

喧嚣时代的兰纳王国

通过比较1569－1688年的阿育陀耶历史与同一时期的兰纳王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傣族人世界内部日益增加的分歧事例。两个内陆“老族”国家兰纳和澜沧拥有类似的社会和经济组织，但是政治条件却是非常不同。兰纳成了一个更强大的缅甸国家的弱小的附属国，而澜沧则恢复了独立地位并且享有了一个繁荣和文化发展

的黄金时期。

在 1558 年清迈落到缅甸人手里之后，国王满哥瑞的王朝被扼杀了，无助的统治者在 1564 年被流放。这之后，清迈不幸地被一连串缅甸操纵的傀儡所统治，而且缅甸的将军和合作者被安排去控制该地区的其他主要的镇。于是，兰纳为了抗击阿育陀耶的战争而经常负责征召军人和物资。只是到了世纪末，这种恶性循环才开始打破，因为对缅甸的抵抗开始了。在 1595 年，澜沧的国王和兰王国一起尝试把缅甸人驱逐出去，但是失败了。不过采取行动的时间到来了。在 1590 年代中期，纳黎萱国王几乎每年都劫掠勃固地区，在 1599 年前，缅甸的莽应里国王也面临着内部的造反和来自邻国阿拉干和一些葡萄牙冒险者的挑战。在莽应里死后那一年，缅甸实际上分裂了。一个缅甸王子在清迈统治，但是没有机会得到国内的帮助。因此，当澜沧攻击他的领地并且攻陷了清盛，他没有办法只得向暹罗求救，答应把兰纳置于纳黎萱国王的主权之下。纳黎萱国王很高兴地作出了回应，派遣一支军队向北进发，再次得到清盛并且在那里安排了一个老族的贵族作为暹罗的专员。

105

这种反常的情况——一个缅甸王子在暹罗的主权下统治兰纳——持续了十多年，直到缅甸决定重申自己在该地区的统治。他们拥有一个相对容易的时光，也许是因为几十年来的冲突对兰纳社会的领导能力的严重破坏。北方分裂成许多小的相互竞争、相互猜疑的村落联合体，一个孤立的缅甸王子控制下的清迈无法对他们实施领导。就这样，缅甸王子在 1607 年去世并且很快由他的三个儿子继承王位，1613 年前由最小的儿子统治。通过安排自己的人在那里作为省长，阿那毕隆完全脱离了清盛，然后在 1614 年，他进犯了清迈。缅甸再次控制了北方，但是兰纳依然是分裂的。

这种安排持续到 1620 年代中期，当时面对着兰王国、清孔和景洪的造反，缅甸派出了一支军事征战队进入到这些地区。这支部队由一段时间曾经督察缅甸北部统治的一个王子率领。1631 年，清迈的统治者宣布脱离缅甸独立并且攻占了清盛，缅甸通过委任一个省长披耶·迪帕奈特而不是一个新的附属国统治者来进行报复。在该地区一个新

的政权开始了，几十年的纪年仅仅记录了省长们从一个村落联合体转化到另一个村落联合体，每一个都得到了缅甸的军事支持，更顽固的或者不太成功的则被流放到阿瓦。

后来，在1660年，在中国的军队为了寻找流亡的最后一个明朝皇帝永历进犯到缅甸北部之后，那里有一段时间发生了动乱。就如世纪初的情况一样，由于担心中国的侵犯和对一蹶不振的缅甸的帮助感到失望，清迈的省长向阿育陀耶寻求帮助。在1660年末纳莱国王派遣了一支军队向北进发，当它接近的时候，清迈得知中国从缅甸退出，于是将自己的人从暹罗军队撤出。纳莱的军队继续前进，攻陷南邦，但是没能夺得清迈，在1661年初撤回。在那一年的后期，纳莱派遣了一支由他的最好的将军率领的更大的军队攻击清迈。这支军队成功地攻下南邦和清迈，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战利品包括著名的Sihinga佛像，但是不久它被一支缅甸军队赶出该城。从这次开始，缅甸施行了一个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兰纳的强硬路线。缅甸的王子们经常被安置在清迈作为该地区的督抚，并且在半个世纪里面，原傣族——以及泐族、掸族和山地民族——默默地忍受一个政权的统治，这个政权向他们征收沉重的税负并且为远离他们家园的缅甸军队向他们征兵。如果对阿育陀耶来说，缅甸1560年代第一次主要的侵犯之后的一个世纪是一个复兴、经济发展和政治多样化的世纪的话，那么对兰纳来说则是一个遭受苦难的世纪。由于陷入不断的战争，乡镇和村庄经常是无人区，他们的家庭被迫穿越大山，逃离到一个领地或者另一个领地甚至到达缅甸。一些领地的现存纪年表明了地方统治家族的迅速更替和倒塌，在这种状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才能在权力中争斗生存。到了18世纪早期，这个地区几乎不需要一个单一的名称，因为它的领导与许多世纪前相比，更缺少整合。而且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16世纪的荣耀则被忽略。

106

在这个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面，原傣族人之间仍然是相互敌视、相互间经常发生战争。他们很容易成为敌对的或者是野心勃勃的邻国的猎物，而且他们的分裂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再统一就变得更加困难。他们自己似乎已经收缩到内部高地河谷的小的、贫穷的和相对孤立的

社区里面。

在世纪转换之际,该地区的人们仍然是由缅甸任命的省长统治。清迈在这一时期重新获得了一些独立,这一事实与其说明了兰纳社会力量的增强,不如说明了缅甸在该地区力量的消退和优秀统治者创造机会的能力。

1727年,一个居住在清迈外部的老族人特披辛,作为一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人,他在乡村拥有很多的追随者。他首先抗拒城市的缅甸总督,然后进入城市暗杀了他。但是在该地区剩余的缅甸人得到卡孟·诺艾的帮助之前,特披辛仅仅统治了该城市一个月左右。卡孟·诺艾是景洪的一个泐族王子,他在老族世界已经有了一个很长的政治生涯,并且曾经短期是琅勃拉邦的国王。缅甸人和卡孟·诺艾罢免了特披辛,随后卡孟·诺艾被推上清迈的王位成为国王翁坎(1727－1759)。

翁坎与许多次推翻他的尝试作斗争,首先是兰王国统治者,然后第二年是一支缅甸军队。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支持下,他击退了这些攻击。因为贵族和民众把他看作是抗击缅甸主导的一位有效力的领导。不过,他统治的清迈仅仅是满哥瑞的兰纳的一个影子。缅甸人在清盛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存在,而帕府、兰王国、帕尧王朝、南邦、芳县、塞特、清孔和汤都屈从于清盛。实际上,他仅仅控制着清迈周围的平河河谷,这里是支援抵制缅甸侵犯的一个小的基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缅甸本身在1740年代开始分裂。事件的节奏由缅甸内部的时间所主宰。随着勃固的孟人在1740年代获得独立并且与缅甸的阿瓦发生战争,翁坎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勃固统治者那里来表示自己的支持。而且当阿瓦本身在1751年屈服后,第二年清盛地区的很多种族集团造反了,这些种族集团包括泐族、坤族和一些山地民族。当翁坎1759年末去世后,出现不祥的征兆:不仅清迈和北部,而且整个傣族世界面临着威胁;而且不久甚至阿育陀耶也不能抵制住“缅甸的电闪雷鸣”了。

107

到了18世纪中期,不论是兰纳还是澜沧都不存在一个完全在力量上能与阿育陀耶相比的王国。此时阿育陀耶所拥有的而它的原傣族和老族表兄弟们所缺乏的,是一个王国范围的精英和具有稳定家族的朝

廷贵族，他们通过他们的文化和价值以及他们拥有的既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来致力于王国整体的统一和独立。“贵族”的意思不是指通过皇家后裔来定义的集团而是通过持续服务于无论谁是君主的国家的一个社会集团。阿育陀耶的官僚比那些老族王国的官僚更缜密，而且更高度差异化和专业化。王朝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准，部分通过农民劳动力的努力和他们的税收与实物捐赠，部分通过暹罗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大量收入。在这些方面，阿育陀耶更发达更强壮，并且由于其国际交往，也更国际化。因此，在18世纪中期后，阿育陀耶更有能力比它的高地邻居从缅甸军队的第二次屠杀中迅速恢复过来，并准备随后在狠狠地牺牲兰纳和澜沧利益的基础上扩大其领土。

阿育陀耶：力量源泉和不稳定

帕·披叻差国王统治下的阿育陀耶似乎很像其北方邻国。纪年也与同一时期兰纳和澜沧的类似。这些纪年充满了王朝争斗、对王位继承的争辩、光荣军事远征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有丰富多彩名字的人，其目的是通过报道捕获白象或国王虔诚的捐赠和建设来使人敬畏。不过，最近对该时期的学术研究已经开始罗列了发生在这些纪年表面之下的更深远的发展，这些发展同暹罗与其北方邻居之间不断增加的差异有很大关系。 108

披叻差作为一个篡位者在1688年登上王位。在他王朝统治的近乎80年里，他和他的继任者总是为篡位这个事实提心吊胆。披叻差自己感到非常不安全以至于他娶了国王纳莱的妹妹和女儿作为妻子，这样能够囊括一些纳莱皇家权力并且能够保证他与她们所生的任何孩子都有皇家血统。披叻差也把那些积极帮助他登上王位的人提升到王储的等级。他的儿子琅·哨拉萨克，成为副国王，居住在通常是为王位继承人准备的所谓的前宫，其他的两个儿子实际上居住在拥有王储等级的后宫。为了对抗中央和省级的行政管理中的贵族力量，披叻差的战略是创造一个自己拥有劳动力储备并且能够控制的皇家制度。不过，琅·哨拉萨克对这种状况感到不舒服，并且嫉妒他的两个皇家对手，于

是在一年内阴谋杀死了他们两个。他的行动使皇家的权力中心落到两个人身上：国王和琅·哨拉萨克，这使得王位暴露在外。

接下来的几年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1690年初一个由塔玛添领导的造反几乎成功地推翻了王位。这个塔玛添是哨拉萨克在前年杀死的纳莱弟弟阿拍稍特的一个仆从。而且，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们镇压了呵叻府和洛坤的总督，因为他们两个拒绝承认披叻差为国王。在监督对这两个领地的许多的征战过程中，国王和哨拉萨克对待贵族非常严酷：当指挥官无法攻下城池的时候，他们将被处死。但是他们的成功是短暂的，因为在1698年和1700年之间，呵叻府再次成为造反的中心。当时一个圣人波圹坚持了一年多，他自称是纳莱的弟弟。这些大众起义和省级反叛加在一起，就使得披叻差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一部分行政资源被动员成战争编制。披叻差也许利用了这个机会清除了对纳莱忠诚的官员，并且从造反最多的省区征兵，他设法遏制了叛乱。

除了哨拉萨克，披叻差还有两个王后所生的儿子：披宽王子(1691)和达叻诺伊王子(1694)，他们的母亲分别是纳莱的妹妹和女儿。随着他们的长大，哨拉萨克逐渐担心他们可能取代他继承王位，因此当披叻差在1703年初生病的时候，哨拉萨克粗鲁地杀死了披宽。披叻差大怒，在他临终的时候指定他的外甥披猜素林王子为他的继承人。但是不幸的王子并不力争，而是让位给了哨拉萨克，他被加冕为国王素立耶塔拉迪波迪。他更出名的称呼是国王苏阿——“老虎国王”——这当然反映了他的残忍和嗜血成性，在过去的20年里他靠残忍和嗜血成性追求权力。如果他的统治比他父亲更和平的话，那是因为在披叻差统治时期他作为王位背后的权力，他已经吓住了所有的挑战者。到1703年，他被勉强地接受为国王。他指定他的两个儿子为副国王，但是他不完全信任他们并且经常鞭打他们。在1709年他去世的时候，当然很少有人为他哭泣。他的大儿子披特(Phet)王子，也是副国王继承了他的王位，他继承王位没有什么争议。

109

披特王子被加冕为蒲冈塔拉查国王，但是他被人们称为国王泰沙(Thai Sa)(字面上的意思是“湖的尽头”，是指环绕他王宫的池塘)。他

有一个相对长的以及和平的统治，事实表明到此时为止王国的政治安排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不过两个重要的发展发生了，这两个发展将有重要的和长期的影响。

第一，国王泰沙逐渐地卷入到柬埔寨事务中，目前他是柬埔寨附属国的宗主。暹罗的卷入是由柬埔寨王子和一个流亡的国王诱发的，1710年他们被越南支持的竞争对手赶出了他们的王国，这标志着越南卷入柬埔寨事务的真正开始。在1720年，一支暹罗征战队，海路由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长率领，陆路由内政部（披耶·却克里）率领，尝试重新推举国王托摩拉嘉登上柬埔寨王位。他们失败了，但是安恩国王同意定期向阿育陀耶朝贡。在下个世纪，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第二，泰沙统治的另一个标志是同中国贸易量的大幅度增加，尤其是有关暹罗的大米出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自从阿育陀耶的建立和建立之前，这类贸易已经在继续了，尽管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这些贸易是在中国政府的严格限制下。到了18世纪初期，很多以前由荷兰从事的暹罗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现在落到私人华人贸易商手里，他们也代表阿育陀耶政府从事贸易并且进行国家的官方服务。尤其是，泰沙的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部长（从国王苏阿统治开始就在朝廷中非常突出）是一个华人，他在整合当地华人社区融入首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于金融和外国事务部的内部各个层次上都由华人主导。当1727年中国几乎完全开放了南中国的港口给来自暹罗运载大米的船只，贸易开始繁荣，而且所有参与方都变得繁荣起来，包括暹罗王朝及金融和外国事务部。

110

这一时期在1733年国王泰沙去世后，阿育陀耶历史的转折点到来了。备受争议的继承问题对王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有深远的影响。在国王泰沙统治的整个时期，他的亲弟弟副国王蓬王子忠诚地服务于他。泰沙自己还有三个与唯一的王后所生的儿子，王子纳仁、阿拍和帕拉迈特。在他临终的时候，国王表达了他选择阿拍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的意愿。纳仁当时正在当佛教僧侣，并且决定不争夺王位。但是其他的各方都准备以武力夺取王位。泰沙一死，阿拍和帕拉迈特就以王宫为基

地并且得到了大多数的官员们的支持，尤其是华人控制的金融和外国事务部。在距离前宫很短的一段距离，副国王在他自己的官员支持下，召集了仅仅大约 4 000 人的军队来对抗王宫的 2 万到 3 万的军队。当双方发生交战的时候，副国王的军队处于失败的边缘，一个前宫的领导官员坤赞楠·赞纳荣，志愿出来负责。在迅速攻击中，他消灭了王宫部队的领导，王宫部队逃离。副国王和坤赞楠于是攻占了王宫，蓬王子登上了王位，被称为宋当王或者波隆摩塔米卡拉特国王。不过，他最出名的称呼是波隆摩阁国王，字面上的意思“金塔中的国王(等待火化)”，因为他是享受那个仪式终结的最后一位阿育陀耶国王。

由于他自己作为副国王和王位争夺者的经历，并且也许反思了王朝早期的统治，波隆摩阁对王国的政治安排做了许多的改变。他的第一个改变同国王和王子的权力与中央行政管理中的贵族权力的平衡问题有关。当 1733 年，就像先前无数次的那样，王国面临着争夺王位的最终的政治竞争，结果总是出现竞争者获得对国家劳动力的控制。由于中央行政管理的根本任务是控制劳动力，关键部门的首长自然随时获得了大量的武装或者能够武装的男子，尤其是内政部和国防部，他们从巴萨通王统治时期就已经在其中间划分了各自控制的省份。因此，至少从披叻差统治开始，王朝的国王们已经开始寻求设立独立的、王子的部门，其主要的功能是按照皇家继承顺序使得王子们能够在官僚制度之外获得劳动力。不过，波隆摩阁在这方面改变了以前的惯例。他的前任仅仅允许少量的这样的部门——通常每个统治期间平均三个，每一个都控制几千人——而波隆摩阁则创立了十三个更小的部门，这样没有一个王子单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获得王位，而所有的王子联合起来则可以抗衡贵族部门的力量。这个改变的效果也许是使得继承问题更平稳，但是它也使得国家对现存有限的劳动力的控制碎片化了。

第二个改变来自 1733 年的继承争议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高级官员包括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部长都站在王子一边来对抗副国王。其中一个国防部官员披耶·拉查宋克拉姆则保持中立，尽管长期以来他是副国王的竞争对手。当副国王登上王位，他清洗了王子的所

有支持者，奖励了那些曾经帮助他成功夺取王位的人。最重要的是，坤赞楠被给予昭披耶·赞楠波立拉克头衔、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部长的职位，而琅查·山亚空则获得昭披耶·阿拍孟提头衔和内政部长。披耶·拉查宋克拉姆则成为国防部长。不过，国王波隆摩阁通过改变省级控制体系，重新调整了这三个权势部门的相对位置。他把国防部控制的南部省份转移到金融和外国事务部。也许这只不过是一个政治问题。毕竟以前的金融和外国事务部曾经支持王子们，因此不得不被取代。拉查宋克拉姆的中立至少勉强值得奖励，但是同时国王也许乐意让赞楠控制南部省份的重要的劳动力。无论如何，结果是进一步扩散了中央权力。国防部尽管失去了其南部省份，仍然是有权势的，因为它控制了许多军事单位。强大的常驻华人社区则失去了它在金融和外国事务部中的政府最高层次的主要代言人。

任命昭披耶·赞楠波立拉克(1686－1753)证实了另一些重要的暹罗官方家族权力的崛起，其中之一是波斯家族，我们曾经指出这与宋当王的统治有关系。彭世洛总督的儿子赞楠是一支印度婆罗门的后裔，他们在巴萨通王统治时期来到暹罗并且在17世纪以礼仪能力服务于朝廷。他父亲的兄弟的头衔昭披耶·摩诃稍姆巴特(蓬)表明他也许服务于金融和外国事务部，或者在早些时候遇到的不知名的华人之前，或者更可能的是在昭披耶·赞楠之后。与他的两个表兄弟和三个儿子一样，赞楠的两个兄弟都得到了昭披耶的头衔；而且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阿育陀耶时期的最后一个统治者的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部长。更奇怪的是，当内政部长在1742年去世的时候，昭披耶·赞楠的儿子萨旺得到那个职位并且被称为昭披耶·拉查帕克迪(而且在1757年萨旺的弟弟阿伦继承了他的职位)。因此，在波隆摩阁统治的后期，我们发现三个最有权势的部门中的两个由来自于同一家族的人控制的例外景象。我们还将再次遇到这个家族的成员，为了方便起见，将它称为婆罗门家族。 112

后人将把波隆摩阁的统治称为黄金时代，一种被再现的理想。波隆摩阁统治的很多方面与对好国王品德的传统观点一致，因此他受到

了赞誉。他首先是佛教的一个强烈支持者。他的统治也许最值得回忆的是为了与锡兰的康提王国交换使团。1751 年,一个来自锡兰的使团请求帮助恢复僧伽罗佛教,因为在葡萄牙和荷兰统治下该教已经没落。因此,18 个暹罗僧侣被派往康提王国去重新委任僧伽罗佛教僧侣并且在锡兰建立一种僧侣的暹罗等级。1755 年第二个使团再次派往康提王国。这些事件的含义暹罗人已经心领神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把锡兰看作是佛教的卓越中心。难道这些交流不是暗示着暹罗目前已经获得了那个位置?

第二,目前在与其邻国的关系中,阿育陀耶可以被再次看作正在发挥一个伟大王国的作用。1737 年,三个在阿育陀耶寻求避难的柬埔寨王子(包括前国王托摩拉嘉)最终被允许召集在呵叻府地区召集一支军队,他们推翻了正在统治的国王并且在 1738 年推举托摩拉嘉登上王位(第三次!)。同样在 1749 年,暹罗人干涉柬埔寨事务,成功地帮助其罢免了一个越南支持的国王。

与此同时,在毫无效果的一个世纪之后,阿育陀耶恢复了与缅甸的关系。这主要与导致后来东吁王朝逐步崩溃的事件有关系。当阿瓦的国王们不能应付 1730 年代来自曼尼普尔不断增强的军事侵犯的时候,位于海岸的孟族地区就趋向造反,最终 1740 年在勃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孟族国家。一些缅甸难民从该地区逃离到阿育陀耶,并且表面上为了感谢波隆摩阁对他们的好客,阿瓦的国王在 1744 年派遣一个使团去阿育陀耶。他的真正目的也许与阻止阿育陀耶与勃固孟国的任何结盟有关。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阿育陀耶劳动力的缺乏都是由大量的缅甸难民补充的,暹罗国王不鼓励形成一个独立的孟族国家,因为这可能成为一个对他们忠诚的替代品。1745 年波隆摩阁派遣了一个有礼貌的回访使团到阿瓦,然后仔细地观察两边发生的事件。当勃固的国王斯弥陶·布达克提(Sming Htaw Buddhaketi,1740－1747)被罢免并且在 1750 年逃离到阿育陀耶的时候,他被拘禁并且最终被送到中国。

到了统治的后期,阿育陀耶不再面对着严重的外部威胁,而且也没

113

有了军事征战。不过，在王国的内部政治中出现一些紧张的事件，这对它未来的稳定是不祥之兆。

这些紧张事件在统治初期就开始了并且在不断加深，当国王生病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急迫。首先，1734年，当国王离开首都去狩猎的时候，一支由300个华人组成的军队围攻了阿育陀耶的王宫，这也许是对他们失去在金融和外国事务部影响力的反应。他们溃败后，许多人被处死。第二年，国王的一个儿子牵连到一个未遂的暗杀波隆摩阁外甥纳仁王子的活动，不过，纳仁王子从1733年起一直在当僧侣。于是，1746年，另一个圣人在华富里地区开始起义。但是只是从1753年起，内部的争斗才变得严重，在这之前，国王已经统治了20年并且已经73岁了。在短短的两年中，相当大的权力变化发生在阿育陀耶的社会高层。副国王社纳披塔克(Senaphithak)王子，是波隆摩阁的大儿子，与他的两个也是王后所生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一起去制止三个由妃子所生的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们的意图和野心。三个年轻的兄弟实际上已经在偷偷地扩展他们的部门，提拔他们的官员，并且征召额外的仆从。当出手抓捕并且鞭打了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的时候，年轻的派系反过来披露了社纳披塔克正与他父亲的三个妃子中的一个偷情。社纳披塔克承认指控，于是他和那个女人被鞭打致死。1755年，副国王死后，王位继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14

在同一时期，在高级部长的职位上发生大量的更换。1753年昭披耶·赞楠死后，金融和外国事务部转手到一个有华人血统的官员昭披耶·披拉克琅(斯姆)手中，他娶了赞楠的女儿。1755年，国防部和内政部两个部长都死了。记录不是很清楚，但是看起来国防部目前转到了一个波斯家族的后代昭披耶·拍特披猜(猜)手里，而内政部则从婆罗门家族转到一个外部人手里。从阿育陀耶最后十年间(1758－1767)主要部长相关的头衔的数量来判断，一小群根深蒂固存在于中央行政管理的大家族之间一定存在大量的对权力的竞争和争夺。尽管几个派系——出名的有以昭披耶·披拉克琅(斯姆)为代表的华人集团和继续主导处理穆斯林贸易的金融和外国事务部的波斯家族——在海外贸易中有重要的基

地,但是在所有的权力斗争中的关键筹码总是对劳动力的控制。

波隆摩阁统治初期就暗示在这方面存在很多困难。当昭披耶·拉查帕克迪(萨旺)1742年担任内政部长职位的时候,他不久就发现对首都北部省份的劳动力的登记是严重缺乏的。他的官员在维塞特猜赞、素攀武里、那坤猜席、卑谬武里、因武里、信武里、猜纳、玛努如姆、乌泰他尼和那空沙旺进行了登记,并且“几万自由民当时被登记为政府服务”①。不过,很明显这只是指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无数的皇家法律和法令要求注意能够提供给政府的劳动力短缺。很明显,许多每年都必须接受强制劳动服务的自由民正在逃避他们的责任。一些人只是逃避登记,其他人则是把自己置于单个王子或者官员的保护之下。而且,随着政府对促进暹罗出口的兴趣增加,许多自由民通过承诺每年支付实物,来允许替代他们的劳工服务,这种承诺可以是与政府正式的安排,或者是与官员的非正式协议。无论这个问题的精确内容是什么——而且阿肯·拉比巴达纳已经在这上面写了很多——很明显,到了波隆摩阁统治末期,阿育陀耶存在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同时,对现存劳动力的控制分散于许多小的部门中,而且,南部省份的重要储备处于金融和外国事务部控制之下,这个部也许比省级行政机关更深地卷入到贸易中。

115

在副国王社纳披塔克1755年去世之后,既定继承人居住的前宫就空出来了,一直到1757年三个主要的部长要求国王任命乌图姆蓬王子成为继承人。临终的时候,国王波隆摩阁再次证实他喜欢王子乌图姆蓬为自己的继承人,尽管他的大哥阿努拉克孟提(Anurakmontri)王子对王位有更好些的要求。但是与许多以前的情况一样,继承问题并没有如国王希望的那样进行。波隆摩阁在1758年4月13日死后,三个王子聚集了他们的仆从,从皇家军火库里武装了他们,去反对乌图姆蓬王子对王位的继承。乌图姆蓬得到了主要官员和僧侣名人的支持,他首先阻止了反叛,然后处死了王子们。他在月底被加冕为国王,但是他的大哥却居

① Cushman, *Royal Chronicles*, pp. 435 – 436.

住在王宫里。乌图姆蓬没有兴趣反对他，在统治了仅仅 10 天后，他让位给他的大哥，他大哥以波隆摩罗阇(1758 – 1767)称呼来进行统治，但是人们通常以他居住地方的名字称他为素立亚玛林即王宫国王。

这个王朝统治的不吉利的起点只是一系列麻烦的第一波。素立亚玛林不信任主要的贵族，他正确地判断出这些贵族喜欢他的弟弟。确实，1759 年国防部领导的一群官员阴谋罢免了他并且重新把乌图姆蓬推上王位。毫不奇怪，国王很难获得他的官员的有效合作，于是，第二年，王国再一次陷入到与缅甸的灾难性战争中。在七年内，这场战争将颠覆整个傣族世界并且终止古代的阿育陀耶王朝。

缅甸和傣族世界

如果 1740 年代缅甸王国是在曼尼普尔人和孟人的摆布之下的话，那么到了 1750 年代古老王国灾难性地崩溃之后，相反的一面则成为现实。就如 16 世纪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缅甸的复兴包括了一个强有力的威胁到所有邻居的帝国侵略措施。 116

1740 年代末期，复兴的勃固孟族王国充分利用了阿瓦在面对曼尼普尔和掸族侵犯时候的软弱无能，并且在 1752 年 4 月，他们成功地攻陷了首都，从而终结了后来的东吁王朝。不过，几乎同时，缅甸人在阿瓦西北部乡村地区的抵抗聚拢在一个具有吸引力和鲜明个性的人周围，他很快聚集了很多人来对抗孟族人。年中，他已经在该地区得到广泛的认可，他被称为雍籍牙国王。他首先恢复了阿瓦王国，然后重新获得南方，1757 年他攻陷勃固。这之后不久，他的注意力转向暹罗。已经有很多解释来说明他这么做的原因。最紧迫的是，从 1754 年开始，由于暹罗已经接收了大量来自蹂躏缅甸的战争中的难民，雍籍牙可能担心阿育陀耶支持复兴勃固王国。也有人认为由于这一时期的战争，缅甸很多地方都变成了无人区，而雍籍牙发动战争是为了补充他的劳动力。其他人则认为对该地区主要大国的征战将验证阿瓦的国家地位，向阿瓦的几百个附属国表明他们别想挑战阿瓦的宗主权。最后，人们可能简单地猜测，雍籍牙很明显是一个缺少治国经验的粗鲁的乡下

人,他只是继续展示他早期能做得最好的:率领军队打仗。他也许也渴望伟大的传奇,这是 16 世纪缅甸伟大战士——国王的特点,除了其他的东西之外,这些国王使得阿育陀耶、兰纳和澜沧成为附庸国。

1760 年初,雍籍牙个人率领一支征战队击败了马达班、土瓦和丹那纱林,然后越过半岛攻陷了奎、碧武里和叻丕。1760 年 4 月,缅甸的军队围攻了阿育陀耶。暹罗没有什么准备,它的统治者为了抵御而召集的军队数量太小并且太分散了。如果不是缅甸军队的一支枪走火,伤了雍籍牙并且引发了缅甸人撤退的话,围攻将是成功的。雍籍牙死在返回缅甸的路上。

雍籍牙的继承人莽纪觉(1760 — 1763)首先镇压了内部对他的挑战后,开始了征服清迈的战争。在清迈,王子赞已经在 1759 年继承了他父亲翁坎的王位,不久卷入到麻烦中。由于缅甸的注意力分散在别处,其在清盛的驻军遭到了挑战,并且反叛到处都是。对赞来说,也许他是个外来者,1761 年他最终被兰纳王子推翻。然后,1763 年初期,一支大规模的缅甸军队围攻了清迈。六个月后,他们攻陷了这个城市和南奔。目前一个缅甸将军在清迈统治,直到大约一年后,他被一场当地的造反推翻。缅甸对此作出了反应,在阿瓦的孟驳王(1763 — 1776)统治初期派遣了大量的军队。一支包括 3 万人的军队,大多数是由他们自己的统治者领导的掸族人,这支由提哈帕特(Thihapatei)将军指挥的军队通过两条路线进犯了兰纳,一支向清莱和上湄公河进发,另一支紧逼清迈。在几个月内,提哈帕特的军队征服了旧的兰纳。缅甸的纪年写道:“当时,在清剿了所有清迈 57 个区中各镇的傲慢和不顺从的人们之后,就没有什么麻烦了,所有的事情都如水面那样平滑顺利。”①

接下来是进攻琅勃拉邦,这也许是受到万象的西里本耶讪国王鼓动,因为他发了封信给孟驳王,表明向他提供帮助来对抗其竞争对手。1764 年底,提哈帕特从他在兰的基地出发,他在兰度过了前一个雨季。

117

① *Koun-hpaung-hset maha-yazawin-taw-kyi* [Royal chronicles of the Konbaung era (of Burma)] (Rangoon, 1967), 1:382.

1765 年 3 月，他已经削弱了琅勃拉邦并且为了得到绍提卡库曼国王将来亲善的态度和帮助而扣押了人质。万象军队据说曾经帮助攻陷琅勃拉邦，因此这进一步加剧了两个王国的敌对。

最后，缅甸军队为了攻击阿育陀耶开始大规模地集中。北部军队由提哈帕特率领，从南奔出发，他们在那里度过了 1765 年的雨季。他们掸族特遣队原有的阵营此时增加了来自兰纳和澜沧的军队，每一支都由当地的总督和统治者率领。那些向南进发的军队须通过达府、甘烹碧、宋加洛、素可泰、彭世洛、披猜、碧吉、那空沙旺和安通，将在 1765 年 7 月底出发。同时，一支南部征战队，由摩诃纳瓦哈指挥，在 9 月底从土瓦出发，通过春蓬和碧武里的跋涉，与一支通过三塔关进入暹罗的小特遣队一起去攻陷叻丕和素攀武里。1766 年 2 月，两支主要的缅甸军队在大城郊区会师并且包围了该城。

对这种大规模的进犯，暹罗人的抵抗是迟缓的和不协调的。1760 年化险为夷之后，国王素立亚玛林似乎允许他的军队放松。通过向北派遣一支小的征战队，他回应了 1763 年清迈要求帮助的请求。但是它到达得太晚了，没有接触到缅甸。如果还存在成功回应的最后一个机会的话，那么是在 1764－1765 年间，缅甸正在北方获胜并且有效地包抄大城的时候。但是素立亚玛林由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白白地让机会溜走了。因此，当最后的屠杀在 1765 年下半年开始的时候，暹罗人没有任何准备，来自北方的援助可能被切断，并且被迫在两条战线上面对缅甸。缅甸人仅仅遇到了许多省的总督和他们军队象征性的抵抗。战争初期暹罗最有效的抵抗来自阿育陀耶西北部的邦拉赞小乡村。在那里提哈帕特的军队被阻挡了五个月。几个月后，一支 6 万人的大规模军队从首都出发去迎战摩诃纳瓦哈，但是他们被更小规模的一支缅甸军队击败了，并且不得不撤回到首都。在各处的乡村，一个领导者可以召集军队，骚扰侵犯者几天，但是这些努力是徒劳的，战斗只是减少对大城周围的围困。 118

如他的前任一样，素立亚玛林一定希望初始的暴雨和广袤的中央平原的洪水将迫使缅甸人后退。不过，缅甸人集中高地并且加固了它

们,征用船只来保持部队行动。到了1766年末,碧武里和达府的总督率领水兵从首都出发去攻击侵犯者,但是碧武里的总督被杀死,攻击遭到挫败。达府的总督是一个有能力的和野心勃勃的指挥官,但是由于征战队的失败而受到不公正的指责,他想发动一场有效反击的尝试也被阻止。随着城市的命运变得越来越黯淡,他和几百随从偷偷逃离了城市并且向东进发。并不只是越来越多的饥荒和流行病肆虐,1767年初期在城市内还爆发了一场火灾,烧坏了几万房屋。看到自己的事业将要失去,国王素立亚玛林于是决定投降,成为缅甸国王的一个附属国,但是缅甸除同意无条件投降外什么也没有承诺。最终,缅甸人加紧了对城市的攻击,1767年4月7日,最终攻破了城墙,夺取了古老的首都。

缅甸人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他们强奸、抢劫和掠夺,驱赶成千上万的俘虏到缅甸。他们点燃一切易燃的东西,甚至乱砍佛像来得到上面涂层的黄金。据说国王素立亚玛林乘坐一只小船逃离了该城,十天后饿死了。前国王乌图姆蓬和无数的皇家家族和贵族成员被囚禁着带走了。能够生存的那些人遭受到最严重的折磨。几十年后一个当代人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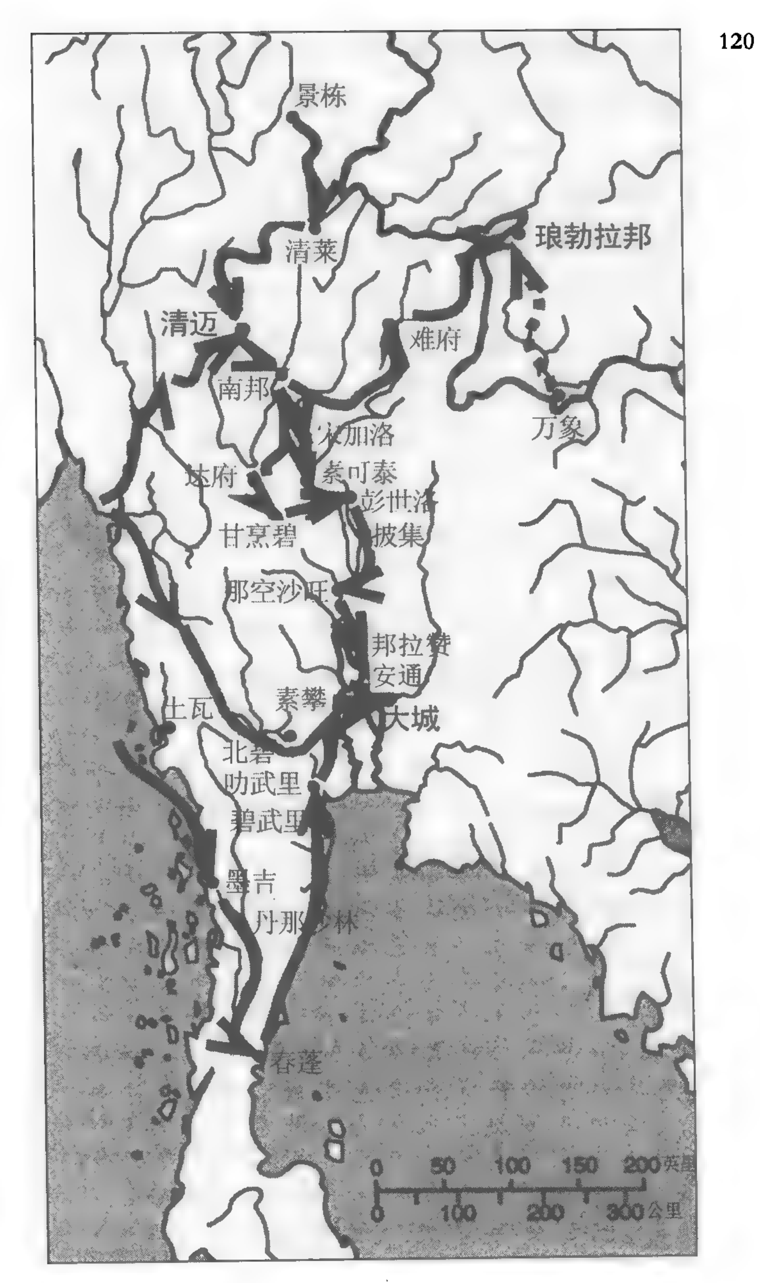
119

> 民众被敌人用各种疾病折磨。一些人四处徘徊,饥饿,寻找食物。他们失去了家庭、孩子和妻子,并且被剥夺了财产和工具。……他们没有大米,没有鱼,没有衣服。他们消瘦,他们的身体日渐衰弱。他们仅仅能找到树叶和草来吃。……在绝望中许多人转向抢劫。他们聚集成队,抢劫稻米和食盐。一些人找到食物,一些人找不到。他们变得日渐消瘦,他们的骨肉日渐衰弱。遭受到许多疾病,一些人死去而一些人继续活着。[①]

---

① Somdet Phra Wannarat, of Wat Phra Chetuphon, *Sangitiyavamsa: phongsawadan ruang sangkhayanna phra tham winari* [Sangitiyavamsa: Chronicle of the great councils] (Bangkok, 1923), pp. 409—410.

120



1763－1767年缅甸的入侵

难道自从上次缅甸攻陷大城之后的两个世纪没有给阿育陀耶或者傣族世界的当代国家带来新的力量？在许多方面，与 200 年前相比，他们目前没有更好地准备迎接攻击。尤其是，他们动员国家劳动力的能力并没有改进。不过，阿育陀耶和它的北方邻居的相似点结束了。在前 200 年里，阿育陀耶已经发展出了有效的制度来进行广泛范围内的专门职能，尤其是发展了能够支持一个高度分化的都市社会的经济制度，就整体而言，这样的社会可以对更广泛的世界作出反应。阿育陀耶有效地管理了广泛的经济、文化、宗教和法律活动而且通常能够有效地治理分布在广大区域上的很多省份。它通常吸收了并且充分利用了相当多的智力。这些智力属于一个拥有文化、种族和语言多样性的异质的人口。

人们很容易忘记阿育陀耶长期以来保持的高度的统一。17 世纪的一段时间，对马来半岛甚至更遥远的地区来说，长期的造反已经成了规则；但是与兰纳和澜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国的核心地区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理。1760 年代阿育陀耶不能轻易地动员其劳工，与其说是因为其行政制度的失败，不如说是存在着一种固有的更持久的问题症结，即劳动力比土地更有价值。控制土地相对更简单，只是因为它是不动的，也没有自己的意志。人，拥有自己的意志，自然会去按照自己的最大利益行动。他们能够回应公共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很好地领导了，而在这里，阿育陀耶缺少强大的持续的政治制度和从一代向下一代转移政治权力的机制，这威胁到王国的生存。

就如兰纳和澜沧一样，实际上这两个世纪的每一个皇家继承都变成了一场政治危机。随着风险变得越来越高，这些危机逐渐变得危险。中央官僚的贵族们需要保护他们的既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而且任何新的国王也许激进地改变他们中间的现存的权力平衡。如果在 17 和 18 世纪存在一个真正的普遍危机的话，它来自皇家和贵族权力、至高无上的王位和精英竞争、贵族派系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张力。在这两个世纪期间，阿育陀耶至少培育了贵族权力的发展以及可能来自进一步发展和变化的多样性的增长。阿育陀耶的继任者仍然需要去找到能够确保稳定的方法，而稳定能够使王朝的力量增长的同时保持其独立。

第六章　早期曼谷帝国：1767－1851年

1767年阿育陀耶毁灭之后，人们也许想到的是一个长期缓慢的复兴和重建过程以及傣族世界碎裂成许多弱小的公国。恰恰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在大约10年内，一个新的暹罗人帝国已经在纳黎萱国王和他的阿育陀耶前任失败的地方建立了，这个帝国包括兰纳和大部分的澜沧、柬埔寨和大部分的马来半岛。到了19世纪中期，帝国进一步扩展并且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从古老暹罗核心爆发出来的一种新的能量在发挥作用。不过，这不仅仅是在战场大展宏图的军事力量。它不止这些，还涉及暹罗对其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一种新视野以及领导其邻居来面对他们周围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的一种新自信。它起初是对1767年灾难的一种回应，但是不久它变得至少有创意性和活跃性。 122

国王达信的未遂重建

当1767年4月缅甸的军队占领阿育陀耶的时候，乡村地区处于动荡之中。没有任何政府和权威存在。不过，由于他们的祖国最近在最北部与中国交战，缅甸的军队不久撤出暹罗，只留下很小的军营，并且在湄南河盆地，争夺权力的斗争开始了。在地方上，

这就意味着组织那些为了生计而掠夺和抢劫的土匪,同时开始慢慢地进入到地方统治家族或者首都官僚剩余势力的关系中,这些人也许能给他们提供领导、支持或者让人尊敬的光环。更多野心勃勃的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甚至“王国”,来争夺整个地区的主导权。

123

1767年该地区有五个主要的权力中心。只有一个声称对阿育陀耶的国王有合法的皇家继承权。这个王朝位于碧迈,是呵叻府(呵叻)附近的一个古老高棉人中心,由国王波隆摩阁的儿子特披披特王子领导。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王国是以楠河的城逸东边的萨旺克哈武里或者芳县为中心。在那里,一群僧侣夺得了权力,他们身着红色长袍而不是藏红花黄色长袍并且以凡夫俗子的身份来生活。顶着神圣的光环,他们在1770年变得足够强大,以至于征服了一个位于彭世洛的第三个领地。在那里当地的总督已经组建了一个王国并且甚至加冕自己为国王。在半岛的洛坤,类似的情形出现了,但是却有相当大的不同。洛坤的总督是世世代代统治该地区的统治者的后裔,并且能够寻求北到春蓬等省的忠诚,使自己的王国要比碧迈、萨旺克哈武里或彭世洛相对更强大。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四个领地没有一个尝试去争夺位于中央平原的古老阿育陀耶腹地的权力。

1767年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权力争夺者,表面上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人物。这是一个名字为信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华人父亲和暹罗母亲的儿子,他被一个贵族家庭收养并且在首都长大。到了缅甸侵犯的时候,他是达府的总督,并且为了把他与前几任总督区别开来,他被称为披耶达(信)——或者是“达信”。为了帮助防卫首都,他和他的军队从达府撤出,但是由于看到绝望的情况,他在缅甸包围了首都的时候逃离了该城,在一队军队跟随下,他向东南进发,在1767年他夺得尖竹汶。

在这些动荡的时代,达信最重要的资产是其个人魅力,一种使其他人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有优点的男人”的能力,这种来自以往气质和

功勋的业力[①]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能够使他领导其他人并且征服所有的对手。人们需要他的领导、勇气和视野。同时，达信也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战术家和战略家，而且他能够在中部暹罗迅速扩展自己的权力基地。10月，他夺得今天曼谷的湄南河西岸上的小港口吞武里。他在那 124 里建立了自己的总部，11月他在西部击败了缅甸在该地区尚存的唯一一支有点规模的军队。大城陷落后的仅仅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使自己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他的成功有相当大贡献的是该地区的潮州华人贸易社区，凭借他父亲的关系，他能够向他们呼吁。短期来看，华人贸易能够提供战争所需要的食物和货物，使达信能够建立自己羽翼未丰的国家。长期来看，它产生的收益"能够用来支付国家费用和支持皇家、贵族以及富有商业家庭的费用"[②]。如一个当代人所观察到的，在1767－1768年的饥荒条件下，达信表现出了慷慨的精神。有需要的人不再一贫如洗。国库为了救济而打开。为了换取现金，外国人必须向他们提供该国不生产的产品。通过自己的仁慈，篡位者（达信）辩解了自己对王位的声称。他改革了对囚犯的虐待，恢复了财产和个人安全，但是对罪犯展示了最严酷的一面。没人抱怨的法律法规取代了迟早会引起造反的独断权力。通过保证公共和平，他能够巩固自己的位置并且由于共享普遍繁荣而没有人争夺王位[③]。

有意义的是，达信选择不去大城，相反则是在吞武里建造自己的首都，这里距离大海仅仅20公里，非常适合海洋贸易。

达信最急迫的任务是通过征服他的竞争对手来重新建立中央权威。他的第一次这样的尝试是在1768年5月征战彭世洛，但是失败了。不过到了年底，他夺取了碧迈，1769年初他派遣了一支军队进入

① 梵文Karma，音译"羯磨"，意译"业"或"办事"。佛教名词，意为造作，泛指一切身心活动。——译者注

② Sarasin Viraphol, 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 － 1853 (Cambridge, Mass., 1977), p. 144，引自泰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孟固王1853年的写作。

③ Francois Henri Turpin,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Siam*, Trans. B. O. Cartwright (Bangkok, 1908), pp. 178－79; original French ed., 1771.

柬埔寨,吞并了马德望和暹粒。这一年的后期,他的军队征服了洛坤,1770 年中,夺取彭世洛和芳县。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已经重组了阿育陀耶王国的疆界,而且从 1768 年开始,他已经以一个加冕的君主来进行统治。

达信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战士比作为一个统治者更为成功——而且他甚至把他军事责任逐渐委派给其他人。1770 年代战争中生死存亡的事情是国家的安危。缅甸的军队通过夺取北部和南部能够扼杀阿育陀耶。只有至少敌人得不到这些疆土或者他们最好被带到暹罗的势力范围里面,吞武里才可能安全。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马来和老族的领地期望能够获得暹罗的帮助来抗击缅甸,达信的任务变得相对容易些。例如,1769 年初,仑沙、丁加奴(或是吉打?)和北大年向吞武里朝贡。不久达信就尝试把他的门徒推上柬埔寨的王位,而且 1771 年初期,万象的西里本耶讪国王寻求他的支持来抗击琅勃拉邦。

125

不过,加入到王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地是兰纳。多年以来,清迈和北部一直在缅甸的军事统治下,尤其是该地区被用作来攻击大城和吞武里军事行动的一个前方基地,并且该地区的老族人口被一再要求提供劳动力和物质供给。在清迈的披耶·却班和南邦的昭·卡维拉领导下,1774 年缅甸派出抵抗吞武里侵犯的兰纳军队却站到了暹罗一边,并且与达信一起夺取了主要的北部城市,最后把缅甸人赶了出去。第二年的一场反击战从北部的彭世洛开始,并且只有通过延长战斗,暹罗的军队才在 1776 年末重新夺回清迈。此时由于多年的不断战争,整个北部已经筋疲力尽并且变成了无人区。清迈本身被遗弃了 20 年,而且在披耶·却班死后,南邦的昭·卡维拉实际上控制了北部,成为暹罗国王们的附属国。

北部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是由昭披耶·却克里(通端)和他的弟弟昭披耶·素拉西(波玛)领导的。这两个年轻人(分别出生在 1737 年和 1743 年)是一个古老的阿育陀耶贵族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在纳莱统治时期有一个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长,他们是负责北部省份的内政部中的一个中级官员与他的华人妻子(引用他孙子的话,她是"一个最富的

华人家庭的漂亮女儿")[1]的儿子。他们的家族联系值得特别强调。阿育陀耶的主要的贵族家族包括了波斯的波纳家族，一个印度婆罗门家族后裔，和几个最近的华人移民家族后裔。至少在1775年前和早期的一些事例中，却克里和他的弟弟与这三个家族都有关系。却克里的大老婆与波纳家族密切相关；通过他姐姐的丈夫，他与婆罗门家族有关系；并且至少通过他的一个妾，同时通过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的联姻，他与华人家族有很好的联系。

1767年大城陷落的时候，通端正作为一个皇家代表在叻丕，他妻子的家族在那里很有势力；他父亲在彭世洛并且成为却克里也就是那个领地的野心勃勃的总督的军事指挥官，那个领地目前正在努力争取获得独立。人们倾向于把这种努力看作是旧贵族精英的主要希望，但是由于总督和通端父亲的过早死亡以及该城落入到来自芳县的穿红袍的僧侣手中，这种努力被中断了。同时，波玛已经加入了达信的军队并且让国王注意到他大哥。经过达信统治早期著名战役的成功，通端在1771年被任命为尧玛拉特，他是却克里，并且在没有皇家军队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征战，他的弟弟总是在他旁边。

126

在征服兰纳并且立卡维拉为暹罗在北部的一个附属之后，却克里和他的弟弟继续向东部发动征战。很明显，暹罗的领导已经意识到结束暹罗东部边界上长期政治动荡——在三个或者更多的老族王国之间的小争斗和柬埔寨的长期不稳定的时候到了。1770年代初期，缅甸军队已经卷入万象和琅勃拉邦之间的冲突。这个事实也许鼓励了暹罗人去利用国王钦拘(1776－1782)统治时期缅甸的政策的和平趋向，拒绝缅甸进入上湄公河河谷。同样地，这一时期的越南王国由于内部的反叛正在转移注意力，因此不可能在老族王国或者柬埔寨采取行动。因此，在177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昭披耶·却克里派遣了一支2万人的军队从呵叻府出发，穿过呵叻高原向万象进发；而昭披耶·素拉西也率领

① 孟固王给 Sir John Bowring 的信，引用在其书中，*The Kingdom and People of Siam* (London, 1857; reprint, Kuala Lumpur, 1969), 1: 65－66。

了 1 万人穿过柬埔寨，并且在那里征用了更多的人和供给，袭击湄公河。一路上征服了占巴塞和佛统之后，素拉西与却克里和一小支琅勃拉邦军队一起攻打到万象城墙下。该城很快陷落。成百上千的老族家庭被捕，被带回并定居在北标地区，而澜沧的两尊佛像，玉佛和勃拉邦佛被带回并供奉在吞武里。暹罗已经牢固地建立起对占巴塞和万象的宗主权并且恐吓琅勃拉邦与它建立了不平等的同盟。

1779 年 4 月军队回到吞武里的时候，显然，国王和他的王朝并不是都很好。根据法国的传教士报道，达信已经越来越多地投身到过度的宗教活动中："他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花费在祈祷、禁食和冥思上，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能够达到在空中飞翔。"[①]更严重的是，由于他要求

127

僧侣们应该认可他为须陀洹或者预流，他正在暹罗佛教中挑起分裂。须陀洹是从事启示的四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的一种神，这四个阶段为：预流，须陀含，斯陀含，阿罗汉[②]。拒绝服从达信的以及拒绝称他为神的僧侣被降级，成百的僧侣被鞭打并且宣判去做苦力。这种状况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会使许多正统的佛教徒烦恼；但是达信的异常行为似乎肯定对那些虔诚者更有威胁。这些虔诚者认为 1767 年的大灾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阿育陀耶的国王们没有足够的虔诚并且社会陷入到一个道德堕落的状态。他们目前由于其功劳而支持达信统治权的看法被国王越来越专横和残忍的行为所动摇。传教士再一次描述了这种状况：

> 这些年来，暹罗的国王已经大大地激怒了他的臣民以及定居或者前来他的王国贸易的外国人。去年(1781)习惯于贸易的华人发现他们不得不完全放弃他们的贸易。去年一年，几乎疯狂的国王造成的愤怒变得比以前越来越常见，越来越残忍。由于他的喜

---

① "M. Coude to the Directors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Seminary, 1780," in Adrien Launay, *Histoire la Mission de Siam*, 1662 — 1811; *Documents Historiques*, vol. 2(Paris, 1920), p. 301.

② Craig J. Reynolds, "The Buddhist Monkhood in Nineteenth Century Thailand,"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72, p. 33.

怒无常，他已经关押、拷打、鞭打他的妻子和儿子们——甚至王位继承人和高级官员。他想让他们承认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过。[1]

被其他人认为是偏执的行为对达信来说也许是自我实现。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暴发户，尽管他从社会的边缘上升到这个社会的最高位置，但是他仍然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他在暹罗社会的根是很浅的，仅仅只有一代。随着和平和繁荣的恢复，几代以来在阿育陀耶统治下的暹罗的古老家族和目前的达信亲戚能够继续追求他们的利益。达信一定知道他们在背后议论他并且感觉到他们不赞同他的行为和活动。不久以后，他已经疏远了所有那些在首都权力结构中算计任何事情的人：僧侣、旧家族、官员和商人。

达信是一个比阿育陀耶在战场上扩展得更远的暹罗国王，不过，表面之下，很多的权力掌握在其他人的手里。我们仅仅举出几个耐人寻味的例子，南方的洛坤和北方的兰纳都处于当地的统治家族的控制之下，波纳家族与华人和婆罗门家族一起共同控制金融和外国事务部。128 旧贵族家族财富的青年继承人使用他们的名字、联系和专业来保持或者改进他们的地位。因为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集团和帮派联系在一起，并且经常得到他们在首都（和首都内）外的村镇控制的劳动力的支持，很可能到了1781年晚期，某些共识在精英中开始出现：达信必须被替代——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为了佛教，为了暹罗的将来。

同一年，柬埔寨的一场造反造成了国王的死亡和普遍的动乱。达信决心把一个亲暹罗的君主推上柬埔寨的王位，并且派遣却克里和素拉西率领2万人的军队去完成这个任务。当这些军队穿越边界的时候，一场危机在首都爆发了。北标和大城的地方帮派联合起来攻击大城的税吏。达信任命的这个税吏其贪婪臭名昭著。从首都派出镇压叛乱的官员反而与他们一起要求推翻达信并且推举却克里登上王位。由

[1] Journal of M. Descourvieres, [Thonburi], 21 Dec., 1782; in Launay, *Histoire*, p. 309.

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叛军向吞武里进发，捕获了达信并且邀请昭披耶·却克里接受王位，他在1782年4月6日接受了王位，并且加速从柬埔寨返回。

15世纪崔洛克国王的宫廷法律提供了不同寻常的皇家成员被处死的方法。达信被困绑在天鹅绒袋中，被用檀香木棍击中后颈部，从而结束了生命，后来他被秘密地葬在吞武里郊区。（泰国长期存在的一个民间传统坚持认为另一个不幸的人取代了在天鹅绒袋中的达信，而前国王则被偷偷带到了隐蔽在洛坤之上的小山的避难所里，在那里为他建造了一个豪华的宫殿。据说直到1825年他才死在那里。）达信没有得到广泛的或者公开的悼念，尽管他的继任者在1784年为他主办了皇家火葬。为了尽快纠正他的过激行为，很少有人抽出时间来考虑他的巨大成就。达信提供了泰国从1767年其陷入可怕的困境中走出来的领导力量。他还建构了一种暹罗生存所需要的军事和外交安全框架。

拉玛一世的新暹罗

在一个简短的胜利仪式之后，以前的却克里以国王拉玛铁菩提称号来进行统治。（他死后被授予披·蒲塔尧特法·楚拉劳克的头衔，但是人们通常称呼他为国王拉玛一世，1782－1809年）。他作为国王的第一个行动是把首都迁移到湄南河东岸的曼谷，政府在那里可易于避免受到来自西面缅甸的攻击。该城市不久就到处是忙碌的工匠在建造一个新的皇宫和佛教庙宇，而王子们和官员们沿着运河建造从皇宫向东辐射的他们的家园，华人和印度商人则沿河向南建造他们的商铺和仓库。与早几个世纪的阿育陀耶一样，各个家族必定服务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他们立即在城市的主要城墙外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这里真腊人附属于军队，那里一组马来人操作海军舰艇，并且聚集在清真寺内；城市北边是葡萄牙和日本基督教后裔的罗马天主教的定居点。王子和官员们的个人仆从通常居住在他们的庇护人和保护者的附近。城市没有公路，而交叉来往城市的运河是忙碌的船只。从大城到曼谷的转型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成千只船从大城残骸中运来的砖被用在建造城墙

129

和公共建筑物上。

国王拉玛一世面对着可怕的问题，尤其是那些造成达信统治结束的问题。他的第一个行动是重新建立佛教僧侣制度。国王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似乎相信暹罗的佛教处于危机当中。许多僧侣看起来是纪律差，素质低，易受到淫邪和异端邪说的影响。大量的僧侣鼓励了达信的更极端自负，而更博学和更虔诚的教友为抵制他们而遭到降职或者惩罚。在拉玛一世登上王位一个月内，他发布了一系列用来针对僧侣纪律的宗教法规；而且与这些法规一起，他还发布了一系列宗教任命，恢复最博学最虔诚的僧侣在等级内的领导地位。国王通过赞助宗教委员会来考虑文本问题，从而进一步鼓励僧侣们的工作和谐，高潮是在1788－1789年，国王召开了一次大的理事会来建立巴利文的巴利大藏经的定本，即佛教经文。国王的领导和赞助包括在首都建造大量的庙宇以及维持和教育成千的僧侣，在联合教会和国家来促进新王朝的利益上似乎很快发挥了作用。

通过这种及其他的各种方式，王朝似乎在集中恢复阿育陀耶的荣耀，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到过去的一个想象的黄金时代——通常与国王波隆摩阁的统治有关。在他统治早期，国王赞助了国家的各种仪式的复活，这些仪式从大城陷落后就暂时搁置了，而仪式上可以表达出以国家为根基的社区、等级和身份概念。只有当研究出正确的形式——王朝和国家得到巩固以后——拉玛一世才在1785年进行完全的加冕。最终国王对他的立法功能采取了一种类似的、系统的方法。在1805年，他任命了一个由法官和学者组成的委员会来考察暹罗的整个法律体系。在“国王自己努力去修正了那些不规则或者不完美的法律，以至于它们将符合正义的要求”之后，[①]他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去建立、修正和编辑所有法律的定本。最终的法令《三印法典》，在下一个世纪继续发挥效力。

130

这些宗教的、仪式的和立法的活动，以及下面要考察的文学和文化

---

① *Kotmai tra sam duang* [Three Seals Law], 5 vols. (Bangkok,1962－630, 1; 5.

的活动,是符合暹罗人对他们的统治者的传统期望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国王达信自己也参与这些活动,尽管程度不同。拉玛一世自己经常明确表示他正在做的事情是在恢复传统的方式。不过,对他的行动一定不能信以为真,因为他不仅仅是重建阿育陀耶的宗教生活、宫廷仪式或者立法。在某种意义上,两种方式可以表明他正在做一些全新的事情。第一,拉玛一世一直把深深扎根于暹罗和佛教传统的某些抽象的标准用于他所有的行动。他宗教法的目的是把僧侣们带回,这不是阿育陀耶后期的方式,而是拉玛一世和他的同伙认为的佛像时期的规范文本的方式。宫廷仪式"按照国王波隆摩阁时期的来实行"[①],但是它们的佛教成分和价值增加了,婆罗门教和拜物成分减少了。同样,古老的阿育陀耶法律得以重申,但是它们被按照传统的印度法律来系统地组织,并删除了国王认为"与正义不一致"的东西[②]。当然,从事这些的人是拥有积极的、创造性的智慧,以及一个不仅仅满足于传送过去,而是想塑造过去并且要塑造未来的心态或头脑(因为我们不知道在何种程度上国王的工作依赖于其他人)。

131

拉玛一世的第二种被认为全新的改革方式则是受到了他们擅长的作风的启发。与任何以前的皇家立法者不同,拉玛一世似乎不得不去解释和证明他的合理。他所有的法律、法令和宣言,以及他的文学和宗教汇编的前言都是非常坦率的。他的法律非常有特点地开始于描述一种将被制止的境况,并且要解释为什么这种境况是不道德的或者是危险的。他们经常把自己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并且详细解释应该适用的抽象原则。最重要的是,他们为了说服公众去理性地辩论。

当然,我们知道在缺少印刷术的暹罗,政府依靠大量的抄写员来手写所有的官方的通信,皇家法令所面对的公众的数量一定非常小,毫无疑问仅仅限于狭隘的官场。不过,在一个等级森严如 18 世纪暹罗的社

---

① *Lattbithamniam tangtang* [Customs and practices], 2 vols. (Bangkok, 1961 — 62), 1: 495 — 96.

② *kotmai tra sam duang*, 1: 5.

会里面，这些人是“重要的人物”，这些人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还在大城陷落之后重建了王国，并且反对达信，接受拉玛一世。这些人就像十年前左右的国王，就像与却克里一起分享战场口粮的人，就像他长期以来平等对待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他的亲戚，并且大多数人来自同他一样的背景。许多阿育陀耶的国王如巴萨通王或者披叻差，当他们登上王位之后，就变得疏远、爱发号施令和以皇家成员身份行动了。拉玛一世已经看到达信这么做了并且他一定认为这么做的成本非常高。总之，拉玛一世把同他的官员一起工作看作是许多同等重要的事情中的第一要务。他与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他奖赏人才和惩罚效率低下，但他总让人感觉是公平的。

以过去的阿育陀耶为范本，拉玛一世的政府主要依靠六个大的部门。六个中的四个部门有直接的疆土责任，他们的官员在里面行使所有的官方功能。就如历史上曾有过的那样，最重要的是内政部，负责首都北部和东部的省份；拉玛一世任命昭披耶·拉特纳披披特宋·宋提拉特〔Chaophraya Rattanaphiphit(Son Sonthirat)〕来领导它。他是一个古老的阿育陀耶贵族家庭的儿子，在达信统治时期他是却克里的秘书(与拉玛一世的父亲在阿育陀耶时期的头衔一样)。国防部管理着碧武里向南的省份，掌握在昭披耶·摩诃森阿（披立）〔Chaophraya Mahasena (Pli)〕手里。披立是前阿育陀耶两个国防部长的儿子和外甥，与波纳家族密切相关，而且在1770年代的战争期间服务于拉玛一世的弟弟。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部长是昭披耶·披克琅(宋)〔Chaophraya Phrakhlang(Son)〕，他是吞武里的一个留任者(也许是因为特定的专业?)，但是不久被贬职并且被昭披耶·披克琅(洪)〔Chaophraya Phrakhlang(Hon)〕替代。他的办公室控制了曼谷南部，暹罗湾顶端周围的省份。联合部负责首都及周边地区，并且处于昭披耶·尧玛拉特(通因)的控制之下，他在吞武里时期与却克里并肩战斗。他不久也被波纳家族财富的一个继承人波纳克所接替。波纳克从1785年到1787年为尧玛拉特，然后成为国防部部长。剩余的两个部由古老的婆罗门家族成员控制。土地部由昭披耶·蓬腊特披(拼·新哈

132

森尼)控制,他在 1805 年成为国防部部长。皇宫部负责管理朝廷,由昭披耶·塔玛(波老特·波亚拉特攀)控制,他在吞武里时期是却克里的手下并且是一个婆罗门法官的儿子。

如果把他们看作一组的话,这些部广泛代表了古老秩序中主要的家族。至少开始的时候,大多数敏感的位置——内政部、国防部和尧玛拉特——是在与君主有密切个人关系的人手里,而金融和外国事务部和皇宫部的位置则是在拥有特定专业的人手里。婆罗门和波纳家族被提供了较好的位置,而华人家族的利益则是由两个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部长来代表,尽管这不是太确定。几乎所有拉玛一世的早期部长都是通过婚姻与他建立联系,注意到这些现象是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多数是通过国王与他的妃子所生的孩子与他建立联系,而这些皇家孩子将进一步把暹罗精英社会联系在一起。

1785 年,拉玛一世的王国将在一次大规模的缅甸入侵中遇到他的第一次大的考验。缅甸的孟云王(1781 — 1819)派遣五支超过 10 万人的军队攻击暹罗。第一支攻击半岛地区,从丹老经陆路到春蓬和猜亚,然后向南。第二支从土瓦发动,穿过大山到达叻丕和碧武里,与春蓬的军队会合。主力部队由孟云王亲自率领,从马达班穿过三塔关向北碧进发,直接攻击曼谷。第四支军队向达府和甘烹碧进发,然后从北部逼近首都。第五支军队从其在清盛的基地出发向南邦进发,然后向东南彭世洛挺进。这是一次非常野心勃勃的行动,但对暹罗人来说却是危险的攻击。

除非绝对必要,曼谷王朝没有扩展其军队的分布。1784 年底在得知缅甸的准备之后,王朝动员了大约 7 万人的军队并且安排去四个关

133

键点。主力部队由副国王(拉玛一世的弟弟)前昭披耶·素拉西率领下去北碧阻止来自三塔关路线的侵犯。一支小点的部队由国王的外甥安拉柯维率领,驻扎在那空沙旺,阻止从北方对中央平原的入侵。另一支小的军队,由昭披耶·塔玛(波老特)和昭披耶·尧玛拉特(通因)率领驻扎在叻丕去保持通向北碧供给线畅通,以防止来自南部的攻击。国王率领 2 万军队留在首都作为后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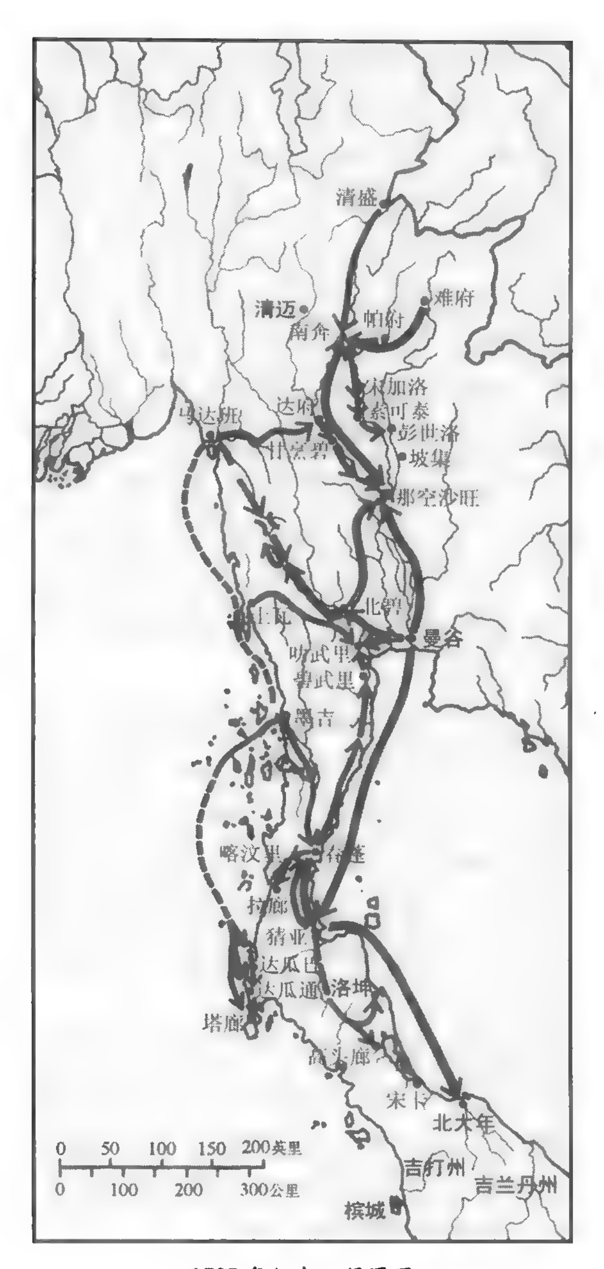
1785年初，冲突从北碧荒凉的腹地上游开始展开。副国王的军队成功地在那里遏制了缅军，而同时沿着桂河更远的补给线骚扰他们。由于缅甸军队此时饥饿、疲劳，变得士气低落，副国王攻击了他们并且造成他们的先头部队在混乱中逃离。孟云王，离开河流更远，在恐慌中撤离他的主力军队回到马达班。同时，塔玛和尧玛拉特由于疏忽使得缅甸的第二支军队从西南部进入并在叻丕安营扎寨。来自副国王的一支分队遭遇到他们，经过激烈的战斗击败了他们。作为对他们失职责任的惩罚，塔玛和尧玛拉特的头上被剃了条纹并且被贬职。

在北部，昭·卡维拉在南邦的城墙前花费了几个月去拦截缅甸的一支军队，而暹罗的北部的主要军队拦截那空沙旺北部的第四和第五支缅甸军队。一旦北碧地区的主要战役结束，拉玛一世就率领军队向北加入到防卫中。当所有的军队集结完毕，一场大战在永河和楠河的交汇口附近展开。缅甸军队被彻底消灭。暹罗的部分军队然后向北进发去解救南邦，把敌兵驱逐出兰纳，这时与来自帕府和兰王国的省级军队以及其他公国军队会合。

尽管在1785年2月和3月期间，所有的激烈战斗在持续，但是缅甸的南部军队在南部的半岛地区却是大显身手的时机，他们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夺取了从南部春蓬往北的半岛两岸大多数的城市，一直到在西海岸遭到塔廊的积极抵御而停止，而在东海岸继续向芭他仑进发。在这个关键时刻，副国王领导的暹罗西部军队来到该地区。由于害怕被切断，敌军开始向北撤退，与暹罗在猜亚短暂交锋之后，敌军逃离到西海岸，然后继续向北逃回缅甸。

135

许多南部的领地，尤其是洛坤，几乎没有对缅甸抵抗，他们认为曼谷必已陷落或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故而不能帮助他们击退强大的缅甸军队。这种状况对暹罗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缅甸控制了南方将使他们获得一个战略前哨基地以及大量的食物和劳动力供给。拉玛一世因此采取两个步骤来加强南部。第一，他命令副国王去实施曼谷对半岛中部马来各王国的宗主权。北大年起初进行反抗，于是副国王迅速进犯了这个王国并且强加了一个新的统治者给它。周围的王国吉



1785 年缅甸入侵暹罗

打、吉兰丹和丁加奴立刻采取了一致的态度并且向拉玛一世进贡传统的装饰性黄金和白银树。第二，对南部的行政性控制进行了重新调整。洛坤的宋卡行政区被取消。它的统治者是一个相对新来的华人后裔，被授予了昭披耶一般的高位并且可直接向曼谷汇报。他对曼谷的马来藩属国有直接的责任。同时，在副国王努力镇压马来各王国的时候，在前一年受到缅甸和暹罗欺负的吉打苏丹通过割让港口和西海岸的槟城岛给英国东印度公司(1785 年 8 月 27 日)，来试图赢得一位新的盟友。曼谷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直到 40 年后曼谷才开始能感受到这件事情的全面影响。

1785 年广泛的战争以及暹罗周密的甚至是辉煌的成功标志着缅甸对暹罗生存威胁终结的开始，尽管多年来几乎没有人确定结果。战争在持续，但是没有一场像 1785 年那一场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那么有威胁。缅甸在 1785 年底和 1786 年的 1 月曾经尝试另一场入侵，这一次仅仅使用经过三塔关的一条入侵路线。通过持不同政见的孟族人和有组织的间谍活动，曼谷清楚地知道缅甸军队的活动情况，国王迅速地派遣 3 万军队沿着桂诺伊河在丛林水源区与缅甸军队交锋。几天后，入侵者在混乱中撤退。

拉玛一世这时觉得有理由亲自发起对缅甸的侵犯，但是在他出发前，他收到 1787 年初的消息说缅甸正在攻击兰纳。国王因此把他的军队分成两支，派遣副国王向北去解救南邦，他自己则率领军队去攻打土瓦。与省级军队一起，曼谷军队很快在北部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现在他们开始认真地重新安置西部的兰纳和复活清迈作为一个抵抗缅甸的堡垒。同时，国王的军队经过两个困难的路线去攻打土瓦。经过延长的战斗之后，他们围攻了该城，但是几个月后当他们的补给缺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撤退。 136

四年之后，由于受到居住在缅甸控制的半岛地区并且曾经邀请拉玛一世帮助他们抗击缅甸的持不同政见的孟族人的鼓舞，一支暹罗军队占领土瓦及周边地区几个月，到了 1793 年初，它的实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来迎接缅甸的攻击。暹罗依靠的孟族人的支持被证明是空想，

最后面对着具备优势的缅甸军队,他们不得不撤退。拉玛一世充其量只是获得了一些孟族难民的涌入来补充他的政府仍然枯竭的劳动力。

拉玛一世统治早期与缅甸的战争至少从内部加强了年轻王国的实力。到了1790年代中期,暹罗在强大的军事挑战面前得以生存。它能够征召劳动力,并且能够把他们安置和保持在战场上。行政和军事管理链是明确的,无效的和不称职的人员被迅速淘汰。防卫负担似乎是共同承担,关于战争的战场委员会积极参与热烈的讨论,这包括社会的各种人员,从高层的王子到相当于少校和上校的军官。王国内的许多人也许开始逐渐充满信心:政府有能力保卫他们。这不仅仅是对那些藩属国的统治者是真实的。我们特别指出南邦的昭卡维拉(从1796年在清迈重新执政),他发现自己分别在1797年和1802年两次被强大的缅甸军队包围。他对曼谷政权有足够的信心,每一次都坚持了几个月直到暹罗军队到来援助他,两次都是由副国王率领。在这两次战役中,尽管为时已晚,但是仍有大量的不仅是来自小的北部公国还有来自万象的军队加入到暹罗军队中。很明显,到了世纪转换的时候,暹罗不仅乐意,而且能够在领导暹罗/老族世界中发挥主导作用,为他们的帝国成就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即使这主要是关于他们负面地关注于防卫缅甸。

实际上,拉玛一世的王朝在一个普遍设想的世界里感到很自在。它拥有一个相当多样性的内生的社会基础。除了根源在海外的强大家族,在朝廷还有许多讲其他语言、穿着不同、信仰除了主流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的人。没有一个地方比早期曼谷时期的壁画能够更生动地表现这种多样性了。这些壁画无一例外都以拥挤的人群为特征,尽管这些现场画也许是表达佛陀时代的印度,但是很明显是曼谷的城市居民。肤色涵盖了广泛的颜色,发型和打扮代表了不同的种族集团。现场画中的一些人是泰族上层人士的行为模式,而另外一些人则暴露出下层阶级的根源或者是不同的文化模式。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的社会,而是一个拥有许多多样性和活力的社会。

137

同样的世界主义在曼谷第一次统治的文学里面得到反映。它的主

要纪念碑通常是采纳巨大的《拉玛坚》(*Ramakian*)，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的暹罗完全版本，1797年拉玛一世和他的朝臣们开始转成暹罗文。(当代印刷的文本超过3 000页)这绝不是盲目的翻译一个印度文本，而是重新塑造一个印度文明的经典核心，以这种方式它被融合成当地的传统。毕竟，《罗摩衍那》的核心形象是一位居住在一个被称为大城的拉玛(与拉玛一世并非完全格格不入)，而且他在经过危险战争的漫长黑暗时期之后，通过美德和英勇登上了王位。不过，不仅仅是语言，《拉玛坚》的角色和背景很明显都是暹罗人。

一种有些不同的过程在曼谷第一阶段统治的一些其他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这是一个以其世界主义文学品味出名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大量的经典从其他的亚洲语言翻译过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地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在这期间翻译的作品中，长期来看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三国演义》，这个发生在2到3世纪的历史小说充满了战争和王朝政治。小说在暹罗逐渐地变得非常流行并且成为统治者、策士和士兵、公众行为的一个样板。这一时期其他的翻译还包括勃固的孟族国王的纪年，来自爪哇的《达朗》和《伊瑙》，根据印度《摩诃婆罗多》的部分内容改编的 *unarut*，来自波斯的系列故事 *Duodecagon*，以及从巴利文翻译过来的斯里兰卡的佛教纪年《大史》。不仅这些大量的新文学是散文而不是更常见的诗歌，而且曼谷第一阶段统治时期的相当多的诗歌作品很少用华丽的语言而是使用比阿育陀耶文学更日常的语言。甚至韵律也更接近普通老百姓的韵律。于是，这就意味着一个逐渐世界主义的文学和文化同时也正变得更乡土、更受欢迎。 138

到了世纪之交，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拉玛一世的暹罗正在逐渐安定下来成为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帝国，至少那些居住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人这么认为。经济上，与中国有利可图的贸易正在发展中，主要包括用泰国剩余的大米产品来交换中国的奢侈品和瓷器(以及不定数额的铜和银)。随着这类贸易的发展，曼谷繁荣起来了。贸易的受益者中相当重要的是曼谷王朝。一个故事说明了这一点。在1796年，副国王向拉玛一世抱怨他每年收到的8万泰铢来运作他的王宫是不够的。国

王回答他税收有必要来用于公共目的,如果王子需要更多的话,他应该投资于中国的贸易并且利用获利来改善他的王宫!当然很多贵族家庭几代人都这么做[①]。

对外贸易发展所引起经济变化的长期意义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还无法显现。目前,拉玛一世更关注避免曾经一再削弱阿育陀耶的劳动力问题的反复恶化。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阿育陀耶王国周期性地遭受到劳动力脱离政府的控制而被个人和集团控制的情况。拉玛一世采取了几个步骤来阻止这种运动。第一,他命令所有的自由民必须把自己主人的名字和居住的镇名文在身上,这样就几乎不可能逃避履行皇家服务了。这种形式就逐渐地演化成在每一代统治的初期实行大众登记制度和"标记民众"。第二,从 1785 年开始,拉玛一世要求所有的自由民,不管是"国王的人"还是"私人仆从"都必须执行徭役劳动。到了他统治的后期,服务的时间也从每年的四个月缩减到三个月。第三,通常国王施行双重政策,一方面使他们逃避责任逐渐变得困难,同时扩展对他们的宽松特权(比如免除某些税收)。最后,为了防止王子和官员们积聚大量的劳工,对劳动力情况进行了仔细的监控。总之,在曼谷统治时期,王子们尤其缺乏能够挑战国王的劳动力。不过,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体系存在漏洞,因此贵族的势力没有能够完全被消除。

139 到了 18 世纪晚期,甚至暹罗的藩属国似乎都乐意附属于以曼谷为中心的世界,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很多方面对他们有好处。尽管除了柬埔寨和老挝南部,暹罗最重要的是防卫缅甸的威胁。清迈的昭·卡维拉似乎把他与拉玛一世和副国王(可以追溯到 1775 年)关系使用到极致(必须指出的是副国王素拉西的大老婆是卡维拉的妹妹)。曼谷依靠卡维拉去防卫暹罗的北部边界,主要是为暹罗防卫南部提供必要的

---

① Chaophraya Thiphakorawong (Kham Bunnag) and Prince Damrong Rajanubhab, *Phraratchaphongsawadan Krung Rattanakosin ratchakan thi 1... ratchakan thi 2* [Royal chronicl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Reigns of the Rattannakosin era] (Bangkok, 1962), p. 222.

军队，并且每年向曼谷朝贡，通常以金树和银树的形式。作为回报，卡维拉被确认并继续是清迈的统治者，并且能够依靠暹罗的军队来进行自我的防卫。而且，当拉玛一世决定他能够信任卡维拉的时候，他实际上使卡维拉成了暹罗在北部事实上的总督（例如兰纳），并且给予他监督滕县、达府和兰的权力。

卡维拉决心复兴北部，而且他在整个1780年代和1790年代首先开始重新移民并且把他们重新安置到清迈和南奔地区（上平河河谷），然后积极地去入侵那些仍然由缅甸从其在清盛的基地来进行控制的北部和西部掸族地区。这些入侵获得了重新安置所需要的额外的劳动力，并且引发了报复——暹罗帮助他进行了反击。他能够在1796年从南邦好好地回到清迈。到了1802年，他入侵了景栋，然后他在更远的南方重新安置了许多家庭。最终在1804－1805年，他不仅把缅甸人从清盛驱逐出去，还征服了孟雍、蒙琅蒲克哈和景洪以及许多在上部湄公河高地的小村落联合体。随着他的弟弟在南奔和南邦统治并将接替他的清迈的职位，卡维拉在1816年死的时候已经接近任何想复兴古老兰纳王国的人的状态了。

柬埔寨王国则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就如我们以前所指出的，柬埔寨在1781年陷入反叛弑君的混乱状态中。达信派去平反骚乱的军队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前被召回，因为拉玛一世要登上暹罗王位。1783年，9岁的王子安英被指定为临时的国王，但是不得不逃离柬埔寨到曼谷寻求庇护，在那里拉玛一世成为他的“继父”[①]。

由于国内处于长期的内战，加上越南的西山反叛和河仙的一个半独立的华人领地，暹罗的主要关注是结束脆弱的东部边界的动荡。为了这么做，他们采取了一个双重政策。一方面，他们小心翼翼地支持阮福映王子尝试结束越南内战和重新统一国家的努力，他是南部和中部越南领地的继承人，曾经于1784－1787年在曼谷寻求短期庇护。另

140

① David Porter Chandler,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 Politics in a Tributary Kingdom, 1794－1848,”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p. 76.

一方面，他们也支持来自马德望的一个强大的柬埔寨官员昭披耶·阿拍蒲柏特(奔)，把他当作暹罗在柬埔寨利益的某种代理(安英不在的时候)。最后，当安英于1794年成年的时候，并且柬埔寨至少暂时处于和平的时候(多亏阮福映和奔的成功)，拉玛一世以隆重仪式赐予安英为柬埔寨国王并且把他送回在乌栋的皇家首都。安英在朝廷被一群亲泰国的官员小心翼翼地辅佐，并且被期望能够每年向拉玛一世朝贡，隔年个人亲自访问曼谷，并且随时向暹罗国王提供战争或公共工程所需要的劳动力。这时候，奔与安英朝廷的关系不好，他控制着马德望和暹粒等大的省份并且直接对曼谷负责，这种行为标志着柬埔寨西部并入暹罗的开始。

由于1797年安英的过早去世，柬埔寨朝廷亲暹罗的官员们通过安英的还是婴儿的儿子安赞来进行统治，一直到1806年后者16岁的时候被推上王位。很明显，这种过早的加冕是受到一个重新统一(1802年)的新越南的压力结果。年轻的国王由于缺乏他父亲在曼谷流亡十年期间与暹罗王朝建立的密切关系，而且他有时候憎恶拉玛一世的咄咄逼人的家长作风，于是他想通过挑拨离间暹罗和越南的关系坐收渔利，从而来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他开始也向顺化(Hue)朝贡，尽管与每年向曼谷朝贡相比只是四年一次。这种数字上的关系也许是一种非常好的衡量暹罗和越南在柬埔寨朝廷相对影响力的指标。

目前完全能够简单描述19世纪初期拉玛一世帝国剩余部分的情况。与1770年代晚期却克里和素拉西征战的时候相比，老挝情况没有什么变化。暹罗对待占巴塞和万象就如他们对待越南一样。占巴塞似乎已经控制了下湄公河两岸向西到乌隆地区和向东到阿速坡地区。暹罗军队前去干预，目的是为了调查指控的政府弊政和制止叛乱。当国王赛因亚库曼在1791年去世后，暹罗立维萨因亚拉特为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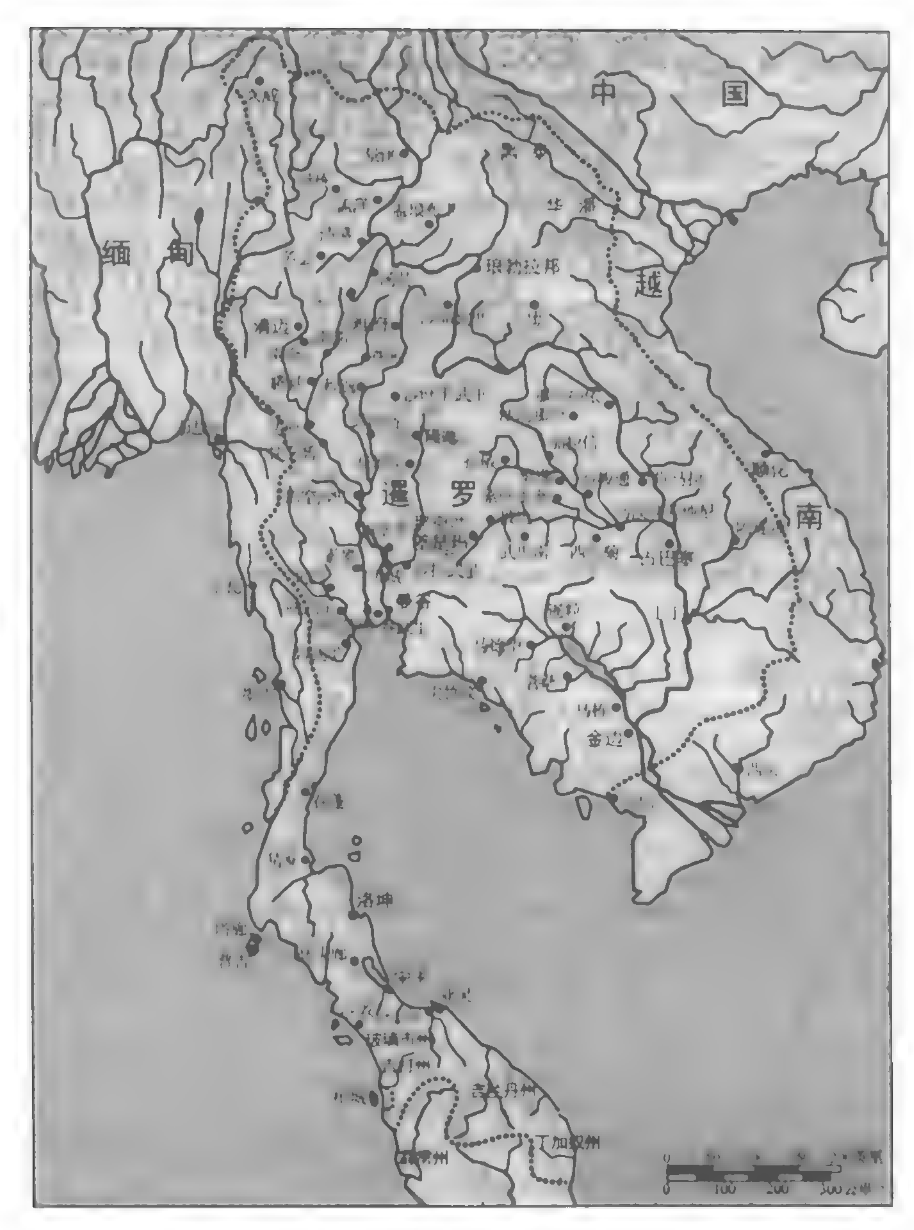
141 万象朝廷曾经在1778年搬到曼谷，而且在接下来的十年战争期间，老挝皇家家族的主要成员服务于暹罗王朝。王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回到万象当国王。南塔森是第一个，他在1782年携带着勃拉邦佛像(拉玛一世认为这对曼谷来说是坏运气)回去作为附属国国王进行统

治。不久，他与琅勃拉邦再次发生了冲突，并且在 1792 年攻击和夺取了该城。据说在他的努力下，他获得了对华藩（黑傣族）联合体的宗主权。与他之前和之后的附属国国王一样野心勃勃，他也许梦想着挑战他的君主。在 1794 年，他被指控与那空帕侬（这个时候他直接向曼谷朝贡）一起阴谋对抗暹罗并且被召唤到曼谷，他最终死在那里。南塔森的哥哥因塔雍继承他成为万象的国王，而他的弟弟阿努雍（或阿努）则成为副国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阿努经常率领万象的老挝军队帮助暹罗抗击缅甸，因此获得了有能力的将军的声誉。不过，到了 1804 年因塔雍死的时候，万象已经经常向越南朝贡。当他被推选继承他的哥哥成为万象统治者的时候，他立即告知了越南。

最后，在同一时期，琅勃拉邦也慢慢地处于暹罗的控制之下了。国王冯沙每年向曼谷朝贡，而且当 1791 年他去世的时候，王国的贵族们派遣了一个使团去暹罗寻求其认可国王的儿子阿努茹塔成为他的继承人。同时，琅勃拉邦也每十年向中国朝贡一次，并且在 1792 年被万象攻陷后，琅勃拉邦皇家家族成功地利用中国的调停来获得让阿努茹塔恢复王位，他统治到 1815 年。

暹罗在第一次统治期间对老挝的政策可以说是分而治之。万象、琅勃拉邦、占巴塞与川圹、那空帕侬一起，被允许拥有相当多的内部自治权，但是基本上谁都不允许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改进自己的地位，更不用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能够获得足够的力量来挑战曼谷。对马来半岛使用了同样的政策。在他统治早期，达信允许洛坤的统治者昭披耶·那空（努）继续其附属国统治者的地位。他在该地区有大量的追随者。不过，拉玛一世在 1785 年与缅甸战争之后，把他的儿子和继任者昭披耶·那空（帕特）贬为一流省的统治者。同时，他把宋卡和主要的马来附属国从洛坤的统治中分离出来，把他们置于宋卡总督的华人统治之下。在中部半岛的马来王国中，北大年一直以来是最强烈抵制暹罗的，200 多年来，间歇地与曼谷的国王交战。副国王在 1785 年立的新统治者努力尝试去组织新的抵抗，于是，一支新的暹罗征战队在 1791 年被派往北大年去立另一个统治者。剩余的马来王国距离较

142



1809 年的拉玛帝国

远并且历史上对暹罗也不是非常重要，在曼谷第一次统治期间他们也不突出。拉玛一世在1800年或者1801年承认了吉兰丹和丁加奴的分支地位，但是除了要求和接受他们定期的朝贡之外，暹罗很少参与他们的内部事务。

如果整体观察拉玛一世帝国的话，它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曾经有大量的权力中心存在。从外围往里看，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一圈半独立的统治者，他们仅仅定期向曼谷朝贡并且也经常向其他国家朝贡。这个集团包括吉打、丁加奴、吉兰丹、柬埔寨和琅勃拉邦。第二层的王国，也许更恰当地说是公国，相对地整合到暹罗体系中。除了朝贡，他们还经常被要求向暹罗提供战争或者公共工程所需要的劳动力，以及进贡相对多的东西，有时候他们与暹罗皇族联姻，而且他们的内部事务有时候受到干涉。这一组的王国主要包括清迈、兰、万象、占巴塞和北大年。再下一层的王国由暹罗周边的大的地区中心组成，它们由昭披耶统治并且被认为是主要的半独立的省份。它们包括宋卡、洛坤、马德望一暹粒和呵叻府。

第四层次主要是一个呵叻高原现象。在18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暹罗的势力开始扩展到该地区，主要是通过接受小的统治者和他们小的村落联合体的顺从，承诺给予它们保护来换取他们名义上的朝贡和必要时候的劳动力。在曼谷第一次统治末期的时候这种类型的村落联合体大约有20个，并且散布在从北部的农汉和那空帕侬到南部的乌隆和武里南。它们包括一些统治中心如孔敬、加拉信、黎逸、索旺那普和四色菊。在暹罗的体系内，它们的统治者被称为披耶而且等级为总督，但是它们的统治通常是世袭的。最后，王国的内部核心严格来说是由省组成的，由首都任命的官员来统治（尽管这些位置可能由一个强大的当地家族一代代传下去），并且中央政府通过国家的主要部门来管理它们。 144

因此，我们拥有了一个理论上比实践上更简洁的等级程度的控制。在最后的分析中，由于社会主要是在个人和小集团（例如家庭）的人际关系上组织起来的，体系内部在相关人员的相对权力上总是有很多的

紧张。体系运作得相当不错,因为在一个财富仍然主要按照对劳动力的控制来衡量的环境里面,国家能够在其组成部分中控制劳动力的分配并且为中央权威保留享有这些资源的优势份额。

在曼谷第一次统治时期,王朝本身并没有摆脱政治动乱、警报和逃逸。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集中在国王与他的兄弟以及副国王的关系上。两者的关系经常是紧张的并且是由双方的嫉妒所引发。1796 年,当时由于担心将发生副国王和他的军队的起义,于是国王包围了副国王的住所——前宫,但是王子的姐姐努力调解并促成了两个人的和解。1803 年副国王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和前宫的官员阴谋推翻拉玛一世,但是他们被发现了,然后被处死。国王因此能够继续生存并且在他 1809 年 9 月 7 日死后,顺利地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大儿子王子艾提萨拉孙通。

拉玛一世的成就有很多,而且很难对它们进行评价,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真正与他的亲信们分享了自己的权力。他们一起构建了一个新的帝国,这个帝国比以前的阿育陀耶更加强大,更加灵活,也更加复杂。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所经历的危机使得他们也许能更加意识到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的必要性,并且他们在巨大困难面前所取得的成就给他们增加了自信,这种自信给他们的继任者带来很大的好处。

插曲:拉玛二世(1809 - 1824)

人们很容易忽视国王拉玛二世的统治,仅仅把它当作暹罗历史上的一个安静的插曲。确实是这样,因为该时期没有大的危机或者战争,并且这一时期被人们记住的主要是国王的文学作品和他的朝臣。不过,在曼谷第二次统治期间重要的发展产生了,并且将会对这个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事件产生强烈的影响,因此这些应该稍许有所注意。

145

第一,艾提萨拉孙通王子和平地登上王位成为披·蒲塔叻拉·纳帕莱(国王拉玛二世)这本身是个分水岭,在某种程度上它暗示了与个人统治相对照的一个君主制王朝的开始。必然地,它还暗示了存在着一

个在曼谷第一次统治时期确立的政府机构和商业模式制度化的持续过程。用政治术语来说，在曼谷第一次统治期间已经建立或者确认的贵族家族逐渐地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但是这看起来是牺牲了皇家权力。

拉玛二世出生在1768年，因此他登上王位的时候是41岁。1785年他被授予王侯等级并获得自已的房子，他居住在吞武里河岸边达信国王的以前的王宫里。他积极地参与他父亲的政府。因此，拉玛二世于1809年时在公共事务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但是为了有效的统治，他需要一个个人的支持基础，尤其是那些要求无条件忠诚于君主职位的征召来源。国王们习惯地并且自然地转向他们母亲和王后的家族。拉玛二世的母亲阿玛林王后与波斯家族的波纳分支有密切的关系。她的姐姐是拉玛一世时期国防部部长昭披耶·摩诃森阿（波纳克）和首都部长昭披耶·尧玛拉特（波玛）的母亲。拉玛二世1790年娶的王后给他提供了一系列有利的联系。她是拉玛一世的姐姐与“她的富有的华人丈夫”[1]的女儿，并且和婆罗门家族的辛哈森伊分支有密切的关系，包括除了其他之外，这个分支还有第一次统治时期的国防部部长——昭披耶·摩诃森阿（平）。

几乎是在拉玛二世刚登上王位之后，这些联系的意义就变得非常明显。拉玛二世对其父亲时期的几乎所有部长都进行了改组。他任命了昭披耶·尧玛拉特（波玛）为国防部长，昭披耶·摩诃森阿（平）为副国王前宫的“首相”。他的内政部长（却克里）是昭披耶·拉坦提柏特（坤·拉坦阿坤），一个华人后裔（来自和王后阿玛林同样的地区），他曾经在拉玛一世统治后期担任财政部部长。这里的意义不仅是拉玛二世通过派发美差事给旧的主要家族来开始他的统治，而且他选择了他母系和姻亲的亲戚给予特别的升迁。因此，他确认了甚至加速了拉玛一世已经接受的贵族权力的发展。

146

拉玛二世也许对贵族权力的发展感到不舒服。在他统治的早期，

---

① Prince Chula Chakrabongse, *Lords of life: The Paternal Monarchy of Bangkok, 1782－1932* (New York, 1960), p. 118.

他引进了一种新的任命形式：他任命王子们去监管各部和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事务。这些任命中的八个是非常出名的，并且也许还有更多的任命。拉玛二世任命了社纳努拉克王子——王后阿玛林所生的、他唯一的同母兄弟为副国王，来监管内政部和国防部。在1819年副国王死后，这些责任在国王自己的王后的两个兄弟之间划分。另一个同父异母兄弟——其母亲是昭披耶·那空(帕特)的女儿，共享着监管国防部的责任(它的疆域包括洛坤)。最后，拉玛二世与一个妃子所生的大儿子切特萨达波丁王子负责监管金融和外国事务部。

丹龙王子对这些任命提出两条理由。[①]第一，1810年对缅甸的一场征战是管理不善的，因此国王也许想更密切地监管部长们的活动。第二，目前皇家家族正在迅速地发展。除了拉玛一世那一代的19个王子和公主，拉玛一世自己还有42个孩子，他的副国王有43个，而且拉玛二世有73个。有许多很有能力的王子，而且国王也许不想浪费他们的才能。第三个原因由第一个原因得出。拉玛二世也许不完全信任他的官员们并且想安置他的近亲，他们能够监督一些事情。在所有的事件中，王子们似乎已经成为各部的咨询师，而且至少他们中的一个人获得了对其将来有一些帮助并且有价值的经历和联结。

拉玛二世的暹罗仍然认为缅甸是主要的敌人，但是除了1810年在半岛上的小战争外，西部边界在曼谷王朝第二次统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安静的。不过拉玛二世不得不去逐步关注其东部边界。

柬埔寨很快就成为暹罗与越南利益冲突的战场，这是由于此时两个大国都在稳定地复兴。在拉玛一世的统治的最后年份里，国王安赞已经与曼谷不和，而且几乎在刚登上王位之后，拉玛二世就任命了奔的外甥去统治马德望—暹粒，因此永久化了柬埔寨西部同赞的统治的分离，很明显，安赞大怒。安赞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情绪：拒绝亲自出席1810年拉玛一世的葬礼，而是派自己的同母弟弟斯恩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艾目和栋出席。这些兄弟们带着曼谷的命令回到乌栋：为了一

① Thiphakorawong and Damrong, *Phraratchaphongsawadan*, pp. 432－36.

场即将到来的对缅甸的征战，高棉军队要被征召。赞拒绝并且命令杀死了他的两个试图听从暹罗命令的官员。他向西贡的越南官方写信要求保护，同时告诉暹罗他已经杀死了两个拒绝征召部队的官员。越南派遣了一支舰队在乌栋之外停泊，而外交信函则在曼谷和越南之间传递。1812 年初事情到了危急关头，当时越南的战舰撤退，斯恩从首都逃离到菩萨，不久在暹罗军队的帮助下向乌栋进发。赞逃到西贡，而艾目和栋则在乌栋与斯恩会合在一起。斯恩在那里停留了几乎一年，但是没能从乡村获得足够的支持。

同时，暹罗感到自己的军事地位太弱小并且担心与越南的对抗。在 1813 年中期，暹罗军最终撤退，在夷平乌栋和金边的堡垒之后，并带走了持不同政见的王子和几千将要重新定居在马德望和暹罗的高棉人。安赞于是同大量的越南军队和少量的暹罗官员一起回到柬埔寨，然后把他的首都迁移到金边，越南能够更容易地到达这里并且帮助他。这时情况发生了逆转，从 1813 年之后的几十年中越南成为在柬埔寨的主要影响力量，并且拥有 10 万人的驻军。暹罗只能通过重新控制柬埔寨一些省份的大量地区来抚慰自己：菩萨、上丁和磅赛。如果柬埔寨国王想打破暹罗东部边界岌岌可危的权力平衡，拉玛二世可以在持不同政见的王子中寻找一个合法地替代安赞的位置。

在曼谷王朝第二次统治期间，同样不祥的发展在柬埔寨北部的占巴塞领地发生了。当昭·维萨因亚拉特(1791 – 1811)死后，暹罗花费了两年时间才找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这个王子昭·曼诺，既不强大也无成果。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暹罗几次干涉占巴塞的事务，第一次是解决曼诺和他的副国王之间的争议，然后，在 1819 年镇压内部的严重骚乱。那一年，在东部高地的山里人间爆发了一场造反，由一个名字为萨的并且声称拥有魔力的叛离僧侣来领导。在大众的支持下，他能够攻陷占巴塞，而曼诺和他的朝臣逃到乌隆。暹罗的军队开进来并且恢复了秩序，但是面对着如何取代曼诺的问题，因为他死在了曼谷。

暹罗迫切需要恢复在占巴塞的强大的权威。万象国王昭·阿努的

儿子昭·尧成功地捕获了飘忽不定的萨,要求暹罗任命自己为占巴塞的统治者。年老的王子披塔克萨孟提,作为政府的总咨询师,反对这么做。他认为对尧的任命将把万象的影响扩展到南部而且将使阿努成为一个危险的附属国。相反,王子切特萨达波丁则认为必须加强老挝南部,以免越南侵犯到该地区,因为他们已经在柬埔寨这么做了,所以他支持任命尧。看起来要两害相较取其轻了,一个强大的万象和占巴塞要好过一个弱小的占巴塞和一个更严重的越南威胁。

这些担心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在曼谷第二次统治期间西方对暹罗的压力也开始上升,这是从一个多世纪前纳莱的统治开始之后的第一次。西方也许从来没有完全在暹罗的舞台上缺席,但是它的存在几乎难以察觉。1760 年荷兰在阿育陀耶保留有一个工厂,并且不时地从他们在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的基地派遣军舰——包括在 1770 年送给达信一船军火。英国东印度公司(EIC)长期以来依靠私人、"国家"贸易商和亚洲来与暹罗进行最低限度的贸易。而且已经有少量的葡萄牙和法国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来满足暹罗很小的基督教社区的需要。当英国在 1785 年拥有了槟榔屿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尽管起初只是隐隐约约的。这个岛屿成为他们在 1800 年获得对面领土(威斯利省)的一个立足点。不过,当时欧洲列强正在专注于拿破仑战争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基本上忽视了暹罗。

接着发生的两件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第一,随着拿破仑战争之后国际贸易的复兴和英国与荷兰对东南亚海洋贸易新争夺的发展,英国东印度公司于 1819 年把新加坡建成了一个自由港。新加坡贸易的未来能够维持,部分要依靠与马来半岛和暹罗发展贸易。在欧洲人的眼里,暹罗的贸易是以一种垄断的、反商业的、几乎是中世纪的形式来进行的。而且,如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在 1819 年指出的:

> 当考虑到暹罗在扩展其在整个马来半岛(除了柔佛之外)的影响,我们的槟城定居点仅仅是最近才从属于它的一个属地的一个

> 小岛，而且这种影响盛行于那些我们必须与其不受限制的交流的国家，因此如果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个王朝，那么优势是显而易见的。[1]

第二，在 1821 年，暹罗与吉打关系的破裂。三年前，当缅甸派遣了一支侵犯军队沿着半岛西海岸进犯的时候，吉打的苏丹艾哈迈德与他们建立了某种关系（没有明确）。当暹罗在几个月后通过洛坤的总督发起反击的时候，他们要从吉打征用补给和载人船只，但是苏丹艾哈迈德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命令。1820 年，暹罗的官员在普吉截获了一封缅甸的信，这封信指示艾哈迈德苏丹起来反对暹罗，从而作为缅甸希望不久就要发起的一场攻击暹罗战争的一部分。最后，在这一年的后期，苏丹的一个竞争对手亲自到曼谷指责苏丹管理不善并且对暹罗不忠。因此暹罗在 1821 年进犯了吉打。苏丹逃到槟城并且尝试去援引他与东印度公司的条约，从而得到英国的帮助来恢复其王位。

随着槟城贸易的中断，吉打处于混乱中，新加坡的官员开始要求建立与暹罗的商业和外交关系，于是 1821 年底，英国在印度的总督派遣约翰·克劳福德去曼谷。曼谷王朝的态度是强硬的，王子和部长们认为他们在吉打的行为是合理的，考虑到他们在现存的贸易体系中的利益，他们不想让商业对英国贸易商变得相对容易，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克劳福德在离开曼谷以前仅仅使得暹罗人认可英国拥有槟城——这个 40 年前的事实之后的！没有解决的问题留给了一个新的国王在几年后来处理。

整体上看，曼谷王朝的第二代统治者给人的印象是国家的领导是犹豫的和不确定的。这是一个既没有强有力的皇家领导也没有干劲十足的部长们推动的时期。没有人真正负责，王子和贵族们的合作关系也没有有效和果断地运作，这些是事实吗？也许有意义的是，拉玛二世

---

[1]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Substance of a Memoir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astern Islands (n. p. , 1819), p. 5.

被记住的主要是他是最伟大的泰国诗人之一，而他的部长们没有一个被认为是王国最伟大的贵族。因此，这一次的统治被公平地认为是第一和第三代统治之间的一次插曲，危机之间的一个喘息机会。

拉玛三世：保守或反动？

150

1824 年 7 月 6 日，拉玛二世召集皇室成员，告诉他们是到了他儿子孟固王子成为一名佛教僧侣的时候了。他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不祥的时刻，由于皇家大白象死了，在没有延误任何时间的情况下，应该安排剃度仪式。"[①]没有任何通常伴随这种剃度的仪式，孟固王子在第二天被剃度。正好一周之后，拉玛二世得了重病，病情非常严重，以至于一直到 7 月 22 日他 56 岁死亡的时候都无法说话。几小时后由大方丈率领的皇家成员、国家的高级官员和佛教僧侣成员组成的大集会在皇宫内召开，很快就决定请求拉玛二世的大儿子切特萨达波丁登上王位。王子以披·南克老的名号统治，但是他通常被称呼为拉玛三世。

一直存在着对曼谷王朝第三代统治开始方式的一些争议，争议集中在切特萨达波丁和孟固对王位的继承权上。切特萨达波丁年龄大些，1788 年他由一个妃子所生，这个妃子是暖武里总督的女儿。他长期以来在政府中发挥了主导的和负责的作用。他主持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 1809 年一场推翻他父亲的阴谋，并且他在父亲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监督金融和外国事务部的事务，包括密切关注省级政府、皇家和国库以及与移民社区和外国的关系。而孟固出生于 1804 年，他的母亲不是妃子而是本身拥有皇家血统的王后——她是拉玛一世姐姐的女儿。当代的西方人认为拉玛三世是拉玛二世的私生子，甚至是一个篡位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几百年来，暹罗民众给予王后所生的（尤其是具有皇家血统的王后）王子比那些妃子所生的王子更高的地位。但是按照

---

① Chaophraya Thiphakorawaong, *Phraratchaphongsawadan Krung Rattanakosinratchakan thi 2* [Royal chronicle of the Second Reign of the Rattanakosin era] (Bangkok, 1961), pp. 201—202.



曼谷城市图景。华人的小商铺（衣服、食物、餐馆、理发），傣族的行人，这一情景取自19世纪吞武里通玛査特寺庙的壁画，照片由 Kriengkrai Waiyakij 提供，感谢该寺庙的住持和僧侣们。

法律和惯例，一个国王的所有儿子都有王位继承权，并且由一个国王死后的继承委员会选择他的继承人。

当读到上面对拉玛二世去世的报道的时候，人们把报道中提及的白象死亡解释为象征性的是合理的：大象死在 6 月 19 日，差不多是在孟固被剃度之前三周。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拉玛二世知道他不久就要去世，并且相信继承委员会将选择切特萨达波丁，因此决定保护孟固免受政治纠葛——而且也使得他的王国在一个妃子的儿子登上王位后免于自相残杀的冲突。如果这样的冲突发生了，切特萨达波丁在强大的波纳家族支持下将获得胜利；它的主要成员迪·波纳(Dit Bunnag)已经在 1822 年成为昭披耶·披克琅，因此在前两年与切特萨达波丁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因此，尽管在技术上授予是不成熟的，并且没有通常的仪式准备，孟固被象征性地打发到一个佛教寺庙，在那里他的藏红花长袍可能使他免受政治纠葛。

152

拉玛三世的首要任务是组建他的政府。对于副国王的位置，奇怪的是他既没有选择一个弟弟也没有选择一个儿子，而是他的叔叔萨克迪蓬拉塞披亲王(1785－1832)，拉玛一世与昭披耶·那空(帕特)的一个女儿所生的儿子。与他的父亲一样，他也任命年纪大的亲王们去监管国家一些部门的事务。在这些任命中，最重要的是苏林王子(1790－1830)掌管金融和外国事务部(迪·波纳是部长)，他是拉玛一世的儿子，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来自波纳家族；拉克荣纳莱特王子(1791－1848)掌管国防部和皇宫部，他是苏林王子的亲兄弟；艾提萨拉努拉克王子(1773－1830)掌管内政部，他是拉玛一世一个姐姐的儿子。不过，后者“在拉玛三世一登上王位后就借口年纪大，从所有的公共事务中退出。据说他对王位的继承不满意”①。

拉玛三世几乎完全保留了他父亲时候的部长，并且实际上只是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任命了其中一位。国防部长最近刚刚去世，因此他

① "Diary of Capt. Henry Burney, Jan. 5, 1826," in The Burney Papers, 4 vols. (Bangkok, 1910－14; reprint, Farnborough, Hants., 1971), 1: 87－88.

把尧玛拉特（诺艾·西素立亚帕哈）提拔到国防部并且任命了一个名字为斯姆的人为尧玛拉特，斯姆是曼谷第一次统治时期昭披耶·披克琅的儿子。内政部、财政部、土地部和皇宫部的各位部长则继续任职。

曼谷王朝第三代统治早期最急迫的事情是关于外国和军事事务。1824年5月，由于缅甸攻击印度的边界，英国已经与缅甸发生了战争。在一年内，暹罗被下面的传闻所震惊：英国正在准备发动一场夺取吉打的征战，之后他们将继续攻击暹罗。暹罗有足够的担心以至于去加强湄南河河口的防卫，围绕着湄南河拉起了一个巨大的铁链，该地区的每一个铁匠都必须贡献若干环节。而且，马来半岛上的冲突正在加速，英国也牵涉进来了。1821年暹罗对吉打的入侵成功地把他们的宗主权扩展到临近的霹雳王国(Perak)。到了1824年，霹雳王国请求暹罗帮助攻击附近的雪兰莪(Selangor)，而且不久洛坤的总督在准备一场征战，从南部的吉打进入到这两个国家内。

1825年晚期，在印度的英国政府任命上尉亨利·柏尼(Henry Burney)为它的特使前去暹罗处理这些和其他相关的事务。当时，由于与缅甸的战争进展得不顺利，英国希望至少军队能够获得供给，以及如果暹罗积极参与的军队不站在英国这一边的话，至少它能够保持中立。当夺取了缅甸东南部的领土后，英国已经变成了暹罗的邻居，他们牵挂这个新的边界上是否将产生冲突或者误解。关于马来半岛，英国至少获得了暹罗的保证：停止对霹雳王国和雪兰莪施加压力，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恢复吉打苏丹艾哈迈德(Ahmad)的王位。最后，英国希望结束暹罗内部严重限制西方人贸易的一系列广泛的限制性和歧视性做法。为了达到这些野心勃勃的目标，柏尼在1825年12月到达曼谷。

153

首先，暹罗朝廷内部在如何对柏尼的建议和要求作出合适的回应上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些对现存的贸易安排有浓厚兴趣的人如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长和他的亲戚们，不希望放弃这些。国防部部长昭披耶·那空（诺艾）和副国王对扩展暹罗在半岛的权力有兴趣并且担心卷入到与缅甸的战争中。柏尼起初没有获得任何进展，尤其是当英国在缅甸遭到挫折的消息不断传来；但是当1826年2月初英国击败了缅甸从而

结束了战争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暹罗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国王起初反对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副国王苏林王子、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长以及昭披耶·那空等将失去最多东西的这些人,劝诱国王改变主意。他们认为英国已经被断然拒绝了,如果这一次再拒绝的话,可能引发敌对;而且如果目前不建立友好的关系的话,将来的冲突很容易在新的缅甸—暹罗边界出现。于是谈判认真地开始了,在 1826 年 6 月,双方签署了一个条约和一个商业协定。

条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暹罗在条约中让步很少。条约中的条款涉及了下面的内容:划定了暹罗与英属缅甸的边界,贸易的通行规则,争议的解决;重组了暹罗在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和北大年的地位以及霹雳王国和雪兰莪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商业协议对暹罗来说意味着很大的牺牲。比如,用一种新的单一税代替了原来船只缴纳的各种费用、税和酬金,这种单一税以丈量船梁为基础(如果载有进口货物的话,每呼 1 700 泰铢;如果没有载有进口货物的话,每呼 1 500 泰铢)。这样,贸易税收减少了。而且皇家对各种商品的垄断权被减少了。短期来看,暹罗似乎相信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安全,它能够承受经济上的牺牲。长期来看,他们一定认为通过征收新的税,能够弥补关税上的损失。

154

签订《柏尼条约》在许多方面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为暹罗处理与西方关系树立了一个建设性的模式。它的特点是妥协和王朝的深思熟虑,并且在主要的和次要的利益中作出区分。在有效并建设性地处理一个越来越危险的国际环境的能力上,它能够增强暹罗的自信心。最后,条约大幅度地增加了暹罗的国际贸易。到了 1840 年代,每年有超过 50 个方帆的西方船只拜访曼谷。而且暹罗和新加坡的贸易额在几年内增加了大约 50%。随着贸易增加而增加的是与西方的交往,而这最终将深远地影响王国。

不过,目前国王和王朝不得不去关注更传统的事情,尤其是东部的附属国。最严重的和直接的问题是万象的昭·阿努的野心所导致的。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 1819 年任命阿努的儿子昭·尧为占巴塞的

统治者，阿努在老挝的权力大大地扩展了。两个人开始加固他们的疆土，而且阿努尝试与琅勃拉邦的国王曼塔图腊建立一个同盟。曼塔图腊一定略微了解将要发生什么，因为当他和阿努在1825年为了拉玛二世的葬礼而访问曼谷的时候，曼塔图腊在那里停留了一整年，直到1826年末琅勃拉邦爆发了一场瘟疫才回去。阿努更急着回去。他感觉到拉玛三世已经侮辱了他，并且没有被当作他所认为的重臣看待。他没有给予曼塔图腊所享受到的恩典。阿努听到了英国将攻击暹罗的谣言，并且观察到暹罗正在为防卫做准备。他回到万象准备造反。他设想横扫整个呵叻高原，夺取曼谷，然后携带大量的俘虏和物资回来进一步加强他的王国。

1827年1月，老挝军队开始了他们从万象和占巴塞的侵犯。他们通过宣称是急于捍卫曼谷来自英国的攻击而夺取了呵叻府，到了2月底，他们抵达北标，距离曼谷仅三天的路程。在短暂的陷入恐慌之后，暹罗的王朝做出了强烈的回应。3月初，副国王率领了一支部队在北标外阻止老挝军队前进，而主力部队则被征调。到了4月初，三支暹罗军队同时进发。一支小的部队席卷了帕萨河河谷，夺取了碧差汶和仑沙。第二支规模大点的军队由披耶·拉提查素帕瓦迪(后来的昭披耶·波丁德查，辛·辛哈森尼)率领，重新夺取东北部高原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占巴塞，在这个过程中捕获了昭·尧。同时，主力部队在副国王的率领下向万象进发。距离万象南部50英里地方，他们于5月的前四天在廊磨喃蒲府与老挝主力部队交战，最后击败了他们。阿努回到他的首都，卷起包裹，逃离到越南。几天后暹罗占领了万象。

155

在围捕了囚犯、洗劫了城市和破坏了其防卫后，暹罗的主力部队撤回，留下新提升的昭披耶·拉提查素帕瓦迪来完成对该地区的征服。将军被指示去完成毁坏万象的任务并且教育老挝和其他的附属国让他们知道造反的代价。不过，几个月以后他认为老挝已经遭受得差不多了，于是留下一些老挝贵族和一支暹罗驻军，在1828年2月撤回。

拉玛三世对此不满意；他希望能够把万象彻底毁灭。而且，他担心越南不仅会乘机进入到万象的疆域，还要进入到黑傣族人的村落联合

体和川圹。拉提查素帕瓦迪重组了他的军队并且返回向万象进发。到了8月初他接近该城的时候,阿努已经率领一小支越南和老挝军队从越南返回并且重新夺回万象。拉提查素帕瓦迪仅仅指挥一支小的先遣队,便返回到益梭通府。阿努跟踪着他,但是在10月中旬被痛击后再次向东逃去。这一次这位将军讨回了他一年前的欠账。阿努被捕获并被送到曼谷,他在1829年初被公开宣判的几天后死去。暹罗破坏了万象周围的除了佛教庙宇的所有建筑,迁移该地区的所有人口重新安置在华富里、北标、素攀武里和那坤猜席等省。即使40年后,当一群法国探险家来到万象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只有森林和腐烂的废墟。

在阿努造反后的几十年里,暹罗系统地重组了他们的东部老挝省份。出于试图保卫更遥远的跨湄公河省份的担心,他们从湄公河跨越到呵叻高原,开始了大规模的迁置老挝人民。尤其是,在1830和1840年代,在邦海和卡丁河之间的中部老挝受到了系统性的洗劫,该地区的人口被重新安置在东北高原的中东部。当越南在1830年初进入到川圹的时候,暹罗与琅勃拉邦合作于1834年重新夺取了该地区,然后把大部分的人口迁移到南部和西部。这场军事炫耀鼓舞了黑傣族人,他们恢复了对暹罗的效忠,这种效忠过去在越南的压力下已经动摇。这之后该地区的最北部通过琅勃拉邦向暹罗国王们效忠。

156

曼谷第三代统治期间,东北部的所有这些活动都大大增强了暹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这期间,大约40个新的村落联合体产生了,其中一些直接向曼谷朝贡,其他的则通过另一个村落联合体作为中介——如占巴塞、加拉信、肯马拉、廓开、那空帕侬或者沙功那空。它们中的一些完全是新产生的,由跨越河流的整个社区的移民组成,以及它的头领及其家族。其他的则是旧乡村,它们的人口由于从老挝转移过来的人口而膨胀。曾经是一个人口极其稀疏、森林稠密的地区,目前开始正在被填补,而湄公河东岸的人口却在急速下降。过去的两个主要的老挝领地万象和占巴塞的面积都被消除或者减少了。在这一过程中只有暹罗增加了人口。

内政部是负责北部省份的,但是在1830年代不得不去关注东北

部，国防部的部分责任则是关注马来半岛的南部省份，而那里的战争和军事征伐与老挝国内的一样频繁。南部附属国的麻烦并非新添，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吉打的例子；1830年被任命的国防部部长对该地区来说是个陌生人，这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迪·波纳作为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部长，同时控制着国防部，他成为暹罗前现代历史上同时拥有国家的两个主要位置的第二人。

1831年，当流亡的艾哈迈德苏丹派系发起了造反并且把暹罗在吉打的官员驱逐出去的时候，暹罗在吉打的麻烦第一次爆发了。洛坤的总督昭披耶·那空(诺艾)开始征召军队并且要求宋卡和北大年也这么做。宋卡抵制，北大年再次造反。从1817年以来，北大年在宋卡的控制下被分成七个小王国，但是这些小王国目前联合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一次终结暹罗统治的机会。当他们攻击宋卡的时候，后者不得不向曼谷寻求帮助；但是即使暹罗派遣了四支军队也不足以击退马来的北大年，因为他们得到吉兰丹和丁加奴的支持。更多的军队被派遣到该地区，而且1832年初期洛坤的军队也加入进来，这支军队成功地再次夺取吉打并且在那里设立了暹罗控制的政府。到了年中，北大年的七个王国被镇压，新的总督被任命到大多数的王国里，包括北大年本身和亚润。吉兰丹的苏丹也很快屈服了，因为此时其北部受到大量暹罗军队的威胁。他愿意支付大量赔款，并交出逃跑的北大年的统治者，以换取被允许继续担任苏丹。只有丁加奴没有屈服。得意的苏丹不想道歉，因此暹罗强制罢免了他并且由其一个表弟取代了他。他们的工作完成后，暹罗军队伴随着几千囚犯和大量的战利品返回国内。

157

不到十年，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支持艾哈迈德苏丹的造反派再次夺取了吉打，正在向宋卡和北大年进发，而且他们从七个王国得到了一些支持。几个月后，1839年初，暹罗从洛坤和宋卡发起了反击，到了3月末，他们再次征服了吉打。同时，吉兰丹陷入到内战中，只有军事干涉的威胁才使交战的双方同意去解决他们的分歧。

在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动乱之后，对半岛地区政府施行新办法的时机已经到来。第一，由于从其领土内产生了几个新的小王国如玻璃市

和沙敦，吉打的领土面积减少了。暹罗放弃了其尝试用自己的总督来统治该地区的政策，允许马来王侯来统治这些王国。1841年，他们甚至允许艾哈迈德苏丹回去统治吉打。1842年通过流放苏丹的竞争对手，吉兰丹的骚乱得以解决。最后，1839年昭披耶·那空（诺艾）死后，尽管他的儿子代替了他，但是他们家族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地下降，宋卡和洛坤之间的权力和责任更为均衡。总之，到了1840年代初期，暹罗在半岛中部地区的地位已经得到大大改善。几十年的斗争之后，他们已经设法给该地区带来少量的秩序和稳定，在该世纪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曼谷很少再关注该地区。

尽管曼谷第三代统治期间，在东北部和南部困扰暹罗的战争非常严酷，但是它们无法与柬埔寨战争相比。这些战争起源于暹罗和越南对金边的柬埔寨王朝影响力的竞争以及安赞国王与其不同政见的兄弟们艾目和栋（斯恩1824年死于曼谷）之间的痛苦竞争。在大约20年的越南的干涉之后，最让人反感的也许是征召柬埔寨人服徭役，到了1829年赞已经对越南的奴役感到烦躁，但是他受到黎文悦的控制，黎是越南在西贡的总督。1832年黎文悦去世，顺化的政府迅速实行对越南南部更有力的控制，而悦当时还设法保持一定的自主，到了1833年该地区处于造反中。

158

由于清楚地了解到柬埔寨痛恨越南的控制，拉玛三世决定去干涉。暹罗和老挝军队从曼谷和占巴塞攻击柬埔寨，而一支海军部队则通过围住海岸加入到西贡的反叛活动中。在经历了起初的成功之后，1833—1834年暹罗的征战变成了一场灾难。军队在西贡西边被占有优势的越南军队击败，当他们开始撤退时，由于大量的囚犯和战利品而行动缓慢，他们被柬埔寨游击队骚扰。已经逃离到越南的赞回到金边，再次处于越南的控制之下。1834年赞去世后，越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来确保他的女儿梅成为柬埔寨的王后（1835—1841）。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精心的越南化运动，从王朝官员重新着装开始，并且要求他们讲越南话，这些政策由大量的越南官员来执行。柬埔寨的32个省甚至使用越南名字。

整个 1830 年代的状况越来越紧张。越南秘密与艾目和栋拉关系，并且欺骗艾目回到金边，他在那里被逮捕并且被拖到顺化软禁起来。1840 年，越南开始进一步加紧控制，实行经常性的高税率，削弱柬埔寨统治阶级的身份和地位，贬斥并带走了王后梅，于是一场大规模反对越南的造反爆发了。柬埔寨的纪年描述："所有柬埔寨的部长们、地方官员和大众都同意联合起来杀死越南人。"[①]越南的军队不得不撤回来镇压其南部的柬埔寨造反，而拉玛三世则派遣昭披耶·波丁德査(辛)返回到柬埔寨。按照国王的观点，他们是去"挽救"受到越南威胁的佛教和柬埔寨制度。经过艰苦的征战后，波丁最终在 1841 年中护送安栋王子到了乌栋，并且尝试鼓励柬埔寨官员和普通大众集结到栋周围使其成为柬埔寨国王。年底的时候，他在金边。战争拖延了另外三年的时间，而且在暹罗这一边涉及来自帝国许多省份的特遣队，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最终，在 1845－1846 年，暹罗和越南达成了一个协议，在协议条款下，1848 年栋被暹罗加冕为柬埔寨国王；他每三年向顺化朝贡一次，每年向曼谷朝贡。与曼谷第一次统治期间一样，在柬埔寨发挥主导影响力的仍然是暹罗。

159

柬埔寨战争的一些方面也许让暹罗深感不安。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对其西部与缅甸的边界关注之后，他们现在不得不去关注东部，一个新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的竞争对手。拉玛三世和他的王朝对这次冲突回应的方式表明他们的身份吉凶未卜。在与非佛教的而且其制度主要来自中国模式的越南的对抗中，暹罗自身文明质量的观念得到加强。在这里，甚至比与老挝和马来斗争更强烈的是，他们面临着对其权力的限制。他们必须去评估通过当地统治者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官员和制度来实施影响力的前景。

拉玛三世和整个第三代统治期间获得了极其保守甚至反动的名声。一些人认为国王和朝廷采取了一种盲目抵制变化、顽固维护传统方式的姿态。与大多数这样的总结一样，这些观点既不完全正确也不

① 引自 Chandler,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 p. 150。

完全公正。毫无疑问,拉玛三世是一个对许多传统价值的积极维护者,在他对柬埔寨的政策中,他把自己看作是在维护佛教,这当然是一种真诚的姿态。同时,他对一般的世俗文学和艺术没有一点兴趣。在阻碍文学方面(他不体面地对待他统治期间的伟大诗人顺通蒲就是一个例子),他也许是对他父亲拉玛二世的反抗,拉玛二世被认为花费太多的时间和资源在诗歌上。不过拉玛三世欣赏和重视暹罗的文化遗产。

在他统治期间最特别的行为之一是翻修曼谷的卧佛寺。他把几百个铭刻和壁画置于公众视野——作品涵盖每一个可以想象的主题,包括诗歌,关于医学、战争、按摩、占星术、植物、历史和宗教的论文以及教会机构、王国省份和外国人的名单。他在做什么? 为什么? 很明显,拉玛三世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国家正在经历迅速的变化并且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传统文化的话,它们将消失。他似乎不喜欢或者不赞同这种变化的方向,但是同时他并没有阻止它。他能够做很多事情——他能够惩罚或者驱逐一些人,他能够制止一些行为,他能够抵制一些变化——但是相反,他允许其他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他自己则坚持旧的方式。他是保守主义者,而不是反动派。他维护旧的价值观和美德的温和做法,实际上比他的一个更极端的政策做了更多的工作来保护它们。

160

在经历曼谷第三代统治期间所有变化的人中,没有人比国王的弟弟孟固更突出的了。他在一个离王宫不远的庙宇里以一个新剃度的佛教僧侣开始了他的统治。即使孟固想去参与政治,但是他别无选择,他必须认真对待佛教,因为离开佛教将把自己带入到危险的王朝政治的漩涡中。孟固有一个不安分的、好奇的头脑,而且起初他在曼谷几百个庙宇里发现的佛教使他焦虑不安。他研究冥想来增强自己的智力和注意力,但是这没有使他满意。于是他返回到内陆城市的学术庙宇,并且为了阅读"原文"的佛教经文,他开始认真地学习巴利文。在拉玛三世的要求下,他在 1826 年参加了巴利文的口头考试,这是通向教会工作和皇家赞助的通常途径。在大片的观众面前,包括高级僧侣、官员和王室成员,对一个仅仅几年前才成为僧侣的人来说,孟固表现得惊人地

好。他不仅展示了伟大的语言技巧还展示了对当年规定的宗教经文的广博知识。由于一些王侯对手私下议论，说孟固的考官对其皇家地位过于恭敬，于是在考试的第三天之后，他拒绝继续考试。不过，他已经给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被奖赏了一把荣誉扇子，标志着他完成了最高学位的考试。

这个年轻的僧侣由于被质疑其动机而闷闷不乐，他认为追求高的宗教职位是不适合他的，尽管有几个皇家王子已经在等级中提升并且许多人已经将这么做。他一心扑到经文研究上，他学习佛教教义和宗教最初做法的核心内容越多，他就对暹罗佛教的现状越不满意。他开始认为僧侣和俗人都盲目追随了他们父亲和祖父的佛教，而没有获得原始经文教义的完整知识。在仔细研究了僧侣剃度的经文之后，他伤心地发现暹罗人的剃度也许是不合理的。他偶然遇到了暹罗境内孟部落的大和尚，通过与他讨论，他确信了孟族严格纪律的合理性。

161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仔细学习和反思之后，他和几个僧侣学生迁移到城市北部的萨摩莱寺。1833 年左右，他按照严格定义的仪式内容，对这组人重新剃度。他们此时以孟族的形式穿着袈裟，覆盖着两个肩膀而不是一个肩膀。到了 1830 年晚期，孟固通过这组僧侣，已经改革了日常实践、仪式、说教甚至巴利文的发音。孟固被国王邀请与这组僧侣一起迁移到布翁尼维寺庙，在这里他成为方丈，并且实际上是暹罗僧侣内部单独僧团的头领。孟固把它命名为“法宗派”，“坚持佛法的秩序”和佛像的教义，以完全区别于旧的秩序“大宗派”，孟固贬义地称之为“长期习惯的秩序”。

这时在一个距离政府中心不到 1 公里的城市庙宇里，孟固逐渐积极地参与王国的宗教生活，尤其对佛教教育和监督培训一代佛教学术领导人有兴趣。从 1830 年代早期，由于孟固发展了与居住在暹罗的西方传教士越来越多的联系，布翁尼维寺也成为西方学习的主要中心。

需要强调的是，在他第一次建立与美国和法国传教士的交往之前，孟固的知识发展的主要轮廓已经成形。他已经采纳了一种探询的理性主义的话语方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脑力思考回到最初的原则，按照

理性来接受或者拒绝它们,从而发现真理。在他的当代框架内,他的方法是"科学的":每一个事情都是有原因的,理性地解释所有的事情。考虑到他的敏锐的知识和活泼广泛的兴趣,毫不奇怪,他应该非常享受与美国新教徒和法国天主教大主教让·巴蒂斯特·帕里果瓦的陪伴和谈话。他学习拉丁文和英语,以及西方科学和数学,尤其是天文学。在1840年代,他还通过辩论的信件来积极发展与锡兰佛教僧侣的联系。

在扩展超越其父辈的精神视野上,孟固不是一个人。他是少量对学习西方有兴趣的高级暹罗贵族中的一个。在这一时期亚洲其他地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接触到下层人士或者少数族群,而在暹罗他们能够接触到精英中的年轻人。他们包括昭披耶·披克琅(迪·波纳)的儿子和外甥们,他当时也是国防部部长;孟固的弟弟珠陀摩尼(Chudamani)和同父异母的弟弟旺萨提拉特;以及主要家族的几个年轻的儿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兴趣,这些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官方责任。川·波纳正在帮助他父亲管理金融和外国事务部,他对造船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在暹罗建造方帆船只,到了统治末期,这些船只已经正在取代土著和华人的船只为金融和外国事务部运载海外贸易。珠陀摩尼变得对英语非常精通,因为他有军事责任,他开始以欧洲人的形式来装备和训练军队。旺萨提拉特王子负责监管皇家医生部的事务,他认真地学习西方医学,以至于从费城的一所医学院获得了函授文凭。

162

与拉玛一世相比,这些年轻人似乎对他们的研究和源于这些研究的创新只是来自他们本身的自我意识。而拉玛一世则是准备回到印度文本或翻译亚洲语言的作品。他们相信自己的头脑能够应付他们周围不断变换的世界,使用任何适合于他们需要的工具和技术而不管它们来自哪里。到了世纪中期,这些已经40多岁和50多岁的人成为暹罗他们那一代中的领导人物。

拉玛三世似乎从来没有对他登上王位感到非常自在。他的行动暗示他好像认为孟固应该在1824年成为国王,而且他好像还认为如果他不是因为年轻和经验不足,他也应该成为国王。关于这一点有一些奇

怪的暗示。第一，拉玛三世的副国王和推定继承人在1832年去世了，并且没有指定其他人来代替他。第二，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836年，拉玛三世要求孟固迁移到距离王宫更近的一个寺庙并且成为宅方丈；他重新命名该寺为布翁尼维寺——这个名字是以通常副国王居住的王宫名字命名的一场戏剧的名字。最后，为了装饰他在布翁尼维寺的新住所，拉玛三世邀请孟固从副国王的王宫里面挑选东西。孟固的儿子后来认为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拉玛三世认为孟固的地位等同于副国王，即推定继承人的地位①。

在王朝派系中，对拉玛三世没能任命一个新的副国王感到不满的人是拉克荣纳莱特王子——这个王子曾经诋毁孟固1826年的巴利文考试成绩。国王在1848年底收到一封请愿书，抱怨该王子的司法行为。官方调查表明他不仅犯有渎职罪，还为了有利判决收受贿赂和挪用资金，而且他还喜欢男性演员的陪伴而不喜欢妃子的陪伴。得到确认的是，为了在国王死后得到王位，他正在建立一个追随者的小圈子，这在朝廷的眼里就等于是叛国。因为拉克荣纳莱特当时是最高排名的王子，国王对其施行了最高的惩罚。1848年12月他被用檀香木棍殴打致死。

163

到了1850年，很显然，统治不能长期进行下去。拉玛三世已经62岁了，并且健康有了问题。就与早期的拉克荣纳莱特一样，许多人预测将要到来的王位继承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且没有时间来采取任何可以削弱首都派系的政治行动。不幸的是，西方大国正在开始要求暹罗王朝在其外交和商业政策上采取激进的改变。在中国的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西方的侵略性加强了，而且与10年前或者20年前比，西方大国不太愿意以亚洲的条件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柏尼条约》和1833年与美国签订的一个类似条约已经不再让人满意。西方目前要求结束对贸易的所有限制，建立常规的外交关系，实施对外国国民

① Prince Wachirayanwarorot, *Tamnan Wat Bowonniwetsawihan* [History of Wat Bowonniwet] (Bangkok, 1922), p. 18.

的领事法律管辖权(如治外法权)。1850年两个使团来到曼谷要求达到这些目的:约瑟夫·马里士他在3月和4月代表美国,詹姆士·布鲁克在8月和9月代表英国。两个人都空手离开,而且两个人在离开曼谷时候对暹罗王朝的傲慢和不让步非常气愤,因为暹罗在每一个问题的每一点上都不妥协。

暹罗在1850年不乐意与西方大国达成协议的原因是它正面临着继承斗争。负责与马里士他和布鲁克谈判的主要官员是昭披耶·披克琅(迪)和他的弟弟披耶·西披帕特(塔特·波纳),他们来自金融和外国事务部和国防部的一个权力基层,这些职位给他们带来劳动力和财富,而劳动力和财富也许能在决定谁将成为下一位国王上发挥主要的作用。他们已经与孟固关系非常密切,而在许多传统的民众眼里,孟固与非传统的佛教和外国分子联系在一起。如果波纳家族支持与西方签订条约,那么将给他们的那些较为保守(和反动或者仇外)的竞争对手提供一个借口来反对他们。因此他们阻止了这些新条约,而私下向国外的朋友写信说他们应该等待。同样,在同一时期,在曼谷民众看来,孟固王子和他的弟弟珠陀摩尼似乎已经停止接待西方访问者。

164

拉玛三世在1850年9月得了重病,到了第二年1月则更严重了。他冗长的病情只是加剧了王位继承问题的紧张气氛。在讨论了可能的继承者几个月之后,一些人担心竞争可能爆发内战,国王在1851年3月10日召集他的主要官员并且告诉他们,他将不指定继承人。他要求他们不久后召集一个包括官员和王子的全体会议来决定继承问题。在国王还在呼吸的时候,他的部长们对是否采取行动犹豫不决,于是两天后国王再次把他们召集到床前,特别与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长的儿子披耶·西·素立亚旺(川·波纳)进行了谈话。国王与素立亚旺讨论了替代人选后,宣布孟固是唯一有智慧统治的王子。不过,国王说孟固受到广泛的怀疑。人们担心孟固也许会让所有的佛教僧侣以孟族的方式穿袈裟——也许这暗示着他在说孟固让人感觉太亲近外国人了。国王说,由于这个原因,他对提名孟固做他的继承人犹豫不决。孟固不久写信在这个问题上向国王保证并且命令他的追随者回到穿袈裟的常规方

式。于是，在3月15日的晚上，所有的官员和王子都汇集在王宫里。孟固后来向美国传教士丹·比奇·布莱德利提供了那次集会的报道。布莱德利把它传给了一家新加坡报纸。昭披耶·披克琅（迪·波纳）已经站在大会前面：

> 大胆地坚定地宣称，他认为在王国里没有人能与殿下孟固和他的弟弟珠陀摩尼王子一起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并且成为王位的继承人。而且他决心运用他所拥有的影响力和权力去维护王子们的权利，因为他认为他们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他们最有可能是前任国王所生的儿子，因为当前的国王与正式的王后没有儿子，因为如以前一样，王位是由当前的国王从那些真正的王子那里借来的，作为他家族的永久拥有者，他从来没有得到这个权利。当现任国王还活着的时候，阁下恳请所有议事会的成员保持安静，阁下说如果他去世后，一定有解决继承问题的斗争。他将请求他们与他一起战斗并且不要与他曾经支持过他们事业的王子在一起。[①]

165

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随即派遣一支重兵守卫在布翁尼维寺和王子珠陀摩尼王宫周围。三周后，拉玛三世在4月3日晨去世，孟固和珠陀摩尼被正式请求作为暹罗的第一和第二国王联合统治。西方观察家认为的进步团体如波纳家族、孟固和珠陀摩尼最终获得了胜利。

拉玛三世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个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和广袤的帝国。在其规模上，它远远超过了所有大陆东南亚邻国，并且它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采取建设性的和有力的行动的能力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可以肯定的是，它充沛的精力和变革以及改革的能力至少部分是来自半个世纪前拉玛一世强加给王国的印记。不过，尽管暹罗非

---

① D. B. Bradley于1851年3月28日发表在*Straits Times*(Singapire 8 July 1851)的信，被引用在William L. Bradley，"*The Accesion of King Mongkut*，"*JSS* 57. pt. 1(Jan. 1969)：156。

常强大，它面临着来自西方强国的巨大挑战，甚至保守的拉玛三世都知道更困难的变革还在前头。在他临终的时候，据说他已经向披耶·西·素立亚旺(川)表示：

> 我们将不会再与越南和缅甸发生战争。我们将仅仅与西方有战争。小心，并且不要失去任何机会给他们。他们建议的任何东西在接受之前都要拖延时间来进行密切考察。不要盲目地相信他们。①

---

① Chaophraya Thiphakorawaong, *Phraratchaphongsawadan Krung Rattanakosin ratchakan thi 3 ··· ratchakan thi 4* [Royal chronicle of the Third and Fouth Reigns of the Rattanakosin era] (Bangkok, 1963), pp. 366.

第七章　孟固和朱拉隆功：1851－1910年

19世纪的后半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代。1851年，大多数的傣族人民都居住在暹罗帝国内，而且已经开始重新塑造他们与其远亲的关系。到20世纪初期，许多已经处于西方殖民强国的控制之下：掸族在统治缅甸的英国控制之下，老族和高地傣族在统治印度支那的法国控制之下。西方的殖民控制结束了一些人对暹罗人领导傣族各种民族的野心。不过，与此同时，暹罗的殖民主义没有成功地把许多民族整合到暹罗内部，包括使用傣语的民族以及以前和暹罗王国没有任何联系的其他民族。暹罗本身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强国直接的殖民控制。 166

王国因此要面对三个问题：内部整合、外部的领土损失和一个独立的暹罗的生存。结果是集中于曼谷王朝的政治发展的一个产物。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这两个人，他们在1851年到1910年期间是暹罗的国王，他们是孟固和他的儿子朱拉隆功。重担就落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不得不去做困难的决定。有些人曾经说孟固是最后一个享受国王地位的暹罗君主。但是很难想象的是他或者朱拉隆功在经历困难的时期还能够享受到乐趣。

孟固国王谨慎的改革

1851年登上王位的时候，国王孟固（拉玛四世）已经47岁了并且
167
已经成为一个佛教僧侣27年了。他的宗教生活没有与世隔绝；实际上，由于他的僧侣经历，他为登上王位做了更好的准备，他有机会进行广泛的学习和阅读，同时在全国游历并且与很多人对话。他缺少一群政治追随的附庸和仆从，而且他尤其容易受到那些把他推上王位的朋友的压力。珠陀摩尼王子与孟固同时登上王位作为披·平·克劳（Phra Pin Klao），"第二国王"，这似乎是孟固的主意，一种战略目的是：如果前者活过孟固，那么通过保留直接权力的可能性和一个对继承王位的增强的机会，这样可以抵消他弟弟的强大的力量（和他的小部队）。

国王的直接议程就是奖赏他的朋友和巩固他的权力，而且这就意味着认可波纳家族的优越地位。昭披耶·披克琅（迪）已经同时控制金融和外国事务部和国防部20多年了，他被温和地提拔，退休后有一个挂名闲差而且他的两个儿子取代了他，昭披耶·室利·素立亚旺（川）为国防部部长，而昭披耶·提帕考拉旺（卡姆）为金融和外国事务部部长。国王近身则布满了波纳家族的年轻人。这些起初的任命使得一个单一的家族在中央行政管理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而且使政权免于受到直接的国内竞争的伤害。

孟固仍然面对着一个地方战争，这是他的前任统治时期留下的。这就是北部泐族王国的景洪，在国王去世他们被召回之前，拉玛三世的军队曾经在1850年短期干涉过那里。1852年，景洪的新统治者已经向曼谷朝贡并且请求保护免于受到缅甸的攻击，缅甸通过景栋对该地区行使宗主权。于是，孟固派遣征战队攻击景栋，两次都是由他的弟弟旺萨提拉特率领，但是人员几乎全部来自兰纳和兰王国的军队。由于供给问题和低落的军队士气，两次征战都没有成功夺取景栋。这也结束了暹罗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该地区的野心。

不久孟固政府更关注与西方的关系，而詹姆士·布鲁克在1850年

底空手离开曼谷的敌对态度则强调了这种关系的严重性。

素立亚旺和孟固都向新加坡的英国当局写信恳求他们耐心等待，而且孟固不久就把通信对象扩展到香港的新总督约翰·鲍林[①]爵士。几年以后，王朝才感到有足够安全去冒险和英国直接打交道，而英国也考虑派遣另一个使团。在1855年初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鲍林被选为英国特使而且他代表英国外交部，而不是印度政府或者海峡殖民地政府。由于他们的地方观点，后两者通常是反暹罗的，而外交部则是采取一个更全球的观点；它主要关注的是英国贸易和贸易商的行为和安全。英国与暹罗一样，希望避免重复第二次英缅战争(1852)，这次战争的直接借口涉及英国贸易商的法律地位和从事商业的条件。

168

鲍林与他背后的军队威胁一起来到曼谷。他与孟固的通信清楚地表明了英国将准备做什么：为了保护他们的贸易和利益，如果必要的话将使用武力。孟固和素立亚旺因此以出人意料的热情、坦诚和不拘常规来接待和招待特使以及他的团队。孟固在他的私人寓所里接待了鲍林并且亲手给他送上了香烟和红酒；素立亚旺在与鲍林的讨论中谴责了暹罗行政管理的不公正和无效率，仔细地重复了事前与美国传教士排练的观点[②]。两周之内，一个协议出现了，它规定暹罗向外国贸易开放并且满足伦敦的主要条件：按价进口关税限制在3%，而出口关税则平均是5%。英国臣民允许在暹罗居住和拥有土地，在女王政府常驻代表的保护下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对他们的土地和活动的税收被限制在很低的水平上。政府对商品和贸易的垄断权一直以来是暹罗财政体系的支柱，现在它被取消了，只有鸦片除外，就像新加坡和香港一样，政府对鸦片拥有垄断权。在这样的大笔一挥之下一个开放的古老的暹罗正在面对着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对这样一个强国他们还没有做好竞争或者对抗的准备。

---

① 鲍林：又译"包令"。——译者注

② 我感谢 Noel Battye 提醒我注意这个资料——来自美国传教士档案。

在一个他们不可更改的处境下他们愿意尽力而为。由于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既得利益，国王和部长们的统治权力取决于其附属和庇护者的合作。王朝不得不小心地处理体系中的任何变化。他们给予英国的商业特权威胁到几乎每一个王子和官员的权力和生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依靠贸易和商品垄断权以及条约取消的各种内部税收。由于这些变化而损失最大的是素立亚旺和提帕考拉旺以及他们的派系，因为大多数的垄断权都是由他们控制。他们一定能够承诺从其他途径的政府补偿性收入来弥补那些为国家利益安全而牺牲的人。在签订条约之后的年份里，国家收入仅仅在一年里下降了一点，然后又回到条约前的水平。差额的弥补主要是通过加强消费税，如鸦片、赌博、含酒精类的酒、彩票，这些都不在条约的范围内。对其影响感受最深的不是暹罗人而是王国的华人少数族群。尽管这种财政转型是有风险的，很明显，这种风险是值得冒的。孟固和素立亚旺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威胁王国的强权本质以及暹罗的主权可能被颠覆或者压制的方式——他们阅读新加坡和香港的报纸。

169

除了改变税收制度之外，暹罗还转向另一个战略来使新情况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孟固和素立亚旺很快就宣布，他们将欢迎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提议。在十年之内，他们与美国、法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谈判了与鲍林类型的条约。为了开始在这种多边道路上前进，暹罗希望避免那些过度密切的双边关系，如英国-印度与缅甸，或者法国与越南。到了 1860 年代，这些条约迅速造成了东南亚在殖民强国之间的瓜分。如果他能够被世界上其他的王朝接受为兄弟君主，并且同时被接受为能够直接与欧洲各国政府的交流的一个国王，这不仅对他的治国才能而且对他的虚荣心都是重要的。因此，他能够避免如缅甸和马来世界的其他土著统治者一样被邻近的殖民官员敷衍。暹罗能够灵巧地利用列强之间的对抗甚至列强行列内部本身的对抗。以英国为例子，暹罗平衡了英国外交部、印度政府、马来半岛殖民地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每一个在暹罗都有不同的利益。再以法国为例，他们尝试利用多尔赛港口的影响力来对抗西贡殖民政府（从 1858 年开始）的咄

咄逼人的目的。这些外交行动运作得很好，超越了暹罗经常被指责的消极被动。由于暹罗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危险，这些多重平衡行为需要敏锐和谨慎。暹罗政策的重点是安抚英国，因为它比任何国家都强大和积极。他们希望英国的仁慈将减弱其他列强对王国的压迫。 170

这条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1860年初，两个令暹罗不安的事件发生了。第一，国王和素立亚旺正在行使他们理解的对吉兰丹和丁加奴的宗主权，但是却通过复杂的方式卷入到槟城甚至更往南的一场继承争议中。1862年当暹罗的战舰在丁加奴登陆的时候，一艘英国战舰炮击了瓜拉丁加奴来警告暹罗停止进一步的干涉。

第二，更严重的是1860年，由于国王安栋死后以及几乎同时法国在越南南部建立了殖民统治，柬埔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栋的继承人是年轻的国王诺罗敦，他几乎马上就要面对着内部的叛乱、持续的暹罗家长式的压力以及法国的提议。法国垂涎这个国家的表面上的财富，并且把湄公河看作是通往内陆东南亚和中国隐秘财富的一条可能的黄金大道。1863年，诺罗敦同意把他的国家置于法国保护之下，而几乎同时签订了一个认可暹罗宗主权的秘密条约——暹罗为他的父亲举行加冕仪式。第二年，当他出发去曼谷接受加冕的时候，法国在他的王宫升起了法国旗帜，他仓惶回到金边。国王孟固深感羞愧，并且一点也不忿恨他感受到的诺罗敦对过去恩惠的忘恩负义以及对暹罗和其代表的佛教传统的不忠诚。

这两个插曲发生得非常靠近，且都更令人惶惑不安，因为每一个都是地方当局引发的并且没有提及他们的本国政府。不过，在两个事件中本国当局都在事实之后支持他们的官员。暹罗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担心下一步将走向哪里，同时加倍努力确保他们的附属国尽可能被密切监管。

伴随着外交和财政政策的巨大转向，尽管人们可能期望主要的内部变化，但是在孟固统治期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当然，曼谷突然开放使大量的外国商品进入之后，很多变化发生了。货物的运载方式迅

速从帆船转向蒸汽船。仅仅从新加坡访问曼谷的现代船只的数量从1850年的146艘就飙升到1862年的302艘，而且年贸易额从1850年的大约560万泰铢增加到1868年的大约1 000万泰铢，到目前为止最171 大部分的贸易额来自大米的出口。[①] 随着贸易的扩张，出现了新的码头和仓库，以蒸汽为动力的碾米机和锯木机，以及一排排兜售进口物品的砖砌的商店，载着商人的马拉车奔驰在忙碌城市中新铺就的马路上，因此王国需要重新塑造曼谷的河岸和商业居住区。

除了从商品和贸易垄断权转换到鸦片、赌博、彩票和酒类垄断权之外，行政管理并没有变化。就如几个世纪以来的一样，政府在官员的家里进行办公。而且欧洲人认为其特点是腐败、无效率和非人道。司法仍然是高度个人化的并且严重取决于当事人能够动员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民事管理充满了裙带关系，它的官员的报酬主要是来自他们办理事务的比例。政府的每一个办公室都尝试控制劳动力，因为劳动力服务的权利仍然提供了基本的收入而且仍然是政治和个人力量的一个来源。政府的三个主要的部——内政部统治北部省份；国防部统治南部172 省份；金融和外国事务部统治曼谷附近的沿海省份——行使多重功能，治理省份，收税，组织公共工程，召集军队和依法治理王朝。整个政府从在曼谷的国家最大的部到最小的最偏远的省份，家族和地方寡头都尽最大努力把他们的权力和特权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些权力以免外人染指。

治外法权是欧洲人对暹罗司法的反应；限制进出口关税及其他税收被认为是对乱糟糟的和反复无常的收入管理的反应。西方的军事威胁仍然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某些前线威胁在增加，不过仍然没有职业军队。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改革也是极其必要的；而且佛教道德和常规的西方标准都要求在行政管理、法典、奴隶和债务奴隶制度以及社会

---

① Wong Lin Ken, "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9 — 1869,"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33, no. 4(Dec. 1960): 278. and James C. Ingram, *Economic Chang in Thailand 1850 —1970* (Standford, 1971), pp. 332 — 35.



一个暹罗贵族正在发号施令（来自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John M. Echols 收集项目中的一个相册）

和经济服务上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为什么这样的根本性的变革没有至少在孟固统治期间发起呢？孟固自己也声称他的国家是落后的而且需要变革。孟固认为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缓慢的变革，从而不至于会太严重、太快地搞垮现存的秩序。他认为帝国主义压力其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推迟国内改革的更充足的理由在于孟固所苦恼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与半个世纪以前拉玛一世几乎从零开始创立一个政府的时候相比，政府的部长和各部门也许更少受制于皇家权威。在跨越两代人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防部和金融和外国事务部由一个单一家族控制，并且其职员由怀有个人忠诚以及首领和直接部属之间有相互义务的部属和仆从组成。这种类似恩主和附属的关系广泛存在于中央行政管理和省份中，大多数这种关系由半世袭的总督来控制，国王仅仅能够证实总督的任

命。攻击任何现存的流弊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场与这些家族、集团和派系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的敌对，而在 19 世纪中期这些人为暹罗社会提供了大部分的凝聚力。无论是好是坏，恩主们依靠办公室的补贴来保护和奖赏他们的部属。部属反过来依靠他们的恩主来获得保护以及他们身份得以建立的社会中的场所和职位感。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由不同阶层的个人之间的联系垂直构造起来的。这些个人之间的联系用语言表达出来并且以行政等级和头衔来形式化。在一个平面之上的两个平等人之间几乎没有社会团结感。暹罗的语汇本身几乎没有提供平等关系的概念。孟固肯定知道这些并且非常清楚他的权力的局限。他能够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领导，而不能咄咄逼人地推动。首先，他需要更多可能的合作来建立稳定性。在稳定性的基础之上，改革也许最终发生。

173

因此，孟固进展得相当缓慢。他开始出版政府公报，并且允许印刷王国的法律，主要目的是人们也许能更好地了解。他试验了选举法官



1865 年孟固王被皇家游行的仪式抬进卧佛寺内（William L. Bradley 收藏。）

(之后就取消了这一惯例)。他与传统决裂，当他行进在公众中的时候，他允许他的臣民凝视他的脸部。为了解除疾苦，他允许请愿。他努力改进奴隶的条件并且允许妇女在婚姻中有一些选择，但是他仅仅获得了有限的成功。在没有破坏现存利益的基础上，他还为专业和技术工作雇佣了一些外国顾问(1870年的时候有14个)。一些人作为从事对外事务的翻译和秘书，其他人则是在作为半私人的军队(如第二国王披·平克劳)的教官、印刷工、乐队指挥、港口和警察管理中的技术官，两者都直接服务于在曼谷不断增加的欧洲人社区。 174



1865年孟固王和皇子朱拉隆功(William L. Bradley的收藏)

这些都只是很小的步骤，但是孟固正在展望将来的日子：他或者他的继任者也许以这些步骤为基础，使暹罗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半文明的，在那里（民众）熟悉一些法律条款并且他们

175 的举止和习惯是好的”[1]。

新国王与保守派

孟固在他隐退的僧侣生活之前所生的儿子们在1868年前都去世了，披·平克劳也在1866年去世了，国王的高龄引发了王位继承问题。孟固的王后所生的大儿子朱拉隆功王子（出生于1853年）当时仅仅是个小男孩，但是不久就被普遍认为是王位的顺理成章的继承人。孟固显而易见希望他儿子能继承他，并且为王位训练他，1860年代他为朱拉隆功提供了包含泰族和现代西方元素的初级教育。朱拉隆功是安娜·李奥诺文斯的学术关注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了经典的

176 泰族文化教育以及跟他父亲当真正学徒的一段时间：坐在被接见席上等待公共事务被办理，并且在部长之间来回传递消息。孟固希望当1873年王子成年的时候能够把政府移交给自己的儿子，但是1868年去马来半岛观看日食的时候两个人都染上了疟疾。他们回到曼谷后不久，孟固在1868年10月1日去世，留下了一个15岁的储君而且他的健康状况也非常危险。

在他去世前接见昭披耶·素立亚旺（川）的时候，孟固令人不解地拒绝说出他对继任者的偏好。尽管他一再要求，如果朱拉隆功被继承委员会选中的话，素立亚旺同意作为摄政一直到这个男孩成年。当委员会会面的时候，素立亚旺介绍了朱拉隆功继承的状况，着重强调了西方人对合法性（在早期拉玛三世的例子中得到反映）的狭隘观念和西方人期望朱拉隆功能够继承王位。从暹罗对外关系的观点来看，选择朱拉隆功更安全。没有人挑战这个观点，朱拉隆功被无异议地提名来继

---

① 1861年2月14日孟固王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皮尔斯的信，引自 Abbot Low Moffat, *Mongkut, the King of Siam* (Ithaca, 1961), p. 89。



1865年的颂德·昭披耶·西素立亚旺(William L. Bradley的收藏)

承他的父亲，素立亚旺则被选为年幼国王的摄政一直到1873年。接着素立亚旺采取史无前例的步骤来宣布威猜赞王子(同时被他的美国狂的父亲命名为“乔治·华盛顿”)应该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他是死去的国王披·平克劳的儿子。这种行为以前总是新国王的特权。一个王子勇敢地站起来挑战这个史无前例的举动，但是他的行动没能获得委员会的任何支持，因为他们害怕素立亚旺的权力，于是对威猜赞的任命得以通过。

不确定的是素立亚旺是如何不正当地掌控这个时机的；但是他的

行为通常被解释为为了维护他在王国位置和地位的一种尝试。他被认为是相信朱拉隆功将不会从病中康复，并相信到那时威猜赞将在素立亚旺的监护下登上王位。短期来看，无论怎么样，由于随后的新部长的任命，他的家族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由于素立亚旺成为摄政，被罕见地授予颂德·昭披耶·西·素立亚旺王子头衔，他的儿子昭披耶·素拉旺(旺)继承他成为国防部部长；另一个儿子昭披耶·帕努旺(图阿姆)接管了金融和外国事务部；他的外甥则接管了大量收入来自土地税的土地部(相当大的部分回到摄政那里)。素立亚旺在摄政期间是行政管理的真正主人，就如以前的他一样并且一直持续到1883年他去世。

177

朱拉隆功不是马上就有条件去挑战摄政的权力，尽管他们有时候会在金钱上争吵。作为一个年幼的国王，没有他自己的政治追随者，在高的位置上没有母系的亲戚或者有独立的权威的王子来支持他，他任凭摄政的摆布。对这种状况最强烈的阻止之一是历史的逻辑，一种常识是：1629年另一个素立(亚)旺成为一个年幼国王的摄政并且篡夺了王位成为巴萨通王。素立亚旺做得很好，通过监督朱拉隆功的教育，他负责任地履行对年轻国王和王国的职责。最后他允许他在1871－1872年游历荷兰和英国在爪哇、马来亚、缅甸和印度的殖民地，这样他能熟悉现在的行政管理。

只有到了1873年，新统治者的性格才开始在公众中表现出来。在第二次加冕合法地成为国王(1873年11月)之前以及随后几个月里，朱拉隆功开始了一系列展示其现代观点和目的的改革。皇家法令创立了一个特别法庭来清除曼谷受阻的部门法庭的大量司法积压并且澄清司法程序。这些皇家法令威胁到旧秩序中的法官们。要求集中化预算和公开拍卖赌博和鸦片垄断权的法令，挑战了在曼谷猖獗的盗用公款的行为。创立了一个拥有咨询、调查和立法权力的枢密院和元老院(用英语如此命名)，其成员是由年轻人主导——国王的兄弟们和朋友们以及波纳家族的一些竞争对手——这些很明显预示了一个严重的政治竞争。最后，宣布逐步取消奴隶制和对债务农奴的身份附加更严格的条件并且使他们的赎回更容易的法令，这些法令破坏了劳动阶层和官僚

精英的经济地位。

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改革从根本上打击了旧的秩序，国王从事这些改革的动机是复杂的。所有这些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加强了国王的政治地位，不过与此同时，所有的改革都声称是建立在没有人能争辩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的。元老或者保守派——“古代人”，国王这么称呼他们——也许攻击改革为西方人鼓动的创新，但是这些改革按照佛教的伦理道德原则来说显然是合理的。根据这些年朱拉隆功在私人通信中所表达的感情，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诚意。也许最好的公众展示是，他的著名的第二次加冕法令，是宣布取消在国王御前人们必须俯伏在地的习惯，他认为这有损人的尊严。在所有的这些法令中，这个年轻人开始透露他对暹罗未来的一种观点：这个国家将传达佛教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但是与此同时达到西方的期望和标准。只是很久以后，国王才开始意识到这个远景的内在矛盾。 178

仅仅几个月之后，1873－1874年的改革就引发了抵制和反抗。1874年末，枢密院里一些更激进的朱拉隆功的支持者开始攻击威猜赞王子，实际上是要求恢复国王自己选择继承人的权利。威猜赞感觉到了威胁并且目睹由于各种改革的结果让年轻的国王增强了力量，他开始召集自己的军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前宫的场地上进行训练。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朱拉隆功加强了他自己皇宫的护卫。随后，1874年12月28－29日的晚上，朱拉隆功王宫内的军火库和煤气厂附近着火了，威猜赞的军队全副武装到了门口，要求进去帮助扑灭大火。他们被拒绝进入，大火被扑灭，双方紧张地站在那里等待下一步的行动。

当国王那一方打算利用这次事件来削减他的特权时，威猜赞在1月2日逃离了他的王宫，到英国领事馆去寻求避难。国家似乎处于内战的边缘，而且曼谷的贵族中很多人支持威猜赞，而国王的激进朋友曾经触犯了这些贵族。威猜赞曾经一度建议，在法国和英国领事馆保证下，他与朱拉隆功签订协议，他可以返回他的王宫，但是王朝不可能接受这么有损国王主权的安排。朱拉隆功在请求欧洲保持中立的同时痛斥了巴黎和伦敦，并且努力去重新获得朝廷中他的部长们和更老的保

守派的支持。英国外交部认为该事件纯粹是一个国内的争议,并且通过新加坡总督把这消息私人传达给了朱拉隆功。失去了可能的外国支持,威猜赞最终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妥协,接受了对他地位的限制并且回到他的王宫。

1875 年的前宫危机不仅仅有直接的意义,因为它使得朱拉隆功所工作的政治环境中所有危险和难以驾驭的情况都更加清晰。他很快就意识到他的年轻的激进朋友会带来大的麻烦,而且他们不能提供真正的支持给他。朱拉隆功也发现国家的支柱——他父亲统治时期的部长和官员们——仍然掌握权威和权力,没有这些,他不能抵御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挑战。这场危机差一点让他失去王位和暹罗的主权。他用来解决危机的代价是放弃 18 个月前的许多改革。委员会停止开会,许多的金融改革被遗忘或者不再实施;司法管理回到国家在 1868 年的状态;而且国王的年轻朋友被告知要更多地尊重老人并且关闭他的青年暹罗人协会和支持改革者观点的报纸。此时旧秩序很明显占了上风。如果朱拉隆功坚持根本性的变革,他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在这个关键时刻,少量的国家团结对国家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而改革的最终希望有赖于国家的生存。朱拉隆功此时必须等待良机,逐渐地积聚支持和力量,最终使改革成为可能。

179

在 1870 年代,朱拉隆功与西方的关系是不愉快的,尽管在 1875 年他对伦敦和巴黎的请求获得成功。尤其是早在 1820 年代就已确定并长期存在的英—暹关系问题,其重要性正在稳步增长。随着英国的柚木考察活动从下缅甸转移到孟固统治的暹罗北部,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卷入开始让曼谷担心。朱拉隆功担心清迈的附属统治者对森林租约的不当处置将出现失去控制的局面。他还忧虑:清迈王子没有卷入与英国缅甸政府的军事冒险或者争议,这可能让曼谷为难或者引发与英国的一场冲突。因此在 1870 年代他发起了对清迈和北部的新政策,这开始了把该地区更安全地整合到王国中的进程。

当昭·卡维老饶(1856 — 1870)在 1870 年去世的时候,曼谷的机会来了。曼谷的摄政和部长们把顺理成章的继承人移交给清迈,挑选

了昭·因坦(Chao Intanon)(1870－1897)，他们当然期望他会更欣赏曼谷的政策。1874年的英—暹协议建立了一个新的两国法庭解决两国臣民之间争议的体制，这之后，暹罗派遣了一个皇家专员去清迈。这个皇家专员慢慢地开始限制清迈统治王朝的特权，使北部省份的行政管理与中央行政管理一致或者处于其控制之下。这里发展出来的程序和战略，尤其是在1880年代期间国王的兄弟碧吉和碧达拉比(Bidyalabh)王子作为专员的时候，后来被成功地推广到东北部和南部省份，但是向琅勃拉邦和占巴塞的老挝王国的推广却没有那么成功。 180

南部暹罗的马来省份的事情却不是那么急迫，暹罗继续对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施行名义上的宗主权。不过，随着1873年英国在半岛西海岸的王国发挥积极的作用，英国对暹罗宗主权下的马来王国的激进政策带来的压力逐渐增加。此时，暹罗阻止英属马来和殖民部野心的唯一办法是，英国外交部决定通过外交和调解达到英国在暹罗的利益目标，只要这个方针能够得到有效的结果。

在1870年代朱拉隆功及其政府同英国和法国在曼谷的代表相处有些困难。托马斯·乔治·诺克斯爵士(Sir Thomas George Knox)原来是帕·平克劳的军队的教官和1864年到1879年英国在曼谷的总领事，并且是昭披耶·素立亚旺的知己和威猜赞的一个朋友。他还是年轻国王的公开反对者，他认为国王任性、激进和不现实。他自己卷入到当时的政治中，据说他希望把自己其中的一个女儿嫁给威猜赞，另一个女儿嫁给素立亚旺的一个儿子。他经常与朱拉隆功争论并且在辩论时采纳了素立亚旺的保守态度。不过，如他之前和之后的英国领事一样，他接受了暹罗的见解，并接受英国外交部的观点：暹罗的持续独立有利于英国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过他的观点与英国在新加坡、英国殖民部和在印度的官员们经常提出的观点相反。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这种政策的成功取决于暹罗官员对大英帝国女王陛下代表的文明的持续理解力。

这时候法国的领事对暹罗政府及其努力没有那么同情，就如法国在这一时期经常的表现一样，当时与英国相比法国处于劣势的无能状

态下,尤其是当英帝国在1870年代开始迅速的发展而法国却遭受了1870年普法战争耻辱的时候。1867年通过与暹罗的条约,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国地位已经合法化。到了1870年代,法国对湄公河流经的土地尤其是老挝的土地的兴趣在增加,梦想找到通往中国内部所谓财富的"后门"。这种对内陆的推进采取了越来越有组织的对湄公河沿岸的考察,这些活动得到了曼谷的勉强允许。最出名的一次探险是1866—1868年拉葛雷—卡尼尔探险,沿着湄公河从金边到景洪,几乎穿过了暹罗的整个疆土。这之后不久,暹罗与老挝的关系开始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困难。几帮华人强盗〔何(Ho)或者豪(Haw)〕,他们是南中国国内战争的逃亡者,经常到老挝的很多地方抢劫,1872年他们甚至洗劫了万象。暹罗多次派遣军队前往远至查尔平原的地方(川圹),但是却不能长时间恢复该地区的秩序。老挝的混乱加上法国对该地区不断明显的意图和卷入,对朱拉隆功来说预示着不好的信号。由于缺乏权力或者资金去进行咄咄逼人的改革和巩固措施,朱拉隆功在绝望中希望情况不会恶化。

181

1880年代初期,国王的前景开始得到了改善。第一,随着摄政时期的官员的去世或者退位,他能够任命的官员数量增加了。更重要的是如下的事实:与孟固和素立亚旺同一代的许多人在进入1880年代时继续主导政治生活,但是随着1883年素立亚旺和1886年威猜旺去世后,他们迅速失去了影响力。随着朱拉隆功健康状况的改进,他的竞争对手的前景迅速地变得渺茫了,而且人们更乐意与他站在一起。不过,至少到1880年代中期,君主仍然缺少强大的政治追随者。一段时间,他努力去突出旧的贵族集团和家族的显著地位,尤其是波纳家族长期竞争对手的那些人。不过,这些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些人却在1870年代末和1880年代初的公共丑闻中名誉扫地。这使得国王在那些舒适的固守旧秩序的人中建立公共职位新行为模式的希望破灭。由于曼谷官僚精英对国王提供给他们现代教育的机会缺乏响应,国王对将来现代化代理人的选择进一步减少了。对他在皇宫建立的新学校唯一有热情的是来自皇族的年轻一代和他自己的兄弟,他们不久成为暹罗社会

中受到最好教育的一群人。考虑到国王对改革的许诺以及他对具有现代思想并且对王室绝对忠诚的人的需要，毫不奇怪，当曼谷的部门和部长的位置以及省级管理中需要新的任命的时候，他会转向他的兄弟们。 182

由于具有实际的经验，这些年轻的皇家兄弟们对他们目前要承担的任务也不是没有准备了。他们中的所有人不仅接受了王子们通常接受的传统暹罗教育，而且大多数人还至少短期参加了摄政时期在皇宫建立的特殊的现代学校教育。而且，在1873－1874年，一些人还接受了一个英国老师的大量教育。尽管按照习惯和惯例，王子们很少能够进入到行政管理服务——至少如果没有通过婚姻进入到官僚贵族家庭的话，将是不大可能的——而且1880年代前，皇家资助几乎完全限制在皇宫辖区内，但是朱拉隆功在皇宫内创立了有意义的和实用的新职位。他的秘书处变得比旧的皇家记录部更积极。王子参与到处理国外和国内通信的工作中，而且国王经常向他们咨询公务。由于创立皇家审计办公室来执行后摄政金融改革，这提供了许多的位置如会计、簿记员和审计员。国王自己也亲自与他的兄弟们一起工作到很晚，来清理混乱的皇家财政。大多数的王子在皇家侍卫军团的军事单位里面作为军官服务，皇家侍卫军团在朱拉隆功的领导下，成为国家军事改革的实验场，也是他抗衡威猜旺私人军队的力量。它也成为一支现代军队的中坚力量。

第一个空缺的部长职位是首都部，负责曼谷和吞武里地区的司法和公共秩序。1876年，这个位置分配给了蒲塔莱特(Phuttharet)王子(1855－1897)，他曾经在清除曼谷诉讼积压的特别法庭服务并且获得荣誉。1882年，披拉查克辛拉帕考姆(Prachaksinlapakhom)王子(1856－1914)被任命为皇宫部部长。这些年来，他负责皇宫管理中涉及皇家工匠的许多次级部门，而且他刚刚从对老挝的华人强盗何的一次征战中返回。他后来作为负责管理大部分东北部地区的皇家专员很多年。1885年，国王进行了两个主要的任命，完全扭转了行政管理中的权力平衡并且使之有利于自己。在那一年，昭披耶·帕努旺(图阿姆·波纳)退位后，旧的金融和外国事务部被完全分成两个新的部：财 183

政部和外交部(多年来这两个部的工作是非正式地分开的)。

为了领导外交部,朱拉隆功选择了德瓦旺亲王(1858－1923),他是国王王后的三个哥哥中的老大(当然他们都是孟固国王的孩子)。作为一个有才能的被任命者,德瓦旺将凭着高超的技术和策略来负责暹罗38年的对外关系并且得到两个国王的满意。同年,恰可拉发特王子(1856－1900)被选为负责财政部,他是国王的兄弟。同一时期,其他的皇家兄弟们则分布在许多国家职位上,从皇家秘书处、皇家审计办公室、皇宫卫队、皇家侍卫中的警卫团,到皇家出版社、邮政和电报部以及法院。他们不久把这些组织合并成一个新的军事部、一个教育部,同时创立了公共健康、公共工程、土地测量和水文办公室。

国王从1875年到1885年的战略是在旧秩序难以驾驭的政治和行政状况下所被迫采纳的。长久以来,不但国家的各部长不是他自己选拔的,相反他们的任命或者他们的运作能力被归功于其他人的支持,故而朱拉隆功几乎无法提出较之他们能够达标的更多些的建议。他们通常采取消极抵抗来对付任何尝试干涉旧部长们的个人权力帝国的努力。例如,前摄政素立亚旺顽固地抵制通过其在西部省份的大本营来建设一条通往缅甸的陆路电报线,因为西部省份的半世袭的总督是他的亲戚。不过,在素立亚旺死后,国王发布了一项命令开始建设电报线。在每一个部里面都有许多类似的事情。只要部长们能够指望素立亚旺的政治、家族或经济支持,或者只要他们继续担心或者敬重他的权力,他们就会抵制国王的政策。随着素立亚旺、威猜赞和所有的老部长们在1882－1888年间去世或退位,他们的官僚部属就失去了以前恩主的保护了。通过任命其准备充分的皇家兄弟到这些部的关键位置,朱拉隆功把权力真正地转到自己手里。

不过,权力的转换进行得相当缓慢。许多处理技术事务的小部首先在皇宫的行政管理中创立,只有当一个稳固的可信的部能够继续工作,它才可能被扩展到皇宫之外。因此,在皇家侍卫的警卫团中的新军事部和教育部,皇家秘书处的新外交部,皇家审计办公室的新财政部,皇家侍卫中的测量、水文和医疗部都是这样开始的。这些部都包含了

184

对以前惯例的一些基本改革——西方的文件和档案管理，习字簿和分类账；在指定的办公室里在固定的办公时间办公，而不是把一个部固定在部长的住所里的传统惯例；办公室职员的整洁的办公室惯例，拟定来信的摘要让部长们审议并且起草回信让其签字；没完没了地撰写季度和年度报告，上交详细的财务账单，最重要的是，要求引用国王对政策和施行的重要决定。从原则和事实上看，这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制度；但是此时相关的主要事务是加强皇家对各部门工作的控制。为了改变暹罗，朱拉隆功首先需要控制他自己的政府。

内部权力和外部挑战

只有到了1880年代中期，国王和他的兄弟们才能感受到现实的权力，而且几乎是马上他们就要面对着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王朝的一小组人退回到后摄政时期的激进主义。1885年初在给国王的一封措辞强硬的60页请愿书中，他们(11个年轻人，几乎全部刚从国外回来，包括三个国王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强烈建议国王迅速转向一个君主宪政下的议会民主制度。他们批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的混乱，并且都逐渐集中到国王一个人手中，造成了一个过度劳累的君主而忽视了更本质的工作。为了使改革能成功地加强暹罗对抗西方的力量，并且为了使改革的好处能更快地惠及绝大多数人民，他们要求国王与一个总理、内阁和代议制议会共享权力——尽管他们可能赞同在议会成员全部选举产生之前，推行该措施的时机还没有到来。[1]

在回应这份请愿书中，朱拉隆功对其批评者的意图和目的表达了同情，同时他赞赏他们的洞察力：国内改革与保持国家独立的必要联系。他特别强调了受过教育的、忠诚的、有效的、能够执行摆在面前巨大改革任务的人才的极度匮乏。毫无疑问，他从他最近的经历谈起，他表达了对国家小部分精英的利他精神、独立、效率和个人利益服从国家

185

① Chula, *Lords of Life*, p. 261.

利益的能力的疑虑。他解释道，老年人力不胜任，而年轻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完成寄望于他们的任务。当国家最需要团结和明确方向的时候，引进选举和议会政治将削弱国家。他同意他忽视了其立法功能。“我也想政治改革”，他说，“但是目前有其他更迫切的事情……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我们能获得合适人选来成为我们将来的立法者，或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更为美好。”[①]

国王的回答在他自己所处的时空背景下是一个开通的回应。他的王国当时几乎缺乏现代教育；大量的农业人口没有任何独立的政治头脑，不能按照选举政治的预想来思考。在暹罗接受到现代教育的那些人不可能超过几百人，而且除了外来的华人商业少数族群之外，没有人拥有独立的财富或者在民事官僚之外拥有任何的社会或者职业位置。王国面对的外来压力正在达到高潮，而现代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朱拉隆功不乐意从事政治试验是可以理解的，接下来十年的事件证实了他犹豫的合理性。

也许是受到了 1885 年请愿书的影响，但是肯定也是当时改革的实际需要，朱拉隆功在 1887 年要求德瓦旺王子学习并且报告欧洲政府的组织。当时他正在英国出席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50 周年的庆祝仪式。一返回到泰国，德瓦旺就建议组成一个有 12 个部长的内阁，包括 7 个旧部和 5 个新部的部长，每一个人的责任都按照功能线重新划定。北部省份（内政部）、南部省份（国防部）、外事和国库（金融和外国事务部）、土地、皇宫和首都等这些旧部，都分别变成内务、战争、外事、金融、农业、皇宫、地方行政（首都地区）等新部；而且创立了新部来负责公共工程、公共教育、司法、军队和御玺（由皇家秘书处和某些公务委员会合并而成）。

186

国王在 1888 年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和博学的讲话，他考察了政府传统制度的历史发展并且分析了其弱点。然后，他简述了被逐渐引进的新制度的程序。部长指定人选被选出，几乎全部是国王的兄弟们，而且

① Ibid., p. 263.

他们很快开始以内阁的形式会面，尽管仍然没有行政权威，但是为1892年他们权力的全面转换做了准备。1888年的转换有两个明显的疏忽：国防部和新的军事部的军事责任继续重叠以及内政部和国防部之间省级管理责任的继续分立。由于旧部长长期在位，这两个情况必定存在。直到他们去世或者选择退位，国王才认为挑战他们是明智的。不过，两个人都是老人了，预计不久后将离开政治舞台。

这些变革的正式宪法没有四年试验期间所发展出来的决策模式那么重要，因为后者促成了1892年内阁政府运作的开始。部长们定期地会面，他们几乎没有这么做过，而且国家政策开始获得一些一致性。尤其是，税收收入集中在财政部引起了以前财政上分别独立的各部的相互依靠。与以前相比，更多的信息得到广泛享用，而且部长们和国王的意见、批评能够影响每一个部长的行动。

在1892年之前的年份里，中央政府能够加强其对边远省份，尤其是以前的附属国或者朝贡国的控制。直到1880年代晚期，清迈和普吉(在暹罗半岛西海岸的锡矿中心)的皇家特使才开始实施有效的控制，通过颁布法令和组织征税。而且第一批在东北的特使被任命，他们居住在琅勃拉邦、廊开(旧万象对面)和乌隆。皇子被挑选并任命到这些大多数的位置。作为皇室的成员，他们能够藐视在部里面名义上负责这些省的元老和根深蒂固的地方权威，大部分总督都是继承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的位置。朱拉隆功非常仔细地挑选他的新特使，而且作为一个团体他们非常有效率。例如，在几年内，碧达拉比王子设立了一个出租森林权利的制度，这个制度大大削弱了清迈统治者的专制权力；在廊开的披拉查克王子开始组织一支边防军去阻止老挝中部的混乱，并且去对抗法国在该地区不断上升的军事威胁。如果缺乏合适的人才从事这些政策并且缺少资金来支持它们，那么这些措施也许采取得过早了点。他们采取措施的时间恰到好处，因为这些地方很快就变成了王国的危险点。

187

由于相信湄公河河谷的经济价值并且决心与英帝国在缅甸的势力增长相比较，法国惊慌地观察着暹罗在老挝活动的增加。尽管越南和

暹罗几个世纪以来争夺对老挝的控制,暹罗在19世纪占了上风。不过,暹罗的地位得到了华人强盗何袭击者活动的帮助但是也受到了他们的威胁。作为琅勃拉邦和川圹王国的宗主国,他们也用军事征战回应了何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的侵袭。尤其是在1885年——与此同时,英国侵占了上缅甸,法国完成了对北部越南的征服——一支在老挝的主要的暹罗征战队一直攻击到黑河,最后任命了两个特使去监管琅勃拉邦乌卡姆国王(1872－1887)的民政事务。随之而来的与法国在越南与暹罗边界上的争议,很快就引发了法国对暹罗拥有所有老挝领土宗主权的挑战。1886年的法-暹协议特许法国在琅勃拉邦设立一个副领事,明确认可了暹罗对该地区的宗主权甚至是主权。尽管有这些事实,但是挑战还是展开了。

法国对老挝的宗主权要求是为了其帝国扩展的目的而捏造的。它是建立在这样的论点上的:法国作为越南帝国的“保护人”,继承了越南所谓的以前对老挝王国的宗主权,尽管全面查阅越南在顺化的档案并没有发现支持这些要求的文件。在过去有一段时间,越南王朝获得了对许多老挝王国的真正宗主权,尤其是在1850年代的川圹地区。而且在更早的时候,越南曾经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琅勃拉邦和1828年作为一个王国废止前的万象实施过宗主权。法国的要求尽管无视历史事实,却很快延伸到包括整个湄公河河谷。

促成1893年法-暹危机事件升级的主要人物是奥古斯特·巴维。他曾经率领一组考察者和科学家去调查柬埔寨历史上和现在的资源与条件。1886年他被法国任命为在琅勃拉邦的副领事,这使他成为法国在中印度支那扩张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角色非常适合他。他个人对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抱有巨大的同情,他完全承担了劝说法国政府去“保护”老挝的王子和民众免于所谓的暹罗帝国主义统治的任务。由于在琅勃拉邦负责暹罗军队的将军的一个严重错误,他的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了。尽管1887年巴维告知该将军将会有一次来自何的威胁性的攻击,但是将军忽视了该警告并且留下一座无防卫的城市返回到曼谷。当何到来的时候,巴维挽救了国王和他的暹罗顾问,他们然后逃离,最

188

终到达曼谷。从这点上看，他的暹罗宗主权有效性的观点遭到削弱，巴维积极地去把所有的老挝领土从暹罗中分离出来。1888年，他同来自越南北部的一支法国军队一起吞并了黑河河谷的傣族村落联合体，并且尝试派遣一组人进入到暹罗管理的中部老挝去寻找越南"宗主权"的证据，但是失败了。然后，1889年他回到法国，并且劝说法国政府，把印度支那帝国扩展到湄公河两岸。他率领着巴维使团在1890年回到老挝，该使团是一个人员齐全的科学和商业小组，巴维把他的人分散开来，法国的影响渗入到老挝。

暹罗对此的回应（包括加强在廓开、乌隆和占巴塞的皇家特使的权力以及准备地区的军事防卫）被法国解释为有些不合法，而且被提名为法国在曼谷的常驻公使的巴维向暹罗表达了此观点。在中部湄公河地区无故驱逐了两个法国的"商业"代理人和琅勃拉邦的法国领事死亡（自然原因）之后，危机最终在1893年初爆发了。巴黎授权印度支那当局采取措施来获得这些行为的"赔偿"，并且根据法国对越南"权利"的继承，明确要求对湄公河东部的所有老挝领土行使宗主权。1893年4月，暹罗军队抵制了派往老挝控制疆土的法国军队，并且杀死了一个领导攻击的法国军官，法国找到了他们长期以来就在寻找的发动战争的借口。当法国政府被拒绝派遣战舰沿着湄南河到达曼谷的时候，法国指挥官设法派战舰上去，迫使河口上的防卫部队进行了短暂的交战，尽管巴黎命令战舰停留在河口外面的沙洲上。

189

德瓦旺王子做了一次精彩的尝试来挽救这种状况，他来到曼谷的水边去祝贺法国指挥官通过河口要塞的英勇行为，并且马上同意从湄公河东部撤出暹罗军队。不过，由于有大量的法国民意支持，巴维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把湄公河东部的整个老挝割让给法国，偿付300万法郎的赔偿，处罚对法国在老挝战役中伤亡负有责任的暹罗军官。不久以后又增加了更多的要求，包括占领暹罗与柬埔寨接壤的海岸省份〔尖竹汶和达叻（桐艾）〕，直到最后通牒的条件被执行并且在湄公河西岸和整个西部柬埔寨设立了一个25公里的非军事区。确切地说，暹罗正在被迫同意无耻的要求，只是因为王国保卫了自己的领土以

免外国入侵。这就好像英国一个新上台的政府恢复了 18 世纪对美国的宗主权,然后惩罚美国政府,因为其抵制了派遣去实施宗主权的英国入侵军队。

如果曼谷不同意的话,暹罗是无法防卫法国所威胁的海军封锁的。在长期的争议过程中,英国一直拒绝卷入其中。两个假设似乎支撑暹罗的政策。第一,他们明显相信在一个所谓的由国际法治理的文明的世界里,法国将不会一直坚持他们荒唐的要求,而暹罗已经学习同样的国际法并且去运用它处理与英国的争议。第二,如果情况变得不可收拾,英国可能被依靠来代表他们实施一些力量,即使只是道义上的。不过,法国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英国的反应也没有达到暹罗的期望。正在运作的是补偿优势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法国与英国在大陆东南亚所获得的帝国一样的权利,无论扩张的方式或理由是什么。英国从 1893 年的状况看出了机会:建立法国和英国之间在大陆东南亚的一种权力平衡,这将使他们的敌对没有那么危险。朱拉隆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接受提出的条款,随后在 1893 年 10 月与法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在这个过程中,暹罗甚至不得不把真正属于兰王国的领土割让给法国。)这之后,由于精神和健康都受到了伤害,他从公共事务中退出了几个月。

1893 年的危机不是暹罗争取国家主权的终结,但是它标志着暹罗尝试从一个不可能的状况中挽救自己的努力。这是最后一次王国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放弃领土,而且英国和法国此刻面对着在东南亚达成妥协的必要性。法国对老挝的吞并使得英国和法国的领土在湄公河上游接壤了。如果他们要避免将来对暹罗地位的冲突,那么迅速解决他们对该地区的冲突要求就非常必要了。

190

通过认可暹罗对该地区的要求(与那些对老挝剩余领土的要求相比,这些要求没有那么不合理)来测试在湄公河上游建立一个缓冲国的想法之后,英国和法国在 1896 年同意湄公河为英属缅甸和法属老挝的分界线。他们一起保证湄南河流域经过的所有暹罗部分的独立地位,每一方都进一步同意不去寻求在那里的独家优势。同时,每一方都保

留对湄南河河谷之外的暹罗领土的优势或者要求权利——英国对马来半岛，法国对湄公河流经的东北部地区、西部柬埔寨、曼谷东南部的泰国省份。为了证实这些假设，英国和暹罗秘密地在 1897 年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在暹罗半岛排除第三方的活动，并且禁止暹罗建造一条穿越克拉地峡的运河。与此同时，法国清楚地表明它认为东北部和柬埔寨是它自己影响力和活动的明确场所。

在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面，最终解决与英国和法国关系和修改孟固统治时期的不平等条约的状况得到很大的改进。随着新机会的枯竭，专注于当前附属地的必要性以及欧洲状况不断上升的危险，英—法之间的竞争减弱了。随着 1904 年英法条约的签订，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对暹罗来说，它准备去同列强讨价还价来消除那些造成王国无能的条约，尤其是治外法权。法国在这方面尤其是滥用他们的特权，他们把出生在老挝或者柬埔寨的或者任何出生于老挝或柬埔寨的后裔，甚至来自上海法租界的中国人都看作是“法国的臣民”。因为英国和法国的臣民不受暹罗法庭的管辖，有权利被领事馆法庭审判，所以他们是正义的威胁。条约对土地税和进出口关税的税率限制一方面阻止了暹罗征收急需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王国对鸦片和赌博垄断权的依靠。这 [191] 些不仅让暹罗反感也让英国和法国反感（尽管他们也在他们的殖民地使用这样的税收）。

与英国和法国的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很多年，而且结果姗姗来迟。在 1904 年与法国的协议中，曼谷割让了琅勃拉邦对面的领土、老挝北部占巴塞的小部分剩余领土，而且作为交换，法国承诺从尖竹汶撤出以及对在暹罗登记法国的“被保护者”实行更严格的管理，法国在东北部的特权得到了明文规定。但是法国直到 1906 年才放弃了达叻，撤出尖竹汶。直到签订 1907 年条约，法国才完全撤出并且取消了对其亚洲“臣民”司法管辖权的要求，而 1907 年的条约把柬埔寨西部的马德望、暹粒和诗梳风等省份割让给了法国。

英国也是一样苛刻。只有在德瓦旺和朱拉隆功自我反省之后，条约才得以签订。1909 年 3 月签订的条约有几个秘密的合并，在该条约 [192]

的条款下，暹罗把它对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等马来王国的宗主权转给英国，作为回报，英国同意当现代化的法令颁布之后，他们就把其对所有在暹罗的英国臣民的领事司法管辖权转给当地法庭。对暹罗土地税税率的限制被明确地删除。英国进一步要求并且得到了资助和监督建设联结新加坡和曼谷的半岛铁路专有权，以及德瓦旺的正式承诺暹罗不会允许任何第三方在马来半岛的暹罗部分建立军事或者海军基地。暹罗的官员不会轻易地接受这些巨大牺牲的必要性。对转交四个王国的宗主权，最伤心的是他们的苏丹，他们中的其中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吉打的苏丹)抱怨道："我的国家和人民被人像卖牛一样卖掉了。"①



1900年治外法权下的司法体系。注意两个法官的存在，一个是外国人，因为案子涉及一个外国人。

① *Straits Times*, 26 Jan. 18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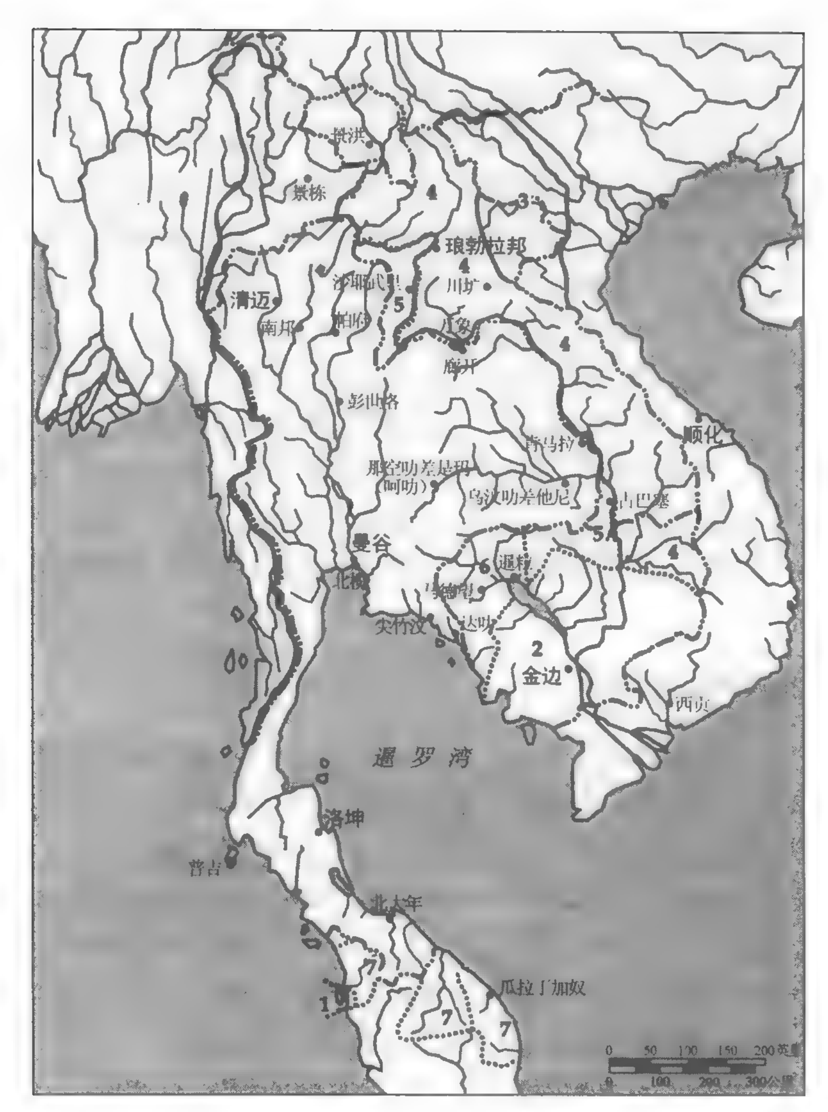
最后暹罗为了维护其独立，放弃了17.6万平方英里(45.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几乎是在第三代统治时期曼谷宗主权下的一半面积。但是领土仅仅是王国所付沉重代价的一部分。在经济方面，由于条约对税率的限制，我们必须计算从进出口关税和土地税上放弃的收入；为了避免外国贷款的政治风险，1892年到1906年间建设铁路资金来自当前的收入而不是借款所带来的附加成本；为了得到有影响力的欧洲人的同情而给予其有利可图的特权所带来的成本；提供给曼谷的欧洲居民便利所带来的成本；而且尤其是当收入应该更好地花费在更具有生产力的项目上如水利的时候，而迅速的军事和海军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花费。因此暹罗不仅仅是牺牲老挝、柬埔寨和马来的利益来获得独立，尽管他们发现自己被转移到了欧洲殖民控制之下。不管怎么说，暹罗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其收获和回报也不仅仅是政治上的。

从改革到现代化

暹罗与英国和法国在1890年代达成妥协之所以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当时两个欧洲强国都对暹罗政府的稳定、对其确保国家一些安全和公共便利的能力以及对其保护欧洲列强条约权利的能力抱有信心。这种假设已经在世纪转换之际的法国和英国的政策中清晰地建立起来了，这个事实可以直接归因于1880年代开始1892年正式启动的改革的成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现代化最成功的部分来自政策的变化，这种变化是1888年革新开始时所无法预料得到的。

193

到了世纪之交，新的内务部已经开始使旧的暹罗王国变成一个国家。1892年晚期，昭披耶·拉坦阿波丁(波老特·坎拉严纳密)被指定为继续担任管理北部省份的部长直到南部和西部的省份从国防部转移给他。不过，拉坦阿波丁由于突然生病不得不被替换。当时看起来是一项奇怪的决定，国王任命了他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兄弟丹龙·腊贾努巴王子(1862－1943)为部长，当时他才30岁并且曾经是公共教育部的部长指定人选。丹龙以一种肯定吓坏下属的方式开始履行他的新责



1785—1909 年泰国的领土损失

1. 1785—1800 年间吉打苏丹割让给英国的领土
2. 1867 年法—暹条约下处于法国保护的柬埔寨领土
3. 1888 年法国夺取的黑傣族人村落联合体
4. 1893 年法—暹条约割让给法国的湄公河东岸
5. 1904 年法—暹条约割让给法国的西岸领土
6. 1907 年法—暹条约割让给法国的柬埔寨西部省份
7. 1909 年英—暹条约割让给英国的马来王国

任，许多下属不久就找到了新的位置。他巡游北部省份，研究行政管理的替代方法，然后着手进行一个集中化和全盘改革的项目，这个项目在 1894 年南部和西部省份从国防部转移到他手下的时候开始顺利开展。

他命名的“特萨披班”制度在 1893 年引入呵叻府。丹龙王子把许多省份划分成一个单一的行政管理单位（“圈”），这个单位处于一个常驻专员的控制之下，类似于早期在东北部的清迈和普吉建立的皇家特使。由于被授予了能够藐视半世袭的省级总督的权力，专员们开始控制地方的税收和花费，检查法庭，引进新的警察部门，同时遏制腐败和司法不公。一些老的官员退休，而另外一些人则进入新的体系。所有的人都被鼓励送他们的儿子去曼谷的学校，这样他们可以继续从事他们家族的职业（但是是在其他的省份）。不久，年轻的受到学校教育的官员在省级的行政管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区一级。这种剧烈的和迅速的集中化带来了国家收入的翻倍、现代法律的引进、一些社会服务的扩展以及以前乡村不了解的一定程度上的个人和财产安全。

195

丹龙能够在省里获得这么多成就部分是因为推翻了 1888 – 1892 年改革中在行政管理中设立的功能分化原则。因为他的部建立在省里面，拥有最少量的职员（尽管 20 年里他非常缺少人手），而且因为更新的部如果没有内务部的帮助的话，就不能处理省里的工作。于是，丹龙迅速接管了正式分配给其他部的功能，尤其是他创立了省收入办公室来征集省里的税收，这种任务完全是属于财政部的。在这一时期来自其他部的很多部门也位于内务部里面——如公共卫生服务——只是因为丹龙能够使他们工作迅速。在把现代教育和佛教僧侣管理引进到省里中，丹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丹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犀利、直率，在他同辈中拥有无可匹敌的行政管理能力，国王放手让其工作，并且经常向他咨询他的部责任之外的事情。

没有很多人像丹龙一样有效率，所有的部长们不得不去和他竞争资金和注意力。财政部在保守的英国顾问的帮助下，有效地进行了预算过程集中化的工作，多年来避免了贷款在欧洲货币市场上的浮动。因此当前收入的很大部分都投入到首都花费上，尤其是建设把快速交

通扩展到东北部(1900年铁路通到呵叻府)和北部的铁路,因为在那里安全考虑和经济或者行政关注一样重要。新的司法部消沉了一段时间,直到拉比王子(1874－1920)接手。他是朱拉隆功从欧洲学习回来的第一个儿子。他精力充沛地与法国和比利时法学家一起,依照拿破仑模式开始着手修改暹罗的法律条款使之符合欧洲的法律——这个政策一方面满足了政府对法律集中化的期望,另一方面反击了法国对暹罗法律"不文明"品质的断言。军事改革在达成共识上进展得比较缓慢,但是到了世纪之交现代军事的核心已经形成,而且从1902年开始了普遍征兵制。到了1905年改革项目已经进展到这个点上:强制性的劳动服务——长期以来旧秩序的经济支柱——开始被取消并且逐渐被一个现金人头税和一个更有限的征兵制所取代。

196

冲突的压力把改革塑造成了妥协。在这期间,暹罗面对的最强大的直接压力是时间。没有时间去小心翼翼地和深思熟虑地进行改革。西方对设施和安全的要求必须很快得到满足,因此现代行政管理和提供最低程度的便利——交通、通讯和合同法等等——必须仓促地通过。与此同时,由于暹罗的现代化已经被政治困难长期延误,改革议程已经被允许堆积,而处理它的方式却没有得到发展。

1890年代行政管理最迫切的要求是受教育的人参与公共服务,这些人对政府尝试引进的变革有一些理解。不过,学校只是从1880年代中期才开始,而且直到1890年代中期,民众对其回应相当缓慢。因此,丹龙王子采纳特萨披班制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他不得不去配置仅仅18个"圈"的办公室,而不是超过100个省府。同样地,受教育人的短缺阻止了大多数的部去迅速发展他们的服务。尤其是,当这些国家机构是新的不为人了解的,因此它们对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没有吸引力。

改革的包袱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尽管内务部在省里的政策以及国家税收两倍和三倍的增加,但是仍然不能应付所有对这些有限收入的要求。金钱趋向于先满足最迫切的需要——省级管理、军队和东北部铁路,尽管其他的部也缺少资金。政府机构的外国顾问提供的建

议——而且每一个部都有几个顾问，且这些顾问的国别得到谨慎平衡——倾向于被地方经验看作是无知的，同时根据暹罗的迫切需要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例如，教育和财政顾问要求设立泰国的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并且警告过度教育的危险。而丹龙正在努力找到从事这些职位的人：助理区官员、会计、警察和打字员。

朱拉隆功如其他人一样，了解他的国家状况的内在矛盾。到了1890 年代，他知道欧洲正在要求的东西，以及隐藏在他们对他的王国的轻蔑判断后面的理论。他知道如何按照欧洲对现代性的定义来发展他的国家，而且他经常对必须做的妥协、没有完成的工作以及正在发展的体系的不完美大失所望。1897 年他第一次访问欧洲，亲眼看到了欧洲现代性的不均衡，对地方习俗的非理性的存留，以及欧洲生活的奢侈和极其不公正。（他访问了伦敦东区，"那里是穷人生活的地方"，而且他打断了他的行程，返回去参观了第二次。）

197

他精神爽朗地回到了曼谷，乐意接受必要的妥协而且相信它们的效用，因为它们能够在一个借来的结构内永久保存暹罗文明中最好的价值。"我相信，"他表示，"在获取（欧洲现代科学）和保持我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的个体性之间不存在根本对立。"[①]这之后，他没有感到负罪感或者不诚实，他能够继续鼓励佛教僧侣在如下领域发挥作用：从事现代教育，改进教学体制去满足暹罗的需要而不是英国或者法国的需要，并且去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暹罗做事情是不同的，因为这里毕竟是暹罗。在没有破坏国家或者其代表的文化的情况下，政府能够被重新定义来服务新的功能。传统的制度——佛教僧侣制度、旧的省级政府制度和君主制本身——在没有复制西方制度的情况下，能够产生新的结果，这种结果在本质上与佛教暹罗文明的理想没有多大的区别。

1910 年的暹罗

当国王朱拉隆功在 1910 年 10 月 24 日去世的时候，整个王国都感

---

① *Bangkok Times*, 26 Jan. 1898.

到震惊。他统治了42年,不是很多人能够记得住任何其他的国王的。朝廷官员用了几个让人忧心忡忡的长夜,尝试找到已经被长久遗忘并且没有完整记录的哀悼和丧葬仪式。许多人泪洒现场,而且穿着哀悼衣服,削发哀悼的人到处都是。消息传到了王国偏远的角落,其反应一方面是对国王和王国成就的自豪,另一方面是对目前将发生什么的害怕和不确定。

如果到了1910年,泰国还不是个现代国家的话,那么它至少是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而且肯定是如此。在面对着外部威胁和国内不小的反对的情况下,朱拉隆功已经为国家创立了一个新的结构,国家拥有了它自己的动量和变化的倾向。不过,这个新暹罗,既不是1850年的暹罗也不是1950年的泰国。

198

1910年的暹罗已经在地图上呈现出它现在的形状,四周的边界都明确划定,并且上了不同的颜色,把它与其在西边和南边接界的英国在缅甸和马来的殖民地以及与其在东边接界的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区别开来,失去的是首都逐渐削弱的五层权力,我们在曼谷王朝早期就指出了这一点。他们现在被一个单一的集中化的曼谷王朝和官僚实施的控制所替代。

琅勃拉邦的萨卡林(Sakkarin)(1894 — 1904)和西萨旺冯(Sisavangvong)(1904 — 1959)等国王们继续统治老挝北部的少量省份,不过此时处于一个法国而不是曼谷常驻专员的监督之下。老挝南部的占巴塞王子昭·拉特萨达奈(Chao Ratsadanai)(1900 — 1934)被法国仅仅当作一个地方显要来对待。他的疆土和曾经是旧的万象王国的一部分的整个中部湄公河河谷目前处于法国官员的管理之下。这些法国官员监督着由当地贵族家族的后裔及法国、越南职员和官吏拼凑成的官僚集团。昭披耶·阿拍蒲柏特(奔)在西部柬埔寨的旧领地再次回到柬埔寨君主的管理之下,同时也在法国的一个很少控制的保护国之下。而且1909年转移到英国宗主权之下的马来王国的各苏丹也一个接一个地与新加坡的总督达成协议,并且接受了英国的“顾问”,尽管吉打苏丹坚持到1923年晚期。于是,所有这些领土都离开了暹罗王国并

且在20世纪将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

到了20世纪初，仍然留在暹罗王国内的所有以前的附属地区，应该会在世纪初进行造反，这应该不让人感到奇怪。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同时这么做了，而且在所有的三个例子中，普通老百姓应该至少与他们的统治者卷入的程度一样。关键的年份是1902年。到了这个时候，丹龙王子对省级管理的改革正在进入高潮并且迅速横扫省里面的旧秩序。曼谷的官员，穿着讲究，自信，受过教育；城市年轻人在首都之外工作，他们正在雄心勃勃地攻击他们认为的北部、东北部和南部的地方统治家族的邪恶和流弊。那里肯定存在邪恶和流弊。这些乡村统治家族依靠农民劳动力的汗水而养得脑满肠肥，而且他们勒索的财物只有很少一部分通过等级转交到首都来进行公共产品再分配（或者是使另一个统治精英富有）。从这些内务部官员的理性和道义观点来看，旧体制是浪费的和无效率的。但是尽管它是剥削的，旧秩序也是一个秩序。它给当地提供了结构，在此基础上人们知道他们期望什么并且他们能够从里面获得一些身份感、家庭和文化感。

199

1902年的三个造反中的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特定状况。在南部，古代北大年王国的七个省里，当地的省长抵制把他们的收入管理权转移给暹罗控制，并且抵制任命曼谷官员到他们管理中的关键位置。北大年的阿卜杜勒·卡迪尔王公(Abdul Kadir)甚至去寻求英国的保护，之后暹罗逮捕了他，匆匆地把他流放到遥远的彭世洛。缺少了他们传统的领导人，很多北大年马来人为独立而斗争的气势至少被暂时地削弱了。几乎是与此同时，在1902年的第一个月里，暹罗东北部发生了通常认为的圣人造反。这是一场大众运动，传遍乌隆地区，还通过湄公河渗透到老挝。这次起义是由来自南部老挝的沙拉湾地区的一个阿僾族(Alak)部落居民领导的，他声称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并且他主要用佛教术语来表达。像野火一样，预言散布“我们了解的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砾石将变成金和银，而金和银将变成砾石。葫芦和南瓜将变成大象和马匹。患白化病的水牛和猪将变成吃人的夜叉。陶·塔密卡拉特（神圣法令里提到的一个

贵族)将统治世界①。

穿过湄公河,"陶·塔密卡拉特"出现在肯马拉,而且征召和武装了1 000多追随者,攻陷城镇。率领军队很快镇压了造反的暹罗官员嘲笑这次起义是无知农民的迷信,但是它不仅仅如此。它短期拥有来自该地区旧的统治家族一些成员的强大支持,而且它似乎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绪: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正在倒塌,正在被一个新的仍然不清楚的但是肯定是"外部"的秩序所代替。

1902年中,同样的事情在北部也发生了。那里被称为掸族起义,因为起初它涉及的主要是掸族移民,他们从缅甸来到帕府地区从事伐木和宝石采掘工作。几百个掸族人攻击政府办公室,迫使暹罗官员放弃帕府;然后他们继续攻击南邦。他们不杀当地统治精英和民众,但是屠杀暹罗人。当起义被镇压了大约六周之后,对其原因的调查表明:造反不仅得到了痛恨暹罗剥夺他们传统特权的地方统治精英的一些支持,也得到了痛恨官员流弊(比如收税来代替劳工服务,但仍然要求劳工服务)的当地民众中的一些支持。

变革确实在迅速地发生,而且它们应该遭到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三个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不过,政府对乡村生活的侵扰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正在被削弱。旧的统治家族正在被替换。他们正在被迫退休,或者他们的收入被取走,或者被新的会计程序所限制;他们的儿子们为了得到区官员的位置而被劝诱去学校,后来被安置在一些遥远的省份;把当地社会黏合在一起的旧的庇护关系土崩瓦解。在法律案件中,当地的统治者不再保护他们的亲戚和仆从。随着1905年强制性的劳工服务制度的终结,他们不再有一个基地定期来联系乡村的人口。旧的地方统治家族于是从他们传统的社会背景中脱离出来了。

如果只是因为更分散的话,同样的情况从底部向上看将更加复杂。

① John B. Murdoch, "The 1901 — 1902 'Holy Man's Rebellion," JSS 62, pt. 1(Jan. 1974): 57.

根据政府在这个时候做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在暹罗大约有3万个村庄。也许比20年或者30年前的数字增加了很多。现在很难想象它，但是19世纪末的暹罗中央平原没有一个地方像今天这样人口稠密。在世纪的后半期仍然有森林紧紧围绕着曼谷，甚至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距离曼谷仅仅20英里或者30英里的地方有野生大象和老虎游荡在乡村。

大量的人口迁移涉及为栽种水稻开辟新的土地。两件事情使之成为可能并且促成了其发生。第一，根据《鲍林条约》，王国向国际贸易的全部主体开放，从而促进了大米种植的经济专业化，这主要养活了缺乏大米的一部分亚洲地区（尤其是印度和中国）。每年平均从暹罗出口的大米数量从1850年代后期的低于100万担（1担等于60公斤）增长到世纪之交的每年超过1 100万担；同时，同一时期每担的平均价格增加了一倍。而且，种植水稻的区域面积从580万莱增加到超过900万莱[①]。这种增长得以实现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家庭的集体决定，他们决定扩展他们种植的土地面积，或者清除并开发新的土地，或者采纳更集约化的农业方法。

201

他们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的第二个考虑。他们比半个世纪前相对自由了。在曼谷王朝第五代国王统治期间，随着奴隶制度的结束和债务奴隶逐渐受到限制，尤其是当1905年差役劳工被取消（即使在一些区域它持续得更长久），把乡村民众同贵族和地方统治精英黏合在一起的束缚大大地减少了。他们目前只是交付一个流通税，一个人头税，而不是向政府提供劳工服务。这些条件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家庭非常有意义，他们实际上可以全职工作：为了市场而种植水稻。而在以前他们只能兼职种植水稻（由于差役）。

许多变化伴随着这些而发展。乡村人口分散了并且得到了增长，而且比前一代人的时候也许远没有那么单一和更具流动性。这时不再

---

① Ingram, *Economic Change*, p. 38. 莱：泰国面积计量单位，1莱＝0.16公顷＝2.4亩。——译者注

受到地方精英的那么多的控制，乡村变得更容易受到官员独断的危害。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政府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赶上了1870年以来乡村的发展，政府越来越侵扰乡村生活。伴随着区级官员、对牛的数量的登记、土地契约以及强制兵役登记，省级警察开始出现。乡村手工艺减少或者完全消失，这是因为人们购买进口的消费品如布匹和工具，而不是自己制造它们。更多的经济变化在乡村成型，因为一些乡村从种植中变得富有，而其他的乡村则没有。土地也变得更有价值。首都的私人企业家与皇族成员一起，在曼谷东北部的兰实地区从事大规模的灌溉。那里水分充足的土地不久变得很有价值而且农业租金也上升了。同样可以测量的是，乡村的生活水准在曼谷第五代统治期间也得到了改进。但是当与农民生活的严酷现实相比，统计上的平均数没有什么意义[1]。

202 当然曼谷王朝第五代统治期间乡村社会变革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与主观感受相关——人们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三件事情——宗教、教育和公民感——当然，所有这些都密切相关。

19世纪中期孟固建立的佛教的改革法宗派到了20世纪初期已经对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知识上和学术上更加严格，但是更少仪式主义，而且它更强调教育不仅是对它的僧侣还包括在俗人口。在瓦持拉延·瓦尧尧特王子(1860－1921)的强有力领导下，它有效地渗透到乡村。王子在19世纪的最后年份里领导该教派，然后成为所有暹罗佛教的主持方丈。法宗派寺庙在王国最贫穷的地区得到了非一般的普及，尤其是在东北部的乌汶圈和南部的洛坤。不过，它们的影响力比数字表明的要大得多。由于皇家的大力支持，瓦持拉延王子在世纪之交对佛教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组和改革，把宗教特使安置到国家的所有地区，调查乡村寺庙和学校，并且重组教会层次。沟通的渠道因此被打开，从而宗教能够施行，文本、仪式、观念能够交流，而且促进了一个

---

① Lauriston Sharp and Lucien M. Hanks, *Bang Chan: Socail History of a Rural Community in Thailand* (Ithaca, 1978).

统一的和共同的王国佛教的发展。制度化的佛教因此到达乡村并且成为王国整合的一个主要的工具。

同时，瓦持拉延王子进入到乡村寺庙，他还从1898年起推动建立乡村学校。几百年来，以文化和宗教思想为基本原理的基础教育曾经是乡村庙宇的主要功能。不过，这种教育是特定的、专门集中在僧侣—学生关系上，使教育内容与单个学生和老师的能力与期望相匹配，但是没有系统的和世俗的品质。世纪之交的新学校使用由曼谷的公共教育部制定的标准化教学大纲和课本。他们不仅向乡村青年介绍使用标准化的文字和语言（已经被称为“曼谷泰语”）的基本能力，以代替地方文字和方言，同时还向乡村青年介绍现代西方类型的数学和科学。（应当说明的是，英属缅甸的佛教僧侣顽强地抵制这样的教学大纲。他们之间的差异必定是，暹罗的努力已经把土著统治者的家族和政府的声誉和权力抛在后面，并且足够改变文本，而大多数的宗教文本是由从某些高棉文改写成暹罗文的）当一代乡村年轻人包括男孩和女孩，开始去他们当地庙宇的学校学习的时候，他们开始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社会中。在曼谷王朝第五代统治的最后十年间，王国作出在全国施行全民义务初等教育的决定，尽管实施这个革命性的决定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203

伴随着这些宗教和教育变化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公民感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它自然来自这些变化，来自一种共同的宗教传统和教育经历的共享。两者构成了社会沟通的新模式，通过这些方式一个社会变得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学校、庙宇以及与政府官员的交流，所有这些都加强了这种想法：所有暹罗的居民都是一个单一国王的臣民，都是一个单一国体的成员。目前，这些想法主要用等级术语来表达。这种等级术语类似于遍布于传统社会的旧的庇护关系。所有暹罗的居民——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包括无数的非暹罗人——现在是同一个恩主即国王的附属。以前对恩主应尽的义务现在则是对国王的义务：忠诚、顺从、纳税、军事服务、教育和合适的行为。作为回报，国王向他们提供安全、保护、正义、同情、需要时候的帮助、道义榜样等等。这个基本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旧概念“臣民”——去掉站立在国王和农民

之间的中间人，与现代概念“公民”之间的一种妥协。它综合了两者的元素，而内在于综合中的矛盾随后将使人担心。

在第五代国王统治期间，伴随着暹罗社会内部变化的，是与该社会一道或者在该社会之上发生的一个主要变化：华人人口的急剧增加。最准确的估计表明华人少数族群从 1825 年的大约 23 万人增加到 1850 年的 30 万人和 1910 年的 79.2 万人。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少于 5%增加到 9.5%。所有这些人，到目前为止最大量的人口(也许超过三分之二)居住在曼谷周围的省份和暹罗湾湾口。不论他们什么时候过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离开了贫穷和充满内乱的华南地区乡村，来到暹罗为寻找更好的生活。他们在暹罗经济的东方市场部门中工作，如当码头上和碾米厂的计件劳工，早期甜菜地和后来曼谷西部市场化园艺社区的农业劳工，零售贸易中的店员和搬运工，装卸工和船员。他们总是首先为其他的华人工作。

204

逐渐地，政府开始雇佣华人劳工来完成像运河建造这样的工作，而不雇佣不支薪的由不情愿的暹罗人组成的差役劳工。一些或也许很多华人移民兴旺起来；并且相当多的人甚至进入到政府服务中。在整个 19 世纪，他们融合进社会的比例很高：大多数的华人是年轻的单身男人，许多人娶了当地的老婆。他们的半华人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以暹罗语言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因此融合相对容易。这些年轻人是第一批对 1880 年代展现的教育机会作出积极回应的人。而且到了世纪之交，他们不成比例地占据了官僚的位置。不过，华人和华—泰少数族群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城市(甚至是曼谷)，而且通过与西方企业的密切合作，他们主导了暹罗经济的现代部门。

在扩展 19 世纪后期的稻米出口经济的过程中，当地农民正在作出理性的决定来使稻米农业专业化，这是他们祖先的职业，他们最了解这个称呼。他们不期望为了令人吃惊的低工资而为其他人工作，并且束缚在一个时钟的对应物上；他们也不急于生活在一个似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由华人主导的外来城市的地方并且从事不熟悉的职业。如果有野心的话，年轻的暹罗人将他们的目光瞄准在官僚中或者佛教僧侣中

的一个职业——这又是一个传统的追求。因此华人确实构建了暹罗经济的现代部门。他们挖掘运河、建设铁路以及建造好的新的政府办公室和曼谷的商店与桥梁。不论是独立还是作为西方公司的雇员，他们都发展了促使稻米出口的经济运作的制度和服务：银行、仓库、批发和零售贸易、碾米厂、把米运到曼谷的航线，甚至出现了在乡村走家串户收购农民的剩余大米并且最终运到香港或者加尔各答或者新加坡的经纪人。从阿育陀耶的最早的日子开始，他们一直是暹罗的一个强大的社区，但是它的权力已经通过密切的庇护关系被国家利用。到了20世纪初，这些联系已经削弱，部分是因为政府的非人格的官僚化，部分是因为华人社区不断增加的规模以及随着融合的减慢，它与社会的分离。从世纪之初，越来越多的华人妇女移民到暹罗并且嫁给华人男子；他们的孩子是华人，而不是暹罗人。于是，在这种社会意义上，到了1910年至少有两个暹罗。

205

第三个暹罗可能是朱拉隆功和他的兄弟们创立的新官僚机构，这种制度非常不同于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世纪前的旧的贵族制度。到了这时，曼谷王朝第四代统治时期的贵族家族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首要地位。他们的成员的很多人仍然活跃在官方职位上，但是他们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族派系和幕僚的身份生存下来。实际上，一些最古老和最强势的家族也许在该世纪的末期已经每况愈下了。因为他们的地位仍然强大，他们慢慢地把他们的儿子送到现代学校，他们认为当工作正在叔叔的部门里或者父亲的部里等着他们的时候，这种教育是没有必要的。在该世纪的末期，小的官僚家庭也许提供了超过他们比例份额的人员给官僚机构，就如华—暹家族一样，他们的经济权力有助于他们迅速地融入暹罗社会。不过，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单一变化是皇家家族所发挥的非同寻常的积极作用。在朱拉隆功统治末期，他的兄弟和儿子们占据了国家大多数的部长位置；但是同样明显的是高级官员也是国王的孙子和重孙子。王子们在陆军和海军的势力尤其强大，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朱拉隆功预见到了军事在国家生活中不断增长的作用。

国王分配给官僚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带来以西方标准衡量的变革，

因此征召年轻人是必要的,他们不仅理解这些标准而且通过现代教育他们已经接受了西方。国王当然比大多数的父亲更有能力向他的男性亲戚保证最好的现代教育。几乎所有他的儿子和许多外甥都被送到欧洲学习,而且与同代人相比,他们的教育和社会优势给他们提供了很少同代人可以与之竞争的公职资格。不过,到了世纪末,曼谷的很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开始征召平民和其他人并且送到国外去培训——例如,去印度的英国森林学校,或者去英国的乡镇教师培训学校,或者去德国和英国的军事学院。其他的人则在为每一个部建立的特别培训学校学习,包括一个大的、有效的军事学院。通过所有这些不同的渠道,在招募中特别强调的是一种正式的西方类型的教育资格;而且这些招募标准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限定了20世纪初期精英的特点。

206

曼谷能够这么彻底地改变官僚机构构成的能力,主要是得力于这样的事实:招募这些人进来是为了在新组织中完成新的功能。例如,旧的省级管理在构成上已经完全当地化,由地区的地方家族主导。丹龙王子的新省级管理是强加给省里的。因此,年轻人首先去新的“圈”管理,后来才出去到省里的总督和区里的官员职位任职。这个时候,传统在位者的权威、功能和特权已经萎缩。而且,专业化的服务机构(如测量部、灌溉部、邮政和电报部)和大的新军事机构都完全或者部分是新的,没有先期的利益与之竞争。因此,当朱拉隆功创立了新官僚机构,分配其功能并且使其对旧精英的儿子们有吸引力的时候,旧的秩序就要消亡了。

造成这次官僚转型这么有效的原因是国王建立的中央对政府的控制程度。为了在1880年代争取主动,朱拉隆功不是简单地再次创立曼谷王朝第一代统治期间王室和部长们的伙伴关系;他还通过打破旧的并创立一个新的社会等级来重新建立皇家对整个政府的权威。尽管如经常指出的那样,通过许多方式,朱拉隆功能够在当时他的现代化项目中发起“从上到下的革命”,确切地说,第五代统治期间的革命来自侧面——至少相对于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平衡。没有权力的精英中的一些人抛弃了大的家族的权力。孟固统治下的君主政体不能够进行现代化,不能够指明根本性变革的方向,而且它受到主要的

家族和部门的摆布来获得支持和实施国家政策。通过把自己的人安置在国家的所有关键的部门中——这是素立亚旺在第四代和第五代统治初期成功运用的策略——而且通过挑选没有独立位置和权力的人，国王能够把官僚机构置于自己的意愿之下，并且与他们一起形成一个政策的统一和一致，从而使一项一致的和强有力的对改革的承诺成为可能。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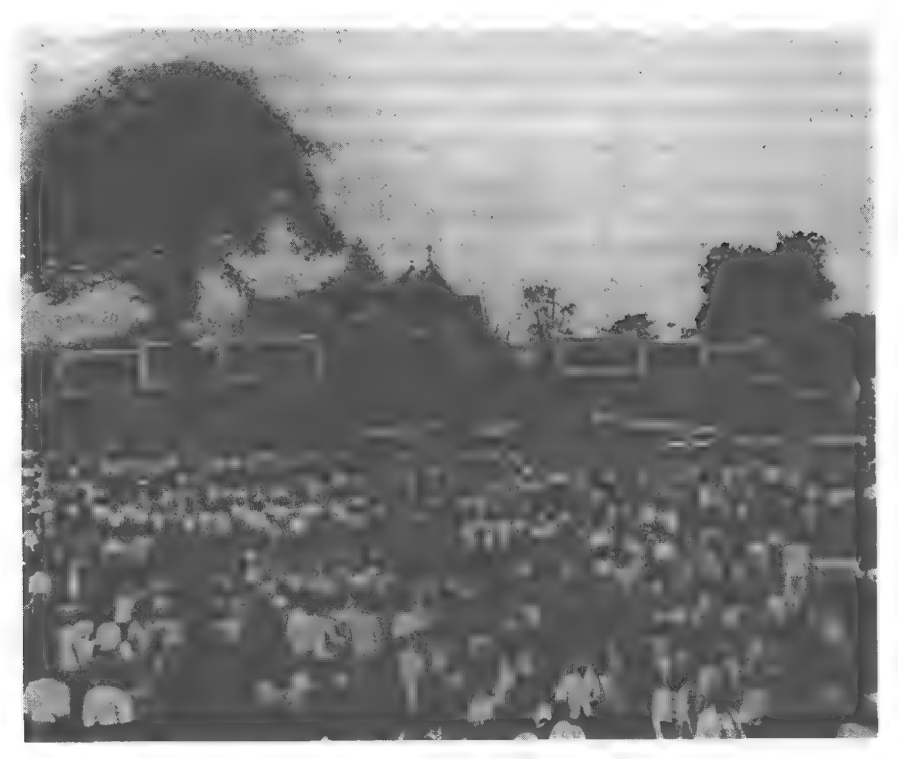
如往常一样，皇家的任命权力是他唯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朱拉隆功能够用超凡的技巧来运用这个权力。可能被国王任命和忽略的一些王子，对他们能够很好地服务于他和国家充满信心——如德瓦旺王子和丹龙王子。其他的部则经常易主。国王有足够的兄弟们来任命而且可以随意免职，从而让他们为了升迁和恩宠而相互之间竞争。旧政权下的部长们通常可以终身服务，但是在整个第五代统治期间，他们没有这种终身职位。最高等级的王子中的一些人拥有充满波折的职业，在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的一系列糟糕表现之后，他们经常被强迫提前退休。尽管国王非常关注他的家族和君主国的将来，他也希望王子们能在国家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更关注现代化的成功和国家的生存事业。他向他的家族清楚地表明，其他条件相同的话，他将任命一个王子或者"好家族"的某人，但是位置总是先给最有资格的那个人，不管他的社会背景如何。这个标准的广泛使用最终给遵守绩优选择原则的一组人带来了权力。不过，尽管它后来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它最终得以在国家结构中永久设立。

行政管理被组织起来保证严密控制。不过，由于国王对他的许多决策权力不下放，很多时候最终还得取决于国王自己的奉献，甚至体力。朱拉隆功在执行这些功能上工作得非常辛苦，他每天要写几百封信，在小事情上作出决定——有时候他自己，有时候根据部长们的建议——如在告示牌上使用的字体，或者关于法国的重大政策。当他的健康欠佳的时候，如在1893年法-暹危机之后的几个月里，他暂时从公务中退出，中央政府一片混乱。不过，到了1890年代末，他对他的部长们的能力已经有足够的信心，于是把业务移交给他们，自己则到欧洲旅游。

通过重塑官僚机构，朱拉隆功不仅仅是创立了完成公共事务的新

的正式的方法。行政机构传统上是社会结构中的主要组织。由于当地人从事的大多数非农业职业将继续包含在官僚机构中,伴随着迅速现代化的职业专业化和社会分化将发生在传统的社会等级模式中,而且它仍然处于王室的控制之下。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被捆绑在曼谷的变革发动机上。政府保留了命令士兵射击、教师教学、牛被接种和铺设路轨的权力。通过其对教育体制的指挥,通过其对佛教僧侣制度的不断增加的控制,它也能灌输现代价值以及能鼓励获得现代技能。通过对几乎所有领域招募官员设立标准,通过其提升和撤职权力,王室能够鼓励被认为对国家好的价值和行为。

208



1908 年朱拉隆功在大城对公众发表演讲

不过,通过这么做,王室和王子们从王宫隔绝的阴影中出来,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的行为和想法充满了每天报刊的版面。国王乐意

甚至渴望在媒体、公共演讲和仪式中直接向他的臣民发表演说，这能够清除存在于朝臣中的使他的前任免于公共监察的阴影。这种被认为与国家、社会以及官方政策成功或者失败密切关联的君主的高曝光率，给现代化工作的履行提供了强大的向前的推力。但是如果踌躇不前，它也使得君主更容易受到公众的批评和不满。

209

第八章　高涨的精英民族主义：1910－1932年

210　如果说国王朱拉隆功建构了现代的暹罗王国，那么也许可以说其两位接着登上王位的儿子则把它建成了一个国家。朱拉隆功统治的主要特点是加强了君主制，并且创立了现代军队和国家官僚制。君主制和官僚制已经在暹罗长期存在，此时它们已获得了使暹罗继续生存而免于殖民控制所需要的新的权力和权威。现在的君主制也许比以前更绝对，并非不是因为它现在能够通过君主控制的官僚机构来实施君主的意旨。而且，曼谷王朝第四和第五代统治初期艰难的政治状况已经促使一支曾经狭隘的社会集团在第五代统治后半期受到了政治和行政控制，下面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1910年几乎所有的朱拉隆功的国家部长们都是他的家族成员、他的兄弟和儿子们。

第五代统治时期的现代化被看作是不均衡发展的一个例子。不同的社会集团以不同的速度正在现代化。皇家家族比任何人速度都快，这是因为其在教育上的领先一步，尤其是去国外学习的特权。他们后来的一代人或半代人是新的官僚精英，他们比皇族晚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获得现代教育。在统治后期，它的领导成员稳步地登上社会的阶梯。社会的所有其他成员都远远在他们下面。事实上，教育、财富、生活方式、接触外部世界以及语言所产生的在暹罗社会中城市受教育的精英

与农民大众之间的社会距离在第五代统治末期是最大的。 211

两个观察能够概括曼谷王朝第六和第七代统治时期的历史，这一时期从1910年朱拉隆功去世到1932年的武力政变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第一，国王瓦吉拉伍德(1910－1925)与下列事情有很大关系：把生命力注入到朱拉隆功的王国内，使它意识到自己至少在精英层次上是一个国家。第二，在这一时期，其他的精英赶上了皇室家族；它获得了凝聚力和政治意愿——尽管，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精英中的军人部分已经首先完成。不过，即使在统治的末期，普通大众仍然远远落在后面。

瓦吉拉伍德国王和泰民族

如果朱拉隆功早去世30年的话，那么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可能是痛苦的和流血的，几乎肯定会涉及国内战争和可能的外国干涉以及暹罗独立的丧失。不过，到了1910年，暹罗已经放弃了继承王位的老规矩，并且采纳了提前很久就指定王位继承人的西方模式。朱拉隆功一直等到副国王威猜赞王子去世一年之后，他才指定瓦吉拉伍海斯为王储。当瓦吉拉伍海斯1895年17岁去世的时候，朱拉隆功指名瓦吉拉伍德为王储(1881)，他是朱拉隆功与王后绍瓦帕所生的大儿子。当时他在英国与监护人一起学习，在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经历了军事训练，并且在剑桥学习了历史和法律，他于1903年初返回暹罗。他是在自己的王宫里被立为王储的，在接下来满是随从的七年里，他沉迷于文学研究和对他家庭内部的管理进行试验。在朱拉隆功1907年第二次游历欧洲的时候，他充当了摄政。他有15年的时间来为他的皇家责任做准备，很少有其他的暹罗国王有这样的福分。薇拉把他称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但是他更应该被称作爱德华时代的绅士。[1]

像他的父亲一样，瓦吉拉伍德经历了两次加冕。第一次在1910年

---

[1] Walter F. Vella, *Chaiyo! King Vajiravud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Honolulu, 1978), p. 9.

11月11日，是一次短暂的、简约的仪式。第二次在1911年11月，是一次13天的盛会，14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包括日本皇储。它的花费超过500万泰铢，相当于当年国家预算的大约8%。大手大脚花钱将成为他统治的一个特点。

212 在他做准备的年份里，瓦吉拉伍德并不为人所知或者得人心。在他登上王位之前，他也没有广泛的支持者和附属者网络。政府和社会由他的叔叔和兄弟们主导，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民事和军事官僚机构中拥有重要的职位。新国王在他统治初期，非常小心翼翼，没有对管理进行全盘的变革，但是他迅速行动去建立个人的追随者。他这么做的方式是一个新时代和一个欧洲背景的特色。1911年5月，他创立了两个军事组织。第一个是王宫部下的一个新单位来保卫皇家居住区，它的创立在国王的兄弟佩理巴托王子领导的军队里引发了一些敌对。第二个是完全新的，所谓的野虎兵团，一个全国性的大众准军事部队。它的主要的功能是保卫"国家、宗教和国王"免受所有敌人(国内和国外)的攻击，同时促进暹罗国家的统一。如国王自己所解释的：

> 这个国家制度的目标是向我们自己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对最高当局——其通过正义和公正管理和维护着国家的独立——的爱和忠诚，忠诚于祖国、国家和我们神圣的宗教，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培养相互的友谊。
>
> 这些品质形成了我们国家生存所依靠的最强大基础而不掩盖它自由国家的名字。①

通过广泛地从行政机构中招募成员(入会费很高，这难住了下层阶级)并且在一个独立于行政机构地位的等级结构中为他们排名，国王越

① The Souvenir of the Siamese Kingdom Exhibition at Lumbini Park B. E. 2468 (Bangkok, 1927; reprint, 1976?), p. 167，引自瓦吉拉伍德在1911年他加冕时候的一次演讲。

过严格的官僚等级机构创立了一种个人追随者团体，接受他个人意志和热情的支配。他认为重要的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共同努力并且去促进爱国主义、战斗性以及对国王和国家的忠诚等新价值，尤其是那些精英，否则他们仍是隔离在他们的官僚职位上。在这里，国王也许以官僚化君主制的干枯事务所不允许的方式获得了对人们的控制感。到了 1912 年初，整个成员已经接近 4 000 人，而且一个持续更长的年轻童子军运动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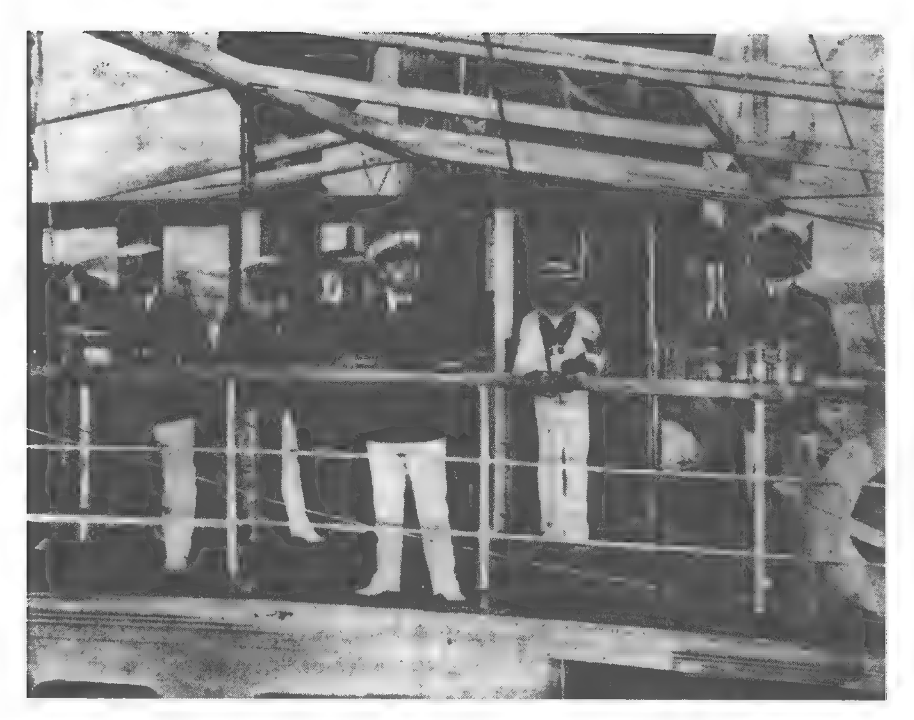
1912 年 2 月 29 日，国王瓦吉拉伍德正在其位于佛统的夏季王宫里进行野虎军事演习，一个载着恰克拉彭（Chakrabongse）王子的专列从曼谷驶来。恰克拉彭王子是军队的总指挥和代理国防部长，他报告说，一群年轻的军事官员正在阴谋发动一场针对国王的政变。在接下来的两天里，92 个年轻人由于在阴谋中的共谋被逮捕。他们几乎都是 20 多岁，并且在军队中担任中尉。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军事学院 1909 年级的同班同学。许多人曾经有华一暹血统。一些年轻人在几年前就对瓦吉拉伍德怀有个人怨恨，但是在这不久以后就转化成了对绝对君主制的一场模糊的意识形态的批评。人们已经卷入到他们自己时代的政治激奋中，尤其是 1911 年 10 月中国的革命。他们认为暹罗是落后的、不公的、腐败的甚至是道德败坏的，他们开始指责他们国家在现存的政府制度上的弊病。而且，他们对军队遭到瓦吉拉伍德的明显贬低感到不满，瓦吉拉伍德似乎正在用野虎兵团来创立自己的军队。

213

谋反者在应该如何行动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两组人支持创立一个君主宪政制度，但是在恰克拉彭王子还是佩理巴托王子成为国王上存在分歧。第三派则想要一个以拉比王子作为总统的政府共和形式。他们辩论赞成对国家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支持促进迅速的经济和教育发展。他们仅仅会面了 12 次，而且在 3 月 1－2 日的逮捕打断他们的行动之前，他们的计划并没有多么深入。2 个月之后，随着皇家宽大处理的继续，三个同谋者被判终身监禁，20 个人每人被判了 20 年徒刑，其余的则被判缓刑。

214

如果回过头来看，流产的 1912 年政变似乎是小规模的，但是在当



1914 年国王瓦吉拉伍德在“摩诃却克里”号皇家游艇上

时却不是。这不是王侯兄弟们参与的王朝争吵的小敌对，而是外部人，一群具有共同背景的年轻人参与的军事阴谋。这在暹罗历史上是一个新的现象。它代表着一种新型政治的开始，把整个国家作为其舞台，并且模糊地为激进改革和变革政府形式提出了一个议事日程。它没有被立即公开，但是伴随着大量的对国王和政府的批评，阴谋和逮捕的消息迅速传遍曼谷。阴谋及其代表和引发的东西，对新国王是个重大的挑战，而且很快迫使他在政府中发挥更积极和更强有力的作用。

在 1912 年期间，瓦吉拉伍德进行了一些行政和人事上的变革，这些直接或者间接都与流产的阴谋提出的问题有关。他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拉比王子召回政府中作为农业部长。他把旧的公共工程部转换成交通部，负责铁路、公路、邮政和电信，昭披耶·旺萨（M. R. W 萨坦·斯尼东）掌管这个部。他让他的叔叔纳叻特王子负责复活的御玺部并且把他的表亲也是一个亲密的个人朋友婆沃拉德王子从外交服务

中召回，安排去负责处理军队中被策划者策反的那些人。他的另一个老朋友也是亲密的个人朋友昭披耶·阿柏拉查(M. R. W. 劳披·素塔特)则被安排为司法部长。

这些任命被看作是国王更直接的干涉政府的一种行为。它们也被看作是王子们在最高级的部级职位中势力下降的开始。渐渐地，越来越多的部长由其他人担任而不是王子，除了德瓦旺王子在外交部，纳叻特王子在御玺部，尖竹汶王子在财政部，拉比王子在农业部。这些其他人几乎都是前任国王的曾孙，他们拥有玛姆·拉特查旺(M. R. W)的皇家地位，他们的家族财富和地位使他们能够更早获得欧洲教育。

215

为了平息关于他糜烂的花费的谣传，同时设计一个更合理的方法来资助必要的发展，国王在 1912 年 3 月任命了一个“调查国家收入和花费委员会”，由两个国库官员和三个外国顾问组成。设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给予国际金融世界以信心，因为他们一定被 1911 — 1912 年度预算中超过 200 万泰铢的赤字吓坏了。由于委员会的工作，财政部编制和监控年度预算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到了 1913 年，国家再次出现了收入超过花费的大量盈余。

但是瓦吉拉伍德对 1912 年挑战最强有力的回应是在一个我们今天也许称之为公共关系和宣传的领域里面。这种回应在他统治的剩余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存在。瓦吉拉伍德长期以来以他的文学才能和爱好以及对喜剧的喜爱而出名。在某些程度上，朱拉隆功曾经沉迷于类似的才华，但是他只是私下为了他自己和他家庭的欣赏。不过，对瓦吉拉伍德来说，艺术是生命的目的，艺术是一种工具，通过它人们可以结合在一起来共享一个更好世界的一种共同远景，从而来使那个世界成为现实。作为王储，他曾经组织他的朝臣和仆从成立了一个名字为“增进知识俱乐部”的小组，他们出版了一本杂志并且创作了戏剧来支持现代价值和行为模式。在成为国王以后，他继续这些努力，因为此时他身后有更多的资源和声望。

15 年中他的作品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笔名下出现在许多媒体上，从期刊和杂志到报纸和戏剧演出，瓦吉拉伍德以几种文学的形式考察

了许多想法。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忽视传统艺术。如他的前任一样，他以很好的暹罗文体为《罗摩衍那》写了一节。他从它们的英语版本翻译梵文戏剧。他对传统文学进行了学术研究。他把一个全新的流派，口语的和西方类型的戏剧添加到暹罗文学中。他把小品文尤其是政治小品文提升到一种艺术形式。在这些作品中最一贯的主题也许被称作是现代性——也就是鼓励甚至告诫人们要像西方的现代人那样行动和生活。他引进了姓氏并且为几百个家庭起了名字；他重塑了暹罗的国旗，用红、白、蓝三色取代了旧的白象在红色的地上。为了纪念国王朱拉隆功(10 月 23 日)和却克里(4 月 6 日)，他引进了第一批国家节日；他推动小组体育，尤其是英式足球；通过鼓励妇女去与男人交往，并且通过辩论支持一夫一妻制来取代普遍存在的一夫多妻制，他努力去改进妇女的地位。1916 年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他负责组织了朱拉隆功大学；1921 年，他的政府最终颁布了一个义务初等教育法，要求年龄在 7 岁至 14 岁之间的所有男孩和女孩都必须去上学(尽管法律首先适用于大约 45%的王国领土上)。

216

在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的问题后面有一个单一的贯穿于整个统治期间的主题——国王瓦吉拉伍德关于"泰民族"的观点。这有时候被称为他的"民族主义"，在这里我们必须对两者进行区分。国王的民族观点包括我们称为民族主义的许多内容。他把民族看作是一个人民的团体，充满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努力争取公共的目标，把公益放在私利之前。民族应该提供个人和集团身份的主要焦点；它是值得去战斗和为之牺牲的某种东西。他构想了主要为了达到民族的目标而应该限制的行为和价值：人们应该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以有益于民族利益的方式来采取行动。除了逻辑上关注国防和国际平等成就之外(包括终结依然限制暹罗自由的不平等条约)，他还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把经济从外国控制中解放出来和制止华人对内部经济的主导。(在这个主题上他写了一篇尖刻的小品文，题目为"东方的犹太人"，他把世纪之交的欧洲反犹主义归因于一些事情，并且呼吁暹罗人在他们自己的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不过，对最终的政治问题的方法中，他缺少最

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区分是好的，但也是重要的。

瓦吉拉伍德的泰民族（他是第一个普及这个短语的）是建立在“民族-宗教-君主”基本的三位一体之上的，所有的三个元素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三位一体的神秘中。效忠于三个中的任何一个就意味着忠诚于所有的三个；不忠诚或者不服从或者不尊重其中的一个就意味着不尊重所有的三个。（进行了一些诡辩来获得暹罗相当多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少数族群的效忠。）

217

不过，民族的这个定义在一个关键方面是错误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为了支持民族，瓦吉拉伍德设立的结构是等级制的，涉及服从以三位一体权威名义的所有的高一级的权威。不过，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把君主制与特定的变革项目联系在一起以及以向现代目标的进展为借口为君主制辩解，这些都取决于这些项目的成功和它们的进展。当现代化进展得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快或者国王表现得没有如人们被引导相信他应该表现的那样的时候，他们诚实地相信，民族利益的东西的追求也许会把他们带进与政府结构和君主制的冲突中。瓦吉拉伍德鼓励他们去拓宽他们的社会圈子，去学习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人会面，民主地在涉及他们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去形成俱乐部和协会并且选举主席、副主席和秘书，去在媒体和公众集会上辩论和争论。所有这些将增进为了民族更好的国家意旨和目的。他当时很少猜疑它，但是他和他的继任者无限期地推动除了政治制度之外的所有方面的变革，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瓦吉拉伍德的“民族”没有考虑一个政治意愿的非等级的表达——平等人之间的政治活动——它缺少“民族主义”。

当然民族是曼谷王朝第六代统治期间的一个中心关注，而且这被用军事术语来加以表述。主要是精英经常参与其中，因此从他们开始。他们购买了新奇的军事制服和设备并且与野虎兵团进行演习，而且他们的孩子参加了学校的“虎子”组织。他们经常被提醒暹罗处于危险中，至迟到1909年，暹罗已经失去领土给巧取豪夺的西方殖民者。而且他们担心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完成对他们的掠夺。他们被告诫准备为他们的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

暹罗在初期宣布其中立政策。尽管国王对协约国的同情,但是军事危险感没有减少。不久,国王通过用一艘现代战舰来装备海军,从而加强暹罗的军事能力。新的皇家海军联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公众运动为购买战舰募集资金。随着战争的进展,军事兴趣和军事价值在增长,亲协约国(Allies)的情绪也逐渐在媒体和政府行动中得以表达。

最后,1917 年,随着美国参战以及协约国致力于把中立国争取到他们一方,暹罗王朝开始担心得胜的协约国在战后也许会拿暹罗的中立来指责它。不过,如果他们参战站在协约国一边的话,他们也许能够为暹罗结束不平等条约的努力添加动力。因此,公开声明他们这么做仅仅是道德上的原因,暹罗政府在 1917 年 7 月 22 日向同盟国(Central Powers)宣战。在敏锐判断了如何最好地增强一个现代暹罗民族的形象之后,一支 1 300 人组成的远征军在 1918 年 6 月被派往法国,包括一个救护组,一支机动舰队和一组汽车司机与技师。(很明显,其他的唯一东南亚人卷入战争的是 20 万越南人在法国被雇为苦力。)

218

尽管已经公开宣称参战是基于道德理由,"权利"和"文明"也许在西方获胜,暹罗政府也寻求政治收益,一是为了避免对获胜的英国不断增加的依靠,二是获得一个可以谈判结束不平等条约的位置。参与战争使暹罗在凡尔赛和会上得到了一个位置,暹罗代表团在那里大力地游说,来获得税收全部自主,终结治外法权和对暹罗法律体系运作的条约限制。由于其他事务对协约国代表团造成的压力,这些努力失败了。因此在巴黎的暹罗部长乍伦(Charoon)王子率领的一小组暹罗外交官制定出了一个谈判战略和一系列内部运作程序,通过这些他们对大国的条约权利发起了协调一致的攻击。

努力是漫长的和艰苦的,并且从 1920 年一直持续到 1926 年。谈判一直在外交部长德瓦旺王子的领导下直到他 1923 年去世,然后继承他位置的是他的儿子德瓦旺·瓦敖达亚(Devawongs Varodaya)王子。所有的谈判都得到了两个美国人的大力支持,埃尔登·詹姆士(Eldon James)(从 1924 年)和弗朗西斯科·B. 塞尔 (Francisco B. Sayre)(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女婿),他们是外交部的顾问。美国在 1920 年底通

过一个新条约率先对暹罗让步。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开始，但是讨论陷入僵局，因为每一个大国都等着看其他大国将让步什么。最终，塞尔接管并且带领一个代表团游历整个欧洲，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谈判。法国最后在1925年2月同意了，英国随后在7月也同意了，在次年所有其他条约强国都照样做了。

这些重要的条约都包含了两个主要的主题。第一个与治外法权有关。现在外国人处在暹罗的法庭和法律的管辖权之下。在所有的现代法律法规颁布之后，外国领事保留了五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此时几乎完成，他们的国民是被告的时候，他们有权移送到他们自己的管辖权下。第二，通过1920－1926年间的条约，暹罗恢复了全部的关税自主，仅仅有很少的有限的例外。例如，与英国的条约中，棉花、钢铁物资和机械的进口关税在十年时间内限制在5%。长期的战役最终获得了胜利；暹罗已经完全再次获得了其主权。

219

同时，回到曼谷之后，谁应该实施那个主权权力以及如何实施是一个重要性逐渐增强的问题。有几个和1912年阴谋一样的公开事件，也许最严重的那一次尚未成形就被1917年中期的一系列逮捕所挫败。（几乎没有关于这一次阴谋的细节披露出来。）[①]更一般来说，在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大量的对国王许多方面的批评，包括从政治上到个人的。一些人认为，国王的成功在于压榨年长的王子并且用没有任何独立社会地位的个人来代替他们，而一些人则认为政府正在变得对国王太恭敬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国家的真正权力在国王喜欢的人的手里：他内部随从的年轻人，他曾经为他们写剧本，与他们一起玩游戏，组织俱乐部和协会。一些人，如去世前的国王朱拉隆功和王后绍瓦帕（他的母亲），都对国王的个人生活和他几乎完全缺乏对异性的兴趣皱眉头。大多数对其统治批评的共同的理由是不赞同瓦吉拉伍德的生活方式，他的奢侈花费和他明显轻佻的专注于游戏和玩耍。

---

① Benjamin A. Batson, "The End of the Absolute Monarch in Siam,"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77, p. 22; Bangkok Times, 25 June 1932.

直到今天，对瓦吉拉伍德的统治仍然充满争议。也许是因为综合了国王的个性和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这种争议在他那个时代更见热烈。国王喜欢男宠陪伴，这本身在政治上是不重要的，直到人们意识到这正在影响他政府内的权力分配以及大大增加了皇家花费。在当时，就如1848年拉克荣纳莱特王子经历的一样，国王遭受到各种理由的批评。

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国王都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变革。通过降低各位王子、他的兄弟们和儿子们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提拔许多平民百姓到依然在扩张的政府的高一级的位置上，他让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他正在共享权力（事实上，他的宠信者比他的高级官员得到了更广泛的招募）。尽管许多人可能反对国王提拔的人，但是他们至少同意政府不再是10年或者20年前那样专门为王子们保留，而且他们能够认同这似乎预示着暹罗精英统治的将来。这种对政府事务的参与感仍然是很有限的。尽管，许多人也许被下列事件的仪式感所鼓舞：野虎兵团所提供的参与，他们对皇家海军联合会等公共事业的动员，伴随国家假日和1918年派遣暹罗远征军到欧洲等重大事件的公共庆典。到了1920年代初期，他们也许在急切盼望更重大的参与。

220

瓦吉拉伍德明显对政治变革缺乏想法或者不关注。薇拉指出他与1885年他父亲意识形态上反对宪政主义一样。他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要求，他认为那是自私动机的、不忠诚的，而且肯定会毁灭暹罗。[①]有时候，甚至他的高级官员都尝试劝说他至少对目前的政府做一些修正。1917年，国王的亲兄弟恰克拉彭王子，当时的财政部长，敦促他复活朱拉隆功时期的立法院，一个全部是任命的实体并且将拥有君主签字后颁布法令的权力以及询问部长的权力。瓦吉拉伍德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由于成员全部是任命的，对国王来说仅仅是一个橡皮图章。[②]

---

① Vella, *Chaiyo!* pp. 60 — 75. M. C. Wibun Sawatwong, Khwamsongcham [Memoirs] (Bangkok, 1943), pp. 28 — 29.

② Chua, *Lords of Life*, p. 290.

1921年，年老的昭披耶·素拉萨克蒙特（朝姆·僧—须韬），第五代统治期间最出名的军人，冒险建议复活朱拉隆功时期给君主建议的枢密院，但是他被以老迈的理由免职了[①]。在国王统治的晚期，有一次他似乎和他的部长们讨论了任命一个总理的可能性，但是他拒绝这样的选择[②]。

两个问题占据了第六代统治期间的最后的年份：经济和财政以及王位继承。从经济上来说，刚刚战后的一段时间不是让人高兴的时刻。暹罗的主要出口物稻米在1919－1921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盛衰周期，加上战后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形成的货币和外汇危机，以及1919－1920年一个灾难性的谷物年，这些造成了经济混乱。在1919－1921年期间，贸易平衡遭遇了巨大的赤字，大量的白银从国家溜走，政府的收入账户在其统治的剩余时间里变成了赤字，王国不断向国外借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其统治结束。造成该状况的一个主要根源是君主花费的稳步增长。内库和王宫部的消费几乎是年度预算的10％。直接在国王控制之下的野虎军团仅仅在1924－1925年就花费了160万泰铢，而整个的王宫预算是900万泰铢（实际的花费也许超过1 200万泰铢），国家预算是9 640万泰铢。国王做了许多努力去遏制财政混乱——例如，两次任命如1912年那样的财政委员会去建议节省——但是都没有成功。很明显，统治期间的经济失败是两方面的原因：皇家的肆意挥霍和国王在建立、保持有效的程序来控制公共花费上的无能。财政估算的日子被推迟了，但不是太长时间。

221

更多的东西牵涉进来，不仅仅是官方的资产负债表。国家开支的分配牵扯到政府努力去发展国家的所有事情。尽管其强调教育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提，但是在1924－1925年只有略微超过3％的预算为了此目的，而23％的是军事开支，超过10％的是皇家开支。

---

① Stephen L. W. Greene, "Thai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Reign of Rama VI(1910－1925),"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Lodon, 1971, p. 326.

② M. C. Wibun Sawatwong, Khwamsongcham [Memoirs] (Bangkok, 1943), pp. 28－29.

最后，在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王位继承问题突然变得显著了。国王朱拉隆功生育了77个孩子，只有他和四个王后所生的七个儿子（包括瓦吉拉伍德）活到了第六代统治期间。选择瓦吉拉伍德继承他的位置，朱拉隆功表明他喜欢通过绍瓦帕王后这一支来继承王位，于是瓦吉拉伍德的弟弟恰克拉彭王子也许成为下一个有望得到王位的人。不过，恰克拉彭在圣彼得堡的军事学校的时候，已经了娶一个俄罗斯女人为妻，这给他继承王位蒙上了阴影，但情况是，他在1920年去世了。1924年国王瓦吉拉伍德颁布了一部继承法令，正式认可王后绍瓦帕的儿子们的基本继承权，如果他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去世了。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里面，他最终又立了几个妻子。同时，瓦吉拉伍德还健在的三个兄弟中的两个去世了，只留下了最年轻的，国王朱拉隆功的第76个孩子，帕恰迪波（Prajadhipok）王子。当瓦吉拉伍德在1925年11月26日去世的时候是他在成为一个女儿的父亲两天之后，帕恰迪波王子是王后绍瓦帕那一支中唯一男性在世者。在瓦吉拉伍德生命终结之时，他留下了一封信，指名帕恰迪波为他的继承人，将是却克里王朝的第七个国王。所有这些都发生得很快。瓦吉拉伍德在死的时候仅仅44岁，而且在1920年和1925年之间他突然去世前，他的大多数的兄弟们都精力充沛地积极在政府中发挥作用。因此，1925年的一系列事件的到来让人大为震惊。不过，没有人比32岁的帕恰迪波——朱拉隆功的最后一个儿子，暹罗的最后一个专制君主——更为震惊的了。

222

最后的专制君主

在却克里王朝历史上，帕恰迪波的统治是最短的，但也许是最有争议的。其统治的开始和结束都处于批评和混乱的阴影之下，还几乎一直受经济问题困扰。不过它的收场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涉及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和部分新精英权力的上升。从1880年代朱拉隆功获得其对行政管理的控制以来，这些新精英的力量一直在增长。于是，一方面，这次统治的短暂历史是伟大的历史力量运动的故事——政治抱负、公共舆论、社会和政治动员、经济现代化等等，而另一方面，它也是个人

和个性以及它们对历史事件影响的故事。评价这些中的每一个的相对功绩都是不容易的，但是理解所有这些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帕恰迪波从他的大哥那里接收的早期遗产是一系列的问题，某些问题在第六代统治期间已经变成慢性的了。这些问题中最急迫的是经济上的：国家的财政处于混乱中，预算严重赤字，皇家账户是会计员的梦魇，充满了债务和有问题的交易。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泰铢的稳定和暹罗国际化经济的活力。经济问题反过来又在许多层次上产生了政治问题。各部对削减开支必要性的争吵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失去控制的官僚制度，官僚阵营之间一直处于战争中，缺乏有效的领导。这种政府的无效率和半瘫痪状态，反过来使一大部分城市精英——实际上他们都被雇佣在官僚制度中(包括军队)，在某些不可测量的程度上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而且如果不是挑战的话，至少开始去怀疑建立在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之上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基本信条。

这是暹罗历史上第一个可轻易看作等同于公共舆论之类的时期。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也是日报和周刊的时代。仅仅1925年，就有七份暹罗文、三份英文和三份中文日报在曼谷出版，而且这之后它们的数字增加了很多。政府和受教育的精英把报纸看作是公共舆论的声音。到1920年代中期，对政府的批评增加了，精英的观点得以在大众媒体中表达和形成。

223

帕恰迪波对他的新责任缺乏准备。他曾经在英国的伊顿和伍尔维奇(Woolwich)军事学院接受教育，最近只是在1924年从法国高级军事学校(Ecole Superieure de Guerre)返回到暹罗，他期望在军队中从事一个普通职员的职业道路；但是在几个月内，他迅速登上了王位继承的阶梯。他没有任何政府工作的经历，他还惧怕他的那些同父异母兄弟和叔叔们，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的年轻和无经历严重影响了他。所有对他有利的是他的活泼、聪明，在他与其他人相处中的一点权谋、谦虚、努力、好学，以及多少受了玷污但仍

然强大有魔力的皇权。

实际上，帕恰迪波作为国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进行了一项制度创新：创立国家最高委员会，目的是为了恢复对君主制和政府的信心。这是一个咨询委员会，由五个皇室高级成员组成，他们都拥有相当多的政府经历。三个人是帕恰迪波的叔叔，包括丹龙·腊贾努巴王子，他长期以来是内务部长(1892－1915)；另外两个是他的兄弟，职业士兵佩理巴托王子和尖竹汶王子，他已经担任了很多年的财政部长(1908－1923)。在他们的建议和支持下，年轻的国王能够开始大踏步前进去迎接马上到来的金融危机(通过把1926－1927年度预算中皇家开支从1 080万泰铢削减到680万泰铢，他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①]。在六个月内他重组了他的内阁。瓦吉拉伍德的12个部长，只有3个留任，离任的大多数人由皇家成员取代。短期来看，这些任命有利于国王，因为他们把那些被认为是无私、诚实和能干的才子带进了政府。不过，长期来看，这些任命似乎是预示了回归皇家寡头——“王子政府”。而且当事情进展得不好的时候，人们更容易指责皇家。

一旦危机过去，到了1926年中期，帕恰迪波就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长期让人困扰的政治发展问题。7月，他写了一份冗长的名字为“暹罗的问题”的备忘录给弗朗西斯科·B. 塞尔，塞尔在国王的请求下访问了曼谷然后返回。国王帕恰迪波在备忘录中寻求什么是他认为当时最重要问题的意见。他提及了九个问题，寻求塞尔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如“这个国家一定要在某天拥有一个议会制度吗？并且盎格鲁-撒克逊类型的议会政府真能适合一个东方民族吗？”以及“这个国家准备好了拥有某种代议制政府了吗？”和“我们应该有一个总理吗？我们应该有一个立法院吗？”他以这个问题作为结束：“能够做一些事情使得华人像以前一样变成暹罗人吗？”[②]在这份文件中，国王对当时王国准备采取

224

---

① Batson, “Absolute Monarchy,” p. 50.

② 备忘录是用英语写的，全文复印在 Benjamin A. Batson, comp. and ed., *Siam's Political Future: Documents from the End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rev. ed. (Ithaca, 1977), pp. 13－22。

代议制民主表达了悲观的态度，但是他认为一个有益的开始也许是从选举市议会开始。总之，国王表明了一种真诚的但谨慎的期望去拓宽暹罗的政治基础。在此事件中，他从塞尔或被推荐作咨询的丹龙王子那里得到的鼓励微乎其微。这第一次对政治变革的热情闪现未带来任何结果。

不过，国王不想让事情到此为止。随着统治时间的慢慢过去，他对政治变革主题的思考渐渐变得不再那么小心翼翼了。这个过程的第二阶段发生在1927年，当时国王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设计一个更宽泛的咨询委员会。作为他们商议的一部分，国王写了一个名字为“暹罗的民主”的备忘录，他在里面认为：

> 如果承认将来某一天我们不得不在暹罗采纳某种形式的民主，我们必须逐步地为之做准备。我们必须学习并且我们必须教育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学习和试验，从而得知议会制政府如何在暹罗运作。我们努力去教育人们提高政治觉悟，去认识到（他们）真正的利益，他们才不会被煽动者或者纯粹的乌托邦梦想者所误导。如果我们拥有一个议会，我们必须教会人们如何去投票以及如何去选举真正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上的代表。①

他看出不久的将来将会涉及枢密院的一个咨询委员会（1927年11月形成），它与早期统治期间设立或者建议的立法院一样，然后再试验城市自治政府。一直到1932年君主专制制度结束，前者运作得不那么引人注目，而后者则从来没有启动。

在整个1920年代后期，压力似乎没有了。繁荣和平衡的国家预算（甚至盈余）回来了，而且政治批评似乎已经消失。不过，在表象之下许多骚动在进行，暂时只限于年轻人，尤其是国外的学生和外侨。

作为可能的“民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任何暹罗少数族

---

① 复印在 Ibid.，pp. 48－50；引自 p. 49。

225 群是挑战政府的重要根源。也许是被世纪之交强加的暹罗的全面控制搞得士气消失殆尽,南部的马来人大部分是沉默的。东北部和北部的老族人此时实际上是无人领导,正在迅速整合到一个不是完全外国的“泰一土地”里面。不过,华人少数族群处于不同的种类,因为其特别的经济作用和权力,还因为其地理上的集中,在暹罗人集中度最高的地方,尤其是曼谷地区,华人又是集中度最高的。而且,在第七代统治期间,华人少数族群达到了其人口的顶峰——在1932年是暹罗总人口的12.2%——而其正融合进暹罗社会,但比以前更缓慢,因为不断增加的华人妇女移民、华文教育和华文报纸的增长以及对中国和中国政治的意识和认同的增强。[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帕恰迪波在1925年关注华人缓慢的融合,在1927年他担心华人的金钱可能主导他将创立的任何代议制政治制度。不过,他实际上面对的是反日本的贸易抵制和抗议(接近暴动),以及正在上升的政治化包括共产主义,尽管在暹罗华人共产主义是相对弱小的而且大部分人倾向于中国。1920年代后期,在暹罗也有一些共产主义活动,涉及到其他的种族集团,包括胡志明在东北部暹罗的越南人少数族群内的工作,以及印尼的陈马六甲(Tan Malaka)对曼谷和清迈的访问。作为政治影响,没有人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的影响。

更成问题的是第七代统治期间亚洲民族主义者在暹罗的活动。除了华人中的反日本活动和华人中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党的斗争之外,暹罗还成了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母国殖民统治的一个基地。暹罗人对这些人的些许同情来自他们对自己免于殖民主义统治的自豪。不过,与此同时,他们非常提防得罪作为他们邻居的殖民强国,并且努力去维持一个良性的中立政策。他们通过每天的报纸接触到邻国的民族主义政治,这也许被认为有助于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而这种政治意识不是不能转化成国内议题的。

不过,在1920年代,暹罗的海外学生是最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和政

①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Ithaca, 1957), p. 183.

治理想的。这些人包括一个小的团体(1924年几乎有400人在海外依靠政府奖学金以及不确定的数量较少的人依靠私人基金)[①]，但是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的数量，因为大多数人来自有影响力的家族并且带着拥有第一手西方知识的声誉。他们很享受在海外的日子，脱离了当地社会控制并且可以获得只有距离才能提供的观点。压倒多数的人在英国学习并且带着一种温文尔雅的猜疑返回，这最终是阶级意识方面的威权主义，并且不涉及意识形态的。不过，少量在法国学习的人则更意识形态化，更激进。这些人包括法律专业的学生和年轻的军官，1920年代中期他们在巴黎聚会讨论社会主义和大众民主。在他们中间，尤其积极的是年轻的律师比里·帕侬荣，第七代统治期间他在司法部编纂暹罗法律，还在朱拉隆功大学教授法律。另一个积极的是披莱克·凯塔桑克哈，他参加了高级军事训练，然后回到暹罗在军中担任一名少校，头衔是銮·披汶颂堪。这些年轻人非常不满意旧的皇家秩序和君主专制制度，而且他们开始秘密地图谋颠覆。 226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1920年代后期一支暹罗知识分子的崛起，受到良好教育的属于城市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很难说暹罗以前缺少知识分子生活，因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文学和艺术已经长期繁荣。至少早在第三代统治期间在暹罗知识分子生活中就有一点社会批评，大部分以传统诗来表达。第五代统治后期和第六代统治初期，少量的特立独行者和局外人，尖刻地批评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在他们中间值得注意的是世纪之交的记者和散文家库拉披和提安万，这两个平民都因为他们的写作而蹲过监狱。

不过，直到1920年代才出现可将其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的作家和艺术家团体，甚至是阶级团体。这些团体能够在第七代统治时期的记者和那些为很多新杂志写稿的人中间找到。这一时期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实际上1928－1929年期间暹罗同时出现了第一批现代小说——作者分别有库拉披·赛帕迪提(Kulap Saipradit)、阿卡岱姆空

① Batson, "*Absolute Monarchy*," p. 72.

(Akatdamkoeng)王子、道克迈·绍特("Dokmai Sot")、波帕·坤加拉·尼曼河民(M. L. Buppha Kunjara Nimmanhemin),他们都关注西方文化和暹罗文化的冲突或者是现代化的个人和社会成本。与此同时,小说、散文和各种领域书籍的出版大量增加。引用唯一一个也许是最不寻常的,即在 1927 年,西提袍恩·克立达卡拉(Sithiporn Kridakara)王子创立了一个农业期刊《卡西孔》(*Kasikon*),来作为实际上是一场一个人开战的组成部分来支持暹罗农民的事业。

这里的重要意义是,到了第七代统治已经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社区,他们不依靠政府来获得支持,并且在不依靠那些掌权的人的情况下,能够开始处理暹罗的问题。只要媒体是相对自由的,他们就能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发挥一些重要的影响。

不过,公众舆论也并非都容易受到影响。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中产阶级的观点可能是华人的观点或可被整合进权威的官僚结构中。尽管许多人的思想(尤其是年轻人的)也许是由知识分子通过媒体而形成的,但他们仍然是相对被动的。不过,很多人私下一定会抱怨现存的秩序,毕竟这个秩序限制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依靠这个秩序来生存,在这个秩序的基础之上他们已经形成了作为暹罗人的身份。打破他们对现存制度的信任将是一个深刻的震荡。

当 1930 年代初期大萧条袭击暹罗的时候,那种震荡就到来了。从 1930 年到 1932 年初两年的时间内,大米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土地的价值下降到以前的六分之一。因为大米是暹罗经济的一个占优势的组成部分,它的加剧下落就成了一个灾难。由于大量减少的现金收入,农民没钱缴税或者偿还他们的债主,而且他们不能购买零售物品。1932 年初期,政府面对着削减三分之一政府开支的必要性。情况更糟糕的是,一场金融危机产生了。当时在英国财政顾问的督促下,暹罗固执地维持着金本位制作为其货币的基础,而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这就意味着暹罗的大米价格比以往要高很多。它也引发了大量的黄金从暹罗流出。

当政府准备佛历(B. E.) 2475 年度——即从 1932 年 4 月 1 日开始的财政年度——预算的时候,关键的时刻到来了。战斗在政府内部

激烈进行，并且扩大到报纸的版面上，争论的内容包括经济政策、紧缩、工资削减和新税收方法、金本位制和泰铢贬值以及期望的1932－1933年度的收入和开支水平。公众也许得出结论：政府是优柔寡断的，单个的部长们（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王子）更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作为整体的经济福利，而且许多人包括国王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1932年2月在军官的一场集会前，帕恰迪波发表了演说，包括下面的段落：

> 财政战争确实是非常艰难的。甚至专家都相互反驳直到他们的声音变得嘶哑。每一个人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建议。我自己对财政一点都不懂。我能做的是倾听其他人的观点并且选择最好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困难；因此，如果我犯了错误的话，我真的希望暹罗官员和人民原谅。[①]

这个坦白是谦虚的和诚实的，更有信心的虚张声势也许会让人们更加放心，但是他们正在开始对政府应付他们生存中的最重要部分的能力失去信心。

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不一定是最政治的。除了大量地解雇政府官员和冻结提拔之外，政府创立了工资削减和工资税。许多人很快就指出这不是所得税。它只影响那些（几乎全部是政府雇员）通过工资获得报酬的人，而遗漏了从租金、版税、分红、利息和商业企业利润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换句话说，暹罗中产阶级遭到剧烈打击，而华人、上层阶级和王族则征税极轻。农民的土地税每年削减20％，而他们的现金收入却下降了三分之二，因此他们遭受的打击最严重。

为什么当时没有一场农民革命？暹罗的农民仍然没有生活在生存

① Bangkok Times, 13 Feb. 1932, in Batson, *Siam's Political Future*, p. 80. 我已经在原初泰文的基础上修正了对第四句的翻译，来自 Batson, p. 73, n. 6. Kenneth Perry Landon, *Siam in Transition: A Brief Survey of Cultural Trends in the Five Years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32* (Chicago, 1939; reprint, New York, 1968), p. 10。

线以上较高的水平上。除了几个大的地区例外，特别是在曼谷东北部的兰实地区，几乎所有的农民家庭仍然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且能够养活自己。他们失去的是他们的盈余以及一些大米，这些大米是他们过去吃的，但是现在要去卖掉（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以偿付税收。而且，由于他们的数量，他们没有人来领导。他们与当前缺席的当地旧的贵族旧的沟通渠道已没有了。他们只能向国王寻求帮助，而且为了免税或者信贷，几千人向他请愿。

229 中产阶级也是分散的，分成几百个现代化的庇护网络布满了整个官僚机构。由于他们没有能够共享和表达他们不满的组织和交流渠道，大多数人仅仅能写抱怨信到日报——由于担心官僚惩罚，通常他们只是签署笔名。

政府和国王担心的是大众不满的上升程度。当时在许多人的脑海中是一个古老的预言，这个预言可以回溯到 1827 年之前并且归功于国王拉玛一世的妹妹纳琳特薇公主。它被解释为预测却克里王朝将持续 150 年。根据预言，到 1932 年 4 月 6 日，时间就到了。帕恰迪波的回应是再次回到引进一些代议制政府的可行性，这与其说针对预言不如说是政治气氛。这一次他首先转向德瓦旺·瓦敖达亚王子，他的外交部长，1929 年他要求去学习研究荷属东印度的代议制制度。1932 年初，他要求王子上交一个宪法的计划，因为他也许在 4 月 6 日将其引进。230 德瓦旺，反过来把起草任务委托给了他的美国顾问雷蒙德· B. 斯蒂文斯和副部长披耶·室利·威萨恩·瓦加。他们的计划在 3 月初提交到国王那里。这个宪法计划请求国王把行政功能委托给一个任命的总理手里，总理将主持一个向立法会负责的内阁，立法会的成员将是半选举（间接选举）半任命的。这个计划下的宪法在很多方面类似于 1932 年 6 月之后实际引进的宪法。不过，帕恰迪波几乎没有去实施，很明显是因为某些王子和国家高级委员会成员的反对。4 月 6 日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情况下过去了。

不过，11 周以后，当时国王正在海边休假，一小组的中等官员，仅仅超过 100 人，在 1932 年 6 月 24 日凌晨发动了一场闪电般迅速的武



曼谷王朝第七代统治期间警察的不端行为。图片取自北大年宽奈寺庙壁画。转引自 *Borannakhadi' 26*（BangKok，1983），p. 261。

力政变。由于仅仅少量的军队在他们控制之下，他们虚张声势并且停顿了首都的其他军事单位，围捕了政府的主要官员，接着派了一个代表团以人民党的名义，去恳求国王同意服从一个宪法。国王回答：

> 我已经收到你们要求我回到曼谷作为一个宪政君主。为了和平；以及为了免于无用的流血；为了避免对国家造成混乱和损失；而且，因为我已经考虑自己进行这样的变革，我乐意合作来建立一个我乐意去服务的宪法。[①]

① Kenneth Perry Landon, *Siam in Transition: A Brief Survey of Cultural Trends in the Five Years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32* (Chicago, 1939; reprint, New York, 1968), p. 10.

小组的密谋策划者,或者是“推动者”——49 个陆军和海军官员以及 65 个文官——他们由比里·帕侬荣和銮 · 披汶颂堪组织,成功地突然结束了曼谷王朝 150 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下一章将考察 1932 年夺取权力的这个小组的本质。不过,在离开君主专制制度之前,我们反思一下帕恰迪波的失败。大多数人将同意帕恰迪波的主要弱点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他经常被看作是软弱的,因为他过度尊重他的长者。我们特别指出他没能遵循他善意的期望,在其统治后期去发起渐进的民主改革。考虑到他的背景和登上王位的出人意料以及他诚心诚意去最大化运用被瓦吉拉伍德冷落的那些老资格王子们的无可争辩的才能和经历,这个特定的弱点也没有什么让人奇怪的。

231

不过,国王不是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 软弱,胆小,没信心。他是一个工作努力、有效的国王,他智力上也符合他职位的要求,而且他能够克服他的顾问和部长的反对。他和他周围的人只是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股力量正在曼谷的精英内部发展,尤其是在更年轻的一代中间。也许帕恰迪波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不想去蔑视他最密切的顾问。帕恰迪波也不想成为一个专制主义者,而且在关键的议题上,他对是否应该强加自己的意愿给统治精英有点犹豫不决。因此,他自相矛盾地避开使用专制权力去结束专制权力! 直到 1941 年 5 月他在流亡中死亡,许多人将同意他的判断: 1932 年转向民主为时过早了。

第九章　军人主导：1932－1957 年

泰国历史从 1932 年开始围绕着军人发展。在本章和下一章的泰国历史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必须考虑军人。记住泰国的军人是一个社会制度，也是个政治和军事制度。在 1932 年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之后的前四分之一世纪里面，军人正在崛起，而且从大约 1957 年起，其地位逐渐被破坏。本章将采用一个对泰国政治的社会解释，表明社会制度和社会凝聚力在谁统治谁以及国家资源如何分配的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 232

回到 1890 年代，国王朱拉隆功当时担心暹罗的政治将来，并且猜测军人最终将在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军人具有相当多的优势。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它有很高的声誉；从曼谷王朝第五代到第七代统治期间它是王子们喜欢的职业。它示范了泰国社会中一些最强大最持久的价值。它具有非常明显的等级性。与旧的萨克迪纳制度一样，军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及按照其军队中的等级着装。军官团体能够拥有这么高的社会凝聚力，是因为他们共享了一个同一的社会化过程。他们都在有同一个军事学院学习的经历，被同样的课程所塑造，以及受到特别强调军人是国家保护人的公共价值核心的熏陶。文官等级结构分成部和部门，以及小集团、派系和追随者。军人也这样互相划分，尤其在陆军和海军中。但是相对于他们文官的竞争对 233



1932 年革命中推动者集团中的陆军成员

手,军人更具凝聚力——而且他们还有使用武力的垄断权。

在四分之一世纪的宪政统治期间,没有任何文官团体拥有军人的凝聚力。一些政治意义的派系能够在法律职业中找到(在司法部和大学,但是直到最近都很难在外面其他的地方找到),而且后来能够在宪政统治形成的政治制度中找到。他们似乎很少有很大的实力或者公共诉求。相反,军人拥有普通士兵的平稳连续性,通过强制军事训练步入军队,他们也许培养了对该时期士兵-政治家所表达的价值的一些理解和共鸣。文官很难在政治中同军人带到公共论坛中的力量竞争。

1932 — 1957 年期间与在这之前的所有时间的一个对照是:王室这期间是缺席的。帕恰迪波不久就与军人闹翻了并且在 1934 年去了国外。当他在 1935 年初放弃王位的时候,他的继任者是一个当时在瑞士学校的男孩,他除了在 1938 年短暂回国之外,一直到 1946 年才返回到暹罗。他不久就去世了,被另一个小孩继承了王位,这小孩直到 1957 年后才在社会中发挥一种可见的作用。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暹罗社会缺少了这么多世纪曾经拥有的以及自从恢复后它所拥有的皇家焦点。于是,这是一个最非同寻常的时期,不是由国王主导而是由一小撮 1932 年政变的"推动者"所主导。他们不得不去面对和克服

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界和强国政治所带来的危险，再次接受维护暹罗不稳定独立地位的挑战。

宪政初期阶段

除了其长期的意义之外，从字面上看，1932年6月24日军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政变不能被准确地描述为一场革命。它是由一小撮阴谋者和几百人的军队完成的，而且仅仅有一例死伤。它起初的成功依靠出其不意和虚张声势，然后是靠"推动者"拥有王侯人质，最后得到皇家批准的承认——所有这些都在仅仅几个小时内完成。一直到它结束，公众甚至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而且在6月24日中午之前，曼谷和暹罗的生活一切照旧进行，但是一批新领导上台了。

如果他们没有把高级军官包括在他们队伍中的话，1932年政变的114个"推动者"不可能成功，这些高级军官在团体中的会员身份加强了可信度。这也许还表明了军官开始对旧秩序失去信心的程度。这些人与比里·帕侬荣领导的左倾年轻文官相比是相对保守的。他们主导了早期的宪政政权一直到1930年代晚期。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披耶·帕凤〔Phraya Phahonphonphayuhasena(Phot Phahonythin)〕和披耶·颂(特披·攀图姆森)〔Phraya Songsuradet(Thep Panthumsen)〕，两个人在1932年都是上校，披耶·颂在曼谷的军事学院有一个高级职位，因此使得阴谋者能够得到广泛的联系并接近一个逐渐被灌输的学生军团机会。他的战术天才使得他能够用一小撮军队来抵消一个强大军队和政府的力量。披耶·帕凤以他的个人正直而出名，这使他能够被"推动者"中的所有派系接受为人民党的领导。

在劝诱国王认可他们的行动之后，"推动者"开始在6月27日的临时宪法下组织一个政府。为了最小化内部抵制以及避免他们认为内乱将引来的国外干涉，"推动者"起初在幕后活动，尽管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了局势。当时由比里制定的长期政治项目设想了一个三阶段的政治发展过程。第一阶段这时已经开始，采纳了一个临时宪法，建立了一个由"推动者"任命的70人议会以及一个出自议会并对议会负责的更小

235

的人民委员会。第二个阶段在六个月内开始,一个类似于3月份为帕恰迪波起草的宪法,一个全国议会,一半是任命的,一半是间接选举的。当全国一半的人口都完成了初级教育,或者在十年内,取决于哪个在前,第三阶段的完全代议制政府将会启动。总体框架根据政治领导和人民党的指导来确定。

这个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大众成员或者追随者,它也没有对军队进行实际的控制,因此由它组成的第一个政府展示了至少表面上的广泛支持。第一个全国性议会包括许多高级官员,其中包括一些旧政权的昭披耶,大约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议会主席是昭披耶·塔玛萨克孟提(萨南·特帕特萨丁),他是前教育部长。处理政府日常管理的人民委员会里面有11个“推动者”,其中包括四个主要派系的领导和四个高级官员。在后者里面,最重要的有披耶·玛诺帕空提他达(空·胡塔辛),一个让人尊敬的上诉法庭的法官,和披耶·室利·威萨恩·瓦加,前外交次长和国王帕恰迪波的顾问。披耶·室利·威萨恩·瓦加是新的外交部长,披耶·玛诺则成为总理和财政部长。

与此同时,在安排有经验的人掌控政府的同时,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人民党重组了陆军和海军,把他们的人安置在关键的职位上,并且开始尝试去建立一个民众的选举区。他们很快就发现第一个过程要比后者容易得多,因为人们不会去参加集会和游行,除非有人命令他们这么做,而且目前很多想参加他们队伍的人的动机是期望在新政府里面找到工作。缺少可靠的大众支持在几个月内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使得人民党内部的年轻文官派系在同军人和拥有官僚经历以及精英内联系网络的高级文官争夺影响力的时候处于严重的劣势。

一旦1932年12月10日的永久性宪法生效,潜藏在统治联盟内部的冲突和竞争就开始爆发了。人们在开始就能够发现有五个主要的派系在新政权内争夺权力。老的保守派分成两个团体:由披耶·曼诺名义上领导的高级文官的团体和一个让人难以琢磨的无领导的保皇派后卫的团体。另一方面,“推动者”也分成三个团体:披耶·帕凤的高级军人派系,其背后的真正力量是披耶·颂;銮披汶领导的年轻陆军和海军派系;

236

比里·帕侬荣领导的文官派系。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涉及各种派系合并的策略之后，1933年的三次大的危机决定了竞争将有利于年轻的军人。

第一，1933年初，政府的领导人鼓励比里为国家起草一个新的经济发展计划。他提出的计划部分是基于他在巴黎参与的报告，但是该计划是模糊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方案，如土地和劳动力国有化，把暹罗社会的所有成员纳入到官僚制中成为政府官员甚至农民，以及一个工业化项目。保守派和大多数的一般军人攻击该计划是共产主义的，甚至寻求国王的帮助来声讨它。当全国议会在更年轻的更激进的比里派系主导下变得焦虑不安的时候，它休会了，然后颁布了一部反共产主义法案。由于不断地遭受攻击，比里被要求流亡一段时间，于是他去了法国。政府已经取缔了所有的政治政党，因此防止了任何尝试建立可能对其构成挑战的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

第二，当时人们开始觉得，通过拒绝他们直接领导军队，玛诺和颂正在打算设法对付更年轻的军人派系。最后的结果是年老的保守派控制了所有权力。年轻军人派系费力地赢得了披耶·帕凤的支持，于是他们在1933年6月20日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政变，这一次又没有流血，结束了披耶·玛诺的政府并且立披耶·帕凤为总理。七个“推动者”进入新内阁，但是他们仍然犹豫不决是否直接掌控各个部，于是让可信赖的高级官员控制这些部。当全国议会再次召开的时候，它通过了一部法律，从而合法化了武力政变带来的行政管理的变化，同时采取了一个决然的反共产主义的姿态。披耶·帕凤的新行政管理似乎已经意识到其在权力中的生存取决于一个稳定和持续的形象。他们不能够与被激进主义阴影笼罩的官僚中产阶级为敌。他们最好小心翼翼，因为仅仅四个月之后，王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接近于内战。

237

第三，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曾经有相当多的抱怨、内讧，甚至阴谋推翻新政权。这些行为有许多动机包括君主主义和未能得逞的野心。1933年10月，这些都凝聚在婆沃拉德（Boworadet）王子周围，他是国王朱拉隆功的孙子，曾经是帕恰迪波下面的作战部长。在那个月

的月初,他突然以一个省的军队反叛领导人的身份出现,他煽动呵叻府的驻军造反。由于北标和阿育陀耶驻军的加入,他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他率领军队向曼谷进发。10 月 12 日,他夺取了廊曼机场并且攻入城市北部的郊区。通过指责政府怂恿对国王不尊重和煽动共产主义,造反军队要求政府辞职。在这次事件中,国王侥幸脱险。其他几个省的驻军也造反了,但是忠诚的军队阻止了他们加入到婆沃拉德的军队去攻击曼谷。造反军队还想指望曼谷的一些陆军和海军的单位的支持,但是这些都没有实现。

政府对这次造反的军事上的反应是: 10 月 13 日到 16 日之间,中校披汶作为战地指挥官在曼谷北部边缘组织并发起了反击。战斗是激烈的,而且双方都有重大的伤亡。最后战斗中断了,造反军队沿着呵叻府的方向后退。当政府的军队在 10 月 25 日接近该城的时候,婆沃拉德王子意识到他的事情失败了并且流亡到法属印度支那。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国王帕恰迪波支持造反,尽管这已经增加了政府对他的不信任。危机期间大众对政府的支持相当高,尤其是在曼谷,那里很多人自愿参加政府部队。由于有一个新的深孚人心的在马背上的披汶,走出危机的政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

几个月之后,在 1934 年初,国王帕恰迪波与新政权的关系逐渐变得更加紧张,他到国外去进行医药治疗。他从英国同政府进行了一次通信,内容集中在他能够继续作为一个暹罗宪政君主的条件。除了要求继续保持一些比如赦免权等传统的皇家特权之外,他急于想缓和新政权不民主的本质,例如也许是代表"民众"在任命全国议会成员上拥有一些声音。但是政府将不会同意这些。于是,在 1935 年 3 月 2 日,国王帕恰迪波退位。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发布了一条简短的公众信息,他对政权的批评包含在下面的短语里,那之后这些短语经常被批评暹罗缓慢政治发展的批评者所引用:

238

> 我乐意把我以前行使的权力上交给作为整体的民众,但是我不想把它们转交给任何个人或者任何团体去以一种民主的方式来

使用，却没有听从民众的声音。[1]

接受了他的退位之后，全国议会邀请阿南达·玛希敦王子（他是当时在瑞士学校的玛希敦王子的10岁儿子）登上王位并且任命了摄政，包括两个年老的王子和昭披耶·尧玛拉特（攀·素库姆）。

在击败了所有内部的挑战者之后，政府此时要去接受如何兑现其承诺的考验，正是依靠这些承诺，它才获得了权力。在战争的阴云开始聚集并且影响其努力之前，它有大约五年的时间去这么做。

在获得权力之后，人民党曾经承诺当人口的教育水平允许的时候，将准许一个全部选举的议会。值得称道的是，它采取了比其任何前任都更咄咄逼人的步骤最终实施了义务初级教育法律。教育所需要的主要是金钱，因此政府在1933－1934年和1937－1938年之间把教育开支增加了四倍，而同一时期的政府开支增加了仅仅三分之一。即使普遍的义务教育仍然没有实现，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将不会到达更偏远的地区，但是至少政府正在踏踏实实地努力。后来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他们大体上是成功的。在1930年代中期参加学校的孩子的年龄组拥有超过60%的识字率（男性，超过80%），而且同仅仅大五岁的女人相比，那些女性尤其更可能是识字的。

同一时期，军事预算加倍了。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比人们认为的更复杂。当然政府内的主要派系正在中饱私囊，如提升自己的人和改进设备及设施，并且加强军事招募。不过，他们这么做无论如何也不是愤世嫉俗或者是心胸狭窄。许多人相信大国仍然对暹罗有阴谋诡计，当他们与绝对君主制的同情关系终结之后，尤其是这样认为。由于这一时期威权和法西斯政权正在席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许多人还相信战争正要来临而且他们卷入了军国主义的情感潮流中。许多暹罗人对德国和意大利甚至是日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对这些国家着迷，尤其是日本。从1932年宪政阶段开始，年轻的军人派系就与日本的官

239

[1] Batson, *Siam's Political Future*, p. 102.

员和利益联系密切。这种趋向的变化对一些人代表着现实主义，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理想主义，相当于同他们自己的过去做一个政治上和制度上的一刀两断。这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主义的时代，强大的军人被描述为正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领导国家。“育瓦冲(好战的青年)运动”传遍全国，这项运动以培训和操练青少年作为一支准军事部队为特色。披汶在 1938 年 11 月宣称在 1 400 万人口中现有 100 万士兵，毫无疑问，这一数字将正规军和预备役一起包括在内。

在经济政策领域，即使政府什么都不做，那么其看起来也是很好的。它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候获得权力，并且几乎是暹罗的经济马上就得到了改善。1932 年 5 月 11 日脱离金本位制，这刺激了暹罗的大米出口。出口总值从 1931 — 1932 年的 13 400 万泰铢增加到 1932 — 1933 年的 15 300 万泰铢和 1938 — 1939 年的 20 400 万泰铢。政府预算也增加了。开支从 1932 — 1933 年的 7 000 万泰铢增加到 1938 — 1939 年的 11 100 万泰铢，而收入则从 1932 — 1933 年的 8 000 万泰铢增加到 1938 — 1939 年的 11 800 万泰铢。删除首都开支，在这一时期国家的预算每年都有盈余，证明了持续的财政保守主义，不管经济辞令有时候多么激进，而且辞令也不是这么强烈。政府的政策强调合作社和政府对农业信贷的支持。它主要的即时行动是公开撤销让人讨厌的工资税，由一个无效的所得税来代替，取消农民的土地和人头税，为了支持低等级的官员而调整行政机构的工资比例。总之，从大萧条最糟糕时候的经济复兴是迅速的，这也反映了对政府的信任。

宪政政权的初期是激动人心的，尤其是对单词“宪政”和“民主”的意思没有真正概念的人来说。有些人认为“民主”是帕恰迪波的兄弟，或者“宪政”是披耶·帕凤的一个亲戚。1932 年有许多零星的报道：年轻的僧侣挑战他们年老的僧侣是“不民主的”，学校男生们攻击学习纪律，认为他们应该与时俱进。没有什么奇怪的是，在 1933 年 11 月的第一次选举中，选举的参与是非常低的，在 10%之下。被选上的这些人(另一半人是任命的)当中大多数可能都是比里的支持者，比里作为内务部长在仍然由披耶·帕凤作为总理的政府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

240

被选举的成员，只占议会成员的一半，但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泰国为了稳定橡胶价格而参与的一个国际项目上，他们在 1934 年 9 月迫使内阁辞职。（帕凤与一个稍微重新改组的内阁返回政治舞台。）

很明显，在整个 1930 年代中期，政府内部和外部几乎一直存在争夺权力的斗争。国家委员会（内阁）是严重分裂的，只是靠披耶·帕凤的人格才维持在一起。主要人物是銮披汶（此时是国防部长）和比里（他在 1935 年成为外交部长，重新与西方强国谈判条约问题，最后重新证实了暹罗的完整的主权）。尽管比里个人仍然是强大的并且受人欢迎的，但是他在国内政策和经济事务中的影响正在消退，而披汶作为明星正在升起。同时，全国议会正变得越来越积极，尤其是反对过高的军事预算和任命军人担任文官职位。少量的但是重要的反对派产生了，主要是在比里的追随者和东北部的代表中。政府外面，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有关阴谋的谣言几乎一直在流传，而且险恶的人物披耶·颂正逼近政府，他是在 1933 年的第二次政变中仅次于披耶·玛诺（Phraya Mano）的主要受害者。

当气氛在许多问题上变得热烈起来的时候，1930 年代的斗争在 1937 — 1938 年达到高潮。第一，在 1937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当很多的王室地产被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了一些高级官员的时候，一个关于政府对皇家财产管理的丑闻震惊了曼谷。政府在 8 月份几乎被击倒，但是议会和内阁似乎从敌对中退回到同意去默默地修复受到损害的政府声誉。只有三个部长丢失了在国家委员会的位置。三个月后，议会的第一次直接选举在 11 月举行，很少有以前的代表再次当选，除了东北部的反对派成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佷·猜雅坎（乌隆），提昂·斯利坎（沙功那空）和通因·蒲立帕特（乌隆）。这一次，人口中 26% 的选民参与了投票并且选举了全国委员会 182 个成员中的 91 个。仅仅有 11 个老代表在被选上的代表名单中，因此毫无奇怪，他们起初是沉默寡言的。但是，在一年中尝试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之后，他们最终在 1938 年 9 月的一个预算草案上表现了自己并且迫使内阁辞职。11 月要求一个新的选举，在 12 月的会上銮·披汶颂堪成为总理，取代了披

241

耶·帕凤。披耶·帕凤最终从公共生活中退出，毫无疑问是厌倦了与野心勃勃且好斗的政治家及士兵无尽无休的争斗。

到了1938年，旧的暹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君主制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是很难在现实中存在了（尽管在1938－1939年国王阿南达对曼谷访问了两个月）。很少有人再想把政治的闹钟拨回到君主专制制度，人们普遍接受了宪政统治的观点。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也已经销声匿迹。强大的“圈”政府已经被70个省级政府取代，代议制民主已经开始在地方层次上实施。大众参与和大众对国家政治的兴趣在增加，而且至少存在对军人主导政府反对的迹象（截至目前，人民党仅仅是个委婉的说法）。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仅仅是一个我们早前称呼的精英民族主义的政府，尽管此时包括更广泛的精英，并正在向民事和军事官僚之外寻求支持。

披汶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38－1944年

披汶是泰国历史上少数能够留下自己印记的人之一。他的第一次政府从1938年底到1944年中期，这个时期完全是由他的权力和人格塑造而成的，就如一代人以前的专制君主所做的那样。他的权势的上升几乎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进行的，而且他的政策与泰国人生活的战时经历有很大关系。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大众民族主义的时代，不仅仅是精英民族主义，这种社会和政治现象比早期在君主制度下的心理更接近平等主义。在就要到来的几十年里，当泰国人谈起第一个披汶时代并且使用代词“我们”的时候，他们是在表示一种对他们国家生活的公共参与程度，这完全区别于几十年前他们的经历。

披汶出生时候的名字是披莱克·凯塔桑克哈，他于1897年7月14日出生在曼谷附近的一个卑微的家庭里面，12岁的时候，他被送到军事学院学习，1914年他毕业并且进入炮兵。他的良好服务记录使他获得了1924年到1927年去法国参加高级军事训练的机会，在此期间，他成了年轻学生们的一个领导，但是已经开始阴谋策划武力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他在1927年回到曼谷，成为陆军参谋部的一名少校，1928年

242

被授予军衔和头衔——銮·披汶颂堪（他后来把披汶颂堪作为他的姓）。1934年他成为国防部长，很快成为帕凤时期政府中的一个主要力量。作为年轻军人中最出名的一位以及政府中的一位强人，他成了多次暗杀行动的尝试目标，而他的多次逃脱也增加了他身上的神秘感。1934年初，他强有力地支持暹罗在一个国家建设和世界危机的时代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的观点。他在这个主题上写了很多东西并且鼓励出版赞美威权领导如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书籍、文章以及銮·威集瓦他干的流行的泰语作品，后者是泰国最多产和最热心的宪政政权思想的普及者。披汶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了解大众媒体的效用和力量，通过控制提供给他们的新闻和保持新闻审查，他能够有效地掌控大众媒体，他是第一位广泛使用政府垄断的电台广播来形成大众对其政权和政策支持的泰国公众人物。

披汶在1938年12月26日成为总理，主持一个25人的内阁，其中15人是军人。很明显，披汶自己掌握了两项业务——国防和内务，这样能够确保他自己密切控制军人和省级总督。在一个月之内，他以阴谋推翻政府为罪名逮捕了40名王室成员、旧官僚贵族、选举的议会成员和陆军中的对手包括披耶·颂，这样他平息了所有可能的反对。经过可疑的合法性的审判，18人被处死——这也许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泰国的第一次明确的政治正法[①]。披汶还攻击了君主制，禁止家里悬挂前国王帕恰迪波的画像并且起诉他滥用皇家财产。他还修改宪法，把训政期从10年扩展为最多20年，在训政期间，议会的一半成员将是任命的。所有这些行动都认可和加强了他的权力，从而来应对他看到的就要到来的危险时代。

不久之后，披汶实施他的权力来建设一个新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国家。这些努力最直接并且看得见的部分就是在1939年他把暹罗的名字改为泰国。披汶认为这么改变的理由是：这将意味着国家属于泰人而不是经济上占据主动地位的华人，当然它还有更广泛的含义。这表 243

① 我感谢Benjamin A. Batson提供这个资料。

明了与旧暹罗边界之外的使用泰语(或者傣语)的各种族的一种不止语言上的血缘关系,而且这还降低了使用泰语者(暹罗)在国家生活中的中心作用。它还指出,暹罗最早在历史上出现是其他国家(真腊、中国、柬埔寨)对湄南河谷的傣族人的称呼。按照披汶政府后来的政策,所有这些意思的第一个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尽管所有的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历史中得到反应。

披汶政府政策中的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冲击点是他们的经济民族主义,"泰人的泰国"。这个问题在前几年对议会中那些选举出来的成员已经变得逐渐重要了。这部分是因为仍然令人沮丧的缓慢的乡村经济发展以及指责明显更富有的华人的趋向,例如收取高利贷的华人经纪人和放债人。不过,另外刺激反华人情绪的情况中至少还有两个新的因素。第一是他们逐渐了解到泰国的华人每年汇出大量的钱给他们在中国的亲戚,这对泰国的经济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损失。第二是在泰国不断增长的华人民族主义。尤其是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暹罗的华人组织了反日抵制,因此破坏了泰国经济和泰国的外部关系,因为日本已经成为暹罗的主要贸易伙伴。在这种情况下,反华人的活动爆发了。当 1938 年銮·威集在一次公共演讲中对暹罗的华人和德国的犹太人做了比较并暗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值得考虑,这预示着泰一华关系正在恶化。

在披汶政府执政的前九个月里,一系列全面的反华人(或者如政府解释的亲泰人)的法令付诸实施。政府组成了一个国家公司在大米贸易中与华人竞争并且实际控制了食盐、烟草、石油和猪肉生意。许多职业是禁止非公民进入的。一个新的法令条款大幅度增加了对商业(如华人)阶级的税收,而且所有的非公民都被要求付一个外侨登记费。华人的学校处于严密的审查之下,限制使用华语,每周只能两个小时。所有的华语报纸都被关闭,只留下一家。在整个过程中,政府仔细地解释说,它正在区别的只是基于公民身份,而不是种族,而且一些经济民族主义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华人企业也同样影响了西方多国公司(例如烟草和石油)。但是没有人能够被欺骗。这些是反华人的措施,从披汶和

244

许多其他泰国人的观点来看，为了使得泰人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反对外国人和排外与这些行为的一些方面一样，自相矛盾的是，在这期间和随后的年份里为定义一个新的泰人身份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很多方面既是西方的又是泰国的。政府在1939－1942年颁布了12个“文化命令”，“目标是激发民族精神和民族的道义信条并且把进步的趋向和‘新鲜感’灌输到泰人生活中”①。除了采纳新年在1月1日而不是4月1日的西方日历之外，这些命令要求泰人向国旗敬礼并且知道国歌，了解时事，并且使用民族语言(不使用当地方言或者外语)。他们被鼓励以现代的方式去生活，合理地饮食和睡眠，为了国家全天有效的工作。他们被鼓励去放弃进口物并且只买泰国的产品；他们还被要求以现代的方式穿着打扮——男人穿上衣、裤子、衬衣和领带；女人要穿裙子、衬衫、戴手套和帽子。人们如果没有戴帽子的话，是禁止乘公共汽车的，也禁止进入政府办公室缴税的。披汶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全世界也许看到泰国是一个现代国家。

在整个1939年和之后，披汶和銮·威集逐步树立了对领导的崇拜。披汶的照片到处都是。他的口号登在报纸和广告牌上，并且在电台反复广播。不管他领导的内容是什么，披汶将不会被忽视或者避开。而且不管人们乐意与否，都必须参与了国家生活，甚至以最琐碎的日常形式。这种参与，这种共同经历是披汶动员大众去面对许多人目前都确定将要到来的一场战争的基础。他还以其他的方式来动员他们——通过面向青少年男孩的“育瓦冲军事运动”以及少年红十字会和童子军来加紧军事招募。

245

在1940－1941年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战争中，泰国的动员结出了第一个果实，在许多方面也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1893年的危机

---

① Thamsook Numnonda, Thailand and the Japanese Presence, 1941－45 (Singapore, 1977), p. 23.

和随后泰国丧失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宗主权和控制,泰国还没有并且也许仍然不会原谅法国。当1940年6月法国被希特勒的军队攻克后,泰国为上次失败报仇以及修正历史错误的机会出现了。西方民主国家看起来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也许是注定的。同时,日本正在开始进入到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此时法属印度支那由一个与德国结盟的维希政府控制。9月份,日本通过与法国的维希政权的协议,获得了越南北部的军事基地和转运权。在前四年里,泰国政府已经努力去迫使法国把湄公河西边的老挝部分交还给泰国,但是这些谈判在法国沦落后也破裂了。披汶政府这时担心日本不久将把他们的势力扩展到老挝和柬埔寨并且将阻止泰国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疆土。在一连串的民族主义的宣传中,泰国在1940年11月进犯到有争议的老挝领土内和柬埔寨西部。尽管国家海军在暹罗湾遭遇了严重的失败,地面部队不久攻占了有争议的地区。日本因此参与进来调停泰国和印度支那并且强加了一个解决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泰国合并了老挝的沙耶武里、占巴塞西岸、柬埔寨的马德望和暹粒省(现在重新命名为披汶颂堪省)。

在这次危机中,泰国与主要西方强国的关系迅速恶化。1940年末,美国政府停止向泰国出售16架战机,到了1941年3月和4月,美国暂停石油供给,直到5月在确保可以持续得到泰国的锡和橡胶之后情况才缓和。很明显,太平洋战争就要来临了,理所当然的是,泰国的安全并不是所有强国的当务之急。美国人认为战机可以在防御菲律宾中得到更好的使用,英国人仅仅可以提供野战炮、弹药和航空燃油。泰国确信日本下一步将入侵泰国,8月28日全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呼吁大众在一旦遭到入侵时一起参与抵抗。

1941年12月7日深夜(当地时间)日本驻泰国大使出现在披汶的住所,他通知泰国,日本已经向美国和英国宣战,日本军队要求借道泰国。披汶当时离开了曼谷,前去视察新的柬埔寨省份,他的外交部长迪热克·伽雅纳玛拒绝了这个要求,同时紧急要求总理返回曼谷。几小时后,就在12月8日凌晨之前(当地时间),日本的侵略开始了。实际上,除了著名的日本同时攻击的珍珠港、阿留申群岛、中途岛、关岛、菲

246



元帅披汶作为战时领导向一个士兵授予勋章

律宾和香港之外，日本还从九个地点向泰国发动攻击：在马德望通过陆路边界，空中攻击曼谷外边的廊曼机场，在暹罗湾海岸通过七个点两栖登陆。日本大规模攻击的目的是获得在宋卡的机场，从而为征服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提供空中支持。在马来亚的英国人有一个阻止日本进展的应急计划：派遣军队进入当时中立的泰国把日本阻止在宋卡。但是当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一组在边境上的泰国边防警察经过一天的艰苦战斗阻止了他们[①]。在其他的地方，抵抗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当披汶在早晨7时30分一回到曼谷，他就下令停火，他的政府 247

① S. Woodburn Kirby, The War against Japan, vol. 1 (London, 1957), p. 186.

认为抵抗日本将是自杀。泰国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同意日本军队借道泰国的权利,来换取日本尊重泰国独立地位的保证。

随着日本在接下来的军事上的闪电式成功,泰国军人相信日本将获得战争胜利,在 12 月 12 日,他们同意与日本签订一个军事同盟关系。一个月之后的 1942 年 1 月 25 日,这种关系扩展成泰国向美国和英国宣战。这是一个具有相当争议的发展过程。为什么泰国人竟然发展到需要与日本建立同盟的地步?披汶和他领导下的军队轻率地判断日本将在战争中获胜,泰国最好的利益就在于跟随潮流,或者他们更大胆地判断通过一种与日本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他们也许可以保留更多的独立,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公民。也许这两个考虑影响了他们的决定;那些反对的人被强迫离开政府。其中财政部长比里·帕侬荣被任命为摄政代替不在位的阿南达国王,外交部长迪热克成为驻日本大使。泰国在华盛顿的大使社尼·巴莫则认为他的政府对美国的宣战是非法的,不代表泰国人民的意愿。他拒绝向美国政府宣布,而且他不久就同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合作组织了一个自由泰运动。

战争的第一年充满了激动和热情。当看到欧洲从他们已经拥有 100 多年的殖民地抱头鼠窜地逃离的时候,泰国人长期以来对技术上优越和现代的西方的痴迷以及夸大的尊敬大大地削弱了。日本人(泰国人认为是与他们一样的亚洲人)正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击败西方,而且看起来白人西方的终结只是个时间问题。泰国人不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日本人侵略的受害者,相反是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共同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而不是以"棕色小兄弟"的身份参与。此刻在所有的亚洲东部,从堪察加(Kamchatka)到印度和澳大利亚边界,泰国是唯一完全独立的国家,是日本的平等伙伴,而所有的泰国邻国除了法属印度支那之外都是附属的被占领的国家。在战时军人精神高涨的时候,泰国甚至发动了一场他们自己的军事征战并且在 1942 年 5 月征服了缅甸东北部景栋周围的掸族地区,成功地完成了第三代统治末和第四代统治初期放弃的征战。(这次征战的起因也许是泰国需要开发一个新的鸦片来源来取代以前来自于英属印度

248

的鸦片。)1943年8月与日本的条约确认了泰国对“联合掸族王国”或者是“原始泰王国”的获取，同时日本也把吉兰丹、丁加奴、玻璃市和吉打转交给泰国行政当局——朱拉隆功曾经在1909年把这四个马来王国移交给了英国。

随着日本在1944年初对印度侵略的失利，英国进入到缅甸前线攻击，以及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反攻中于1945年初重新夺取菲律宾，战争开始对日本不利。战时环境在泰国已经成形，1942年的欢快心情早已不在。泰国政府保留了对军队和人口的完全控制，日本技术上只是友军，泰国能让其借用设施。泰国通常能够阻止日本从泰族人口中征用物质或者劳动力服务，但是双方非官方的交往经常是糟糕的。泰国受到更严重的伤害是基本商品的短缺，税负的增加，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战争中间盟国的空袭。日本不能够提供泰国必须的基本进口物品，即使是它曾经可以提供，但是不久就没有船只可以运输它们，也没有船只把泰国的出口物品运到仍然可以进入的少数几个市场。随着通货膨胀、配给制和短缺而来的是黑市、走私、腐败和囤积居奇。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士气和道德都低落了。

到了1944年中期，形势不仅对日本不利同样也对披汶不利。人们有了更多的抱怨，对通货膨胀、文化训令、披汶引进的简化拼写(1942－1944)以及尤其是对日本不断增加与披汶的联系。众所周知，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盟国已经攻入了法国(1944年6月)，意大利已经退出战争，而且日本的“胜利”正在越来越接近日本本土。1944年7月18日，日本的东条政府辞职，仅仅六天后，泰国的全国议会拒绝了两个政府法案并且迫使披汶辞去总理职位。发生了什么？

当日本人在战争中越来越处于防御地位的时候，他们变得更加依靠与泰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并且这些似乎在1944年正在恶化。原来在地下活动的反日自由泰运动，此时在美国的资助下，从中国西南部的重庆以及锡兰和印度的英国总部，成功地渗透进泰国的政府中。实际上，它的总部就在摄政委员会的比里的办公室内。泰国学生和几个美国人、英国人已经空降到泰国(甚至隐藏在曼谷)去准备飞机跑道，训练突

249

击队组织，以及把情报传回盟国部队。对披汶来说，他声称他也在考虑准备反击日本的方法。这些准备中的一部分内容包括迁移首都到曼谷北部的偏远的碧差汶的计划，已经在北标附近建造一个“佛教城”，世界佛教的某种中心——这两个壮观的项目符合披汶的典型的奢侈作风。披汶后来认为迁移到与世隔绝的、群山环绕的碧差汶将有利于泰国人反抗日本的起义。

在战争的后期，证据表明日本正在计划控制泰国，就像他们在1945年3月对法属印度支那的控制一样。

议会的代表们——1938年任命和选举的同一组人（他们的任期已经延长），投票反对这些计划，尽管披汶的起义计划没有公开告诉他们。他们似乎已经被这些因素刺激：部分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与披汶密切相连的东条的倒台，部分是因为他们感觉战争正在不利于日本，部分是因为他们感觉披汶被认为与一个威权政府的过去密切相关，而为了改进与盟国的关系现在必须埋葬它。不过，更迫切的是选举一个总理的必要性，总理也许能改善与日本的表面的正式的关系，同时更灵活地保护不断上升的自由泰运动。如巴特森所说，宽·阿派旺能够被选上“主要是因为他与日本假装亲热的能力”①。代替缺位国王的两个现存的摄政中的其中一个辞职而不签署任命宽的文件。因此新政府在7月31日开始运作，宽为总理，比里为唯一的摄政——宽应付日本而比里则通过自由泰对付盟国。

对泰国历史上六年时间的一个结束是突然的，在当时也是让人惊讶的。也许直到他们真正投票的时候，全国议会的成员才意识到结果将是什么。他们使一个当时已经变味的好战的民族主义的最高统帅下台，把一个温和有礼的、有点尴尬但聪明的44岁文官推上了台。在获 250 得这些的过程中，可以追溯到1932年的大多数的旧政治同盟破裂了。陆军和海军很明显是分裂的，海军站在宽一边，而且披汶和比里之间不

---

① Benjamin A. Batson, “The Fall of the Phibun Government, 1944,” JSS 62, pt. 2 (July 1974): 110.

断增长的裂痕变成了一个裂口。当时一些人预计已经溜回到华富里总部的披汶可能召集皇家军队并且发动政变，因为他很容易就可以这么做。但是他却聪明地选择去等待时机。

热战与冷战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泰国来说是一个混乱的危险时期。它要求对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进行大规模再调整，同时战争本身的各种影响阻碍了泰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去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从1944年到1948年可以看作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大国继续对泰国的生活和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外部的压力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人为地对泰国的政治造成了不平衡。尤其是，美国的政策重点给泰国的文官政治家带来了他们没有准备承当的负担。不过，为了反击英国和法国政策一个新的危险的冲击，他们必须在美国的帮助下去尝试。

随着菲律宾即将落入美国军队手中，1945年初英国军队迅速进入缅甸，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泰国不久就要处于战争的前线。泰国自然会担心同盟国会再次征服泰国(实际上是第一次征服)。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同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战时想法，他们期望强加给战后的泰国以惩罚和控制，而这些将形同于对一个保护国行使权力。泰国建立一个自由泰流亡政府的努力失败了，此后，他们采取了两个互补的政策。由于自由泰运动已经在比里直接控制的整个政府内建立，他们声称除了实际上所有的泰国常规部队之外，他们能够调动一支超过5万人的游击队。无论同盟国什么时候发话，这些是他们提供的用来反击日本的力量。

他们向英国清楚地表明，他们将立即归还1942－1943年合并的英国控制的马来和掸族地区。他们能够阻止类似的对老挝和柬埔寨省份的要求，因为法国在亚洲战争中的作用是最小的。泰国担心英国对其要阴谋诡计，更多的担心则起因于路易斯·蒙巴顿将军领导下的英国主导的东南亚最高司令部被期望行使主要的军事责任来征服泰国。 251

因此他们很需要通过自由泰国运动和其名义上的领导人以及泰国在华

盛顿的大使社尼·巴莫来建立他们与美国政府的关系。

他们对美国则强调他们对与日本建立同盟并向美国和英国宣战的不热心。他们把这些行动分别描述为不合法的(并不是所有的摄政委员会的成员都签名同意,比里正好不在场),或者是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或者是野心勃勃的和没有代表性的泰国军国主义者的粗心大意行为。他们能够指出泰国的军队事实上没有参与抗击同盟国的战斗,而且他们现在也做了承诺开始恢复民主政府。对美国政府来说,由于在泰国没有实际的利益,以前也没有与泰国有根本的联系,因此这些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在 1945 年期间,美国外交部一直支持泰国抗击英国。

随着日本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出人意料的投降,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泰国立即恢复了战前的原状。作为摄政,比里把宣战称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并且取消了披汶与日本签订的所有协议。基于其过去与日本的联系,总理宽·阿派旺上交了辞呈。全国议会宣布其打算在社尼·巴莫一回到泰国,就邀请其成为总理,同时,组成一个由著名的文官政治家塔威·波雅克特领导的看守政府。

英国政府立即对泰国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其接受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全面赔偿所有英国人的财产损失、优惠的经济利益、在泰国无限期驻扎军队的权利、150 万吨的免费大米。由于日本使用泰国的领土去攻击马来亚和缅甸,英国感觉被人在背后刺了一刀,而且他们想遏制对此有责任的泰国军队。他们还想无理地惩罚泰国,因为泰国在战争期间抑制大米出口,而且他们肯定不想看到泰国通过销售战时不能运输的大米获得可观的利润(他们对 1945 年的大米存储过高估计了一倍)。英国在 9 月份单方面地强加这些条件给泰国,但是强大的美国压力迫使其推迟,在 12 月底泰国与英国签署协议的时候,甚至大量地削减了相关的条款(仅涉及销售泰国大米,而不是免费)。

252

终止与法国的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泰国人的情绪很高,想保留柬埔寨和老挝的省份(这些省份的人口在 1946 年 1 月和 8 月参与了泰国的全国选举)。直到 1947 年 1 月泰国才同意把这些省份归还给法

属印度支那，来交换法国同意不投票否决泰国加入联合国，这对泰国的国际尊严是至关重要的。

在整个1946年的外交政策危机过程中，比里是塔威和社尼政府背后的强人。当国王1945年12月返回的时候，比里从摄政的位置退休，他被正式提名为高级政治家，成为政府的顾问。为了维持与西方强国的良好关系，明显不得人心的军人如今从政治中退出，政治政党第一次可以组织并竞选。有人从1945年11月的曼谷写道："英国正在通过亲英国的暹罗人尝试组织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但是还没有找到出色的领导人。"[①]不管他们的外国支持者是谁，也很难猜到，但是在1946年初期至少四个主要的政党正在组织中。来自东北部的习惯性反政府的代表为了支持比里，加入了人民党的比里旧部。他们的对头是宽·阿派旺领导的民主党和社尼弟弟克立·巴莫(Kukrit Pramoj)的进步党(但相对保守)。所有这些政党中，除了东北部的合作党是可能的例外，其他的党有一点或者基本没有大众支持。他们只是由城市受教育的政治家简单松散组成的政治派系，而且他们内部的等级和关系被个人斗争和嫉妒所撕裂。

1946年两个支持比里的政党获得了大多数的选举席位，不过议会当时选举宽为总理。大多数的议会成员在政策事务上仍然与比里站在一起，不过，情况很快变得议会不再容忍宽，他在3月份辞职。这次比里不得不自己亲自担任总理。为了改进状况和创立一个更稳定的政治制度，比里组织了对新宪法的起草，该宪法在1946年付诸实施。它引进了一个两院制，包括一个由全部选举组成的众议院和一个由下议院选举出来的参议院。它的成员只限于年龄超过40岁，有高等教育资格或者有行政或立法经历。从民主的外观看，文官政府看来是好的，而且大多数人现在期望稳定的政治领导，因为这也许能减轻战后滞留的影响——通货膨胀、短缺、腐败横生，以及与大国的不确定的关系。 253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vol. 6 (Washington, 1969), p. 1375.

这些期望被1946年的一系列事件给粉碎了。第一,4月份,泰国最高法院停止了对披汶及其战争同伙的起诉,理由是由于同盟国的压力,审判他们的战争犯罪法的追溯效力是违宪的。法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且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判决至少部分是因为大众的压力。公共舆论总体上是有利于披汶的,他被认为是在面对着来自日本的巨大压力,已尽其最大努力来保护泰国的利益。实际上,披汶和军人被免除了责任,但是他们仍然不乐意在面对着可能来自西方强国的负面反应去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而此时泰国非常需要这些强国。

两个月后的1946年6月9日,在前一年12月份刚回到曼谷的年轻国王阿南达·玛希敦死在床上,脑袋被手枪子弹打穿[①]。政府在这次重大危机中的无能更增强了围绕他死亡的神秘气氛。他们首先宣布死亡是一次意外事件。然后,一个包括美国和英国医生的政府委员会被任命去调查此事件,报告说国王也许是被谋杀的。三个主要的目击证人被匆匆忙忙地审理和判决。公共舆论很快把比里与反保皇党情绪联系起来,并且记起他曾经与帕恰迪波在1933年经济计划上意见严重不和(但是忘记了他作为摄政的年份),因此认为比里应该对阿南达的死负责,无论是间接上他当时是在位的政府首脑或者以更可怕的形式。8月,比里辞去总理职务并且去国外旅行。后来的銮·塔荣纳瓦萨瓦特领导的文官政府也不能逃避弑君的疑云,因为没有总结的证据以及没有问起也无法回答的问题根本无法解释这些疑云。由于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议会和政府在面对着严重困难的时候艰难地挣扎,尤其是在经济停滞和存在着涉及稻米走私和囤积居奇的广泛的高层腐败的时候。

塔荣政府进一步被下列事实削弱:1946年8月举行的填补扩大下议院席位(在新宪法下)的补选,削弱了比里的政党的控制,使之勉强超

① 对这一时期的事件的引人入胜的英语回忆录参看 *Nung sattawat Supsawat 23 Singhakhom 2543* [One Century of Supawat, 25 Aug. 2000] (Bangkok, 2000), pp. 555—556。

过半数，到 1947 年初该党已经失去了对议会的控制，因为该党的成员从多数党脱离而加入到他们的竞争对手中。议会正陷入无法控制的混乱中，而且当许多政治家被谋杀的时候，议会正朝着一种不祥的方向发展。同时，比里已经从国外返回，急切地想促进东南亚民主主义者在反对殖民主义上的团结。为了这个目的，他在 1947 年 9 月成立了东南亚联盟。从战争的最后一年开始，自由泰国已经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反法和反日团体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而且随着战后时期比里登上权力位置，这些联系已经拓宽了。到了 1947 年，印度尼西亚、老挝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在曼谷设有信息和武器采购办公室，而且那里甚至有一个孟族分离主义组织。许多人，尤其是泰国军人，相信比里有共产主义联系。谣言这样散播：

254

> 比里曾经打算成立暹罗共和国来作为一个东南亚联邦的基石；电台命令曾经被截获并且被发现的文件支持这些论点；间谍在前去瑞士谋杀国王普密蓬的路上；在塔荣的其中一个部长（通因·蒲立帕特）的房子里发现了一个武器地窖，包括很多俄国武器——武器毋庸置疑地是用来发动共产主义革命。[①]

冷战，无论是实际的颠覆还是仅仅是夸大的担心，已经来到曼谷；而且很难辨别在多大程度上军队是处于冷战担心，还是如他们所说的，是为了把秩序和方向交给一个跌跌撞撞的文官的民主政府。但是他们采取了行动。1947 年 11 月 8 日，陆军部队夺取了政府，不再称自己为人民党而是简单称为政变团。比里暂时隐藏起来，之后，在英美海军随员和一个壳牌石油的油轮的帮助下被偷运出国。三个月的犹豫之后，披汶和政变的鼓动者——銮·卡特颂堪、中将平·春哈旺、上校帕敖·斯雅侬和上校沙立·他那叻——意识到如果军官们，尤其是披汶执掌政府的话，泰国将冒着遭到国际上反对的风险，甚至更糟糕的情况。于是

① John Coast, *Some Aspects of Siamese Politics* (New York, 1953), p. 42.

陆军把不幸的宽·阿派旺任命为总理并且暂时保留了1946年的宪法。

宽政府一开始运作得很好，通过任命一个非常合格和有经验的内阁，同时为新的全国选举做准备。不过，陆军和警察从事了一个清除左翼分子的项目，主要目的是针对比里的旧支持者、自由泰国积极分子以及最终的反对派政治家，尤其是来自东北部的。在1948年1月的选举中，宽的民主党在议会席位上获得了微弱多数，而比里组织的一个政党的结果则惨淡。披汶和政变小组高枕无忧了三个月，眼看着民主党和宽扩展他们的控制并且准备起草一个新的宪法，这个新宪法将进一步削弱军人的势力。最后，通过再次使用武力，他们迫使宽辞职，披汶在1948年4月8日成为总理——宽在战后从他手中接管之后四年。

255



宽·阿派旺总理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

在泰国历史上这不是个快乐的时期，而且大多数人也许想忘掉这一时期的很多东西。在一系列的政变、内阁和部长变换、条约和经济危机中，几乎被忘记的却是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真正的大众追随的领导在这一时期出现，当然除了披汶和比里；而且在公众心目中，每个人获得的支持都是有条件的——披汶通过其战时和威权的联系，而比里则通过左翼分子和可能的弑君联系。披汶求助于军人和更保守的精英，而比里则求助于文官官僚精英、职业阶层和上层学生。这两个例子都没有大量的大众支持，而且这一时期也没有大众的公众示威。这一时期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只有很浅根基的政治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涉及被模糊的意识形态趋向，对皇家权威和经济秩序的态度，尤其是野心和个人利益及敌对所导致的分裂和易怒的精英。

由于战时和战后的紧急情况，1944－1948年期间的泰国政治是人为扭曲的支持文官政府。为了获得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好意确保美国援助来首先对抗日本然后是英国，泰国成为民主的国家是极其必要的。这种倾向于文官的不平衡在1948年并没有修正，反而是倾斜得太远以至于走向相反的极端，因为一个新的冷战背景似乎再一次威胁到泰国独立的存在。

披汶的第二次掌权：1948－1957年

在披汶第二次掌权的1948－1957年间，泰国政治游戏的赌注要比十年前高很多。王国的人口比以前更多，不久之后也比以前更繁荣。积极的和野心勃勃的政治精英增加了很多；更容易接近也具有更多实质内容的权力被更急切地追求和维护。那些控制政府的人为了行使权力以及让别人远离它而制定了自己的规则，因此模式已经建立。这些像它们的前任一样是宪政政权，但是重要的条件是宪法服从于政府，而不是相反。

这一时期的政治事件通常在轮廓上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其细节却没有得到仔细的和系统的研究。它们等待着距离事件和名人都比较远

的另一代的历史学家的工作。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简单的探寻其轮廓，然后评论一下这一时期的一些鲜明的特点。

理解它的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尤其是掌权的第一年，1948 年。冷战在欧洲真正开始，尤其是 2 月共产主义完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这里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个反殖民主义或者反政府的暴乱的高潮，主要在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法属印度支那。同时，中国的内战看起来不久将以共产主义的胜利而结束。冷战的开始促成了美国和英国乐意在 4 月认可披汶政府。

257

在披汶长期与比里和文官"激进分子"的斗争背景下，他认真地对待这些发展所引发的担心(但是有可能被夸大了)。同时，他还要去获得大众支持，还要在军队内部和泰国总体的政治舞台上应对竞争对手。

如披汶在 1938 年所做的一样，他开始统治的时候，发起了一个新的反华运动，当时小规模的泰国共产党里面有大量的华人成员，再加上人们不断把海外华人看作是代表共产主义中国进行颠覆的第五纵队，所有这些都为披汶进行反华运动增加了动力。泰国华人社区的亲共产主义与亲国民党原来力量上的相对平衡在这个时刻迅速转向前者——在工会、华人学校、华人报纸和社区组织都是如此。在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华人移民的情况下，政府再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华人的经济主导地位以及促进泰人商业。他们还取缔华人协会和学校并且对报纸强加新的控制。

同时，披汶正在打击他的文官对手。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政府并且与比里站在一起的人受到骚扰和逮捕。尤其是，东北部的政治家成为警察的目标。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包括提昂·斯利坎和通因·蒲立帕特在 1948 年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为阴谋分离东北部并且将其纳入共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印度支那。1949 年 3 月，通因和两个其他的人"在尝试逃离警察的时候"被射死[1]。1952 年底，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提昂

[1] Charles F. Keyes, *Isan: Regionalism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Ithaca, 1967), pp. 33－34.

头上。恫吓足够让大多数政治家沉默。

这一时期东北部分离的想法可能是一小撮政治家和自由泰国积极分子的想象，但是更严重的发展正在南部的马来省份中发生。战争后期，披汶政府实施文化训令和用暹罗法律取代伊斯兰法律的努力已经引发了得到大众强有力支持的抵抗。宽和塔荣政府减轻了压力，但是随着把主要针对华人的教育政策运用到南部的时候——马来人的学校被禁止了——新的问题出现了。南部的马来人感觉像一个外来殖民政权的臣民。1947年8月，他们向政府提交了一系列的要求，呼吁地区行政、教育、财政、宗教、语言和司法的自主。銮·塔荣政府已经承诺将以同情的态度来考虑他们的不满；但是上台后的披汶的反应是：逮捕和囚禁四个省的主要的马来首领并且宣布马来和伊斯兰组织为非法。到了1948年4月，南部有大量的暴乱，但是被政府军队用包括空中轰炸的大规模武力镇压了[①]。在马来亚有很多对持不同政见者困境的同情，但是1948年中期主要的占据优势的华人共产主义暴乱对英属马来亚的攻击，侵犯了边界地区，因此需要马来亚和泰国政府的合作，这导致了西方支持下的大量军事力量和注意力集中于该地区。这造成了马来持不同政见者的分离和长期沉默。

在统治的第一年里，披汶不得不面对对其权力的两个军事挑战。第一，1948年10月，少将奈特·克摩尧森和许多高级军官正在阴谋发动一场政变，他们的计划泄露出来，60个人被逮捕。第二年初，1949年2月26日，当海军和水兵尝试把比里重新推上台的时候，更严重更暴力的一幕发生了。战斗在曼谷激烈进行了三天，政变小组和披汶重新控制了局面。由于诉诸于暴力，比里失去了很多。海军逐渐变得不值得信任。同时，披汶似乎更有理由去使用更严厉的措施来对付不同政见者和竞争对手。警察力量由于随意的逮捕，甚至拷打和处死许多公

① Ibrahim Syukri, *History of the Malay Kingdom of Patani*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Monograph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east Asia Series, no. 68, 1985, trans. John N. Miksic and Conner Bailey), pp. 69－77.

民,遭到滥用。批评性的报纸编辑被暴徒鞭打。

宪政民主的表面形式仍然存在。泰国目前接受了来自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国际组织的照顾。披汶不能够通过抛弃似乎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宪法虚构来危及这些好处。民主党继续主导上下两院,而且它在 1949 年 3 月起草并颁布了一个新宪法。这个文件规定上议院议员应该全部由国王任命,从根本上增强了君主的权力,并且还给予了上议院拖延立法的权力。军人没有权力去影响立法机构的构成。

259

披汶不得不去求助于其他方式来确保自己的控制。1949 年 6 月在为下议院的新席位进行补选的时候,他的政府据说操纵了许多选举并且资助了一个亲政府的政党,该党最终赢得了所有的新席位,这样披汶获得了下议院的多数席位。通过礼物和特别好处的赞助,他后来把多数扩展到 121 个席位中的 75 个。不过,他仍然不能通过上议院做什么事情;他在军人中的位置也不是完全安全的。



1951 年"曼哈顿"政变,"室利·阿育陀耶"号战舰受到空军的攻击

1951 年 6 月 29 日,披汶正在"曼哈顿"号挖泥船上参加一项仪式,

这艘船是美国作为经济和军事援助增加的一部分送给泰国的。这个过程被海军军官打断了，他们掳走了披汶，匆匆地把他带离，并且囚禁在旗舰"室利·阿育陀耶"号上。几个小时之后，劝诱政变小组放弃权力的谈判开始了，但是不久这些谈判都破裂了，到了第二天，陆军、警察和空军支持的政府同海军和水兵的激烈战斗在曼谷进行。空军轰炸了"室利·阿育陀耶"号，当它下沉的时候，披汶得以泅水离去。他最终到达了友军那里，并且通过广播向海军呼吁停火。"曼哈顿"政变不久就结束了，但是有超过 3 000 人伤亡，包括 1 200 人死亡，大多数人是平民。由于政变，海军被削减到其原来力量的四分之一，随后很多人被逮捕，包括 50 名泰国国立法政大学的学生，他们被指控为有共产主义联系。 260

1951 年在很多方面是个转折点。对"曼哈顿"政变的镇压标志着披汶在 1947 年政变小组中的两个主要对手权力的崛起和得到确认。少将帕敖·斯雅侬现在成为警察部总长，警察部拥有与军队一样的权力；少将沙立·他那叻原来掌握曼谷的第一军，不久也成为国防部副部长。披汶只是不安地主持这三头政治并且逐渐地失去与其两个对手竞争的权力。

考虑到 1949 年宪法的形式和给予国王的权力，政变小组相当关注国王普密蓬·阿杜德 1951 年底准备返回并且承担他的皇家责任。当国王从新加坡返回曼谷的途中并且还在海上的时候，12 月 29 日军人在国家电台简单声明：

> 由于目前的世界局势，而且由于共产主义的进攻以及普遍的腐败现象，武装力量和警察的成员以及 1932 年和 1947 年的武力政变的领导已经决定在王国内实施 1932 年的宪法。①

立法机构被一个单一任命的由 123 个成员组成的议会代替（106

① Bangkok Post, 30 Nov. 1951；被引用在 Frank C. Darling,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1965), p. 92。

个是军人和警察官员),1952 年 2 月的选举后,123 个选举的成员被增加进去。从一开始,年轻国王与披汶政府的关系就不妙。

在宪政政权的前 15 年里,那些也许是社会批评家和政治积极分子的人反而加入了该体制。不过,下一代的知识分子被排除在披汶政府之外,这促成了 1940 年代末和 1950 年代初泰国政治骚动的再度活跃。这复兴了知识分子生活,此时主要集中在曼谷的泰国两所综合性大学:著名的朱拉隆功大学,它长期以来主要为政府职位招聘;更新一些的国立法政大学,建立于 1934 年,在这一时期,它是一所公开大学,没有限制的入学,趋向于研究法律,而且与朱拉隆功大学相比,它的学生来自更低一级的社会阶层。国立法政大学与比里有密切的联系,他主要负责其资金并且暂时担任校长。毫不奇怪的是,这一时期遍布亚洲很多地方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通常是享有很高声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对那些聪明的不满他们年长者的年轻人有一些吸引力。他们把比里看作是他们的政治英雄和经济导师;他们的文学兴趣被库拉披·赛帕迪提这样的作者所增强,他已经从 20 多岁时候的社会评论家成长为 50 岁出头的政治左派。

261

在这个环境里许多重要的任务出现了。我们提及 1950 年代左右朱拉隆功大学的同时代的两个人。吉·普米萨在 1950 年初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和小品文作家,由于其有些天真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泰国封建主义的脸面》(1957),他变得非常出名。他在 1958 — 1964 年间因为颠覆罪而被沙立政权关进牢房,随后在 1965 年东北部一起暴动中去世。卡姆辛·室利纳克,来自东北部一个农家,以记者为职业养活自己,同时参加了“朱拉”,写作了优秀的讽刺性的短故事,其中之一是《政客》,很好地表达了 1950 年代的青年对政治秩序的厌恶[①]。有意义的是,吉和卡姆辛似乎都没有对他们同时代的人产生很大的影响:随波逐流的压力是巨大的,公开政治行动的风险可能是致

① Khamsing 的一个短篇故事选集被翻译成了英文,参见 The Politician and Other Stories (Kuala Lumpur, 1973)。

命的。

在第二次披汶政权时期，泰国的经济得到很大的改进，主要是因为发展超出了政府的控制。1950年中期开始的朝鲜战争刺激了泰国的大米、橡胶和锡等商品出口的繁荣；而且最佳估计是国民生产总值从1951－1958年年平均增长率为4.7%，同时制成品的进口增加得甚至更快，而且再加上一小部分国内制造业（很多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使得大大改善的消费品的供给成为可能。泰国的财政管理仍然是保守的，就如它从曼谷王朝第五代统治以来的一样，而且泰铢仍然非常稳定，围绕在20泰铢兑换1美元上。

泰国国际经济和政治状况中的主要的和新的元素是美国的作用，美国此时已经超越了英国曾经享受的地位。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是把泰国看作一个对抗共产主义的独立国家并且还把泰国看作一个地区强国，其要追求的事业就是遏制该地区的共产主义。泰国是第一个派遣军队参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作战的亚洲国家，1954年它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地区基石。与当时的邻国相比，泰国是强大的和稳定的，尤其是在披汶重新掌权之后。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共产主义的挑战——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建立（1949），朝鲜战争（1950－1953），法国在印度支那败在共产主义主导的越盟手下——美国增加了对泰国的依靠和援助。1951年到1957年间，泰国是1.49亿美元经济援助和2.22亿美元军事援助的受益者[①]。经济援助包括扩展曼谷港口的工作，改进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还有对农业、教育、灌溉、经济计划等领域的技术援助。除了其他的事情，军事援助是用来偿付现代设备、训练空军、支持1954年达到43 000人的警察力量，以及加强陆军。这些都大量增加了泰国预算，1950年代初期泰国的每年预算达到大约2亿美元。政变小组的一个优势是这些资金的大部分都是处于议会控制之外。

262

从这以后，存在着对该时期泰美密切关系的强烈批评。甚至是这

---

① David A. Wil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uture of Thailand (New York, 1970), p. 144.

一援助的接收者也同意援助能够使得泰国的政治平衡向更有利于军人的方向进一步倾斜。这不仅使他们更独立于政治过程之外,还加强了他们强制平民百姓的能力。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对帕敖将军领导下的警察部尤其是如此;但是它对军人夺取政权(以及失败的政变)和镇压分离主义运动和反政府运动也是如此。而且,美国对这些资金的账户控制从来都不是有效的,以至于也不能阻止大量的资金最终落在各种各样的泰国军事人物的口袋里及其瑞士银行账户里面。

但是仅仅指责美国的政策造成了这一时期泰国的腐败也是太简单的想法。如果有人想争辩美国政府正在利用泰国军人来获得其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或者甚至是美国经济扩张的目标,他也必须不假思索地承认泰国的相关人物似乎已经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也许很难坦率地自我辩解,因为他们的动机肯定是非常的复杂。许多人真心实意地相信军队是国家的救星,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或者越南)已经颠覆了它的反对派,泰国在阻止共产主义的力量扩张上应该发挥领导的作用。在不止一代人的时间里面,所有这些想法在泰国已经成为标准军事训练和灌输的一部分。

263

但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它与泰国军队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有关。泰国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大约有四个获得提升的制度渠道:高等教育、军队、佛教僧侣和商业。佛教僧侣的吸引力是有限的,作为佛教僧侣被认为是独身主义者,不能期望有太多的钱,也不能有太多的权力。商业实际上对泰国年轻人来说是封闭的,因为是由华人主导并且其体现的价值和精神对大多数泰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历史上,高等教育是中等和上等阶级年轻人进入官僚机构的途径。进入大学直到最近都是严格限制的,而且直到 1960 年代才能广泛地进入。相反,军队从社会上公正和广泛地征募官员,而且他们所有人都没有大学教育。他们共享了一个共同的官员训练和对更富有公民的仇恨。通过进入政治,军队可以凭借军人的身份来共享社会的财富,否则他们无法享有。

于是,以这些社会术语观察的话,军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行为更容易理解,如果不是更值得称道的话。披汶手下的高级军官发展出了大量

的共享国家财富的技巧。官员可以被任命为部长、副部长、部门首长等等；他们可以成为省长。他们也许被任命去政府委员会或者去做顾问；他们因此可以获得大量增加的收入和贪污机会。他们可以加入新商业公司的董事会，公司的资本是由华人或者外国商人出资。他们也许被给予能赚钱的政府合同或者是许可证或垄断权。这些可能性似乎是没完没了的，但是一个高度创造性的和创业性的泰国军人阶层发掘了大部分的东西。

披汶的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都有大量的私人收入，尽管他们二位都出身平常。帕敖将军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还在非法的鸦片贸易中起到领导作用(同时领导警察部)，也许是为掸族王国的华人团体的战时联系提供了方便，因为华人主导了大部分的鸦片贸易。沙立将军的经费来自政府彩票局的丰厚利润。他们使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立个人的追随者，并且支持政治活动，而且两个人都迅速地成为披汶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披汶的权力和声誉在1950年代中期正在减弱。

264

到了1955年，披汶似乎已经意识到他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也许担心比沙立更无情更不择手段的帕敖将军迟早迫使他离开。当年，披汶继续延长访问美国和英国，而且他带着一种对民主的消费热情返回到泰国。也许他甚至希望能被爱戴，而不仅仅是害怕或者敬重，或者也许他希望获得大众支持来抗衡沙立对军队的控制和帕敖对警察的控制。无论是什么原因，他开始放松威权的政治控制。他允许注册政治性政党以及民主化地方政府。他取消了对报纸和公共演讲的控制，而且他开始为1957年初到期的议会选举做组织准备。他通过掌管管理警察的内务部来努力削减帕敖的权力，并且削减帕敖派系对财政部和国防部的控制。不过，当1957年2月选举最终开始的时候，披汶的社里·玛兰卡西拉党只有通过公然欺诈、选举舞弊、篡改和胁迫等手段，才获得仅仅超过半数的席位(162个中的85个)。

公众对“泰国历史上最肮脏的选举”的强烈反对迫使披汶宣布全国处于短暂的紧急状态，并让沙立负责公共秩序。选举是披汶的第一个大错误，他任命沙立是他的第二个错误。沙立不是以政府的代理人去

镇压反对派,他似乎是同情学生抗议者。在朱拉隆功大学的一次集会上被问到选举的问题,他回答说:“我将要说他们是肮脏的,最肮脏的。每个人都欺骗。”[①]他小心翼翼不对平民行使武力,他迅速赢得了声誉,被称为是一个诚实、坦率的领导人。

当披汶政府在1957年8月和9月的一系列震荡中乱了阵脚的时候,事情到了危急关头。在应对东北部一场严重的干旱中它向人们表明自己是无情和无能的,而在应对涉及帕敖派系的一场木材丑闻中,它表明自己同样是腐败的。于是,议会对政府的政策和行动进行了一场主要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表达了对帕敖和披汶的严厉批评,包括指控帕敖攻击国王。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沙立和他的主要副手——他侬(Thanom)和巴博(Praphas)将军,从内阁中辞职。一个受人欢迎的记者解释道:

265

> 政府通常会做一些违背民意的事情。陆军元帅沙立在加入披汶的内阁前向民众承诺政府将改革民众要求的很多东西而且披汶已经保证。但是现在五个月已经过去了,政府还没有进行公众要求的改革。因此沙立不得不辞职。[②]

一群被任命的立法者当时也从政府的政治政党辞职,报纸和大众对沙立的支持越来越多。

最后,1957年9月13日,沙立率领57个军官正式要求政府辞职并且将帕敖革职。9月15日,举行了一个主要的公众集会来支持这些

---

① *Sayam Nikon* (Bangkok), 3 March 1957; 被翻译成了 Thak Chaloemtiarana, *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c Paternalism* (Bangkok, 1979), pp. 108—109。
Thai Noi and Kamon Chantarason *Watoelu Khong Chomphon Plaek* [The Waterloo of Field Marshal Plaek (i. e., Phibun)] (Bangkok, 1957), p. 3; Translated in Thak, Thailand, p. 118.

② Thai Noi and Kamon Chantarason *Watoelu Khong Chomphon Plaek* [The Waterloo of Field Marshal Plaek (i. e., Phibun)] (Bangkok, 1957), p. 3; Translated in Thak, Thailand, p. 118.

要求,而且人群游行到沙立的居所来表明对他的支持。9月16日晚,披汶和帕敖努力尝试获得最高法律权威的支持来批准对沙立的逮捕。他们被拒绝了,而沙立遭到警告。第二天早上4时,军队发起了一场组织良好的、闪电般的、没有流血的武力政变。披汶和帕敖不久就逃离泰国,军人再次上台。25年的时间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但是在政治上王国似乎还停留在1932年。

第十章　发展和革命：1957－1982年

266　　乍一看，1980年代的泰国似乎与披汶时期的泰国没有什么区别——或者，就此而言，也与朱拉隆功时期的泰国没有什么分别。所有的中央制度仍然似乎很强大：王国是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官僚机构几乎渗透到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军人主导了政治领域，经济仍然以农业为主，加上一点的外侨城市商业部门，佛教僧侣得到特别的尊敬，而且经济上劣势的和文化上少数族群的外围身份仍然被不完善地整合进国家经济和社会。王国保留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国家独立。它是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参与者，然而它经济上仍然与日本和西方工业强国保持密切的(和从属的)关系，政治上与它的东南亚政治联盟的邻居们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在文化上也是与西方保持联系。泰国的统治者向世界树立一个这样的国家形象：它是政治稳定和动量的经济发展的一个亚洲天堂，一个几乎是奇迹般设法保留其独特的文化身份、社会等级和秩序以及其泰族和佛教价值的国家，而其邻居已经陷入社会主义的蜕变中，或者迄今已经现代化，以至于他们已在一个由摩天大楼、快餐宫殿和晶体管化的流行文化组成的水泥迷宫中失去了他们的身份。

不过，同一个泰国也经历了曼谷街头的恶性政治暴力以及伴随着

267　罢工和游行的无休止的劳工动荡，不仅涉及不断增长的工厂和其他蓝领工人的人口，还包括成千上万鼓动土地改革和反对官僚麻木不仁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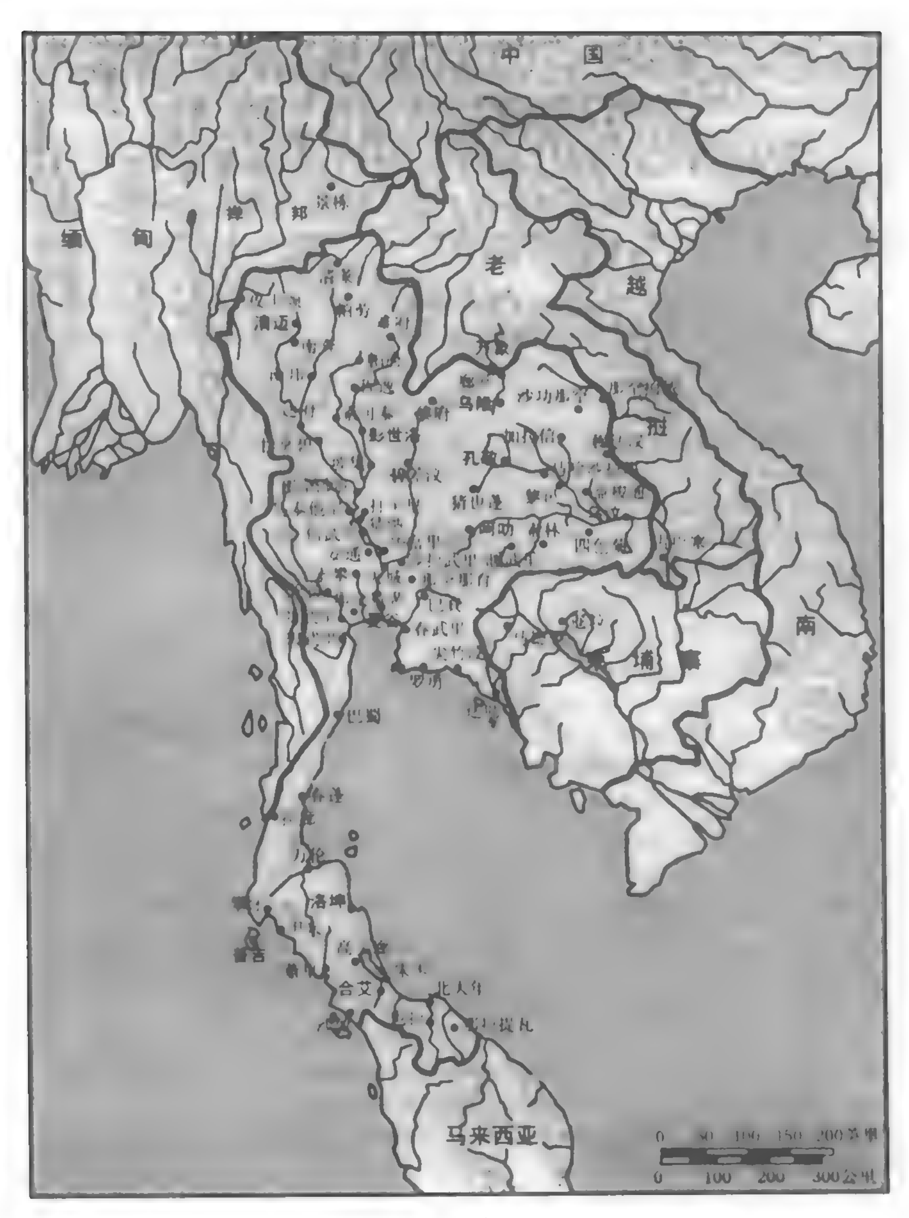
风的农民。一个从来不以意识形态激情出名的国家，在那里一个对公共生活“从不介意”的态度似乎是普遍存在的，1970年代经历了一个左派和右派政治情绪上的大规模迸发。泰国共产党突然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泰国人，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华人和知识分子，而社会主义党似乎长期以来就比较突出，经常争夺议会选区。事实上，自我主张的左派是如此强大，它对年轻人的吸引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掩盖了普遍拥有的印象：反体制的意识形态和总体上的西方政治思潮从来没有吸引过泰国人。甚至著名的佛教僧侣也对政治问题采取强烈的公共立场，表示他们不仅对左派不容忍，甚至还承诺对其实体根绝，在这种情况下，两极分化已经完成，而且泰国过去作为一个单一的、快乐的、和谐家庭式的社区，平和地效忠于国家、佛教和君主，这样的一个旧形象已经不见了。从1973年到1976年混乱的三年中，激情在暴力、公共不信任、猜疑以及游行和暗杀中爆发。这是一个有深刻重要意义的时期，其影响不仅塑造了今天的泰国，还塑造了明天和后天的泰国。

最近泰国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去解释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的相对和平和有序的国家，是如何变成了1980年代动荡和混乱的泰国的，也不仅仅去理解泰国政体的古典制度，是如何被削弱到它们不能完全获得被统治者的尊敬。挑战同样是设法处理国家结合在一起的问题，以及联结社会的纽带是多么强或者弱的。在这里我们仅仅能建议，泰国的成功，特别是被不严谨地称为所谓的发展，尽管其缓解了许多长期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但其本身已经创造了新的问题，尤其是政治的，以至于革命及其所有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含糊之处，已经在泰国发生并且正在继续发生。

沙立悖论

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的上台帮助泰国走出了文化转型的危机。他的同一时代的泰国人夹在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披汶时代的缓慢发展已经松动了维系社会在一起的传统纽带。披汶的政治实验和新制度都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纽带来取代它们。 268

269



中国
缅甸
掸邦
老
越
南
清迈
乌隆
孔敬
彭世洛
巴蜀
洛坤
普吉
合艾
北大年
马来西亚
0 50 100 150 200英里
0 100 200 300公里

当代泰国

根据传统价值和民族特性，沙立努力去为他的国人提供他们来自哪儿的感觉，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一个清晰的他们将去哪儿的远景。如当代的统治者一样，他的上台代表着独特的一代领导人的崛起。只有他们那一代的泰国领导人完全是在泰国接受的教育，因为从2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期派遣泰国学生到国外学习是非常有限的。这个事实也许解释了他们独立的以泰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解释了他们对传统制度和价值的更多尊重，解释了他们的信心，他们比其前任更能够代表他们国人中的大众，而且也许解释了他们培养的对一些公共舆论的容忍。尽管他们对传统价值和制度的承诺增强了他们对体制中更保守元素的吸引，同时，这也使他们远离了不断增加的城市、平民精英中的更年轻成员。

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是披汶长期的同伴和竞争对手，也是1957年政变的领导人，他于1908年6月16日出生在曼谷，一个陆军少校的儿子，除了其他的事情之外，他还从事柬埔寨语翻译。不过，他与母亲在穆达汉府的老族家庭度过了其早年岁月。他为了一点学校教育回到曼谷，于是，在11岁的时候，选择了军人职业并且进入到军官学院，他1928年从那里毕业。他早期的军队生涯以许多职务而出名，都在曼谷一直到1938年。他在掸族王国里度过了战争岁月，在那里他结交了帕敖·斯雅侬和平·春哈旺，他们为他在1947年进入政治提供了帮助，当时他和他们一起发动了把披汶重新推上台的政变。在这之后，他迅速崛起，1948年升为少将，1950年为中将，1952年为上将，1956年为元帅。

在领导1957年9月17日反对披汶的政变中，沙立强调他是代表人民采取行动的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取消了由"肮脏的选举"而产生的议会席位，并且组建了一个由扑·沙拉信领导的临时内阁，他是一个外交官，刚从华盛顿的任职返回担任设立在曼谷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秘书长。扑让泰国的盟国美国放心并且他开始准备12月份的选举，而沙立前去美国进行紧急治疗(肝硬化)。尽管政府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微弱多数的席位，但是在选举之后，扑拒绝继续担任总理，而且

270

在经过督促和劝说之后，沙立的副手他侬·吉滴卡宗接替了该位置，明显是缺席的沙立的替补。他侬的问题很快就与日俱增。民主党在3月份的补选获得13个新席位，而政府党获得9席位，而且在面对着预算问题，议会中经历了气势汹汹的斗争场面。甚至政府党与内阁的关系也不是那么顺利。他侬感到无能为力，只得选择辞职。

同时，沙立正在英国回复元气，并且在1958年中期集中精力思考泰国的问题。在对立法者的自私和固执的行为、恶意的和主要破坏性的报刊批评以及似乎正在使王国瘫痪的劳工冲突和游行等进行反思之后，沙立得出结论：政治体系需要作出重大变革。在几个月内，他分别咨询了时任驻美国大使的他纳·柯满和时任驻瑞士大使的德高望重的銮·威集瓦他干，然后决定需要一场"革命"来变革泰国。正如他纳不久后解释的：

> 在过去，我们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突然把外来的制度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而没有正确地尊重我们祖国的普遍环境、我们人民的本质和特色，总而言之，没有正确地尊重我们种族中的天才。结果就是它们的运作是随意的，甚至是混乱的。如果我们看看自己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国家在一个权威领导下就会更好更繁荣，当然这个权威不是专制权威，而是一个全国的所有元素都能集合在其周围的一个统一权威。[①]

沙立得出结论他必须提供这种权威。他偷偷地回到曼谷，接着在1958年10月20日取消了宪法，颁布戒严令。100多个政府的批评者被逮捕，包括吉·普米萨以及一些访问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记者，报刊受到严格的控制。此时，泰国将由革命委员会的法令来统治。

沙立建立一种使他的政府让人难以忘记的控制类型。他在整洁和秩序上喋喋不休——他希望街道能够得到清理并且保持清洁，流氓被

① *Bangkok Post*, 10 March 1959；被引用在 Thak, *Thailand*, p. 156。

围捕，小型犯罪得以减少，妓女得到控制。他认为三轮车是陈旧的、不文明的，并且禁止了它们。他取缔了鸦片的使用和贩卖并且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纵火犯，几乎就是在他们犯罪的现场，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当众处死了他们。他把所有的反对政府的人都称为“共产主义者”，不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非政治的批评者。在没有保释或者审判的情况下，他将他们拘禁很长时间。在泰国社会的许多部分里，越来越担心王国正在陷入混乱的人们欢迎这样的威权领导和统治。而民主党的小部分的追随者、主要是城市的以及东北部政治家的相当多的乡村支持者，或者对此感到愤慨，或者不再参与政事，直到15年后才露面。

沙立根据他和活过他很久的銮·威集一起形成的一个原创的思想来合理化他的政权。塔克·乍露提拉纳已经重新建构了它[①]，这个政治哲学是建立在权威的内在原则、社会政治等级的传统类型和统治的旧家长式的形式之上的，所有这些都在传统的泰国价值中体现。不是主要强调对一个抽象的国家或者宪法效忠，他认为这是不可行的，沙立把关注点集中在把君主作为公民效忠的焦点和政府合法性的来源。相反，政府变成了一个王权的世俗分支，由于这样的联系，政府也值得尊敬和服从。在牺牲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强调从大众经过官僚和政府到国王而组成的社会等级。国王重新回到道德、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顶峰。沙立尝试去重新定义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政府、官僚和国王对人民需求和期望的回应。政府的这种积极回应以一种高度家长式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的领导将像父亲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对待社会的成员，关心他们的福利并且保持严格的纪律。

无论是公众还是军队都不主张回归皇家专制主义，因此国王和军人主导的政府之间的分工是必要的。沙立恢复了君主制在泰国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复活了从1932年开始就被忽视的公众仪式，鼓励国王在公众露面，并且公开表明效忠国王普密蓬·阿杜德。例如，国王个人亲自授予所有的大学学位并且经常到各省巡游。通过这种联系政府获得

---

① Thak, *Thailand*, pp. 152－71.

了权威。通过使用高水平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在内阁和次内阁职位从事专家工作的海外受训的新一代泰国人中的先锋,政府也获得了信誉。最后,沙立的政府也尝试通过支持为了公众利益的经济发展,使其统治以民主的术语合法化。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沙立自己认为他的政府是 1932 年以来唯一一个值得冠以“革命”这个美名的政府,因为他的政府专注于对全部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进行重组。

沙立政府对发展的专注可以说不久之后就获得了重大成就。与以前的任何政府相比,他的政府更关心乡村的需要,比如高速公路建设、灌溉、乡村电气化以及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他的政府尤其关注国家人口最密集的和最贫穷的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沙立这么做是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和老族根源。政府还同心协力去改进初级教育并且决心延长义务初级教育从四年到七年。它把中学学生的入学率从 1958 年到 1962 年增加了 63%,同时也推广了职业训练。在同一时期它产生的小学教师也增加了 79%,并且开始在大学层次上的重大扩张:在清迈和



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和总理沙立·他那叻

孔敬开办新大学并且计划在南部省份进行类似的扩展。与这些努力一
起的还有在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指导下的更强的集中化的经济计划，从 1961 年开始制定五年的发展计划，该计划强调在灌溉、交通、电力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投资。再加上对私人和外来投资的开明促进，政府的经济政策很快就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获得了很高的增长率，在 1959 年到 1969 年每年的增长率为 8.6%，几乎是前一个十年的两倍。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部分上依靠国际援助和投资，但是最终却是依靠泰国的政策和专业。

沙立代表了一代人和一个政治联盟，不仅仅是军队里面的一个派系。他所谓的革命以及他对社会的权威性的重组是以君主制最高权力为依据的，这使他获得了旧的官僚贵族和保皇分子们的支持，他对发展的支持以及他致力于一个自由企业的经济秩序，使他获得经济精英的支持。通过鼓励他们参与到扩充官僚机构，他吸纳了少量的受到西方教育的技术官僚。对于那些仍然反对他的如乡村政治家或左派知识分子，他使他们哑口无言或者是干掉了他们。

沙立和其继任者时期的泰国的发展是发生在一个咄咄逼人的国际状况下。1960－1961 年的老挝危机期间转折点到来了，泰国卷入其中并且深切地关注其结果。1950 年代初泰国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泰国在 1954 年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是共产主义力量在越南的崛起，尤其是越南支持老挝苏发努冯(Souphanouvong)亲王的左派巴特寮(Pathet Lao)运动。泰国在 1950 年代中期通过发展与老挝右翼分子的密切关系而进行了还击。老挝的右翼分子包括富米·诺萨万(Phoumi Nosavan)，他恰好是沙立的表亲。1953 年老挝从法国获得完全的独立之后，巴特寮未能进入政府，但是它仍然在军事上控制了几个与越南北部接壤的老挝省份。不过，在 1957 年，总理梭发那·富马(Souvanna Phouma)亲王商谈了一个和解方案，导致巴特寮进入到政府。泰国军方作出了回应，暂时关闭了实际上所有的老挝对外贸易经过的边界。也许是由于泰国的支持或者鼓励，老挝右翼不久就迫使巴特寮退出政府并且设立了包括富米·诺萨万为国防部长的政

274 府。在 1959 年底,越南军事上正在支持巴特寮的报道,引发了泰国努力尝试去获得第一次的联合国的调查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干涉,但是两者都失败了。富米发动了一场武力政变并且在 1960 年 4 月在万象建立了另一个右翼政权。老挝的状况恶化成了内战,泰国对巴特寮的发展和其在整个老挝的军事优势感到震惊,并且感觉到共产主义已经到了边界了。他们感觉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来运作,而且当美国放弃了老挝右翼并且支持了中立者梭发那·富马的时候,泰国感到被出卖了。1962 年 7 月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确保了梭发那·富马作为一个老挝民族团结政府领导人的地位。

表 1　1958－1967 年美国对泰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单位:百万美元)

财政年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经济[1]	25.9	58.9	25.9	24.3	47.6	21.9	15.1	41.4	60.4	37.0
军事[2]	19.7	18.0	24.7	49.0	88.0	71.8	35.2	30.8	42.3	59.0

资料来源:1. David A. Wil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uture of Thailand* (New York, 1979), p.144。

2. 1958, 1960 年来自上书;1961－1967 年则来自 U. 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Securiy Agreements and Commitments Abroad,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curity Agreements and Commitments Abroad* (Washington, 1971, vol.1, p.633)。

泰国对这个结果的容忍很明显是通过下列事情达到的:第一,他们接受了美国防卫泰国的明确承诺,不论东南亚条约组织同意与否;第二,美国军队驻扎在泰国;第三,大量增加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经济上,为了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泰国似乎放弃了经济援助。而且,经济援助和计划都被改变去适应安全关注,这是由一个反政府暴乱的高潮所引发的,尤其是在东北部。军事上,美国的援助支持了泰国的军事集结,主要是面向老挝,后来逐渐面向越南战争。

老挝不是泰国军队的唯一关注。随着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开始在 1950 年代末期与共产主义的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部分原因也是对抗北越),泰国支持反对他的民族主义反对派,关闭了边界,断绝了关

系。一个涉及一个山顶庙宇(柏威夏寺)的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被提交到海牙国际法庭。1962 年不利于泰国的决定似乎对泰国来说是不公正的，尽管在国际法惯例内。

275

这一时期与老挝和柬埔寨关系的恶化让泰国军人不安。两者所涉及的地区都是泰国认为他们有强烈的历史要求的，对于这些地区来说他们直觉地感到就像“兄弟”。军人实际上曾经在 1940 – 1941 年重新征服了老挝和柬埔寨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只不过是在战后被文职政治家和强国“夺走了”。眼下，他们通过声称去保卫泰国免受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和控制，从而来合法化其权威，但是他们似乎无能为力。1962 年和 1963 年一旦需要或者机会出现，他们希望能够使用美国的军事训练和硬件去准备未来更激烈的行动，这是可能的。一个对他们的政策更冷嘲热讽的评估将导致这样一个结论：他们主要的关注是保持和巩固他们军人对泰国本身的控制。

1963 年沙立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于 12 月 8 日去世。不久，他的家族开始争吵其遗产。据透露他留下了接近 1.5 亿美元的财产，包括在许多商业企业的控股(比如在为泰国大米销售供应的麻袋上拥有垄断权的公司)，2 万莱的土地(8 000 英亩)，以及许多的房屋——而且除了一个悲伤的第二任妻子，他拥有 50 多个情人。他的名誉突然(如果是暂时的话)受到了玷污——至少直到公众经历了他的继任者并且开始怀疑沙立是否不值这个价。他曾经是无情的、贪婪的、任意的和独裁的。他曾经在议会民主和人权上逆潮流而行，他曾经把泰国的国际地位同大放光彩的美国结合在一起，而且他曾经把国家的将来作为抵押。他曾经建立了一个持续的政治哲学，该哲学夸大了传统的价值和制度，在牺牲平等主义甚至人权的基础上支持社会和政治等级。不过，因为沙立和军人在发展上无可否认的成功以及他有点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公众形象，作为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男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一个完成所有事情并且关心和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的人，这个政治遗产是很难一笔勾销的。

沙立的政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一个矛盾体，因为他打出的名号

和政策的核心内容这两个概念是自相矛盾的。他自我宣称的革命目标是恢复以泰国传统价值为基础的内在的君主制和等级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发展的目的是加强和合法化这个秩序,但是实际上他却是破坏了它。经济发展增强了中产阶级;教育扩张有助于他们价值的西方化,或者至少是怀疑一些泰国的价值;与美国政策的密切联系产生了政治热点问题。总之,短期的力量和稳定是以更长期的不稳定和政治危机为代价获得的。

276

在越南的阴影下:1963－1973 年

在沙立死后,军事继承就转到他侬·吉滴卡宗身上,他长期以来就是沙立的副手而且从 1958 年起就是沙立的总理代理人。他侬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相对诚实的并且没有那么咄咄逼人的领导,他缺少沙立所具有的个性和磁性的领导素质,但是更加宽容和更灵活。他从 1963 年到 1973 年作为总理的十年时间,几乎原封不动继续了沙立的政治机构以及政治哲学。在这段时期,作为副总理和内政部长,巴博·乍鲁沙天在他一边。这两个人的同盟通过他侬的儿子纳隆(Narong)和巴博的女儿的联姻得到进一步加强。

现在看来他侬和巴博统治期间似乎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泰国不断增强的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不断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第二个是不懈的追求发展,继续沙立的倡议,加速王国的现代化。前两个反过来促成了第三个,不可避免的泰国的政治发展。尽管起初沙立,随后他侬都努力尝试去阻止和引导到其他的方向,但是最终却导致了与沙立想要的完全不同的一场革命。在这几十年期间的泰国公共生活中,许多最尖锐的讨论涉及国家同其邻居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复杂关系。在一个狭窄的政治层面上,这些讨论都集中在下列问题:涉及老挝和柬埔寨,或整体的印度支那,王国与美国或强国的关系,其与日本或多国公司的经济关系,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讨论经常是热烈的,与会者热情地表达非常不同的和思考深入的看法。最终,这些冲突中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都是些涉及泰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身份以及独立的根本性问题。

277

在泰国现代历史上没有比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泰国同美国和印度支那战争的纠缠所产生的问题更能概括这种冲突了。

在泰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上最持久的主题之一是军人关注同老挝和柬埔寨的关系，就如18世纪以来的所有泰国政府一样。按照他们的观点，长期以来的历史问题就是把越南整合到大陆东南亚的政治中。在早期这不是个问题，但是越南更倾向于中国，同时被西部的一个崎岖不平的山地屏障和沿海岸向南的真腊缓冲国与大陆强国分开。但是一旦越南人在18世纪开始定居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冲突不久就到来了，就如达信统治时期那样，先是在柬埔寨，然后是老挝。

由于卷入了越南战争，泰国经常被指责是为了有利于与唯一的一个大国——美国保持密切的一致和参与，而放弃了他们传统的独立或者中立的外交政策。这个观点歪曲了事实。因为所有人会马上不假思索地承认，虽然在技术上不偏不倚，但是暹罗实际上主要依靠英国来挫伤法国更极端的帝国冒险。同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与日本建立了密切的同盟关系，然后突然转成与美国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在战后的十年里更加密切。泰国感到印度支那的发展越有危险，他们就会更加转向一个在力量和意愿上都愿意帮助他们的唯一大国——美国。1954年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产生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个总体的多边承诺来防卫泰国的国防。1960－1961年的老挝危机产生了当时的秘密的《腊斯克—他纳协定》(Rusk-Thanat)，美国承诺防卫泰国。它似乎越来越暗示美国将防卫来自泰国内部的反叛和来自外部的入侵。不过，这一时期与美国关系的发展无论如何也不是单方面的。泰国人也追求他们的外交政策目标，在细节上不一定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完全一致。他们操纵他们同美国的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标，首要的是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或保持友好的、非共产主义的、反越南的政府。

因此，泰国的军人必定会牵涉进越南战争，这场战争更准确的是被称为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在1960年代初，当时北越和南越的公开战争重新开始，老挝和柬埔寨都很快卷入进去，尽管两个国家持中立主义立场的政府都努力去掩盖这个事实。北越通过使用所谓的胡志明小道

278

穿越老挝南部和柬埔寨东北部的山脉来供给他们南部的部队。泰国和美国通过秘密地干涉老挝而做出了回应。北越和中国通过支持泰国的反政府叛乱也做出了回应。

到了 1964 年中期,印度支那的情况看起来越来越对泰国和美国具有危险性。泰国当时同意大规模升级他们军事基地的设施和后勤系统,而且从 1964 年 3 月,美国的战机可以把曼谷北部 255 公里的那空沙旺省的塔克里(Takhli)机场作为基地。在当年 8 月份的东京湾事件之后,更多的美国战机以呵叻为基地,而其他的军事先遣队则是在那空帕侬之外运作,直接对付老挝东南部的胡志明小道地区。美国的军事集结从 1964 年持续到 1968 年,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大约有 4.5 万美国军事人员驻扎在泰国,大约有 600 架战机,包括在乌塔堡(U Tapao)的 B-52 轰炸机。从泰国的这些和其他的军事基地,美国发动了对北越和老挝的空中打击,包括轰炸、空中侦察和补给,用信号干扰参与电子战,电子情报收集,雷达监控,秘密空投地面部队到老挝和柬埔寨。

泰国从初期就开始直接卷入到冲突中来了,1964 年中期一支皇家泰国空军先遣队抵达南越,1965 年一支海军先遣队也抵达。最终,在 1967 年 1 月,泰国同意派遣一支地面作战部队到南越。1967 年中期泰国在越南的部队有 2 200 人,到了 1969 年超过了 11 000 人——相当于皇家泰国部队总实力的 14%。同时,在无论美国是否参与和支持的情况下,泰国在老挝进行了自己的运作。1966 年的报告把泰国的军队放在老挝,当时的政府公告通常统计出军事伤亡的数字,但是没有指明这些伤亡来自哪里。不过,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泰国军人在传统上似乎被允许在“军事”事务上拥有很大的自由度。

不过,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的影响扩展到了国家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它不仅仅是大量的美元注入经济中以及成千上万的泰国人变得依靠美国的存在来生活,它也不简单的是越南的繁荣带来了更广泛的腐败,以及在旅馆和低级夜总会酒吧、新碧武里公路或者乌隆按摩厅里产生的商业罪恶。这个短暂时期的影响更加深入。城市和经济中服务

279

部门的经济吸引力甚至改变了农民家庭中的社会关系，同时它也有助于军事执政精英与华泰商业精英之间在社会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男女青年到城市去学习英语并且从事侍应生、调酒师、酒店服务台办事员、妓女和按摩师、导游和纪念品商店办事员的工作。建筑业的增长非凡，建造了道路、机场、酒店和咖啡馆，以及面向高层外国人和泰国暴发户的豪华住宅。从长远来看，为了一个非常有效和豪华的旅游业理应发展基础设施，但是短期来看，更重要的是外国人在泰国密集存在的文化和政治影响。

直到1960年代晚期，只有少数的泰国精英才能完全接触到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思想、价值和流行时尚。但是越南战争期间带来了外面的世界与大量人口前所未有的面对面的接触。在这里，战争只是加速了十年前左右已经开始的教育机会和大众媒体的扩张。社会的许多方面与西方的直接接触增加了泰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对抗力量——吵吵嚷嚷地，例如，当盒式磁带录音机能够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散播到几乎所有地方的时候，有抱负的音乐家们能够更轻易地为那些表演西方流行音乐的天才找到市场，而表演泰国传统音乐的则比较难。与西方品位和时尚一起到来的是社会关系的新想法（例如包括性道德、浪漫爱情的想法以及代替传统尊敬达成协议的青年时期崇拜）以及一个新的对现有泰国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质疑。聪明的大学生开始质疑日本在泰国的贸易及其经济现代部门的主导地位，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年一样，他们对反越战运动兴奋不已，以至于质疑他们自己国家在那场战争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多种因素导致了乡村对执政的军政府政治挑战的增长。 280
经济学家也许争论1960年代泰国乡村的真实收入增长的程度，以及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不过，最终重要的是乡村家庭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想法是什么。政府努力去改善条件也许有助于乡村贫困人口，自相矛盾的是，他们也许会促进农民意识的形成——尤其是在东北部——在绝对程度上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是多么的穷。而且有意思的是，那些最乐意挑战政府的农民不是那些穷人中最穷的

那部分人，而是那些最好的人，因为他们能够获得有限的教育和经济机会，能够明白他们处于多么劣势的地位。就是这些人的不满转化成了反政府的暴乱。

随着旧左翼政治反对派与泰国共产党合并并且试图协调他们的努力、扩大他们的基地的时候，叛乱在1964年底进入高速增长。第一个主要的威胁不久就来自东北部的暴乱，由在北越和老挝受到训练的干部领导并且涉及了几千个武装支持者，主要是东北部人。到了1967年，暴乱向北散播到清莱和兰等地区，那里的参战者主要是泰人和华—泰人领导的赫蒙(苗)〔Hmong(Meo)〕人，并且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和供给。第二年类似的暴乱开始在莱府(Loei)—彭世洛—碧差汶地区出现。到了这个时候，暴乱在中南部〔索叻他尼(Suratthani)和洛坤省份〕也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参与者主要是泰人。在最南部的省份，马来持不同政见者的加入更增加了马来亚共产党华人部队造成的军事威胁。泰国现在面对着严重的内部问题，这些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不能再像20年代驳斥的一样了——少数不满的华人和华—泰知识分子的革命乌托邦。

到了1970年代初期，他侬—巴博政权面对着一个主要的安全危机。这不仅仅是军队陷入两个筋疲力尽的冲突，既要试图阻止内部叛乱的上涨潮，同时又要保持部队在印度支那的力量。他们也慢慢担心他们最亲密的盟友美国正在放弃他们，当时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转向越南化的印度支那的冲突，让“亚洲进行自己的战争”，而且将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而泰国军人认为中国正在支持泰国的反政府叛乱。元帅他侬的回应是努力从十年的发展中获利，通过争取泰国社会中那些从经济、社会和教育变化获利最多的民众的支持来巩固他正在变老的政权。他将会发现——就如1873－1874年的朱拉隆功国王，或1912年的瓦吉拉伍德，或1932年的帕恰迪波，或甚至1957年的披汶一样——他们的回应缺少感激和尊敬。

281

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沙立同时对革命和发展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发展把他的革命推

向一个与他打算相反的方向。无论沙立和他侬在多大程度上打算为发展而增强泰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它都只是起到相反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也许认为1973年的泰国社会比十年前左右在结构上更弱，或者更松散。这种情况发生的过程是复杂的，而且我们只能指出其大概。（一个统计摘要包括在表2里面）。

用最彻底的术语来讲，泰国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发展故事可以用令人头脑麻木的统计数字来讲述。国家的人口一直在增长。由于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小的人口稀少的国家，泰国相对于其资源来说已经变得拥挤和人口过剩。1947年其人口接近1 800万，然后1960年增加到2 600万，1970年3 400万。1980年之前，它已经达到4 400万，到了1980年，它达到4 500万，1974年的年增长率是2.74%，由于下降的出生率和死亡率，1980年代初将为2.2%。到了1980年代，平均年龄开始上升，不久在1980年代就超过了20岁。在1970年代，科学的出生控制方法同样在贫穷的东北部乡村农民和富有的城市华—泰中产阶级家庭中使用。

这些年来，历任的泰国政府不乐意同心协力去控制人口。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认为听话的泰人将减少他们家庭的成员，而华人少数族群将扩展人口比例。不过，到了1980年代，泰国的“华人问题”的重要性在降低，多年来不再有大量的华人移民到泰国，华人国民（公民）相对于泰人公民的比例突然下降，从1937年占总人口的3.7%下降到1960年的1.6%和1970年的0.9%。甚至更多泰国公民讲华语并且自认为自己是华人。他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地缩减，因为泰国的教育政策限制华文教育，而且还因为许多促进融合的微妙的政治和经济压力。1960年代和1970年代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在泰国成功的阶梯包括泰文教育、泰语姓、泰语以及甚至和泰语家庭通婚。 282

在这二十年里，泰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曼谷，它的面积增加了三倍，而且它几乎被拥挤和空气污染所窒息。天边耸立着参差不齐的高层建筑——旅游酒店、政府办公楼、公寓住宅和商业公司。在延伸的郊区中间是从生产汽车到大规模生产传统工艺品的所

有东西的杂乱工厂。这样的城市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曼谷一个地方。我们也能在一度沉睡的省级镇里找到，如彭世洛、合艾(Hat Yai)，或者东北部的呵叻、孔敬和乌隆。

乡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东北部的穆达汉府多山的内部地区，偏远的侬颂(Nong Sung)乡村在过去一旦进入雨季，道路被水淹没，就无法进入，现在它已经拥有了一条铺就的全天候的公路、自来水、电、冰箱和几家电视台以及一个中学，而且许多村民的儿子和女儿们曾经去读大学和师范学院，然后在政府官僚机构中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

仔细审查这两套统计数字表明这种现象已经变得是多么普遍。第一，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73.9％下降到 1970 年的 62.9％和 1980 年 55.6％。这些数字也许有一定的欺骗性，其掩盖了某些比例的除了其他职业外还从事农业的乡村人口，但是它应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泰国不再是一个田园牧歌的、乡村的、水稻种植的社会。迅速增加的泰国人口从事非农业的职业，而且泰国职业结构的多样性有显著的增加，此时包括电脑程序员、工业化学家、农民和渔民。

第二，国家的现代制造业部门经历了有意义的结构变化。1960 年代的经济严重倾向于开采活动——农业、林业和矿业——而且制造业主要是为了出口。1960 年代，政府的政策是通过促进工业发展主要是用当地制造的产品替代进口，食品加工业失去了其在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当政府的发展政策在 1970 年代转向出口导向工业的时候，制造业部门繁荣起来并且多样化；它不久占据了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还多，并且仅仅使用了比较少量的劳动力。

283

这并不是说农业在经济上不再发挥作用了。尽管其大量的人口增加，但是泰国仍然是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稳定的大米出口国之一，随着所谓的绿色革命的出现，水稻产量已得到大大改善，因为它把改良种子和技术带进到许多亚洲国家的农业中。不过，与此同时，泰国的农民将他们种植的作物多样化了，1970 年代末，大米终于被另一农业商品——木薯超过，木薯成为泰国的主要出口商品，而制成品的出口总值超过十年前的所有出口的总值。旅游业不能以与商品和制成品的同样

方式被列为出口，但它相当于一个出口，因为它对王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作出贡献。旅游收入从1961年的2.5亿泰铢到1971年的22.9亿泰铢、1978年的56亿泰铢。表面上看，这些统计数字给人印象深刻。泰国成功地使经济多样化并且减少了对少数高度脆弱的主要农作物的依靠。不过，在1970年代中期，泰国遭遇了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商品价格的跌落和该国大量进口的石油和制成品价格的灾难性上升。通货膨胀突然变成了严重的问题，而且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新兴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所产生的中产阶级。

很难去定义泰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按照收入进行的标准定义将是误导，即使它能够被建构。通过考察几个其他的关键性的社会指标，我们可能会建议其数量大小。它主要是城市的和非农业的，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人口中的这些人是如何成长的。它几乎全部是从1960年后崛起在曼谷和一部分的省级的镇和城市。对这一组人来说，在中学以及以上的现代教育是获得地位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先决条件——这包括接触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足够的收入来保证子女的教育质量，实现某种意义上向上的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考察1947年至1980年间实现各级教育的绝对数额也许是有益的。 284

表2　1961－1978年主要出口产品的排名

（单位：百万泰铢）

1961年		1970年		1978年	
1. 大米	3 598	1. 大米	2 516	1. 木薯	10 837
2. 橡胶	2 130	2. 橡胶	2 232	2. 大米	10 403
3. 黄麻和红麻	626	3. 玉米	1 969	3. 橡胶	8 020
4. 锡*	617	4. 锡	1 618	4. 锡	7 225
5. 玉米	597	5. 木薯	1 223	5. 纺织品	6 863
6. 木薯	428	6. 黄麻和红麻	719	6. 玉米	4 215
7. 柚木	252	7. 绿豆	255	7. 糖	3 913

（续表）

1961 年		1970 年		1978 年	
8. 水泥	53	8. 冷冻虾	224	8. 电子电路	2 148
9. 糖	26	9. 萤石	222	9. 宝石	1 709
10. 纺织品	23	10. 烟草	197	10. 冷冻虾	1 466
11. 宝石	21	11. 柚木	156	11. 豆类	1 342
12. 烟草	16	12. 高粱	103	12. 菠萝罐头	1 195
		13. 糖	94	13. 烟草	1 148
		14. 水泥	83	14. 冷冻鱿鱼	1 019
				15. 钨	945

说明：* 至 1965 年为铁矿石，此后为冶炼的锡。
资料来源：1961 from *Statistical Yearbook Thailand*(1964), pp. 323 — 329; 1970 and 1978 from *Thailand into the 80's*(Bangkok, 1979), p. 206。

这些数字表明一个明确的进展。从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高中毕业生与小学毕业生的比例增加了四倍。尽管在 1960 年小学毕业生与中学毕业生的比例是 26∶1，而到 1980 年则是 7∶1。学生获得更高层次教育的比例得到大幅度的增加。青少年继续进行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相对比例的增加肯定是重要的，因为它反映了不断增加的教育机会和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愿望。不过，同样有意义的是这些人的绝对数量，男人和女人几乎拥有同样的比例。这一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获得了十倍增长，从少于 1 万到几乎 100 万，再加上中学毕业生的数量得到了同样的增加，所有这些给泰国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大众基础。他们的大小和繁荣使他们成为大众市场广告和大众媒体的一个主要的目标观众。由于他们的教育、经历和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和行为把他们跟乡村社会的大众分离开来。由于他们的数量足够大以至于不能被吸收进政府官僚和武装部队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不能成为统治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高等教育的招生持续增加，从 1974 年的 107 634 人到 1980 年代初的超过 200 000 人，因此每年他们的数

285

量都急剧膨胀。

表3　1937－1980年的教育成就　（单位：千人）

	1937	1947	1960	1970	1980
完成小学教育(第4年)	1 142	2 475	7 371	12 535	26 756
完成中学教育(第10年)	13	87	276	575	3 471
任何学院或者大学教育	5	10	95	186	868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1937, 1947, 1960, 1970. *Preliminary Reprot 1980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1982)。

随后的几十年对中产阶级来说是困难的和具有挑战性的。政府雇员的招聘没有像大学毕业生那样迅速扩大，而且大批青年中产阶级和有抱负的泰国中产阶级首次必须考虑进入私营部门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和评价的伤害，这种评价是基于他们的表现而不是他们在行政机构中的传统做法。他们感觉相对比较不安全，也许也不太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变化形成了他们的政治反应和愿望，并且造成了泰国政治的不稳定性。

这不一定是认为泰国中产阶级的出现是充分意识到其独特的身份和利益。仅仅根据其成员的行为判断，人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中产阶级的增长加强了传统主义的泰国的政治保守主义。这个阶级的成员对保持一个相对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明确的兴趣。与此同时，他们正式的价值观——从教育中获得的自由价值并通过接触西方政治生活而得到鼓励——使他们越来越对军事独裁统治以及泰国文化传统的那些元素感到不舒服，他们在理智上认为这些是迷信的，或按照国际标准是不人道的。因此他们的利益导致他们重视秩序和一些少量的等级，导致他们担心不稳定以及现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任何迅速的、根本的改变。因此，尽管他们支持1973年推翻他侬—巴博的行动，但是他们也参与到右翼中反对1976年的政治混乱。

中产阶级在成为泰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上行动缓慢，由于一些同样的原因促成了1930年代军人的首要地位。1970年代和1980　286

年代的中产阶级比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的时候更加四分五裂。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数量更大以及私人领域比以前更有意义。甚至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也是巨大的和无定型的,而且在单独官僚机构之间旧的分歧之上又增加了高级官员和低级官员、前辈和后辈以及不同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之间官僚的新分歧。在一种高度的整合下面潜伏着很多的竞争、纠纷和冲突。这即使在军队内部本身也是事实,例如低级军官的"青年土耳其党"和"民主士兵"派系挑战执政的将军团体。即使军队也越来越不能根据其所有资源来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行动,那么一个细分和多元化的中产阶级更不可能这么做了。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得泰国的统治者更有必要去考虑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价值观。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泰国的农民和工人身上,尽管其规模比较小以及其发展的速度比较慢,他们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参与叛乱和威胁参与叛乱最起码已经赢得了政府对农村问题的重视,特别是在较偏远和最贫穷的地区。这一重视得到了相当多美国和其他经济援助的支持,并且产生了一些成果。为了提高政府对军事挑战的反应能力而新建和改造的道路,从长远来看把边远村庄整合进国家经济。改善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努力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个雄心勃勃的改善饮用水供应和消除疟疾的计划也是如此。灌溉项目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加快了绿色革命,而改善的通讯和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支持了作物的多样化并且改进了农业盈余的营销。与此同时,泰国的农民并没有平等地分享农村收入的增长,而快速的人口增长和新的土地供应的衰竭,一起导致了农场平均规模的减少,农业租赁的增加,以及青年人从农场溃逃到已极度饱和的城市劳动力市场。

不断增加的政府在农村的存在还促成了不满的增多。村民们变得更易受军队和警察的骚扰或官僚腐败和渎职的侵害;政府对发展的过于乐观的承诺给他们带来的期望却经常得不到满足;他们逐渐了解到他们落后于较发达地区和城市居民多远。到了1970年代初,这些事态的发展增强了政治意识,促成了叛乱以及农会和工会的形成。不过,尽

287

管那时候这些运动变得相当强大，但是他们没有像中产阶级对军人政权不满那样的力量和紧迫性。农村不满可能将学生和中产阶级对政治变革的承诺合法化了。

革命和反动：1973－1976 年

在一个短期临时宪法的统治下，沙立已经任命了一个制宪大会来审议一部永久宪法并且重申对民主体制的承诺。整整一代的泰国中产阶级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接触着民主思想而长大，因为他们学习了历史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他侬受到日益沉重的压力来放松其控制，压力来自美国人对与其联盟的军事独裁政权的不快，压力同时还来自曼谷数以十万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为代表的泰国中产阶级。1968 年，他侬的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宪法，该宪法与 1932 年的一样，提供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下议院和任命的上议院组成的两院制立法机关。在 1969 年 2 月举行的选举中，政府控制的政党在下议院获得大多数席位，他侬继续担任总理。当他侬在 1971 年 11 月发动针对自己的政变时，他解散议会，禁止政党，并在再次恢复了军人主导政府的临时宪法下进行统治。这一次的民主实验就像以前的那些实验一样失败了。

这次实验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政府很难使其预算在下议院通过，并且让其感到震惊的是它所看到的在一个新竞争气氛中国家团结的崩溃，这些新的竞争因素包括政治政党、放松的报刊控制、上升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对泰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和政府经济发展缓慢的抗议。泰国的军人统治者更担心的是美国与中国的和解以及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化对泰国安全的含义。他们担心美国支持的缩减和美国捍卫泰国命运的意愿削减的速度正在开始超过柬埔寨和老挝。但是，最重要的是，当泰国军队似乎正在丧失其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他侬和巴博在放松控制上犹豫不决。他侬和巴博正在接近强制退休年龄（60 岁），而且他们唯一明确的继承人是他侬的儿子（也是巴博的女婿）中校纳隆·吉滴卡宗，但是他在军队内部的支持无论如何都不强大，而且他一般被认为是腐败的。

288

他侬重新恢复军人控制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他对政治危机的强人方法对 1933 年的披耶·帕凤、1938 年和 1947 年的披汶和 1957－1958 年的沙立能够有效,但是它不可能再在泰国成功。这不仅仅是军人精英内部无法达成一致;问题要比这深刻得多。泰国社会整体上(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和中产阶级)不再接受这样的一个在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的幌子下仅仅代表军人利益的政权。无论是自私还是无私,他们期望能有一些代表他们冤屈和利益的直接的声音,能够分享一些军人允许之外的政治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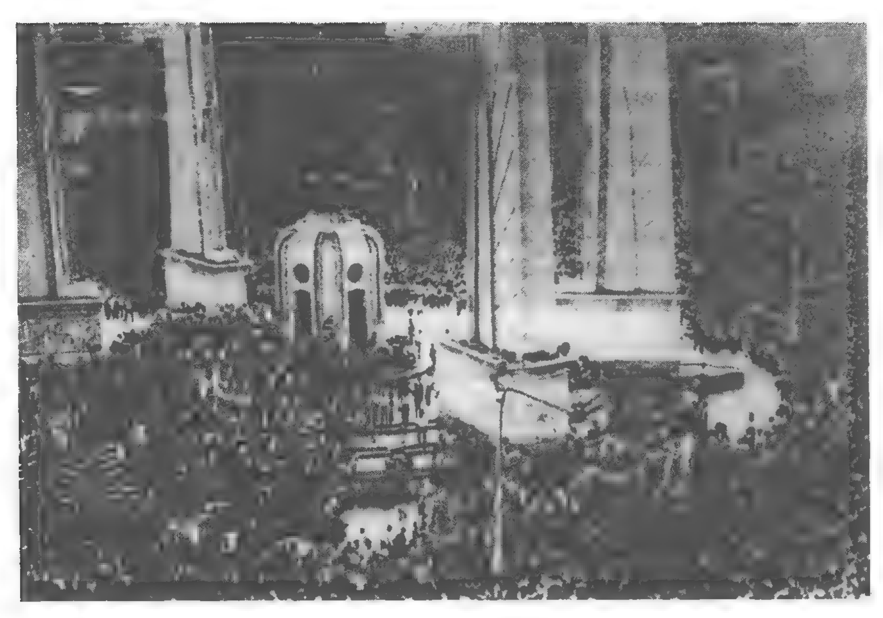
最后,学生,这个最不拘泥于现有秩序和最面向将来的社会团体,终结了他侬—巴博的政权。他们感觉被欺骗了。他们曾经被劝诱去期望政治演变,而他侬恢复军人统治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们以一种新的意识和战斗力开始采取行动并且很快得到许多民众的同情。

到了 1973 年中期,他们已经变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由于反政府出版物被取消,大学生被驱逐,学生们的示威在 6 月开始。当在公共传单中要求一个宪法的批评者们被逮捕的时候,学生们的示威在 10 月份如滚雪球般发展。有 20 万到 50 万人的大规模示威,包括大学生、中学和技术学校的学生以及许多年轻的中产阶级成员,他们要求释放批评者,颁布宪法。这造成了同警察的冲突,而且暴力升级为攻击警察局和政府办公大楼。他侬未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军事支持。更冷静的军事首领拒绝派遣他们的部队去攻击平民大众并且得到了国王普密蓬的支持。1973 年 10 月 14 日,他侬和巴博被迫辞职,逃出泰国流亡到国外。

289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1973 年 10 月的事件远比 1932 年的事件或沙立的威权上台更适宜称为“革命”。它们终结了一个人的威权统治;而且如果它们没有终结军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的话,那么它们至少标志着一个新的意识:有必要比过去更广泛地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次,人们对政府旧体制上的错误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腐败,国家利益屈从于军人的自我利益,对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群体的利益和价值的傲慢和麻木不仁,对经济和社会改革不足的承诺和进展,被认为过度依赖和屈从于美国和西方。

运动的先锋是学生，他们也许以更极端的形式表达他们许多同胞的感情。他们表露出了一个长期的但以前总是受压抑的传统的不同意见，甚至援引国王帕恰迪波在 1935 年退位的时候对军人统治的批判。他们使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左派文人的著作再次受欢迎。他们至少拥有国王和军队里面一些人的诚意或许是支持。由于被来自他们对整个国家分享他们对旧政权负面评价信念的信心所振奋，他们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民主改革实验。与此同时，他们低估了许多泰国人在积极政策和一个将来可能建立其上的意识形态承诺的分歧程度。 290



1973 年 10 月革命时群众聚集在民主纪念碑前纪念 1932 年的革命

10 月 14 日的最初结果是一个由桑雅·达磨萨克提博士领导的文官政府，桑雅博士是一位著名的法律学者，他曾经是国立法政大学的校长，枢密院的主席，并与国王关系密切。一个要求一院制议会并完全由选举产生的宪法被颁布出来，并定于 1975 年 1 月进行选举。由于受到学生的领导或启发，政治组织和活动以规模空前的方式展开，甚至涉及了城市劳动者的罢工和由不满的农民参与的大规模示威。学生在村庄

组织政治教学,而各政党纷纷成立,无处不在。公众表达异常自由,报纸和杂志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左派知识分子如吉·普米萨和库拉披·赛帕迪提的著作再版,而且马克思社会主义正在流行。书店里堆满了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人们可以发现呼吁阶级斗争和革命或制作燃烧瓶和伏击政府军的详细方法的传单。左派,甚至是最左派,都完全曝光,他们相信一个新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一天即将到来。工会和农会的组织正在顺利进行,所有这些最初都是针对 1975 年的选举。

没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明显多数。起初,老资格的政治家社尼·巴莫,继任宽 · 阿派旺成为民主党的党魁,他是长期政治传统的继承人,他努力与两个左派政党结成同盟来统治,但是两周之后这个努力失败了。于是他的兄弟克立·巴莫开始组织政府。通过一些娴熟的操作,克立组成了由他的温和的社会行动党牵头的包括中间和左派 17 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他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包括确保了美国承诺快速撤出在泰国部队和谈判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而这两者都是受欢迎的。

泰国国际环境的变化造成了人们对克立悠闲自在和有些混乱的联盟的失望。从 1975 年初开始,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倒塌,巴特寮政权巩固了其在老挝的权力并且取消了 600 年的老挝君主制,共产主义势力在印度支那获得了重大的胜利。不确定的气氛增加并加剧了克立不稳定联盟内部的紧张局势。尽管政府尝试去确保美国完全从泰国撤出的努力是有争议的,但是国内问题迫使面对着议会不信任投票的克立在 1976 年 1 月辞职,呼吁举行新的选举,他不切实际地希望能够获胜。

291

1976 年 4 月的议会选举最初似乎预示着改善的稳定。民主派控制了 279 个席位中的 114 个席位,社尼·巴莫重新掌权并且与中间和右派的 4 个政党组成联盟来统治。左派政党表现得很差,此时只控制了他们以前 37 个席位中的 6 个。不过,社尼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的执政联盟的内部冲突;他在解决任何当时的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进展,更不要说公共秩序和经济改革了(包括农村土地改革)。尽管争斗不

休的政客们逗弄或者激怒了曼谷报纸的读者，但是左翼的大学生却由于过分地舞文弄墨而疏远了他们大部分的追随者。一个相反的反应开始迅速在政治权利上发展。

在很早的时候，君主、城市精英以及许多中产阶级都已经被激进的学生吓怕了，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或者是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或者是受其启发。他们的支持不久就转向右翼的许多新组织，其中大部分都在军事机构或者官僚机构中有支持力量。这些组织包括新力量运动，主要以在官僚机构中个人联系的网络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以“民族、宗教和国王”的名义来压制左翼；非常受欢迎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组织的“乡村童子军”，他们专门清查共产主义和坚持爱国主义的价值；而且还有“红牛”，一个脱离了1973年的学生运动职业学生派系的组织，他们在攻击左翼时经常诉诸暴力。到了1976年，司空见惯的是政治暗杀，到处是激进人物。警察骚扰左翼政党的竞选，甚至积极的温和派也担心他们的安全。暴力、谩骂和非礼现在成了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这在以前的泰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政治的节奏在1976年10月加速到了一个暴力高潮。前总理他侬从流亡生活中返回，过着一个佛教僧侣的生活（在曾经是孟固的总部一个庙宇里面）。他的返回受到了右翼的欢迎。当王室成员访问了他之后，他的威望似乎得到了证实。竟然这样接待一个对1973年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大学生被激怒了。每天的示威游行开始了，特别是在国立法政大学。在军队和政府中一些人悄悄地但却是直接的支持下，并且含蓄地得到了执政体制内广泛阶层的许可（包括经济利益和许多中产阶级），右翼进行了反击。10月5日，几家曼谷的报纸刊登了法政大学学生悬挂王储哇集拉隆功肖像的照片，而且一个军队广播电台呼吁爱国志士加入反对学生和“杀死共产主义者”的行动中。他们开展了对法政大学的大规模攻击，其中乡村童子军、“红牛”、警察和其他一些人参与了暴力行为。有的学生在10月6日被处死刑，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殴打，这样残暴地结束了短暂的民主实验。而军人再次采取行动，取消了宪法，压制政治表达。许多泰国人对这个事件的野蛮行径反

292

感,并且对现在看起来非常暗淡的、被政治暴力震撼的泰国的未来担心。

几乎所有泰国人在头脑中都对1973年至1976年期间的事件记忆犹新,尽管那些脑海中的东西经过个人的价值观和利益的过滤和渲染,而且很少有人能够明确地解释清楚。所有人都一定获得了一些对秩序价值的深入了解,尽管许多人都会不赞同这些价值:秩序在这些价值的基础上而建构。泰国1980年代的政治文化都得益于此时期,包括其意识,其对问题的戏剧性的定义,甚至其国家社区感,无论这个社区似乎是多么零碎。许多中产阶级从这一时期获得了一个新的信念:一个由"民族、宗教和国王"限定的至少松散的等级公共秩序,以及军人和大学知识分子双方加强的不信任。农民和工人也许是矛盾的,他们陷于一方面更加确信泰国社会存在错误,但是另一方面怀疑现在什么是可以做的境地中。学生和知识分子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以及大量的他们将继续行使的政治手法和风格。但他们也在10月6日的事件中遭受了几乎无法遏制的愤怒以及一种他们不能改变泰国社会的无助感。最后,自1973年至1976年期间之后,军队的凝聚力和自信心被削弱,至少到了他们愿意忍受冲突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地步,这种程度在1973年之前无法想象。不过,在他们到达这一点之前,他们不得不去与一个变化的社会和国家达成一些新的和解。这个过程他们又花费了五年的时间。

第十一章　新的开始：1976－2002年

犹豫不决和不确定性：1976－1980年

在1976年10月6日之后，泰国短暂经历了强行倒退到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君主专制制度都更极端的威权主义时期。军人的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安排了一个前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宁·该拉威谦担任政府的总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名男子，作为一位文官和律师，竟然比他的任何军人前任都更独裁更专制。比如，实施严格的审查制度，工会遭到压制，在官僚和教师队伍中清除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接受反共灌输。右翼对胜利得意洋洋，而左翼和许多温和派则被疏远，他们或者逃离去流亡或加入在山区的叛乱分子。后者包括许多1973－1976年间的学生领袖和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作家卡姆辛·室利纳克和普·阿翁帕空博士，他是泰国银行的前行长和国立法政大学的校长。 293

军人只是袖手旁观，耐心等待他宁政权自己抹黑自己，然后跳回到政治竞争中。1977年10月军人解除了他宁的职务。江萨将军依靠在军中微弱的支持成为总理，并且承诺另一部宪法及在1979年进行选举。他能够阻遏右翼的暴力活动，而且他还鼓励许多流亡者从山上和国外返回。他宁期间的黑暗和绝望有所消除。

不过，到了1979年的选举时期，随着年初越南入侵柬埔寨，一种新

294 的担心到来了。泰国人这时在其东部边界上有敌对力量,成千上万来自柬埔寨和老挝的难民,各种各样尝试跨边界(双向)运作的游击队小组。江萨的政府党通过拉拢小党和独立人士参加他们的联盟,在议会中形成了简单多数,但是他的权力基础很薄弱而且他也不能改善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或者是柬埔寨危机。他最终在 1980 年 2 月被军队统帅炳·廷素拉暖将军迫使交出权力——再次通过辞职而不是政变。炳在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议会联盟的支持下,很有希望地开始了统治。这个包括民主党和克立的社会行动党的议会联盟,使他在 301 个议会席位中获得超过 180 个席位。他的大内阁中很少有成员是军人,通过任命让人尊敬的专家到关键的岗位去管理经济政策,他赢得了很大的支持。炳以拥有广泛的军人支持而出名,因为他没有腐败的丑闻记录,而且他以在东北野战行动打击武装分子而出名。人们认为国王也坚决支持他。

炳在他的职位上面对持续不断的困难的时间比其前任更长。这些困难中最严重的是来自越南的入侵和占据柬埔寨。从 1980 年起,越南军队时不时越过泰国边境对红色高棉的党派实施攻击,并且每一次泰国都不得不发起强烈反击以确保他们的边界。这些事件加强了泰国对来自越南欲图控制印度支那共产主义的威胁感。

为了反击这些威胁,泰国采取了一个广泛的政策,其目的如果不是击退越南的存在,那么至少是平衡泰国和越南的力量在这些传统的缓冲国的存在。军事上,泰国成功地请求并得到了美国的军事支持,以防止一旦更严重的越南入侵。为了换取美国的这些保证,泰国甚至提供长期的军事基地。同时,他们还通过联合国及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东南亚联盟来劝说越南撤回军队并且拓宽柬埔寨政府的基础。他们寻求并获得了中国的援助和支持,中国在越南入侵柬埔寨时与越南发生了交战并且仍然与受苏联影响的越南保持着敌对关系。他们通过暂时关闭泰国与老挝的边界以及切断该国的外部贸易来向越南施加间接的压力。他们支持柬埔寨游击队,并为中国的补给通过泰国的国境来提

295 供便利。他们继续默默地支持反抗柬埔寨和老挝政府的右翼叛乱。他

们还努力把一个统一的柬埔寨解放运动团结在他们长期的老对手诺罗敦·西哈努克之下。

同时，泰国还备受大量来自柬埔寨和老挝的难民之苦，他们的存在减少了几年前泰国左派的革命性要求。如果革命是将来的潮流，那么将来就是现在了，而且它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

到了1980年代初期，情况变得很清楚了，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不会带来和平、稳定或者繁荣。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个危险的国际局势尤其是相对于一个共产主义的印度支那；由于暴涨的石油和能源成本以及全球经济停滞造成的高通货膨胀和经济问题；以及很难决定大国会不会为了和平而公共努力。而且，还有很多内部的小问题：尽管乡村叛乱减少了，但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潜在的威胁；在泰国穆斯林的南部持不同政见者的情绪高涨；尤其是北部的非泰人的山地民众受到剥削并且很难整合到国家里面；经济中的农业部门很难吸纳迅速增长的人口；而现代工业部门没有能够迅速扩大，以减轻不断增加的失业人数。

面对着这些问题，泰国在一个保守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辛苦地运作。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充满了既得利益和派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能够以国家的利益采取统一行动，相反却是为了维护自我的利益而在内部争斗。尽管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民主实验，泰国还没有设计出持久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也许能成功地调解在一个迅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中的不同利益。威权统治不再可行，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强人领导的吸引力很早就消退了。尽管很多人仍然处在传统的、高度结构化的社会等级机构中，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地位，而政治是处在顶部的那些人的事，但是很多的中产阶级此时认为政治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甚至军人也不再相信权威能够出自第一军的枪口；但是他们不同意盲目地接受皇家权威。尽管大多数人同意泰国不可能再回到军人专制或者1973－1976年间的混乱时期，但是他们对如何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取得合适的平衡却没有达成共识。

尽管其对将来的犹豫不决和不确定，泰国国家继续展示一种力量 296

和弹性,这不会让那些熟悉王国漫长历史的人感到惊奇。军人对与越南印度支那的边界冲突的反应是小心翼翼的和有板有眼的,尽管冲突的潜力仍然很高。泰国外交家继续巧妙地寻求最多样化朋友和盟友的支持,包括东方和西方、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认真的管理和规划加上不减的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显现出经济恢复了迅速发展的迹象。1976 年大多数逃到丛林中的学生领导和知识分子投降,返回到民间社会,几年前的严重叛乱平息了。而且最后,在 1983 年 4 月,随着举行全国议会选举,确认了军人和炳政府的权力,一个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也许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最有趣的发展是君主制再次进入到政治中。它开始得比较缓慢,当国王普密蓬在 1957 年阻止披汶元帅参与纪念佛陀 2 500 年诞辰仪式的时候,他默默地暗示对其不满。沙立后来给予君主一个更明显的公众作用,并且帮助其以政治结构中的核心的、虽然是无权的形象,在社会等级的顶部获得了君主的位置。1970 年代更直接地卷入到来了,当时国王在从支持他侬和巴博转到学生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不久之后,皇族与右翼积极分子如乡村童子军关系密切,并且他们在终结"完全民主"以及把他宁推上台中处于风暴的中心。皇家的支持后来促成了炳的崛起。

在 1981 年,与一次未遂政变有关的高潮事件发生了。当时,一群参与"青年土耳其党"组织的军官,批评过去军人政府的失败,在 4 月 1 日早上夺取了曼谷的政府中心。炳将军与皇家家族一起逃离首都,在呵叻的省级军事基地建立了总部。不久来自王后诗丽吉的一则消息在呵叻电台发布,实际上是来支持炳政府的。皇家对炳的支持阻止了让·集巴滴马将军领导的、动员了曼谷地区甚至所有军事机构效忠的反叛分子。4 月 3 日,炳重新夺取曼谷,仅仅以两个人的受伤为代价。君主政体再一次曝光,认同一个政治一军事集团是基于牺牲另一个政治一军事集团。

297

这种情况的发展有很多原因,而它在很多方面增强了泰国的稳定。

多年来，大多数的民众认为国王卷入到政治中（如果不是超越政治的话）通常是为了全体泰国人的利益。当他干涉的时候，通常是为了抑制过度，不论是极端左派或者极端右派。他合法化了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只要他们在模糊定义容许的范围内实施权力。他还被认为是危机时候的最终求助对象，因为他平等地对待个人请愿者和一般的公众观点。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传统的社会等级框架内。他的权力是道义的和社会的，而且也许会被他自己和以他名义的其他人或继承人滥用。那些希望看到泰国激进变化的人逐渐地对君主制越来越没有耐心。他们认为君主制无可救药地与威权的军事机构和一个腐败无效的政府联系在一起。那些不放弃体制并且在体制内工作的人，认为国王不仅是来定义政治限制的，而且还能帮助他们迫使政府对他们的需求和要求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回应。由于这些来自右和左的压力，泰国的政治未来以非常讽刺的形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取决于君主。由于这个事实以及皇家两代人的一夫一妻制减少了可能王位继承候选人，最近继承法得以修改，允许妇女继承王位；哇集拉隆功王子和诗琳通公主都被指定为预定继承人。

泰国的军人政权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一个革命和发展的道路。现在的一代人作为这些政策的创立者和继承者正在走向成熟。下一届的泰国领导人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许多人还在国外接受训练。他们的价值和经历使他们更习惯大众政治并且能以与沙立那代人所不同的方式适应复杂的国际局势。他们承受过去冲突的伤痕以及1973－1976年期间的情感和政治后果，但是他们比他们的长辈还拥有更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价值感。当然，他们不仅拥有所有不同意义的发展的信念，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现代泰国的远景。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对“革命”这个术语不舒服，但是作为一个团体的存在——一个数量众多、城市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和富有的中产阶级，是泰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真正革命的一个产物，全部的结果可能需要几代人来发展。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泰国开始感觉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社会和政治发展或者“革命”的后果。那些认为他们“了解”早期泰国的人也许将发现他们辨认不出继承了早期泰国的那个国家。实质上,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仿佛大部分的树木已经消失,现代化的公路和电力线几乎随处可见,而且曼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并且随着单调雷同的无数的郊区向视野所及的每一个方向扩展,笼罩在几百万辆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的污染之中。社会上,曾经是一个主要的农业国家,现在则以它的城市和城镇而出名,它们正无情地穿越过去似乎几乎要吞没它们的稻田。这个迅速发展的国家的经济是世界上最精彩的表现之一,而且它的国际贸易是一个NIC的商业——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来投资者太有吸引力了,以至于它几乎难以适应资本蜂拥而来和“关闭载入”而投资于周边国家。这方面的“进展”并不便宜,而且所支付的努力和痛苦不只是社会团体和机构,还包括数以百万计的个人。但是如果给他们提供了机会,他们的许多较不富裕的邻居将乐意马上付出代价。然而,从长远来看,仍然有待付出的最大代价是:旧秩序和新秩序以及传统权力和现代权力之间不断增长的冲突。

表面上看,最近的政治史似乎类似于前一个时代的政治。它们也许在1980年代初以那种方式开始,因为1981年4月1日作为总理的炳差一点被一场军人的未遂政变推翻;1991年一场军人政变终结了差猜·春哈旺政权。1973年和1976年的大众示威游行似乎将在1992年5月的灾难性事件中重演。仔细考察这些事件和它们的背景表明了巨大的变化对泰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影响,而且最终导致了一些将把泰民族带进新世纪的新问题的出现。

1980年代的稳定和增长

在整个1980年代,泰国似乎是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天堂。1970年底最糟糕的混乱局面已经过去,而且,甚至军人似乎也最终接受了文官政权。经济增长可观,就如王国的稳定与以前几十年相比是无与伦比

的。但是，表面之下的迹象表明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如看起来的那么乐观。

两个进展主要促成了泰国的繁荣。第一个是人口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本质上，这意味着目前的家庭仅有一个或者两个小孩，而不是1960年代的五个或者六个。这样政府就可以把以前用来建造更多小学和培训更多的教师的钱直接去改善中学甚至是高等教育。

当1988年站在帕府的一个学校外边，人们能够听到孩子们正在高声异口同声地朗读乘法口诀（"二三得六，三三得九，三四十二"等等）。旁边是一个像学校的建筑，但是它是关闭的、空的并且是寂静的。一个路人对旁边学校的寂静作了解释："我们没有这么多孩子，因此我们不需要它了。"

对有关出生率下降，需要指出的重点是，它与政府政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它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的决定。否则的话，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但是这是泰国社会中一个深远的变化：女性至少拥有一个同等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多作用的话。

第二个进展与第一个且与下面这个事实有关系：许多年轻人（以及年龄更大者）正在经历比他们父母所获得的更多的教育。1990年，在清迈和清莱之间的一个公路边的小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村长解释，他来自一个贫困的父母没有受到教育的家庭。他们的五个孩子受到不超过小学四年级的教育。当他们的父母去世后，仅仅留给他们很少的土地。每人只能分得1莱（2.5英亩或者1公顷。原文如此——译者），甚至不够养活他们自己。他们被迫去寻找另一个收入来源。他们开始制造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的短把扫帚，以竹手柄和当地芦苇制成的刷毛来配搭。

通过利用他们村庄不断增加的交通流量，他们做得很好。我没有被告知其他兄弟姐妹的情况，但是我的线人解释他和他的妻子只有两个小孩。这两个小孩已经完成了村里的小学教育，目前正在附近的镇里上中学。

政治上的困境似乎也从1970年代后期的劣势中反转过来。当炳　300



泰国人民解放军 561 连战士。从左至右，后排，三个赫蒙族女人：Bai，Prani，Mana(在战斗中牺牲)；前排：Jit，Dao。

的政府被说服欢迎叛乱的游击队学生从丛林中返回的时候，转折点到来了。他们在赛育德·克尔德迫尔的带领下，在几年之内，成千的叛乱者返回到城市。他们似乎相对容易地再次整合到泰国社会中，一些人甚至在泰国的政治政党中上升到相对高的位置。

与这个进展看起来同样有意义的是——而且它也意味着——它实际上迷失在社会和经济变化的炫人光辉中，这种变化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数字反映出来的。

301 首先要注意的是泰国全部人口的增长。直到 1960 年代都是加速增长，但之后随着人口控制的实施，它开始变慢。

表 4 1910－2000 年泰国人口数量 （单位：百万）

年 份	人口数量	年 份	人口数量
1910	8 149	1960	26 258
1919	9 207	1970	34 397
1929	11 506	1980	44 825
1937	14 464	1990	54 549
1947	17 443	2000	60 916

解读这些数字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人口的平均年龄也许从 1910 年的 19 岁或者 20 岁下降到 17.1 岁，然后到新千年开始的时候增加到超过 20 岁。

更惊人的是城市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些是不清楚的，因为官方数字在省级“府”里把城市和乡村数字混在一起；但是那以后就清楚了。在世纪末，有 15 个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

曼谷经常被人口统计学家和地理学家称为“首要城市”，这意味着该城包含了国家总人口的很大比例，它甚至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如果人们考虑到其他的三个大城市实际上是它的邻近郊区——暖武里、北榄府和春武里。清迈过去是泰国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今天它滑落到第八的位置。

这不仅仅是许多泰国人居住在城市里面。我们需要去记得同一个现象的另一面。城市化和更小家庭的结合是与依靠农场和农业来生计的家庭数量急剧下降一起发生的。农业家庭在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从 1970 年人口普查的接近四分之三下降到 2000 年人口普查的少于一半（49.9%）。毫不奇怪，曼谷是以拥有世界上最恶劣的汽车交通情况之一而出名！而且毫不奇怪的是，在半个世纪前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是佛教寺庙里的佛塔，而且其主要的色彩是植物的绿色，而现在却是一个布满摩天大楼的灰色城市。

交通拥堵不是迅速城市化的唯一产物。还有相当多的城市服务的紧张，从电力和通讯到排水。不过，在过去的大约 20 年里，泰国在城市管理

302

上经历了相当大的增长。尽管街道更拥挤,但是比以前更干净更有序。

表 5　1947－2000 年泰国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的人口数量级

(单位：千人)

城　市	1947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曼　谷	78.1	1 703.3	2 495.3	5 153.9	5 882.4	5 680.4
暖武里	10.3	18.3	27.5	30.9	232.8	522.7
宋卡/合艾	18.7	31.0	89.0	170.2	243.0	273.0
北　榄	10.2	21.8	46.6	49.0	65.3	268.6
春武里	17.7	11.5	39.4	50.0	187.0	256.3
呵叻府	22.3	42.2	66.0	88.9	278.8	241.0
孔　敬	14.4	19.5	29.4	94.0	205.9	210.0
清　迈	38.2	65.7	83.7	100.1	166.9	171.7
洛　坤	16.7	25.9	40.7	66.1	112.1	158.0
乌　隆	13.1	30.9	56.2	80.1	81.4	155.7
素　叻	13.1	19.7	24.9	35.7	85.3	154.5
乌　汶	7.9	12.1	40.7	48.5	136.5	150.7
北　标	7.2	18.9	25.0	46.1	107.0	142.7
那空沙旺	17.4	34.9	46.9	88.6	151.8	141.0
罗　永	3.8	9.7	14.8	37.3	59.5	103.6

资料来源：十年人口普查;《统计年鉴》。

不久前,泰国的主要出口收入来自稻米、锡、柚木和橡胶。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农作物和矿物,少量的附加值来自泰国的劳动力。当代的数字把旅游业的收入放在所有的出口物名单的最顶部。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酒店、餐馆和其他服务中雇佣成千上万的人。商务旅行者在他们的世界酒店的名单上通常把泰国的酒店放在首选的位置。能够在宋卡、清迈和普吉岛找到最好的类似酒店的情况下,一些人甚至选

择了偏远省级城市孔敬的一个酒店。

仔细考察主要的出口产品，很明显的是，大多数的主要出口产品都是制成品，里面有相当多的劳力输入——电脑和电脑配件、成衣、汽车、罐头鱼、塑料、虾、家具、织物、鞋类以及电动机和变压器。即使你继续往下看超过 60 个的出口目录（这里列出了 15 个），大多数的项目是制成品，包括“钉子、螺丝和螺栓”、“仿制首饰”、“手袋”、“皮革手套”和“米粉”。没有第三世界国家常有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甚至在一个省级城镇如大城，在城镇的中心就可以发现许多的工厂和跨国公司的办公室和银行。

303

表 6　1978－2001 年泰国主要出口产品排名

（单位：百万泰铢）

1978 年		2001 年	
1. 木薯	10 837	1. 电脑、零件	493 450
2. 大米	10 403	2. 服装	133 002
3. 橡胶	8 020	3. 汽车	101 252
4. 锡	7 225	4. 罐装鱼等	82 811
5. 纺织品	6 863	5. 塑料聚合物	73 932
6. 玉米	4 215	6. 宝石	66 631
7. 糖	3 913	7. 大米	65 516
8. 电子电路	2 148	8. 橡胶	60 742
9. 宝石	1 709	9. 虾、龙虾	20 268
10. 冷冻虾	1 448	10. 橡胶制品	42 015
11. 豆类	1 342	11. 家具	36 793
12. 高粱	1 195	12. 织物	34 213
13. 烟草	1 148	13. 鞋类	33 478
14. 冷冻鱿鱼	1 019	14. 电动马达	32 431
15. 钨	945	15. 变压器	32 013

说明：泰铢对美元汇率，1978 年大约是 25 泰铢兑换 1 美元，2001 年大约是 43 泰铢兑换 1 美元。

资料来源：1978 from *Thailand into the 80's* (Bangkok, 1979), p. 206; 2001 from Inernet Web site of the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ailand.

其他的例子展示了出口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泰国许多田地里种植了万寿菊,一个被要求解释的农民回答道,“那些是万寿菊,一些中介商告诉我他将购买它们,然后卖给美国的养鸡者。母鸡将吃掉它们使其肌肉更黄。”类似的回答也解释了沿着从宋卡到洛坤高速公路存在几里宽的虾塘的原因。

这不仅仅是农民接受国际市场的变化,而且他们对应对技术变革怀有敏感性。现在很难称这些人为“农民”,最好称呼他们为“农场主”。

这些经济变化不仅仅是个男性现象。在建筑工人中,女人与男人一样常见,而在工厂的工人数量里面也许要超过男人。几十万的泰国人被雇佣在国际劳工市场里,并同样可在波斯湾地区,在新加坡、香港和日本,在太平洋的共和国中发现。他们的收入定期地汇回到泰国,尤其是增加了乡村家庭的收入。

304

在那里和它们一起汇回的还有在曼谷和帕提亚以及其他几个城镇的“社会”(我们姑且这么说)服务业工作的妇女的汇款。据说在曼谷接收到最多汇款的一个区的邮局就是帕尧府的一个特定区。这个区以最美丽女人的家乡而出名,假定那些妇女没有离开而是在曼谷做保姆或者女佣!

对外贸易统计中没有包含旅游业的统计,如果包括在内的话,将在图表 6 中排名第二。旅游业在 2000 年的收入为大约 2 852.72 亿泰铢。旅游者主要是男性(570 万男性以及 380 万女性)而且年龄在 25 — 34 岁之间[1]。

出口图表上缺少的最大数字将是代表非法商品的收入。名单的最顶部将是大麻,然后是海洛因,随后是安非他明和其他物品。当然,这些统计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常见的是哀叹城市经济增长和乡村地区贫困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东北部。一群知识分子在 2002 年初从曼谷到那空帕侬沿着公路进行了一次旅行。他们仍然能够看到东北部的贫

---

① *Statistical Yearbook Thailand*, no. 48 (Bangkok, 2001), table 5. 19.

困，但是他们也遇到了许多的机动车工具（主要是摩托车）以及他们经过的每一个村的电视天线。收入差距是相对的事情，而且当同中国、印度或纽约北部的部分地区相比较的时候，他们看到的贫困是相对的。泰国的历届政府已经意识到相对贫困是个严重的问题并且已经在努力去减少它。

1991－1992年的危机

从1980年代初一直统治泰国的各政党和军人组成的不安的联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尤其是1988年的选举之后。这次选举最终使得差猜·春哈旺登上舞台。差猜政权一再用伐木特许权及改善同老挝和柬埔寨关系的努力来讨好商业利益。在越来越多的议会强烈攻击下，政府娇宠了军队中的一些人，他们的竞争对手在1991年2月从差猜手中夺取了权力。他们起初把一个临时总理阿南·班雅拉春（泰国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推上了台。他们推动了一个新的宪法产生，这个宪法对保守利益是最慷慨的，而且军人领袖素金达·甲巴允将军承诺他将不会寻求政治权力。在1992年3月的选举之后，素金达违背了他的承诺，领导了一个新政府。

305

大规模的示威随后在曼谷及其他几个城市发生了，比较特别的是由前曼谷市长占隆·西蒙少将（退休）领导。经过几天的犹豫不决之后，素金达将军要求他以前领导的因此忠诚于他的几个军事单位使用暴力来对付示威。

“官方”的数字声明有100个示威者被杀死，但是其他的估计比这要多。暴力集中在中心城市的北部，在那里军队甚至杀死了经过佛教庙宇的摩托车手。同时，昂贵的属于商人的汽车被用作救护车来运载伤员到医院。暴力持续到5月底，泰国的海军的舰只沿着附近的河流巡游，悬挂着一个大的标语，声称“海军不杀民众”。

政府控制了所有的消息，但是海外的新闻机构（包括电视和CNN）让世界获知了这次事件。这样的消息源到达了一个在海外旅游的皇家成员那里，他告知了国王暴行现在正在破坏曼谷。

国王召见了素金达和占隆将军，许多泰国人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素金达明显是紧张的、处于守势的，并且在召见之后宣布了他的辞职。公众被告知一个新的政府和新的选举不久就会到来。

一直到 5 月底和 6 月初，电视新闻（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才播出军人暴力对付示威者的可怕的场景。

许多人预计一个接近军队的人颂蓬·拉宏将被提名为临时总理，但是 6 月 10 日，国王提名阿南·班雅拉春担任那个职位直到 9 月份的选举。

9 月 13 日的选举在俗称为“魔鬼派系”（代表军人的坏人）和“天使派系”（代表文官政党的好人）之间进行竞争。选举接近结束，当正在清点选票的时候，一个接近军人的政党党魁突然宣布他的派系将支持川·立派领导的民主党，于是川·立派成为总理。

306

通过考察 9 月 13 日的选举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天使”在国家南部以及其余大部分的城市地区获胜，而“魔鬼”则是在乡村地区获胜。贿选在农村地区尤其猖獗。

更民主的政权

川的新政府花费很多的时间来争论新宪法，试图反击更加保守和专制的利益来塑造泰国政治前途的努力。这些冲突持续了川的整个任期。当新的选举在 1995 年 7 月举行的时候，根基在各个府的旧政党——没有一点曼谷的支持——获胜，而且班汉·西巴阿差成为总理。

当班汉在他们的支持者中间划分了政治领域的时候，严重的争吵随后再次发生了。当王国的主要经济制度（尤其是泰国银行）处在政客手中时，更严重的是经济政策的政治化。在 1997 年中期，股市崩盘，经济和货币崩溃。

同时，班汉的政府也在上台仅仅一年后垮台，由差瓦立·永猜裕继任。看到经济崩溃就要到来，差瓦立试图采用更严格的经济政策，但因为政治压力而未能支持这些政策。泰国货币泰铢，很快从 25 泰铢兑换 1 美元下滑到 56 泰铢兑换 1 美元。经济危机使得长期的宪法危机更

追切。它最终产生了一个比以前政权更民主的宪法草案。在新宪法下，上议院的权力被削减，媒体审查被遏制，被选举的代表要拥有大学学位，并且努力尝试去削减政治和选举腐败。

高涨的对差瓦立政权的公众和媒体批评促成了他在1997年11月的辞职，且川·立派重新成为总理。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川的政府能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个协议来拯救泰国的经济，这使泰铢在1998年4月回到大约40泰铢兑换1美元。

一些泰国知识分子尖锐地批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是泰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情。其他人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是对“富人”的援助。没有注意到泰国的令人震惊的腐败和经济的无能，也没有注意到泰国迫切需要一个“拯救”。 307

新的宪法没能生效，一直到新的选举立法获得通过。政治争吵持续不断，尤其是在经济处于挣扎之中的时候。许多立法委员被直接或者间接地指控为腐败，而且许多部长被控告为无能、裙带关系、腐败和违法。随着选举无情地接近，统治联盟开始分裂。在这些选举之前的是在2000年3月上议院的选举，选举中选民投票率超过70％。

随着完全选举的接近，富可敌国的他信·西那瓦的政党（被称作Thai Rak Thai，字面上的意思是“泰爱泰”）得益于其可以提供诱因，来鼓励人们从其他团体和流行于泰国政治的致命内斗中脱离。许多人厌倦了旧秩序的无能、贪财受贿和裙带关系，而且可能推测在一个由那些足够富有而不需要这种腐败的人领导的新秩序里面，这些都将减少。

在2001年1月举行的选举中，他信的政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且他开始了作为总理的一个新任期，除了其他的事情，他还采取行动对付那些批评泰国的外国作家和出版物。

将要统治泰国的那些人面对着安抚和管理无数合法和非法的既得利益的挑战。一些政治团体由一些深深卷入到一些非法活动中的人控制，这些非法活动包括从毒品和卖淫到赌博和走私。

尽管有些丑陋，但是泰国还有很多好的甚至迷人的地方。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能代表无数其他的方面。

几年前(1998年5月),一个退休的受人尊重和欢迎的高级学者遭受了他妻子去世的痛苦。几个月后,他就要到他72岁的生日了,他的许多朋友决定以一个典型的北部泰国方式来庆祝这个事件。他们决定在南奔的一个古代佛教寺庙诃梨朋阇耶寺庙的场地上为他举行一个"净首"仪式。他以前的学生和许多朋友从王国的各地会合过来,一些人包机过来,其他人则是乘坐公共汽车。有年轻人和老人、富人和穷人,所有人把他们对德高望重者的爱和尊重结合到了一起。所有人都往他头上泼水,以一种荣誉学位和装饰品无法完全做到的方式来崇308 敬他。

净首仪式确认了传统泰国价值中最好的一面。它与财富和权力没有任何关系。在场的大多数人在那里是为了证实泰国的身份、泰国的语言和泰国的文学和历史。他们在那里也是为了证实忠诚和服务的社会价值。而且他们正在表达他们的期望:所有这些在未来将继续下去,就如它们过去所经历的那样。

附录 1：素可泰历任国王

1. 室利·因陀罗(印拉第王) 1239? －1259?年
2. 班孟(坤邦克朗刀) 1259? －1279?年
3. 兰甘亨 1279? －1298年
4. 卢泰 1298－1346/1347年
5. 努阿·南·陶姆 1346/1347年
6. 昙摩罗阇一世(立泰) 1346/1347－1368/1374?年
7. 昙摩罗阇二世 1368/1374? －1398?年
8. 昙摩罗阇三世(赛·立泰) 1398－1419年
9. 昙摩罗阇四世 1419－1438年

附录 2：兰纳、清迈和兰王国历任国王

兰纳王国历任国王

1. 满哥瑞(从 1292 年起在清迈)　1259－1317 年
2. 切雅颂坎　1317－1318 年
3. 盛富　1318－1319 年
4. 克鲁阿　1319－1322 年
5. 南吞　1322－1324 年
6. 盛富(第二代统治)　1324－1328 年
7. 卡福王　1328－1337 年
8. 帕于王　1345－1355 年
9. 库那　1367－1385 年
10. 盛蒙玛　1385－1401 年
11. 山芳坎　1401－1441 年
12. 提洛克罗阇　1442 年 5 月 19 日－1487 年 5 月 27 日
13. 育清莱　1487－1495 年 7 月 18 日
14. 蒙·凯敖　1495－1526 年 2 月 7 日
15. 克特·查他拉特　1526－1538 年

16. 猜　1538－1543 年
17. 克特·查他拉特(第二代统治)　1543－1545 年
18. 吉罗婆罗帕王后　1545 年 6 月 25 日－1546 年
19. 赛塔提腊(来自澜沧)　1546 年 7 月 17 日－1547 年 8 月 20 日
20. 披·密库塔威素提旺　1551 年 5 月 9 日－1564 年
21. 威素提特薇(在缅甸宗主权之下)　1564－1578 年
22.(缅甸人)塔拉瓦迪王子　1578－1607 年
23.(第 22 的两个儿子)　1607－1613 年
24. 塔道皋　1613－1615 年
25. 西·颂·蒙　1615－1631 年
26. 披耶·迪帕奈特　1631－1659 年
27.(帕府的统治者)　1659－1672 年
28. 应赛莽(缅甸人)　1672－1675 年
29. 切蒲塔莱(缅甸人)　1675－1707 年
30. 莽瑞恩纳莱(缅甸人)　1707－1727 年
31. 特·披辛(造反者)　1727 年
32. 翁坎　1727－1759 年
33. 赞　1759－1761 年
34. 凯·哈特　1761 年 4 月 27 日－1762 年
35. 阿芭雅葛玛尼(缅甸人)　1766－1768 年
36. 摩雅葛玛尼(缅甸人)　1768－1771 年
　　兰纳的造反者　1771－1774 年

清迈王国历任国王

1. 卡维拉(1775－1781 年在南奔)　1775－1816 年
2. 塔玛琅卡　1816－1821 年
3. 卡梵　1822－1825 年
4. 蒲塔旺　1826－1846 年
5. 摩诃旺　1846－1854 年

6. 卡维老饶　1856－1870 年
7. 印坦　1871－1897 年
8. 素立亚旺　1901－1911 年
9. 因·凯敖　1911－1939 年

兰王国历任国王

1. 阿塔瓦拉攀尧　1786－1810 年
2. 素玛纳特瓦拉特　1810－1825 年
3. 摩诃尧特　1825－1836 年
4. 阿斯塔旺　1836－1838 年
5. 摩诃旺　1838－1851 年
6. 阿南塔尧特　1851－1891 年
7. 素立亚袍恩·帕立提德　1891－1918 年
8. 摩诃披饶姆·素拉塔达　1918－1931 年

附录3：阿育陀耶、吞武里和曼谷历任国王

阿育陀耶王朝历任国王

1. 拉玛铁菩提一世(乌通王)　1351－1369年
2. 拉梅萱　1369－1370年
3. 波隆摩罗阇一世　1370－1388年
4. 东兰　1388年
5. 拉梅萱(第二代统治)　1388－1395年
6. 罗摩罗阇　1395－1409年
7. 因陀罗阇一世　1409－1424年
8. 波隆摩罗阇二世　1424－1448年
9. 波隆摩戴莱洛迦纳
   (在阿育陀耶统治)　1448－1463年
   (在彭世洛统治)　1463－1488年
10. 波隆罗阇三世(在阿育陀耶统治)　1463－1488年
11. 因陀罗阇二世　1488－1491年
    (10和11为同一个人)
12. 拉玛铁菩提二世　1491－1529年

13. 波隆罗阇四世　1529－1533 年
14. 叻德沙达　1533－1534 年(5 个月)
15. 帕猜罗阇　1534－1547 年
16. 缴华王　1547－1548 年 6 月
17. 坤哇拉旺沙(篡位者)　1548 年 6－7 月
18. 查克腊帕　1548 年 7 月－1569 年 1 月
19. 马欣　1569 年 1－8 月
20. 摩诃达摩罗阇　1569 年 8 月－1590 年 6 月
21. 纳黎萱大帝　1590 年 6 月－1605 年 4 月 25 日
22. 厄加陀沙律　1605 年 4 月 25 日－1610 年 10 月/1611 年 11 月
23. 西・骚哇帕　1610－1611 年
24. 颂昙王(因陀罗摩二世)　1610 年－1628 年 12 月 13 日
25. 策陀　1628 年 12 月 13 日－1629 年 8 月
26. 阿滴耶王　1629 年 8－9 月
27. 帕拉赛・东　1629 年 9 月－1656 年 8 月 7 日
28. 昭发猜　1656 年 8 月 7－8 日
29. 素潭玛罗阇　1656 年 8 月 8 日－10 月 26 日
30. 那莱王　1656 年 10 月 26 日－1688 年 7 月 11 日
31. 帕碧罗阇　1688 年 7 月 11 日－1703 年
32. 素　1703－1709 年
33. 蒲闽塔拉查(泰沙)　1709－1733 年 1 月
34. 昙摩罗阇二世(波隆摩阁)　1733 年 1 月－1758 年 4 月 13 日
35. 武通贲　1758 年 4 月 13 日－5 月
36. 素立亚玛林　1758 年 5 月－1767 年 4 月 7 日

历任吞武里国王

达信(又名郑信,郑昭)　1767 年末－1782 年 4 月

历任曼谷，却克里王朝国王

1. 拉玛一世(昭丕耶却克里) 1782－1809年
2. 拉玛二世 1809－1824年
3. 拉玛三世(帕南告) 1824－1851年
4. 拉玛四世(孟固大帝) 1851－1868年
5. 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 1868－1910年
6. 拉玛六世 1910－1925年
7. 拉玛七世(巴差提朴) 1925－1935年
8. 拉玛八世(阿南达·玛希敦) 1935－1946年
9. 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 1946年—现在

附录 4：1932 — 2002 年泰国历任总理

1. 披耶·玛奴巴功侯爵　1932 年 6 月 28 日—1933 年 6 月 20 日
2. 披耶·帕凤裕庭上将　1933 年 6 月 21 日—1938 年 9 月 11 日
3. 銮披汶·颂堪元帅　1938 年 12 月 16 日—1944 年 8 月 1 日
4. 宽·阿派旺少校　1944 年 8 月 1 日—1945 年 8 月 31 日
5. 塔威 · 波雅克特　1945 年 8 月 31 日—9 月 17 日
6. 社尼·巴莫　1945 年 9 月 17 日—10 月 15 日
7. 宽·阿派旺少校　1946 年 1 月 31 日—3 月 24 日
8. 比里·帕侬荣　1946 年 3 月 24 日—8 月 23 日
9. 銮探隆少将　1946 年 8 月 23 日—1947 年 11 月 8 日
10. 宽·阿派旺少校　1947 年 11 月 10 日—1948 年 4 月 8 日
11. 銮披汶·颂堪元帅　1948 年 4 月 8 日—1957 年 9 月 16 日
12. 波特·沙拉辛　1957 年 9 月 21 日—12 月 26 日
13. 他侬·吉滴卡宗元帅　1958 年 1 月 1 日—10 月 20 日
14. 沙立·他那叻元帅　1959 年 2 月 9 日—1963 年 12 月 8 日
15. 他侬·吉滴卡宗元帅　1963 年 12 月 8 日—1973 年 10 月 14 日
16. 桑雅 · 达磨萨克提　1973 年 10 月 14 日—1975 年 1 月 21 日
17. 社尼·巴莫　1975 年 2 月 21 日—3 月 6 日
18. 克立·巴莫　1975 年 3 月 17 日—1976 年 1 月 12 日

19. 社尼·巴莫　1976年4月21日—10月8日
20. 他宁·盖威迁　1976年10月22日—1977年10月20日
21. 江萨·差玛南上将　1977年11月12日—1980年2月29日
22. 炳·廷素拉暖上将　1980年3月12日—1988年4月29日
23. 差猜·春哈旺上将　1988年8月4日—1991年2月23日
24. 阿南·班雅拉春　1991年3月2日—1992年4月6日
25. 素金达·甲巴允上将　1992年4月7日—5月24日
26. 阿南·班雅拉春　1992年6月10日—9月22日
27. 川·立派　1992年9月23日—1995年5月19日
28. 班汉·西巴阿差　1995年7月13日—1996年9月27日
29. 差瓦立·永猜裕上将　1996年11月25日—1997年11月6日
30. 川·立派　1997年11月9日—2001年2月9日
31. 他信·西那瓦　2001年2月9日—2006年9月19日

进一步阅读建议

随着印刷业在泰国的开始以及对该国历史的兴趣的兴起，有关泰国历史的书目在1个世纪前才刚刚开始。充分讨论所有对该主题进行认真研究的资料，至少需要另外一本完整的书才可以。在这里，我只能建议一些最有用、最重要的泰国历史著作，而且主要局限于那些现存的西方语言作品。

通　史

很多最好的作品只是在最近才出现，而且大部分尚未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它包括博士论文。大多数的博士论文可以通过密歇根安阿伯的大学微缩胶卷找到。博士论文的特点是它们包含研究主题的详尽书目。有关泰国历史的文章通常出现在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这之后简写为 *JSS*）(Bangkok, 1904 —　)以及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70 —　)。这个领域一个很好的指南是 Charles F. Keyes, *Southeast Asian Research Tools: Thailand* (Honolulu, 1979)。

两本特别好的地理参考书是 Robert L. Pendleton, *Thailand: Aspects of Landscape and Life* (New York, 1962); Wolf Donner, *The Five Faces of Thailand: An Economic Geography* (New York,

1978)。其中最重要的对泰国的一般性介绍的著作有 Frank J. Moore, *Thailand: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rev. ed. (New Haven, 1974); *Thailand: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1987);和泰国总理办公室编辑的 *Thailand in the 90's*(Bangkok, 1991),这本书里面有精美的彩色插图。

少数出色的人已经试图尝试撰写通史。第一个是 W. A. R. Wood, *A History of Siam* (London, 1926; Reprint, Bangkok, 1959), 包含曼谷统治时期的内容只有 8 页,而且它目前已经完全过时了。我的许多文章收集在 *Studies in Thai History* (Chiang Mai, 1996)。我的另一本有用的新文集是 *Siam in Mind* (Chiang Mai, 2002)。

编年体上的问题最好查阅两本书: J. C. Eade, *The Calendrical Systems of Mainland Southeas Asia* (Leiden, 1995), *The Thai Historical Record: A Computer Analysis* (Tokyo, 1996)。大量的统计方面的内容可以在国家统计办公室维护的网页上找到: http://www.nso.go.th/。

傣族历史的起源

Frank M. LeBar, Gerald C. Hickey 和 John K. Musgrave, *Ethnic Group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1964),对傣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人种学的考察,并且包含较好的书目和插页地图。有关该地区史前时期和傣族的资料是广泛分布的,因此有必要汇集在一起。Wilhem G. Solheim Ⅱ, "Northern Thailand, Southeast Asia, and World Prehistory," *Asian Perspectives* 13 (1973): 145－162, 和 Chester F. Gorman 和 Pisit Charoenwongsa, "Ban Chiang: A Mosaic of Impressions from the First Two Years," *Expedition* 18, no. 4 (1976): 14－26,是该领域中大量令人振奋人心的作品中的代表作。尤其是 Charles Higham, *The Bronze Age of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1996)。

最近的语言学家对语言发展的主题大胆进行了推测并且已经发表的是，James R. Chamberlain, "A New Look at the History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Tai Languages," in *Studies—in Tai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William J. Gedney*, ed. Jimmy G. Harris and James R. Chamberlain (Bangkok, 1975), pp. 49－66。许多人已经读过并且已经获益的是，Graham Thurgood, "Tai-Kadai and Austronesian: The Nature of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Oceanic Linguistics* 33, no. 2 (Dec. 1994); 345－368。

两篇文章足以厘清"南诏问题"：F. W. Mote, "Problems of Thai Prehistory," *Sangkhomsat parithat* 2, no. 2 (Oct. 1964): 10－18；和Hiram Woodward, "Who Are the Ancestors of the Thais? Report on the Seminar," *Sangkhomsat parithat* 2, no. 3(Feb. 1965): 88－91。G. H. Luce 翻译了同时代的中国官员樊绰(Fan Ch'o)对南诏的描述，*Man Shu*(*Book of the Southern Barbarians*)(Ithaca, 1961)。对南诏早期历史的考察参看 Charles Backus, *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New York, 1982)。

对 9 世纪和 10 世纪大陆东南亚概览状况，我们找不到比 G. Coedes,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trans. Susan Brown Cowing*(Honolulu, 1968)更好的书了。关于陀罗钵地王国，可以参看 Dhida Saraya, (Sri) Dvaravati: The Initial Phase of Siam's History (Bangkok, 1999)。这一时期该地区的令人振奋的地图，参看 Georges Maspero, "La geographie politique de l'Indochine aux environs de 960 A. D.," in *Etudes asiatiques publiees a l'occasion du vingt-cinquieme anniversaire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Paris, 1925), 2: 79－125。Hoshino Tatsuo 的现在的和将要发表的文章对这些地图做了很多修正。

傣族和传统帝国

Coedes 的 *Indianized States* 提供了较好的一般的背景。H. G.

Quaritch Wales 的 *Dvaravati, the Earliest Kingdom of Siam* (*6th to 11th Century A. D.*)(London,1969)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概览,但是需要根据最近的考古发掘和发现进行修正。Donald K. Swearer 和 Sommai Premchit 把诃梨朋阇耶王国的编年史 *Camadevivamsa* 翻译成了 *The Legend of Queen Cama* (Albany,1998); N. A. Jayawichrama 把编年史 *Jinakalamali* 翻译成了英文 *The Sheaf of Garlands of the Epochs of the Conqueror* (London,1968)。一般的编年史并且包含有大量的书目的,可以参看 David K. Wyatt, "Chronicle Traditions in Thai Historiography,"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 G. E. Hall*, ed. C. D. Cowan and O. W. Wolters(Ithaca,1976),pp. 107－122。

对吴哥历史的粗糙总结可以参看 L. P. Briggs, *The Ancient Khmer Empire*(Philadephia,1951)。

一直到其有问题的资料被更仔细地考察之前,对傣族如诺王国的早期历史都是高度推测的。最重要的编年史资料被翻译成了 *The Chiang Mai Chronicle*, trans. David K. Wyatt and Aroonrut Wichienkeeo (2nd ed. ; Chiang Mai,1998)。

1219－1350 年间的傣族人世纪

G. H. Luce 的权威性的分成两部分的文章"The Early Syam in Burma's History," *JSS* 46, pt. 2(Nov. 1958): 123－214, and 47, pt. 1(June 1959): 59－101,特别是,其根据中文资料把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的北部东南亚地区结合在了一起。

Wyatt 和 Aroonrut 根据原傣族编年史翻译成的 *The Chiang Mai Chronicle*,最终完全包括了兰纳王国。许多其他的文本等待着批判性的研究,包括清迈、兰、景洪和景栋限定的区域内的许多王国的早期编年史。

他们的不朽的系列文章"Epigraphic and Historical Studies"开始出现在 *JSS*,pt. 2 (July 1968),后来在同样的题目下以一本书的形式

出版(Bangkok,1968),A. B. Griswold 和 Prasert na Nagara 系统地建立和翻译了素可泰及其邻国的最早期的傣族碑铭,极大地改进了 G. Coedes 在 1920 年代的早期作品。他们已经激发了一些重要的讨论,也是在 *JSS* 上,尤其是 M. C. Chand Chirayu Rajini 和 Michael Vickery。没有比对 1292 年的兰甘亨的碑铭讨论得更热烈的了,可以参看 *The Ram Khamhaeng Controversy: Collected Papers*, ed. James R. Chamberlain (Bangkok,1991)。Griswold 的 Towards a History of Sukhodaya Art(Bangkok,1967)是一篇尤其值得赞赏的文章。

阿育陀耶王朝及其邻居:1351 - 1569 年

关于阿育陀耶王国历史的最重要也是第一手的资料是各种各样版本的阿育陀耶编年史,其中最重要的已经翻译成了英文:*The Royal Chronicles of Ayutthaya: A Synoptic Translation* by Richard D. Cushman, ed. David K. Wyatt (Bangkok, 2000) 和 David K. Wyatt, "The Abridged Royal Chronicle of Ayudhya of Prince Paramanuchitchinorot," *JSS* 61, pt. 1 (Jan. 1973): 25 - 50。1630 年代居住在阿育陀耶的一个荷兰居民根据泰族资料汇编了暹罗历史:Jeremias van Vliet,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Siam*, trans. Leonard Andaya, ed. D. K. Wyatt(Bangkok,1975)。

早期的阿育陀耶的历史是一篇令人深思的综合性文章的主题,参见 Charnvit Kasetsiri, *The Rise of Ayudhya: A History of Siam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Kuala Lumpur, 1976)。除了他们的几篇"碑铭和历史研究"之外,A. B. Griswold 和 Prasert na Nagara 还通过对诗歌"*Yuan Phai*"的研究对阿育陀耶与兰纳之间的战争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解释,参见"A Fifteenth-Century Siamese Historical Poem,"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d. Cowan and Wolters, pp. 123 - 163。其他的则是通过 *The Chiang Mai Chronicle*。而劳动力控制的一般问题则由 Akin Rabibhadana 第一次探讨,参见其 The Organization of Thai Society in the Early

Bangkok Period, 1782－1873 (Ithaca,1969; rev. ed. Bangkok,1996)，尽管其题目如此，但它的大部分内容与阿育陀耶和其法律有关。H. G. Quaritch Wales, Ancient Siames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1934; reprint, New York, 1965)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参考。

这一时期的兰纳王国，在西方语言里面基本没有什么资料，当然除了对清迈编年史的英语翻译和 Jayawickrama 对 *Jinakalamali* 的翻译之外；但是还可以参看 *The Nan Chronicle*, trans. and ed. David K. Wyatt(Ithaca,1994)。横跨这个时期和更早时期的来自南部的可以对比的资料，可以参考 *The Crystal Sands: The Chronicles of Nagara Sri Dharrmaraja*, trans. and ed. D. K. Wyatt, (Ithaca, 1975)；和 *Hikayat Patani: The Story of Patani*, ed. A. Teeuw and D. K. Wyatt, 2 vols. (Leiden,1975)和 Lorraine M. Gesick, *In the Land of Lady White Blood: Southern Thailand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Ithaca, 1995)。

阿育陀耶帝国：1569－1767 年

随着现代欧洲旅行者的出现，17 世纪的资料突然变得更加充足。除了已经引用的编年史，还有对第一手的欧洲文件的重要收集，这些都由泰国国家图书馆出版：*Record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iam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17th Century Copies from Papers Preserved at the India Office*, 5 vols. (Bangkok, 1915－1921)和 *Dutch Papers: Extracts from the "Dagh Register,"* 1624－1642 (Bangkok 1915)。对外国旅游者最有用的报道参见下面：*Peter Floris: His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the Globe, 1611－1915*, ed. W. H. Moreland (London, 1934); "Translation of Jeremias van Vliet's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Siam," trans. L. F. van Ravenswaay, *JSS* 7, pt. I (1910): 1－108；同一个作者的 *Historical Account of Siam in the 17th Century*, Trans. W. H. Mundie(Bangkok,1904)，并且参看 F. H. Gile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van Vliet's Historical

Account,"*JSS* 30, pt. 2(1938): 155 — 240, and 30, pt. 3(1939): 271 —380; Claude de Beze, 1688, *Revolution in Siam*, trans. E. W. Hutchinson(Hong Kong, 1968);和 Simon de la Loubere 的优秀作品, *A New Historical Relation of the Kingdom of Siam* (London, 1693),再版为 *The Kingdom of Siam* (Kuala Lumpur, 1969)和波斯人的报道, *The Ship of Sulaiman*, trans. John O'Kane(London, 1972)。

第二手的著作,我们可以从 O. W. Wolters 对 1590 年代的中—暹关系的考察开始,参看"Ayudhya and the Rearward Part of the World,"*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8): 166 —178。17 世纪的历史现在相当清楚,这多亏了 George Vinal Smith 的著作, *The Dutch in Seventeenth-Century Thailand* (DeKalb, Ⅲ., 1977)。E. W. Hutchinson, *Adventurers in Siam in the Seventeeth Century* (London, 1940)是对纳莱处理与西方关系的标准阐述。Maurice Collis, *Siamese White* (London, 1936)读起来可以看作一个惊险刺激的探险故事,但是作为历史同样是相当准确。Luang Sitsayamkan (Sit Hoontrakul), *The Greek Favourite of the King of Siam* (Singapore, 1967),是对华尔康(康斯坦丁·帕夫尔孔)一个很好的阐述。

在现存的文献中,对 1688 — 1767 年间的研究是缺乏的。一个主要的例外是 Busakorn Lailert 的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The Thai Monarchy in the Ban Phlun Luang Period, 1688 — 1767"(1972),这个时期的所有学者都必须依赖这篇论文。同样可以参见 *In the King's Trail: An 18th Century Dutch Journey to the Buddha' Footprint* (Bangkok, 1997)。关于这个时期我也写了一点东西,参见 *O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a Category of Asian History*, ed. Leonard Blussee and Femme Gaastra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1998)。

早期曼谷帝国: 1767 — 1851 年

随着曼谷时代的开始,泰国的历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资料更加丰富并且包括大量的档案。对该时期进行研究的学者相应地也非

常多。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最重要的近期的西方语言作品,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现。

对早期曼谷时期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我们已经提醒注意 Ak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ai Soceity*。我一直以来就欣赏 Baas Terwiel, *Through Travellers' Eyes: An Approach to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ai History* (Bangkok, 1989)。Jennifer Cushman, *Fields from the Sea: Chinese Junk Trade with Siam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Ithaca, 1993)是对 Sarasin Viraphol, *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 — 1853* (Cambridge, Mass., 1977)很好的补充。Lorraine Marie Gesick, "Kinship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Traditional Siam, 1767 — 1824,"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76,最直接地谈及了泰帝国的王权和组织问题。Craig J. Reynold 撰写了大量关于曼谷时期的泰国佛教和知识生活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 1972 年的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The Buddhist Monkhood in Nineteenth Century Thailand" 和他的重要的文章,"Buddhist Cosmography in Thai Hist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e Chan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5 (1975 — 1976): 203 — 220。David K. Wyatt, "Family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Thailand,"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9, no. 2 (Sept. 1968): 208 — 228,考察了统治精英的定义;Hong Lysa, *Thailand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 Evolu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Singapore, [1984?])很好地评估了经济变化。Nigel J. Brailey, "The Origins of the Siamese Forward Movement in Western Laos, 1850 — 1892,"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8,考察了与清迈和兰纳王国的关系并且第一章追溯到了吞武里时期。David P. Chandler, *A History of Cambodia*, 2nd ed. (Boulder, 1992)对暹罗与柬埔寨关系的考察是出类拔萃的。Mayoury Ngaosyvathn 和 Pheuiphanh Ngaosyvathn, *Paths to Conflagration: Fifty Years of*

Diplomacy and Warfare in Laos, Thailand, and Vietnam, 1778 – 1828(Ithaca,1998)有点过分偏袒老挝了。他们的 *Vietnamese Source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1827 Conflict between the Court of Siam and the Lao Principalities*, 2 vols. (Tokyo,2001)是很有用的补充。我们也许能从 *Two Yankee Diplomats in 1830s Siam*, ed. Michael Smithies (Bangkok,2002)中获益良多。

除了已经提及的著作之外,尤其是 Gesick 和 Reynolds 的,目前基本上没有对达信统治的研究,当然也有例外,如 Jiri Stransky, *Die Wiederverinigung Thailands unter Taksin 1767 – 1782* (Hamburg, 1973)和 *Jacqueline de Fels, Somdet Phra Chao Tak Sin Maharat, le roi de Thonburi* (Paris,1976)。

国王拉玛一世统治时期仍然值得大量的学术努力。Chaophraya Thiphakorawong(Kham Bunnag)的第一代统治期间的编年史已经由 Chadin 和去世的 Thadeus Flood 翻译成了 *The Dynastic Chronicles, Bangkok Era, The First Reign*, 2 vols. (Tokyo, 1978)。Klaus Wenk,"The Restoration of Thailand under Rama Ⅰ, 1782 – 1809 (Tucson,1968)"是一个有用的总结,但是它没有超越编年史。对这一时期不同的观点可以参看 David K. Wyatt, "The 'Subtle Revolution' of King Rama I," in *Moral Order and the Question of Change: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n Thought*, ed. A. B. Woodside and D. K. Wyatt (New Haven, Conn., 1982),pp. 9 – 52。

关于第二次统治期间很少有资料,但是除了 John Crawford 的重要的著作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London, 1828; reprint, Kuala Lumpur,1971)。

国王拉玛三世统治时期以暹罗与以鲍林使团为代表的英国的对峙开始,这方面可以参看 *The Burney Papers*, 4 vols. in 5 (Bangkok, 1910 – 1914; reprint, Farnborough, Hants.,1971),是一个相对未开发的信息金矿,可以获得许多关于 1840 年代的资料。去世的 Walter

F. Vella 的第一本书是 *Siam under Rama* Ⅲ (Locust Valley, N. Y., 1957),而且它经受住了另外四分之一世纪研究的考验。Nicholas Tarling, "Siam and Sir James Brooke," *JSS* 48, pt. 2 (Nov. 1960): 43－72,是作者详细考察英—暹关系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对于统治末期的继承危机,可以参看 William L. Bradley, "The Accession of King Mongkut," *JSS* 57, pt. 1 (Jan. 1969), 149－162。

孟固和朱拉隆功：1851－1910 年

学者们对第四和第五代统治期间的研究最充分,他们利用了曼谷和国外的丰富的文件资料。除了以前引用的一般性的著作,还有大量的跨越相当长时期的重要著作。对经济变化进行了较好考察的,可以参看 James C. Ingram, *Economic Change in Thailand, 1850－1970*, rev. ed. (Stanford, 1971)。Sompop Manarungs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ailand, 1850－1950: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World Economy* (Bangkok, 1989)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观点。同样可以参看 Lindsay Falvey, *Thai Agriculture: Golden Cradle of Millennia* (Bangkok, 200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Suehiro Akira,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ailand 1855－1985* (Chiang Mai, 1996)。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1957)是持久的和有价值的。三个对文件的相关收集值得特别注意：Chattip Nartsupha and Suthy Prasarts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am 1851－1910* (Bangkok, 198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am 1910－1932* (Bangkok, 1981),和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Change in Siam, 1851－1910* (Singapore, 1977)。以经济史的观点来考察乡村社会的,可以参看 David H. Feen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ductivity: Tha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880－1975 (Vancouver, 1982);和 David Bruce Johnson, "Rural Society and the Rice Economy in Thailand, 1880－1930," Ph. 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75;以及一个非常精

彩的可读性较强的地方民俗史，可以参看 Lauriston Sharp 和 Lucien M. Hanks, *Bang Chan: Social History of a Rural Community in Thailand*(Ithaca,1978)。

第四代统治时期的详尽书目，可以参看 Constance M. Wilson, "Towards a Bibliograph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Mongkut, King of Thailand, 1851 — 1868,"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d. Cowan and Wolters, pp. 164 — 189。Wilson 自己的大部头的博士论文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Reign of Mongkut, 1851 — 1868: Thailand on the Eve of Modernization,"Cornell University,1971,是对该时期最好和最完整的研究，在经济资料方面尤其强有力。王国的外部关系是 Neon Snidvongs 研究的主题，参见 "The Development of Siamese Relations with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eign of Maha Mongkut, 1851 — 1868,"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1961。

这一时期的同时代的资料，我们尤其需要提及 Sir John Bowring, *The Kingdom and People of Siam*, 2 vols. (London,1857; reprint, Kuala Lumpur, 1969)和 Bishop Jean-Baptiste Pallegoix, *Descriptioin du royaume Thai ou Siam*, 2 vols. (Paris, 1854; reprint, Farnborough, Hants. ,1969)。两者都是对重大变革前夕的暹罗具有高度感召力的和全面的论述。泰国人自己对该时期的标准记录更加温和，但是追踪内部的发展是有用的：Chaophraya Thiphakorawong, *The Dynastic Chronicles, Bangkok Era, The Fourth Reign, B. E. 2394 — 2411* (A. D. 1851 — 1868), Trans. Chadin Flood, 5 vols. (Tokyo, 1965 — 1974)。

第四代统治期间的第二手的资料由于距离现在太近没能包括在 Wilson 的书目里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William L. Bradley, *Siam Then: The Foreign Colony in Bangkok before and after Anna* (Pasadena, 1981);和 Milton E. Osborne, *River Road to China: The Mekong River Expedition 1866 — 1873* (New York, 1975)是对拉葛雷·卡尼尔探险的考察。

同时代人对第五代统治期间的描述在质量上有很大的差异。其中的最好的是 J. G. D. Campbell, *Sia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1902); A. Cecil Carter, *The Kingdom of Siam* (New York, 1904)是为圣路易斯博览会做准备。James McCarthy, *Surveying and Exploring in Siam* (London, 1900)和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Siam*, ed. Arnold Wright(London,1908; reprint Bangkok, 1994)的图表尤其有用。

近年的学者专著包括 Pensri (Suvanij) Duke, *Les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a Thailande (Siam) au XIXeme siecle d'apres les archives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Bangkok,1962); David K. Wyatt,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Thailand: Education in the Reign of King Chulalongkorn* (New Haven, 1977); Tej Bunnag,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Siam 1892 — 1915* (Kuala Lumpur, 1977);Chandran Jeshurun, *The Contest for Siam 1889 — 1902: A Study in Diplomatic Rivalry* (Kuala Lumpur,1977)。同样还可以参看 Patrick Tuck, *The French Wolf and the Siamese Lamb* (Bangkok, 1995)。

最后,有两本回忆录读起来是对这一时期的很好的但是不同的阐述。瓦持拉延王子是朱拉隆功的兄弟,也是个佛教僧侣,并且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物: *Autobiography: The Life of Prince-Patriarch Vajiranana of Siam, 1860 — 1921*, tran. Craig J. Reynolds (Athens, Ohio, 1979)。W. A. R. Wood 是英国的领事,一个业余历史学家,并且长期在泰国居住: *Consul in Paradise: Sixty-Nine Years in Siam* (London, 1965)。

高涨的精英民族主义：1910 — 1932 年

Walter F. Vella 对第六代统治也就是国王瓦吉拉伍德统治期间做了令人钦佩的研究,参见其 *Chaiyo! King Vajiravud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 (Honolulu, 1978)。不过,Vella

也许有成效地使用了 Stephen L. W. Greence 的 1971 年版本的著作，*Absolute Dreams: Thai Government Under Rama* Ⅵ, *1910 — 1925* (Bangkok, 1999)。

W. A. Graham, *Siam*, 2 vols. (London, 1924)作为同时代人的描述,就如帕里果瓦和鲍林对他们时代的描述一样是全面的。Malcolm Smith, *A Physician at the Court of Siam* (Londom, 1946; reprint Bangkok, 1999)是一本使人愉快阅读的书。

现在人们对最后的绝对君主国王帕恰迪波的了解主要是通过 Benjamin A. Batson 的大量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 *Siam's Political Future: Documents from the End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Ithaca, 1977); 和 *The End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in Siam* (Singapore, 1984)。一个同时代的记者的印象是 Andrew A. Freeman 的 *Brown Women and White* (New York, 1932)。

军人主导：1932 — 1957 年

关于这一时期,对以前引用作品的一个主要的补充是一个由塔克·乍露提拉纳(Thak Chaloemtiarana)编辑的非常好的文件汇编，*Thai Politics: Extracts and Documents 1932 — 1957* (Bangkok, 1978),这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因为它包括了许多泰国人的声音。同一个作者的 *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c Paternalism* (Bangkok, 1979)包含了一个追溯到 1932 年的很长的简介。除了以前引用的 Batson 的两部作品,如果有必要了解 1932 年政变和其后到 1935 年的背景的话,还有许多有用的专业著作。Thawatt Mokarapong, *History of the Thai Revolut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Behavior* (Bangkok, 1972)是对 1932 年事件本身描述非常好的一部作品,而 Pierre Fistie, *Sous-developpement et utopie au Siam, le programme des reformes presente en 1933 par pridi phanomyong* (Paris, 1969)考察了比里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和形成。同时代人 Kenneth P. Landon, *Siam in Transition, a Brief Survey of*

Cultural Trends in the Five Years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32 (Chicago, 1939; reprint, New York, 1968)是根据在该国家的长期经历写成的。而 Virginia Thompson, *Thailand: The New Siam* (New York, 1941; reprint, New York, 1967)则是在最低程度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写了一部较好的大部头作品。

1938－1944 年的披汶政府的第一次掌权期间包括 1940－1941 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和二战的大部分时间,因此是非常复杂的。Kobkua Suwannatha-Pian, *Thailand's Durable Premier: Phibun Through Three Decades, 1932－1957* (Kuala Lumpur, 1995)是对其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简介。这一时期的后半部分是 Daniel Finemen 的研究主题,参见其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Honolulu, 1997)。关于印度支那战争,Luang Wichit Wathakan 的 *Thailand's Case* (Bangkok, 1941)进行了描述。而且一个同时代的记者 M. Sivaram 也对战争进行了描述,参见其 *Mekong Clash and Far East Crisis* (Bangkok, 1941)。对于披汶政府和世界大战,参看 Charnvit Kasetsiri, "The First Phibun Government and Its Involvement in World War Ⅱ," *JSS* 62, pt. 2 (July 1974): 25－88; 和 Thamsook Numnonda 的两篇作品, "Pibulsongkram's Thai Nation-Building Programme during the Japanese Military Presence, 1941－1945,"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9, no. 2 (Sep. 1978): 234－247, 和 *Thailand and the Japanese Presence, 1941－1945* (Singapore, 1977); 以及 Direk Jayanama 非常重要的回忆录 *Siam and World War Ⅱ*, tran. Jane Godfrey Keyes (Bangkok, 1978)。Benjamin A. Batson, "The Fall of the Phibun Government, 1944," *JSS* 62, pt. 2 (July 1974): 89－120,是权威性的作品。John B. Haseman, *The Thai Resistance Move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Chiang Mai, 2002)是有用的。而且人们可以从第一手的报道中获益良多: Sir Andrew Gilchrist, *Bangkok Top Secret* (London, 1970); Peter Kemp, *Alms for*

Oblivion (London, 1961); Nicol Smith and Blake Clark, *Into Siam, Underground Kingdom* (Indianapolis, 1946)。Richard Ruth 的新硕士论文(2003)对该主题增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

日本对战争的看法是 Benjamin Batson 的研究主题，参见其 *The Tragedy of Wanit: A Japanese Account of Wartime Thai Politics* (Singapore, 1990)。战争结束时候的外交危机在美国外交文件的选编中得到了最好的研究，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vol. 6 (Washington, 1969)。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观点考察了外交危机：Nicholas Tarling, "Atonement before Absolution: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ailand during World War Ⅱ," *JSS* 66, pt. 1 (Jan. 1978): 22－65; James V. Martin Jr., "Thai-American Relations in World War Ⅱ,"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2, no. 4 (1963): 451－467; Herbert A. Fine, "The Liquidation of World War Ⅱ in Thailan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34, no. 1 (1965): 65－82。Frank C. Darling,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965)考察了直到 1960 年代的关系。

关于国王阿南达结束统治，可以参看 Rayne Kruger, *The Devil's Discus* (London, 1964); 和 *1 Sattawat Supsawat 23 Singhakhom 2543* (Bangkok, 2000)。

对于直到 1957 年战后时期的历史，人们仍然是非常困难地去解读。Thak 在 *Thai Politics 1932－1957* 中的解读和 *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c Paternalism* 中的前几章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研究。我们可以从 Jayanta Kumar 翻译的回忆录 *Portraits of Thai Politics* (New Delhi, 1972)中倾听到另外的泰国人声音。两个同时代的外部观察者是记者 Alexander MacDonald, *Bangkok Editor* (New York, 1949)和美国第一任泰国大使 Edwin F. Stanton, *Brief Authority* (New York, 1956)。比里·帕侬荣的回忆录，*Ma vie mouvementee et mes 21 ans d'exil en Chine populaire* (Paris, 1974)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他们没有说出他们所做的事情。同样可以参看 Thomas Lob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Aid to the Thailand Police, Monograph Series in World Affairs, no. 14 (Dever, 1977)。

发展和革命：1957－1982年

关于这个最近的时期，严肃的历史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Thak对沙立政权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几乎没有资料来源可以允许学者有信心对该时期之外的情况进行研究。但是也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尤其是根据公布的官方文件来研究泰国与美国的关系。政治科学家至少向历史学家提供了发展得以产生的结构的观点。例如，Fred W. Riggs, *Thail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 Bureaucratic Polity* (Honolulu, 1966)对泰国军人与商业社区的关系做了一些洞见性的分析。William Siffin, *The Thai Bureaucracy: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Honolulu, 1966)是有用的和翔实的。最近三本有关政治的书在提供当前的背景上是非常有用的。Clark D. Neher, ed., *Modern Thai Politics: From Village to Nation*, rev. ed. (Cambridge, Mass., 1979)是对一系列当代议题的非常好的和最新的文章汇编。John L. S. Girling, *Thailand: Society and Politics* (Ithaca, 1981)主要关注泰国政治关系的结构和模式以及它们在变化的泰国社会中的根源。David Morell and Chai-anan Samudvanij, *Thailand: Reform, Reaction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81)内容非常丰富，是了解70年代中期动荡的必读书目。

最早考察文官政治领导的是David Van Praagh, *Thailand'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The Life and Times of M. R. Seni Prmoj* (New York, 1996)。

新的开始：1976－2002年

对当代政治的最常见的简介是Ruth McVey在*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撰写的有关泰国的年度文章以及在*Asian Survey*一月或者二月号上的年度文章(由不同的作者撰写)。

有关政治的系统性作品是很少见的。可以参看 Pasuk Phongpaichit 的不同的书；尤其是 Pasuk Phongpaichit and Sungsidh Piriyarangsan, *Corruption and Democracy in Thailand* (Chiang Mai, 1994);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Thailand's Boom!* (Chiang Mai, 1996); Pasuk Phongpaichhit and Chris Baker, *Thailand: Economy and Politics* (Kuala Lumpur, 1995)。关于政府结束暴乱的战略，可以参看 Gen. Saiyud Kerdphol, *The Struggle for Thailand: Counter-insurgency, 1965 —1985* (Bangkok, 1986)。关于当前的君主制，参看 William Stevenson, *The Revolutionary King* (London, 1990)。

关于经济方面，参看 Robert J. Muscat, *The Fifth Tiger: A Study of Thai Development Policy* (New York, 1994); Yoshihara Kunio, *The N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Kuala Lumpur, 1994); Peter G. Warr(ed.), *The Thai Economy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1993)。Lindsay Falvey 的书对这些做了有益的补充，参看 *Thai Agriculture: Golden Cradle of Millennia* (Bangkok,2000)。

关于人口方面，参看 John Knodel, Aphichat Chamratrithirong and Nibhon Debavalya, *Thailand's Reproductive Revolution: Rapid Fertility Decline in a Third-World Setting* (Madison, 1987)。

我最喜欢的著作之一是对现代泰国佛教的研究，参看 Kamala Tiyavanich, *Forest Recollections: Wandering Monks in Twentieth-Century Thailand* (Honolulu, 1997)。她也刚刚送了一本新书给清迈的出版社。

两本非常有吸引力的主要通过历史上和当代世界的视觉证据来考察泰国的书是：Surat Osathanugrh, *Vanishing Bangkok* (Bangkok, 2001); Steve Van Beek, *Bangkok Then and Now* (Bangkok, 1999)。

索　　引

（索引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

abdication 退位，让位 238

Abdul Kadir 阿卜杜勒·卡迪尔 199

absolute monarchy 绝对君主制(君主专制) 213, 222, 226, 230, 232, 234, 237－238, 241－242, 293

academy military 军事学校 206 234 269

Aceh 亚齐 74

administration 行政(管理) 11, 28, 61, 63

Administration Reform Council 行政改革理事会 293

advisers foreign 外国顾问(咨询师) 173, 196

Aga Muhammad Astarabadi 阿加·穆罕默德·阿斯塔拉巴迪 95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农业人口 282

agricultural tenancy 农业租金 201

agriculture 3, 7, 9, 26, 266, 282－283, 301

Agriculture, Ministry of 214

Ahmad, Sheik 艾哈·迈德谢赫 95

Ahmad, Sultan of Kedah 吉打苏丹艾哈 149, 152, 155, 156

Ahom 阿洪族 10, 33

Ai, Thao 艾 陶 37

Ai Fa 艾法 34－35, 37

Air force 空军 259, 262

Akatdamkoeng, Prince 阿卡岱姆空王子 226

Akin Rabibhadana, 阿肯·拉比巴达纳 M. R. W 114

Alak 阿僋族 199

Alaunghpaya, King 雍籍牙国王 116

Alcoho (spirits) 含酒精类的酒 169

Aleutian Islands 阿留申群岛 246

Alien registration 外侨登记 243

Amarin, Queen 阿玛林皇后 145－146

America: see United States 美国：参见合众国

Amphetamines 安非他明 304
An-nam 安南 12
Anand Panyarachun 阿南·班雅拉春 305
Ananda Mahidol, King 阿南达·玛希敦国王 241, 247, 253
Ananda Mahidol, Pince 阿南达·玛希敦王子 238
Anaukpetlun, King 阿那毕隆国王 105
Ancients 古代人 177
Ang Em, King 安恩国王 109
Ang Thong 安通 117
Angkor 吴哥 13－17, 21－26, 28, 30－31, 35, 40－45, 48, 52－53, 57－60, 72
Angkor Thom 吴哥城 17
Angkor Vat 吴哥窟 17, 24
Anglo-Dutch rivalry 英国与荷兰的对抗 148
Animism 灵物论 4, 26, 40, 43
Anorahta, King 阿奴律陀国王 17
Anti-Chinese 反华人 243
Anti-Japnese boycotts 反日抵制 225, 243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216
Anticommunist law 反共产主义法案 236
Anu rebellion 阿努反叛 154
Anurakmontri Prince 阿努拉克孟提王子 115
Anurakthewet Prince 安拉柯维王子 134
Anuruddha, King 阿努茹塔国王 141
Anuruttha, King 阿努茹塔国王 141
Anuvong(Anu), King of Vientiane 阿努雍(阿努)万象国王 141, 147, 153－154
Aphai, Prince 阿拍王子 110
Aphaimontri, Chaophraya 昭披耶·阿拍孟提 111
Aphaiphubet(Ben) Chaophraya 阿拍蒲柏特(奔)·昭披耶 140, 198
Aphairacha (Chün) Chaophraya 阿拍拉查(春)·昭披耶 95
Aphairacha (M. R. W Lop Suthat), Chaophraya 昭披耶·阿拍拉查(M.R.W 劳披·素塔特) 214
Aphaithot Prince 阿拍稍特王子 103, 108
Arab 阿拉伯 74
Arakan 阿拉干 83, 104
Archipelago, Indonesian 印尼群岛 95
Army 军队, 军人 182, 195, 212－214, 232, 237, 248, 250, 259, 262－263, 271, 273, 278, 280, 286, 288－289, 292, 294－295
Army, Department of the 军事部 183, 184, 186
arson 纵火 271
arts and sciences, Indian 印度艺术和科学 53, 65
asian nationalists 亚洲民族主义者 225
Assam 阿萨姆 30, 48
Assassinations 暗杀 267, 291
Assimilation 同化 225, 282
Associatioi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266, 294
Astrology 占星术 65
Athittayawong 阿提塔牙旺 93
Attopeu 阿速坡 140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南亚语系 5
Austronesian languages 南岛语系 5
Ava 阿瓦 36, 76－77, 79, 88, 90－91,

105, 107, 113, 116－117
Ayutthaya 阿育陀耶 10, 33, 35, 48, 50, 52－131, 137－138, 144, 148, 204, 237, 303

B

B－52 B－52 278
Baht 泰铢 306
Balestier, Joseph 约瑟夫·马里士他 162
Bamboo tools 竹制工具 3
Ban Müang 班蒙 41
Bang Hian 邦海 154
Bang Klang 邦康 41
Bang Klang Hao 邦克朗豪 41
Bang Rachan 邦拉赞 118
Bang Sanuk 邦·山努 31
Bang Yang, Müang 蒙·邦扬 41
Banharn Silpa－acha 班汉·西巴阿差 306
Bank of Thailand 泰国银行 293, 306
Bantam 巴淡岛 74
Batavia(Jakarka) 巴达维亚(雅加达) 148
Batson, Benjamin A. 本杰明·A. 巴特森 249
Battambang 马德望 124, 140, 143, 146－147, 191, 245－246
Bayinnaung King 莽应龙国王 79, 80－84, 88
Bayon 巴戎寺 17
Belgian 比利时的 195
Bengal, Bay of 孟加拉湾 73, 91, 95, 98, 101
Benzoin 安息香 96
Bhumibol Adulyade, King 普密蓬·阿杜德国王 254, 260, 271, 288, 296
Bidyalabh, Prince 碧达拉比王子 180, 186
Birth rate 出生率 299
Black, White, and Red Tai 黑白红傣族 10
Black River 黑河 6, 33, 187－188
Black Tai 黑傣族 2, 10, 33, 154－155
Blowpipe 吹箭管 3
Bodawhpaya, King 孟云王 132, 134, 136
Bodindecha (Sing), Chaophraya 波丁德查(辛)·昭披耶 157
Border, Burma－Siam 缅甸和暹罗边境 152
Border police 边境警察 246
Borommakot, King 波隆摩阁国王 110－115, 123, 130
Borommaracha I, King 波隆摩罗阇一世 56－57, 59－60, 62, 65, 115
Borommaracha II, King 波隆摩罗阇二世 58－59
Borommaracha IV, King 波隆摩罗阇四世 76
Borommathammikarat, King 波隆摩塔米卡拉特国王 110
Borommatrailokanat(Trailok), King 包若玛特罗卡纳王(崔洛克) 58, 60, 62
Borough Road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英国的乡镇教师培训学校 205
Boundary 边界 152
Bow and arrow 弓箭 3
Boworadet, Prince 婆沃拉德王子 214, 237
Bowring, Sir John 约翰·鲍林爵士(又译包令) 167－168
Bowring Treaty 鲍林条约 200
Boy Scouts 童子军 212, 244
Bradley Dan Beach 布莱德利·丹·比奇 163
Brahmakumara 婆罗玛库玛腊 26

Brahman 婆罗门 112, 127, 145
Brahman family 婆罗门家族 112, 114, 125, 132
Britain 英国 151, 162, 169, 189 — 202, 218, 245, 251, 264, 277
British 英国的，英国人的 148, 152 — 153, 166 — 170, 177 — 180, 187, 189, 190 — 192, 194 — 195, 198 — 199, 205, 217, 245, 250 — 256, 261
British attack 英国的攻击 153
British Burma 英属缅甸 179, 190, 202
British Consulate 英国领事馆 178
British India 英属印度 149, 151, 248
British Malaysia 英属马来西亚 180, 258, 246
Bronze 青铜 3
Brooke Sir James 布鲁克·詹姆士爵士 162, 167
Buddha Sihinga Image 佛陀像 105
Buddhism 佛教 19, 23, 26, 30, 37, 40, 43, 51, 70, 83, 100, 112, 118, 126, 128 — 130, 137, 149, 157 — 160, 162, 170, 172, 177 — 178, 202, 249, 266, 296
Buddhism, Mahayana 上座部佛教(或者小乘佛教) 23, 53
Buddhism, Sinhalese 僧伽罗佛教 30, 37, 112
Buddhism, Theravada 大乘佛教 23, 29, 31, 40, 46, 49, 51 — 53
Buddhism, monkhood 佛教僧侣 36, 52, 62, 65, 78, 103, 110, 115, 123, 129, 149, 159, 166, 195, 197, 204, 208, 263, 266 — 267, 291
Buddhism precepts 佛教戒律 43
Buddhism sect 佛教教派 65
Buddhism shrines 佛教神庙 82
Budgeting 预算编制 177
Bun Khwang 波圹 108
Bun Rüang 巴让 68
Bunnma 波玛 126
Bunnag family 波纳家族 125, 127, 131, 132, 145, 150, 151, 162 — 163, 167, 177, 181
Bunnak 波纳克 132
Bureaucratic nobility 官僚贵族 62
Buriram 武里南 143
Burma 缅甸 9 — 15, 18, 26, 35 — 37, 76, 79, 81 — 83, 86 — 88, 91, 95 — 98, 104 — 107, 112, 115, 117 — 118, 120, 122, 124 — 125, 129, 132, 134 — 136, 139, 141, 146 — 147, 149, 151 — 152, 158, 164, 166, 169, 177, 179, 183, 187, 198, 200, 248, 25 — 51, 257
Burmans 缅甸人 15 — 16
Burmese 缅甸的，缅甸人 2, 39, 61, 77 — 83, 85, 88 — 89, 91, 97, 104 — 107, 116 — 117, 123, 126, 167, 225
Burnaby Richard 伯纳比·理查德 101
Burney Col., Henry 亨利·柏尼上尉 151 — 152
Burney Treaty 柏尼条约 153, 162
Business 商业 263

C

Cabinet government 政府内阁 186
Calcutta 加尔各答 204
Calendar 日历 244

Camadevi, Queen 加玛德薇皇后 21
Cambodia 柬埔寨 13, 15, 18, 22, 24, 58, 78, 88, 91, 97, 109, 122－128, 140, 143, 146－148, 157－158, 170, 180, 187－190, 198, 243, 245, 254, 275－278, 288, 290, 293－295, 304
Cambodians 柬埔寨人 2, 61, 87－88, 91, 112, 139, 147, 156－157, 192, 225, 245, 250, 252, 269, 274
Capital, Ministry of the 首都部 182
Capitation tax 人头税 196
Catholicism 天主教 99, 103
Ceberet du Boullay, Claude 克洛德·塞贝雷·迪布莱 102
Celadon 青瓷 46
Census 人口普查，人口统计 200
Central Plain 中央平原 18, 22, 39, 59, 60, 67, 118, 123, 134, 200
Ceylon 锡兰 26, 40, 46, 249
Chaban Phraya 却班·披耶 125
Chai 猜 71, 93
Chainarai (Siang Khwang) 猜纳莱(川圹) 33
Chainat 猜纳 39, 44, 53, 114
Chairacha, King 帕猜国王(也译查拉佳、蔡拉加) 76－78, 80
Chaiya 猜亚 132, 135
Chakkraphat, King 恰可拉发特国王 78－84, 88
Chakkraphat, Prince 恰可拉发特王子 182
Chakrabongse, Prince 恰克拉彭王子 213－214, 220－221
Chakri (Thong Duang) Chaphraya 却克里(通端)·昭披耶 125－128, 131, 140
Chakri Dynasty 却克里王朝 216, 221, 222, 229
Cham 占族(语) 15, 41, 59, 90, 101, 129
Chamlong Srimuang, Major－General (retired) 占隆·西蒙少将(退休的) 305
Chamnan Channarong (U) 赞楠·赞纳荣(U) 110
Chamnanborirak (U), Chaophraya 赞楠波立拉克(U)·昭披耶 111－112, 114
Chamnanphakdi (Sombun), Chaophraya 昭披耶(宋巴)·占南帕克迪 95
Champa 占婆王朝 13, 20, 37, 51, 90, 243, 277
Champassak 占巴塞 126, 140－141, 143, 147－148, 153－157, 180, 188, 191, 198, 245
Chan 赞 140, 146－147, 156－157
Chan, Prince 赞王子 116
Chanthaburi 尖竹汶 58－59, 87, 123, 189, 191
Chanthaburi, Prince 尖竹汶王子 214, 223
Chao 昭 6, 26
Chaophraya 昭披耶 95, 112, 143, 235, 243
Chaophraya River 湄南河 15, 18－19, 39－42, 46, 52－53, 76, 122, 124, 129, 151, 188, 190
Charnvit Kasetsiri 参威特·卡赛思瑞 54
Charoon, Prince 乍伦王子 218
Chasænyakon, Luang 查山亚空·琅 111
Chatichai Choonhavan 差猜·春哈旺 298, 304－305
Chaumont Alexander Chevalier de 肖蒙·亚历山大·谢瓦利埃·德 100

Chawalit Yongchaiyudh 差瓦立·永猜裕 306
Chen - la 真腊王朝 12, 16
Chen - li - fu 40
Chetsadabodin, Prince 切特萨达波丁王子 146, 148 — 150
Chetta 策陀 93
Chi River 齐河 22
Chiang Chang 清郑 34
Chiang Hung 景洪 33 — 34, 36 — 37, 64, 67 — 68, 105 — 106, 139, 167, 181
Chiang Kham 清堪 34
Chiang Khong 清孔 34, 64, 66, 105 — 106
Chiang Krai 清克莱 77
Chiang Mai 清迈 9, 15, 18 — 20, 22, 33, 36 — 38, 58, 60, 63 — 71, 76 — 81, 83, 104 — 106, 116 — 117, 125, 136, 139, 143, 179, 186, 194, 225, 272, 299, 301 — 302
Chiang Rai 清莱 34 — 35, 38, 64 — 66, 79, 117, 280, 299
Chiang Sæn 清盛 15, 25 — 26, 33 — 35, 64 — 66, 71, 79, 81, 104 — 107, 116, 132, 139
China 中国 11 — 13, 15, 24, 30, 40, 44, 46, 51 — 52, 91, 96, 99, 109, 113, 122, 138, 141, 148, 162, 170, 181, 200, 243, 249, 257, 262, 274, 277, 278, 280, 294, 304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中华人民共和国 290
Chinese 华人, 中国人 1 — 2, 9 — 10, 36 — 37, 41, 44, 51, 54 — 56, 62, 66, 68, 74, 96, 105, 109 — 114, 123, 125 — 127, 129, 132, 135, 137 — 139, 141, 145, 158, 161, 169, 181, 185, 190, 203 — 204, 216, 224 — 225, 227 — 228, 243, 257 — 258, 263, 267, 280 — 281
Chiraprapha, Queen 吉罗婆罗帕皇后 71
Chit Phumisak 吉·普米萨 261, 270, 290
Chodüksethi 查都赛提 54
Chonburi 春武里 58, 59, 301
Chou Ta - kuan 周达观 52
Christianity 基督教 99, 100, 102 — 103, 148, 216
Chronicles 纪年 8, 21, 25, 28, 31, 33, 36, 39 — 40, 44, 56 — 59, 63, 69 — 70, 88, 91 — 92, 106 — 108, 117, 137, 157
Chuan Leekpai 川·立派 306
Chuang Bunnag 川·波纳 161
Chuang, Khun 幢坤 33 — 35
Chudamani, King 珠陀摩尼国王 161, 163, 167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朱拉隆功大学 216, 226, 260 — 261, 264
Chulalongkorn, King 朱拉隆功国王 166, 175 — 186, 189, 192, 195 — 197, 205 — 207, 210 — 211, 215, 219 — 222, 232, 237, 248, 261, 266, 281
Chum Sæng 春桑 34
Chumphon 春蓬 53, 117, 123, 132, 134
Chungking 重庆 249
Cirrhosis of the liver 肝硬化 270
Clement Ⅸ, Pope 教皇克莱门特九世 99
Cloth 布 201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305
Cold war 冷战 254, 256
Colonial Office, British 英国殖民部

169, 180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225
Commerce, international 国际商业 72, 73, 74, 77, 91, 96, 98, 107, 148, 153, 170, 200
Commercial power 商业力量 55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枢密院委员会 224
Committee to Inspect State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调查国家收入和花费委员会 215
Communications, Ministry of 交通部 214
Communism 共产主义 225, 236 — 237, 254, 257 — 258, 260 — 263, 271, 275, 290 — 291, 294 — 296
Communist China 共产主义的中国 257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马来亚共产党 280
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 泰国共产党 257, 267, 280
Commutation tax 流通税 201
Compulsory labor service 强制劳役 114, 195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义务兵制 73, 233
Compulsory primary education 小学义务教育 216, 238, 272
confederations 结盟 53
Constituent Assembly 制宪大会 287
Constitution 宪法 230, 234 — 235, 252 — 253, 255 — 256, 258, 260, 270 — 271, 287 — 288, 290, 292 — 293, 305 — 307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君主立宪制 184, 213, 230, 266
Constitutionalism 宪政 220
Conversion, religious 改宗 99 — 100, 102
Cooperative party 合作党 252
Copper 铜 3
Coppersmiths 铜匠 36
Coronation 加冕 34, 70, 177 — 178, 211
Cotton cloth, Indian 印度棉布 73, 96
Council of Regency 摄政委员会 251
Council of State 元老院 177
Coup Group 政变小组 254 — 255, 258 — 260, 262
Coup 政变 214, 230, 265, 287
Craftsmen in metal 金属工匠 36
Crawfurd, John 约翰·克劳福德 149
Crown properties 皇室地产 240
Cultural Mandates 文化命令 244, 248, 257
Cultural pool 文化集群 2
Czechoslovkia 捷克斯洛伐克 257

D

Dalang《达朗》137
Damrong Rajanubhab, Prince 丹龙·腊贾努巴王子 146, 194 — 196, 198, 206 — 207, 223, 224
Danish 丹麦 98
Debt – bondage 债务奴隶 60, 177, 201
Decrees 法令 131
Deer hides 鹿皮 96
Demilitarized zone 非军事区 189
Democracy 民主 224, 226, 239, 241, 264, 271
Democracy, representative 代议制民主 224
Democrat party 民主党 252, 255, 258,

270－271, 290－291, 294, 306
Democratic Soldier 民主士兵 286
Demonstrations 游行示威 266, 305
Depression 萧条 239
Devawongse, Prince 德瓦旺王子 182, 185, 188, 191 － 192, 207, 214, 218, 229
Development 发展 266－267, 269, 272－273, 276, 281, 286－287, 297
Dhamma 佛法 61
Dhammayutika 法宗派 160, 202
Dharmasastra (梵语)法论 61
Dien Bien Phu(Müang Thæng) 奠边府 6, 9, 10
Direk Jayanama 迪热克·伽雅纳玛 246－247
Dit Bunnag 迪·波纳 150－151
Dokmai Sot (M. L. Buppha Kunjara Nimmanhemin) 道克迈·绍特(M. L. 波帕·坤加拉·尼曼诃民) 226
Don Muang 廊曼 237, 246
Dong Sano island 东赛诺岛 54
Drugs: see amphetamines, herion, marijuana, opium 毒品：参看安非他明、海洛因、大麻和鸦片
Duarte Fernandes 杜阿尔特·费尔南德斯 74
Duel on elephant－back 象背上的决斗 58
Duodecagon 137
Duong, King 栋国王 146 － 47, 156 － 58, 170
Dutch 荷兰 93, 95－100, 103, 109, 112, 148, 177
Dvàravari 陀罗钵地王国 17－22, 24, 39
Dynasty 王朝 145

E

Eaglewood 沉香木 96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教会层次 202
Ecole Superieure de Guerre 高级军事学校 223
Economic Plan of 1933 1933 年的经济计划 236, 263
Economic aid 262
Economic nationalism 经济民族主义 243
Economic policy 经济政策 239
Economy 经济 227, 298
Education 教育 175, 181－182, 185, 195, 197, 202 － 206, 208, 210, 216, 221, 225, 238, 263, 272, 282 － 283, 286 － 287, 299
Education, primary 小学教育 299
Education Department 教育部 183－184
Ekathotsarot 厄迦陀沙律 88－95
Election 选举 254 － 255, 260, 264, 269, 287, 290－291, 293, 296, 304－307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选举参与 239
Elephant Department 大象部 101
Elephantry 象术 65
Emerald Buddha 玉佛 126
Eng 安英 139－140
England(English) 英国，英国人 98－99, 101, 160 － 161, 169, 185, 223, 226, 237, 270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EIC) 英国东印度公司 96, 99, 101, 102, 135, 148
Enhancemeng of Knowledg Club 增进知识俱乐部 215

Entente Cordiale 挚诚协定 190
Eton 伊顿学院 196, 223
Europe 欧洲 95, 169
Exports 出口 302－304
Extraterritoriality 治外法权 98, 162, 168, 172, 190, 218

F

Fa Dæt Müang 法岱蒙 19
Fa Ngum 法昂 72
Face of Thai Feudalism《泰国封建主义的脸面》261
Factories 工厂 96, 282
Family name 姓 242
Fang 芳县 26, 28, 34, 39, 64, 66, 79, 106, 123－124, 126
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 泰国工业联合会 305
Feng－chia－i 凤伽异 12
Fifth Reign 第五代统治 201, 203, 206, 210, 220, 226, 232, 261
Finance, Minister of 财政部长 183－184, 186, 195, 215, 220, 247
Finance, Ministry of 214, 264
Financial adviser 财政顾问 227
Firearms 火器, 枪支, 枪炮 76, 90, 96
First Army 第一军 260, 269, 295
First Reign 第一代统治 137, 141, 143－145, 151, 158, 206
Food－processing industry 食品加工业 283
Football, soccer 足球 216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外交部 182, 184, 214, 235
Foreign Office, British 英国外交部 169, 178, 180
Foreigners 外国人 94
Foresty 林业 282
Forgery 伪造 43
Fourth Reign 第四代统治 205－206, 210, 248
France 法国 99－101, 169, 187, 189－192, 207, 218, 223, 226, 236, 242, 245, 248, 251, 273, 277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 180
Franco－Siam agreement of 1886 1866 年《法暹条约》187
Franco－Siam Crisis of 1893 1893 法暹危机 187, 207
Free Thai 自由泰 247－251, 254, 257
Freemen 自由人 60, 62, 138
French 法国的, 法国人 97－99, 100, 102－103, 126, 154, 160, 166, 170, 178, 180－181, 187－191, 194－195, 198, 217, 245, 250, 254, 257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法国东印度公司 102
Front Palace 前宫 108, 110, 115, 144－145, 178
Front Palace 前宫危机 178

G

Gambling 赌博 169, 171, 177, 190
Geneva Conference on Laos 关于老挝的日内瓦会议 274
Germany 德国 205, 239, 245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1688 年"光荣革命"92
Goa, Portuguese 葡属果阿 95
Golconda 戈尔康达 99, 201

Gold standard 金本位制 227, 239
Goldsmith 金匠 36
Government gazette 政府公报 173
Grahi 加罗希 15
Great Britain 大英帝国 247, 251, 257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227
Greek 希腊人 94, 103
Green Revolution 绿色革命 283, 286
Griswold, Alexander B. 亚历山大·B. 格里斯沃尔德 45
Guam 关岛 246
Guanxi 关系 5, 6
Guizhou 贵州 5, 11
Guns and ammunition 枪支和弹药 74

H

Ha-tien 河仙 139
Hamsavati 汉纱瓦帝 9, 26
Hang Müang 航蒙 91
Haripunjaya 诃梨朋阇耶王国 15, 21, 24, 25, 26, 34, 35, 36, 37
Harrow 哈罗学校 196
Harvey, G. E. G. E. 哈维 77
Hat Yai 合艾 282
Head - lustration ceremony 头部净化仪式 308
Heroin 海洛因 304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 284, 285
Hill peoples 山地民族 7, 25, 37, 83, 105, 107, 295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242
Hmong(Meo 苗) 赫蒙人 280
Ho Chi Minh 胡志明 225, 290
Ho Chi Minh Trail 胡志明小道 278
Ho Müang Phrakan 胡蒙帕坎 (帕坎 Phakan) 33
Ho, or Haw 何或豪 34, 181 - 182, 187, 188
Holy Man's Rebellion 圣人造反 199
Holy man 圣人 87, 106, 108, 113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162
Hong Kong 香港 167, 168, 169, 204, 246, 304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议院 252, 259
Hsenwi 新威 70-71, 79
Hsien 暹 45
Hsinbyushin, King 孟驳王 117
Hsipaw 锡袍 68, 77
Hua Phan(Black Tai)muang 华藩(黑傣族)蒙 141
Hue 顺化 140-141, 157-158, 187
Hut Mount 哈特山 34

I

I-mou-hsun 异牟寻 12
Illegal commodities 非法商品 304
Illegalily 非法活动 307
Im 艾目 146-147, 156, 157
Immigration 移民 281
Inao《伊瑙》137
Inburi 因武里 53, 60, 114
Income tax 所得税 239
Indapathanagara 因打巴塔纳伽拉 26
Indemnity 补偿, 赔偿 35
India 印度 3, 12, 19, 30, 51, 95 - 96, 99, 101, 137, 151, 177, 200, 205, 247-249
Indian 印度的, 印度人 1, 87, 99,

129，169
Indianization 印度化 17
Indo－European languanges 印欧语系 2
Indochina 印度支那 72，188，198，245，257，262，275－280，290，294－295，296
Indochina，French 法属印度支那 237，245，247，249，252，257
Indochina，French，Thai war with 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战争 245
Indochina war 印度支那战争 277，287
Indonesian 印度尼西亚 254，247
Indraditya，King 因陀罗迭多国王 41
Industrial 工业的 283，295
Inflation 通货膨胀 283，295
Inheritance 继承，继承权 3
Inscription 碑铭 31，33，41－42，44－45，48，158
Insurgency 暴动，叛乱 274，278，280，286－287，293－295，296，300
Intanon，Chao 印坦·昭 179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 226
Interior，Ministry of 内务部 194－96，199，223，264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t the Hague 海牙国际法庭 27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06
Intharacha，King 因陀罗阇国王 57，58，67，73，92
Inthavong 因塔雍 141
Investment，foreign 外来投资 273，296，298
Iron－working 铁的冶炼 3
Irrawaddy river 伊洛瓦底江 15
Irrigation 灌溉 59，192，201，286
Irrigation Department 水利部 195，206
Islam 伊斯兰教 99－100，129，258
Islamic law 伊斯兰法 257
Italy 意大利 239，248
Itsaranurak，Prince 艾提萨拉努拉克王子 151
Itsarasunthon，Prince 艾提萨拉孙通王子 144－145

J

James，Eldon 埃尔登·詹姆士 218
Japan 日本 3，90－91，96，98，109，239，245，247－249，251，266，276－277，279，304
Japanese 日本的，日本人 92－94，96－98，103，211，239，245－251，253－254，256
Japanese Christians 日本基督教 129
Java 爪哇 37，137，177
Java Sea 爪哇海 101
Javanese 爪哇人 61
Jayasinghavarman 阇耶辛哈跋摩 24
Jayavarman Ⅱ 阇耶跋摩二世 15，24
Jayavarman Ⅶ 阇耶跋摩七世 17，22，24，40
Jayaviravarman，King 阇耶跋摩国王 24
Jesuits 耶稣会 99，100，102
Jews of the East《东方的犹太人》236
Jinakalamali《胜纪鬘语》70
John Bowring 约翰·鲍林(又译包令)168
John Crawfurd 约翰·克劳福德 149
Johore 柔佛 148

Journalists 记者 226
Junior Red Cross 少年红十字会 244
Justice, Ministry of 司法部 195, 226, 233

K

K. S. Kulap K. S. 库拉披 226
Kading 卡丁河 154
Kæo 凯敖 33－34
Kæo, Müang 蒙·凯敖 69－70
Kæo Fa, Prince 凯敖·法王子 80
Kæo Phrakan, Müang 蒙·凯敖·帕坎 34
Kalahom 国防部(长) 63, 93－95, 110－111, 114－115, 131－132, 145－146, 151－152, 155, 161－162, 167, 171－172, 176, 185－186, 194
Kalasin 加拉信 19, 143, 155
Kamchatka 堪察加 247
Kamphængphet 甘烹碧 39, 42, 57－58, 67, 82, 117, 132
Kamphucha 柬埔寨 54, 294
Kanchanaburi 北碧 53, 78, 88－89, 132, 134
Kandy, Kingdom of 康提王国 112
Kao(Tai of the Nan valley) 谷族(楠河河谷的傣族) 38, 45
Karen 克伦人 77
Kasikon 卡西孔 227
Katsongkhram, Luang 銮·卡特颂堪 254
Kavila, Chao 昭·卡维拉 125－126, 134, 136, 139
Kavilorot, Chao 昭·卡维老饶 179
Kedah 吉打 40, 125, 135, 143, 149, 151, 152, 155, 156, 180, 192, 198, 248
Kelantan 吉兰丹 135, 143, 152, 156, 170, 180, 192, 248
Keng Tung 景栋 36, 64, 70, 71, 72, 79, 139, 167, 248
Ket 克特 71
Ket Chettharat 克特·查他拉特 70
Kham, Khun 卡坤 38
Kham Fu, King 卡福王 39, 64－65
Kham Hao 卡颢 34
Khamon Noi 卡蒙·诺艾 106
Khamsing Srinawk 卡姆辛·室利纳克 261, 293
Khao Sanam Luang 王宫广场 70
Khemmarat 肯马拉 155, 199
Khmer(Khom) 高棉族, Khom 高棉人, 直译为"孔人"是泰语对古代孟高棉语民族的泛称 1, 20, 22, 24－26, 29, 39－41, 45, 48, 53, 55, 59, 61, 76, 79, 87, 123, 146－147, 203
Khoen 泰艮人 38
Khon Kaen 孔敬 143, 272, 282, 302
Khorat (Nakhon Ratchasima) 呵叻府 22, 278, 282, 296
Khorat Plateau 呵叻高原 15, 19, 20, 53, 126, 143, 153－155
Khorat Radio 呵叻电台 296
Khrüa, Khun 坤如 38
Khuang Aphaiwong 宽·阿派旺 249, 251－252, 254－255, 257, 290
Khün 坤 64
Khün 坤族 107
Khun Borom 坤博隆 9－10
Khunnang 坤纳恩(官僚贵族) 62
Khwæ Noi River 桂诺伊河 135
Khwæ river 桂河 134

Kim Il Sung 金日成 290
King 国王 289, 294, 305
Kingship 王权 271
Knox, Sir Thomas George 托马斯·乔治·诺克斯爵士 180
Ko-lo-feng 阁逻凤 11
Kompong Svai 磅赛 147
Korea 朝鲜 91, 262
Korea War 朝鲜战争 261-262
Kra, Isthmus Of 克拉地峡 190
Kriangsak Chomanand 江萨将军 293-294
Krom 部 63, 111
Kü Na, King 库那国王 65, 70
Kuala Trengganu 瓜拉丁加奴 170
Kui 奎 116
Kukrit Pramoj 克立·巴莫 252, 290, 294
Kulap Saipradit 库拉披·赛帕迪提 226, 261, 290
Kunming 昆明 10-11
Kuomintang 国民党 225, 257
Kyanzittha, King 江喜陀国王 17

L

la Loubere, Simon de 西蒙·德·拉卢贝厄 102
labor unions 工会 287, 290, 293
lac 胶 96
Lahu 拉祜族 11
Lai Hka 莱卡 68
Lai, Müang 莱, 蒙 34
Lampang 南邦 37, 57, 64-69, 76, 105-106, 117, 125, 132, 134-136, 139, 200
Lamphun 南奔 19-22, 35, 65-67, 71, 78, 117, 139, 307
Lan Na(Chiang Mai) 兰纳(清迈) 25, 33, 38-40, 45, 48, 51, 58-59, 63-73, 76-80, 82-85, 90-91, 98, 104-107, 116-117, 120-122, 125-157, 134-136, 139, 167
Lan Sang 澜沧王国 34, 63, 71-73, 76-86, 90, 104, 107, 116-117, 120-122, 126
Land reform 土地改革 267, 291
Lands, Ministry of 土地部 176
Language 语言 137
Lao 老族 2, 9-10, 23, 25, 33, 36, 38, 40, 45, 48, 71-72, 76, 82-83, 85-86, 104, 106-107, 125-126, 136, 139, 141, 153-155, 157-158, 166, 180-181, 187-192, 198-199, 225, 250, 252, 254, 257, 269, 272, 274
Laos 老挝 8, 10, 13, 15, 18-19, 30, 33, 41, 140-141, 148, 153, 155, 182, 245, 254, 273, 275-278, 280, 288, 290, 294-295, 304
Laos Crisis 老挝危机 273
Latin 拉丁 160
Lavarattha 拉瓦阿萨 25, 26
Law code 法律条款 195
Lawa people 拉哇族 26, 34, 37, 68
Lawæk 拉瓦克 78-79
Laws 法律 38, 130-131, 173
Le Van Duyet 黎文悦 156
Leftist 左派 254-255
Legal profession 法律职业 233
Legislation 立法 130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院 220

Legislature 立法机构 184, 260
Lenin, V. 列宁 290
Leonowens, Anna 安娜·李奥诺文斯 175
Liang Chaiyakan 佷·猜雅坎 240
Literary 文学 144, 215
Literary production 文学作品 137
Literature 文学，文献，书籍 137, 215
Loei – Phitsanulok – Phetchabun 莱府—彭世洛—碧差汶 280
Lolo 黑彝族(倮倮族) 11, 12
Lom Sak 仑沙 44, 125, 154
London 伦敦 99, 197
Lopburi 华富里 19, 21－22, 24, 26, 35, 39－40, 42, 45, 52－58, 60, 62, 87, 101, 113, 154, 250
Lottery 彩票 169, 171
Lottery Bureau, Government 政府彩票局 263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99
Lü 泐族 2, 10, 33, 67, 82, 105－107, 167
Lo Thai, King of Sukhothai 卢泰，素可泰国王 48
Luang Phukha, Müang 蒙琅蒲克哈 139
Luang Prabang 琅勃拉邦 9－10, 15, 33－34, 44, 48, 66, 67－68, 71－72, 80, 83, 106, 117, 125－126, 141, 143, 153, 155, 180, 186－188, 191, 198

M

Mæ Sai 迈赛 26
Mæ Sot 湄索 41
Mæhongson 夜丰颂 36
Maha Chedi Luang 摩诃·柴迪隆寺 68
Maha Phrom 摩诃·卑谬 65, 66
Maha thammaracha, King 摩诃·达摩罗阇国王 79－82, 84－88
Mahabharata《摩诃婆罗多》137
Mahanawrahta 摩诃纳瓦哈 117－118
Mahanikai"大宗派" 160
Mahasena(Bunnak)Chaophraya 昭披耶·摩诃森阿(波纳克) 145
Mahasena(Pin)Chaophraya 昭披耶·摩诃森阿(平) 145
Mahasena (Pli) Chaophraya 昭披耶·摩诃森阿 (披立) 131
Mahasombat (Phon) Chaophraya 摩诃稍姆巴特(蓬)·昭披耶 112
Mahathammaracha I (Lüthai), King 摩诃达摩罗阇一世(立泰)国王 57
Mahathammaracha II, King 摩诃达摩罗阇二世 57
Mahathammaracha III (Sai Luthai), King 摩诃达摩罗阇三世(赛·立泰) 58
Mahathammaracha IV, King 摩诃达摩罗阇四世 58, 59
Mahatthai 内政部(长) 63, 87, 94－95, 99, 109－114, 125, 131－132, 146, 151, 155, 171, 185－186
Mahatthai(Chakri), Chaophray 内政部长(却克里)昭披耶 145
Mahavamsa《大史》137
Mahavihara 大佛寺 40
Mahidol, Prince 玛希敦王子 238
Mahin, King 马欣(马欣)国王 82
Makasarese 望加锡人 101, 103
Malacca(Melaka) 马六甲 72－74

Malaria 疟疾 176
Malay 马来，马来族 39，125，156，158，180，248，250，257，258
Malay peninsula 马来半岛 15，24，30，39，44，72－73，96，120，122，141，148，151－152，155，169，176，190，192
Malay states 马来国家 135，141，192，198
Malay world 马来世界 169
Malaya 马来亚 177，198，251，257－258
Malayan 马来亚的 258
Malayo－Polynesian(Austronesian)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南岛语系) 5
Malays 马来人 99，129，192，224，257
Man shu《蛮书》11，12
Man of merit 有优点的男人 123
Mandalay 曼德勒 15
Mangrai，King of Lan Na 满哥瑞，兰纳国王 33－39，42，45，48，64，79－80，104，106
Mangthaturat 曼塔图腊 154(英文书错误地标为 153 页，译者注)
Manhattan 曼哈顿 259－260
Manipur 曼尼普尔 83，113，115－116
Manoi，Chao 昭·曼诺 147
Manopakonnithithada (Kon Hutasing) Phraya 披耶·玛诺帕空提他达(空·胡塔辛) 235－236，240
Manorom 玛诺如姆 114
Manpower 劳动力，人手，人力 29，120，138－40，143－44，162
Manu 摩奴 61
Manufacturing 制造业 282－283
Mao Tse－tung 毛泽东 290
Marijuanna 大麻 304
Marines 海军 258，259
Martaban 马达班 44，65，78，98，116，132，134
Martaban，Gulf of 马达班湾 15，18
Marxian 马克思主义 261，290，292
Mass media 大众媒体 242
Medicine 医学 161
Meditation 沉思，冥想 159
Mei，Queen 梅皇后 157
Mekong Delta 湄公河三角洲 15，227
Mekong River 湄公河 11，13，20，22－23，25，33，36，45，48，72，79－80，83，117，126，139－140，154－155，170，181，187－190，198－199，245
Mekuti 默库提 80
Melanesia 美拉尼西亚 3
Meng－she 蒙舍诏 11
Mæhongson 夜丰颂
Mercenaries，Portugese 葡萄牙雇佣兵 74，76
Mergui 丹老 96，98，101－112，132
Mergui Massacre 丹老大屠杀 101
Metal 金属 6
Metallurgy 冶金术 3
Miao－Yao peoples 苗─瑶族 11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276，283－288，291－292，295，297
Military 军队，军事，军人 205－206，211－214，217，220－222，226，228，230，232－242，244－245，247，250－260，262－266，269，271，273－280，285－289，291－298，304－305
Military organization 军事组织 86
Ming Dynasty 明朝 51，105

Mining 采矿业 282
Ministries 部 185
Mission Pavie 巴维使团 188
Missionary 传教士 160, 163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51, 185, 192, 194, 196, 201, 206－207, 209－210, 217, 222, 276
Mogaung 孟拱 77
Mohnyin 莫因 77
Molotov cocktails 燃烧瓶 290
Mom ratchawong 玛姆·拉特查旺 215
Momeik 孟密 77
Mon 孟族 1, 9, 13, 18－21, 24, 26, 34, 36－40, 42, 44, 48, 53, 76－77, 79, 82, 88, 91, 107, 113, 115－116, 135－137, 254
Mon country 孟族国家 65
Mon language 孟族语言 19
Mon sect 孟族部落 160
Monarch 君主 271, 296
Monarchism 封建专制皇权思想 237
Monarchy 君主制 217, 242, 271, 273, 291, 296－297
Monarchy, Laos 老挝君主制 290
Mongkut 孟固王 149－150, 159－163, 166－170, 172－176, 179, 181－182, 190, 202, 206, 291
Mongol 蒙古 10, 30, 35－36, 37－39, 45, 51
Monogamy 一夫一妻制 216
Montagnard 山里人 147
monthon "圈" 194, 196, 198, 206, 241
Moulmein 毛淡棉 77
Mountbatten, Admiral Lord Louis 蒙巴顿, 路易斯将军 250
Müang, Krom 部, 联合 132
Muhammad Said 穆罕默德·赛义德 95
Mukdahan 穆达汉 269, 282
Mun River 孟河 22
Mun nai 目奈(疆土官员) 60
Mural paintings 壁画 137, 158
Muslim 穆斯林 95－96, 99, 101, 114, 216, 295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242
Myanmar 缅甸 15

N

Na 纳(或者稻谷地) 64
Na, *Krom* (*Ministry of Lands*) 部, 土地 132
Nai, *Mong* 奈, 孟 38, 68, 71, 79
Nakhon, *Chaophraya* 昭披耶·那空 152
Nakhon(*Noi*), *Chaophraya* 昭披耶·那空(诺艾) 152, 155－156
Nakhon(*Nu*), *Chaophraya* 昭披耶·那空(努) 141
Nakhon(*Phat*), *Chaophraya* 昭披耶·那空(帕特) 141, 146, 151
Nakhon Chaisi 那坤猜席 22, 114, 154
Nakhon In, *King* 那空·膺国王 56－57
Nakhon Nayok 那空那育府(坤西育府) 53, 61
Nakhon Pathom 佛统(那坤巴统) 18, 53, 212
Nakhon Phanom 那空帕侬 45, 72, 82－83, 126, 141, 143, 155, 278, 304
Nakhon Ratchasima (*Khorat*) 呵叻府 59, 108, 112, 123, 126, 143, 153, 194－

195, 237

Nakhon Sawan 那空沙旺 24, 39, 44, 57－58, 114, 117, 134, 278

Nakhon Si Thammarat 洛坤 24, 30, 35, 39－40, 43－46, 48, 53, 72－74, 93, 96－98, 108, 123－124, 127－128, 135, 141, 143, 146, 149, 155－156, 202, 280, 303

Nam U 南乌河 41, 45

Nan 兰王国 44, 58, 65－66, 68, 72, 104－106, 117, 134, 139, 143, 167, 280

Nan, Kingdom of 兰王国 189

Nan river 楠河 41, 123

Nan Zhao 南诏 10－13, 15, 25, 33, 34

Nan Zhao question 南诏问题 10

Nandabayin, King 莽应里(难陀巴因)国王 88, 91, 104

Nandapuri(Nan) 难陀武里(兰王国) 34

Nanthasen, King 南塔森，国王 141

Napoleonic War 拿破仑战争 148

Narai 纳莱 93, 95, 97－103, 105, 108, 148

Naren, Prince 纳仁王子 110, 113

Naresuan 纳黎萱国王 87－92, 94, 104, 122

Naret, Prince 纳叻特王子 214

Narinthewi, Princess 纳琳特薇公主 229

Narong Kittikachorn 纳隆吉滴卡宗 276, 288

National Assembly 全国议会 235－238, 240, 245, 248－249, 251

Natio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 273

Natinalism 民族主义 216－217, 231, 241

Nationalism, Chinese 华人民族主义 243

Naungdawgyi, King 莽纪觉，国王 116

Naval defeat 海军失败 245

Navigation 航行 3

Navy 海军 90－91, 217, 232, 237, 250, 258－260, 305

Net Khemayothin 奈特·克摩尧森 258

Netherland 荷兰 95

Netherlans Eat Inies 荷兰东印度 229

New Force movement (Nawaphon) 新力量运动 291

New Phetburi Road 新碧武里公路 279

Newspapers 报纸 222, 244

Newspapers, Chinese 华文报纸 244

Ngam Müang, King of Phayao 昂蒙，帕尧的国王 34－36, 39, 42, 45

Nghe-an 义安 9

Nguyen 阮 140

Nguyen Anh 阮福映 14

NIC 新兴工业化国家 298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 280

No Phutthangkun, King 诺·普单坤国王 76

Nobility 贵族 107

Noi, Prince 诺艾王子 103

Nong Bua Lamphu 廊磨喃蒲府 155

Nong Han 农汉 143

Nong Sarai 侬萨莱 88, 90－91

Nong Sung 侬颂 282

Nongkhai 廊开 155, 186－188

Nonthaburi 暖武里 150, 301

Norodom Sihanouk 诺罗敦·西哈努克 274, 295

Norodom, *King* 诺罗敦国王 170
North Vietnam 北越 273－274, 278, 280
Northern Thai(*Tai Yuan*) 北部泰族(泰原语) 10
Nung 侬族 2, 6

O

Oath of allegiance 宣誓效忠 41
Ocean, Indian 印度洋 73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战略服务办公室 247
Ong Kham, King 翁坎国王 106－107, 116
Opium 鸦片 168－169, 171, 177, 190, 248, 263, 271
Opium War 鸦片战争 162
Ordination 加冕登基 67, 78, 149
Original Thai States 原始泰王国 248
Outrigger canoes 独木舟 3
Oxford 牛津 211

P

Pa Sak River 帕萨河 18, 53, 82, 154
Pagān 蒲甘 15, 17, 28, 30, 31, 36, 41－42, 48, 51, 76
Pahang 彭亨 40, 44, 170
Paknam 河口 188－189
Palace, Ministry of the 皇宫部 132, 182, 212, 220
Palace Guard 王宫卫队 183
Pali language 巴利语言 17, 19, 23, 70, 137, 159
Pallegoix, Bishop Jean－Baptiste 让·巴蒂斯特·帕里果瓦主教 160
Pallu 巴禄 99
Paramet 帕拉迈特 110
Paribatra, Princess 佩理巴托王子 212, 214, 223
Paris 巴黎 226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议会民主, 代议制民主 184, 223－224
Patani 北大年 72－74, 81, 96－98, 125, 135, 143, 152, 155－156, 199
Patani Malays 北大年的马来人 93, 98, 156
Pathet Lao 巴特寮 273－274, 290, 295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庇护关系 60
Patronymic linkage system 父系制度 12
Pattaya 帕提雅 304
Pavie, Auguste 巴维, 奥古斯特 187－188
Pearl Harbor 珍珠港 246
Peasants 农民 228, 303
Pegu, Kingdom of 勃固王国 9, 15, 26, 36, 44, 48, 67, 77, 82－84, 88, 90－91, 98, 104, 107, 113, 116, 137
Penang 槟城 135, 148－149
People's committee 人民委员会 235
People's party 人民党 230, 234－245, 238, 241, 252, 254
Perak 霹雳王国 151, 152
Perlis 玻璃 156, 180, 192, 248
Persia 波斯 93, 95, 98－100, 111, 114, 125, 137
Persian family 波斯家族 145
Persian Gulf 波斯湾 95, 304
Persian muslims 波斯穆斯林 93, 98
Petition 请愿书 184－185
Petroleum 石油 243－244, 283, 295
Pha Muang, King 帕蒙王 41

Pha－ngua 帕努 54
Pha Ruang Mæn Kham Kha 帕攘曼卡凯 34
Pha Yu, King 帕于王 65
Phahonphonphayuhasena(Phot Phahonythin), Phraya 披耶·帕凤 234, 236, 239－242, 288
Phakan 帕坎 33
Phang, King 攀国王 26, 33
Phanuwong (Thuam Bunnag), Chaophraya 帕努旺(图阿姆·波纳)昭披耶 176, 182
Phao Siyanon 帕 敖 · 斯 雅 侬 254, 260, 262－265, 269
Phatthalung 芭他仑 58, 72, 97, 134
Phaulkon, Constantine 华尔康(帕夫尔孔, 康斯坦丁) 95, 99, 101
Phayao 帕尧王朝 34, 36, 39, 45, 65－66, 106, 304
Phet, Prince 披特王子 109
Phetburi 碧武里, 又译佛丕, 碧布里 22, 39－40, 44－45, 53－54, 87, 116－118, 131－132
Phetchabun 碧差汶 53, 81－82, 154, 249
Phetphichai(Chai), Chaophraya 拍特披猜(猜), 昭披耶 114
Phetracha, King 披叻差国王 94, 101－103, 107－108, 111, 131
Phibunsongkhram(Phibun) 披汶颂堪(披汶) 226, 230, 236－237, 239－251, 253－265, 266, 281, 288, 296
Phichai 披猜 117
Phichaisurin, Prince 披猜素林王子 109
Phichit 碧吉 117, 180
Philadelphia 费城 161
Philippines 菲律宾 245－246, 248, 250, 257
Philippines, Spanish 西属菲律宾 91
Phimai 碧迈 22, 123－124
Phin Chunhawan 平·春哈旺 254, 269
Phithaksamontri, Prince 披塔克萨孟提王子 147
Phitsanulok 彭世洛 22, 39, 44, 57－58, 60, 67－69, 76, 78－82, 88, 111, 117, 123－136, 132, 199, 282
Phlu Luang 披卢琅 102
Phnom Penh 金边 59, 78, 170, 181
Phon, Prince 蓬王子 110
Phon Hong 蓬洪 19
Phonlathep 土地部(lands department) 151
Phonlathep(Pin Singhaseni), Chaophraya 蓬腊特披(拼·新哈森尼), 昭披耶 132
Phote Sarasin 扑·沙拉信 269
Phoumi Nosavan 富米·诺萨万 273
Phra Khwan, Prince 披·宽王子 108－109
Phra Phimontham 披·皮蒙昙 92
Phra Phutthaletla Naphalai(King Rama Ⅱ) 披·蒲塔叻拉·纳帕莱(国王拉玛二世) 145
Phra Phutthayotfa Chulalok (King Rama Ⅰ) 披·蒲塔尧特法·楚拉劳克(国王拉玛一世) 128
Phra Pin Klao, King 帕·平·克劳, 国王 167, 174, 175, 180
Phrabang image 勃拉邦佛 126, 141
Phræ 帕府 31, 44, 58, 65－67, 76, 106, 134, 200
Phrai 自由人 26
Phrai luang 属于国王的自由人 138
Phrai som 私人仆从 138

Phrakan, Müang 蒙帕坎 34
Phrakhlang 金融和外国事务部 63, 95, 98—99, 109—115, 125, 127, 131—132, 145—146, 150—152, 155, 161—163, 167, 171—172, 176, 182, 185
Phrakhlang(Chim), Chaophraya 昭披耶·披克琅(斯姆) 114, 151
Phrakhlang(Dit Bunnag), Chaophraya 昭披耶·披克琅(迪·波纳) 161—163, 167
Phrakhlang(Hon), Chaophraya 昭披耶·披克琅(洪) 131, 151
Phrakhlang (Son), Chaophraya 昭披耶·披克琅(宋) 131
Phraya 披耶 143
Phrom, Province 卑谬省 26, 28, 34, 39, 42
Phromburi 卑谬武里 60, 114
Phu mi bun 圣人 106
Phuket 普吉 149, 186, 194, 302
Phumintharacha, King 蒲闽塔拉查国王 109
Phuttharet, Prince 蒲塔莱特王子 182
Pi, Mom 披, 玛 103
Pi-lo-ko 皮逻阁 11
Ping River 平河 22, 25, 80, 106, 139
Plæk Khittasangkha 披莱克·凯塔桑克哈 226, 241
Plains of Jars 查尔平原 181
Plot 阴谋 214, 219
Pol Pot 波尔布特 295
Police Department 警察部 258—260, 262, 286
Polygamy 一夫多妻制 216
Population 人口 281, 295, 300, 301
Population control 人口控制 281
Pork 猪肉 243
Portugal 葡萄牙 74, 76, 87, 90—91, 95, 97, 104, 112, 129, 148
Post and Telegraph Department 邮政和电报部 183, 206
Pottery 陶器 3
Poverty 贫穷 304
Power of appointment 任命的权力 207
Prachaksinlapakhom, Prince 披拉查克辛拉帕考姆王子 182, 187
Prachinburi 巴真武里府 53, 78
Prajadhipok, King 帕恰迪波国王 221—223, 225, 228—231, 233, 235, 237—239, 242—243, 281, 289
Praphas Charusathian 巴博·乍鲁沙天 264, 276, 296
Prasat Thong, King 巴萨通王 93—94, 96—98, 111—112, 131, 177
Prasert Na Nagara 普拉萨特·纳·纳伽拉 45
Preah Vihear 柏威夏寺 274
Prehistory 史前时期 3
Prem Tinsulanonda 炳廷素拉暖 294, 296, 298—299
Pridi Phanomyong 比里·帕侬荣 226, 230, 234, 236, 240, 247, 249—251, 257—258, 261
Primate city 首要城市
Prime minister 总理 220, 230, 249
Primogeniture 长子继承制 66
Privy Council 枢密院 177—178, 220, 290
Privy Purse 内库部 220
Privy Seal, Ministry of the 御玺部 214

Progressive 进步党 252
Prome 卑谬 15
promoters 推动者 230, 234－236
prostitution 妓女，卖淫 270, 279
proto Tai 原始傣语 5
province Wellesley 威斯利省 148
provincess 省 94
provincial police 省级警察 201
provincial Revenues Office 省收入办公室 195
Provincial government 省级政府 197, 241
Provincial officials 省级官员 61
Public Instruction, Ministry of 公共教育部 194, 202
Public Works, Ministry of 公共工程部 214
Puey Ungphakorn 普·阿翁帕空 293
Pursat 菩萨 147
Pyu 骠国 12－13, 15, 16

Q

Quai d'Orsay 多尔赛港口 169
Qeen 皇后 145

R

Rabi, Prince 拉比王子 195, 214
Rachathirat 拉查迪拉特 137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184
Radio broadcasting 电台广播 242, 244
Raffles, Sir Thomas Stamford 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 148
rai 莱 62
Rakronnaret, Prince 拉克荣纳莱特王子 151, 161, 219
Rama 拉玛 56
Rama Ⅰ, King 拉玛一世国王 128－132, 134－141, 143－136, 150－151, 161, 164, 167, 176
Rama Ⅱ, King 拉玛二世国王 144－150, 153, 158
Rama Ⅲ, King 拉玛三世国王 149－151, 153－154, 157－159, 161－164, 167, 176
Rama Ⅳ, King 拉玛四世国王 166: see also Mongukut, King 同样参看孟固王
Rama Ⅴ: see Chulalongkorn, King 拉玛五世：见朱拉隆功国王
Rama Ⅵ: see Vajiravudh, King 拉玛六世：见瓦吉拉伍德国王
Rama Ⅶ: see Prajadhipok, King 拉玛七世：见帕恰迪波国王
Rama Ⅷ: see Ananda, King 拉玛八世：见阿南达国王
Rama Ⅸ: see Bhumibol, King 拉玛九世：见普密蓬国王
Ramakian 拉玛坚 137
Ramaracha 拉玛拉查 56－58
Ramathibodi, King 拉玛铁菩提国王 128
Ramathibodi Ⅰ, King 拉玛铁菩提一世国王 54－55, 57－61, 76
Ramathibodi Ⅱ, King 拉玛铁菩提二世国王 73
Ramayana 罗摩衍那 137, 215
Ramesuan 拉梅萱 54, 56－59, 79, 81
Ramkhamhæng, King 兰甘亨国王 35－39, 42－46, 48, 51－53, 57
Ramkhamhæng inscription 兰甘亨碑铭 43,45
Rangoon 仰光 98
Rangsit 兰实 201, 228

Rat, Muang 蒙拉特 41

Ratburi 位叻丕 22, 44, 53, 116 − 117, 125, 132, 134

Ratchaphkdi (Sawang), Chaophraya 昭披耶·拉查帕克迪(萨旺) 112, 114

Ratchasongkhram, Phraya 披耶·拉查宋克拉姆 111

Ratchasuphawadi (Sing Singhaseni), Phraya 披耶·拉提查素帕瓦迪(辛·辛哈森尼) 154

Ratsada, Prince 罗萨达王子 76

Ratsadanai, Chao 昭·拉特萨达奈 198

Rattanabodin (Bunrot Kanlayannamit), Chaophraya 昭披耶·拉坦阿波丁(波老特·坎拉严纳密) 194

Rattanaphiphit (Son Sonthirat), Chaophraya 昭披耶·拉特纳披披特(宋·宋提拉特) 131

Rattanathibet (Kun Rattanakun), Chaophraya 昭披耶·拉坦提柏特(坤·拉坦阿坤) 145

Rear palace 后宫 108

Rebellion 造反, 反叛 87, 108, 153, 198 − 199

Rebels, Malay 马来人造反 81

Red Gaurs 红牛 291 −292

Red River 红河 5, 13

Red Tai 红傣族 10

Reform, military 军事改革 195

Refugees 难民 295

Regency Council 摄政委员会 249

Regicide 弑君 253, 255

Relic 遗迹 31, 34, 36

Remittances 汇款 243 − 244

Reordination 再次授予 71

Revenue system 税收制度 169

Revolt 造反, 反叛 147

Revolution 革命 102, 234, 266 − 267, 270, 273, 275 −276, 281, 297 −298

Revolution, Chinese 中国革命 213

Revolutionary Council 革命委员会 270

Rice 大米, 稻米 109 − 110, 138, 171, 200 −201, 220, 227, 239, 243, 251, 261, 275, 283, 302

Rice agiculture 稻米农业 3, 200, 204

Roi Et 黎逸 22, 72, 143

Roman Catholic missionaries, French 法国罗马天主教传教士 148

Roman Catholics 罗马天主教 129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三国演义》 137

Royal Audit Office 皇家审计办公室 182 − 184

Royal Chronicles of Ayutthaya 《阿育陀耶皇家纪年》 54

Royal Navy League 皇家海军联盟 217, 220

Royal Pages Corps 皇家侍卫军团 182 − 184

Royal Physicians, Department of the 皇家医生部 162

Royal Press 皇家出版 183

Royal Scribes, Department of the 皇家记录部 182

Royal Secretariat 皇家秘书处 183, 184

Royal Thai Air Force 泰国皇家海军 278

Royal bodyguards 皇家护卫 94

Royal family 皇族 205, 305

Royal regalia 皇袍 34

Royal succession 皇室继承 62

Rubber 橡胶
Rusk－Thanat 腊斯克—他纳 277
Russian 俄国人 221，254
Ryukyu kingdom 琉球王国 91

S

Sa 萨 147
Sæn Müang Ma，King 盛蒙玛国王 65－66
Sǽn Phu，King 盛富国王 64
Sæn Surin，Phanya 单·素林，帕亚 84
Sai Fong 赛风 22
Saigon 西贡 147，156－157，169
Sainyakuman，King 赛因亚库曼国王 140
Saivite 湿婆教 23
Saiyud Kerdphol 赛育德·克尔德迫尔 300
sakdi na 萨克迪纳 62，64，232
Sakdiphonlasep，Prince 萨克迪蓬拉塞披王子 151
Sakkarin（Zakharine），King 萨卡林国王 198
Sakon Nakhon 沙功那空 22
Salt 盐 3，6，155，240，243
Salween River 萨尔温江 26，36，88
Sam Dek Yoi 山德尧 66
Sam Fang Kæn，King 山芳坎国王 66
Samut Prakan 北榄府 301
San(Sankhaburi) 讪卡武里 57，60
Sandhurst 桑赫斯特(英国陆军官校) 211
Sankhalok ceramics 宋加洛陶瓷 45
Sanskrit 梵文 17，23，61，215
Sant Chitpatima 让·集巴滴马 296
Sanya Dharmasakti 桑雅·达磨萨克提 290
Saowapha，Queen 绍瓦帕皇后 211，219，221
Sappanwood 苏木 96，97
Saraburi 北标 126，128，153－154，237，249
Saravane 沙拉湾 199
Sarit Thanarat 沙立·他那叻 254，260－261，263－265，267，269－273，275－276，281，287－289，296－297
Sat 塞特 64，66，70，106
Satchanalai 撒查那来 22，41，67－68
Satun 沙敦 156
Savannakhet 沙湾拿吉 22
Sawangkhaburi 萨旺克哈武里 123
Sawankhalok 宋加洛 22，42，117
Sayaboury 沙耶武里 245
Sayre，Francisco B. 弗朗西斯科·B. 莎尔 218，223－224
Schools，Chinese 华文学校 243
Schools，Malay 马来语学校 257
scribes 抄写员 131
scriptures 经文 159
sculpture 雕塑 19，46
SEATO 东南亚条约组织 273－274，277
Second Anglo－Burmese War (1852) 第二次英缅战争 (1852)168
Second Indochina War 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 277
Second King 第二代国王 167，174
Second Reign：see also Rama Ⅱ 第二代统治：参见拉玛二世 145－149
Secondary school 中学 272，284，299
Selangor 雪兰莪 151－152
Senanurak，Prince 社纳努拉克王子 146
Senaphithak，Prince 社纳披塔克王子 113，115

Senate 参议院 252, 258
Seni Pramoj 社尼·巴莫 251 — 252, 290 —291
Senior Statesman 高级政治家 252
Separatism 分离主义 241, 257, 262
Seri Manangkhasila 社里·玛兰卡西拉党 264
Setthathirat, King 赛塔提腊国王 71, 79 — 84
Seventh Reign 第七代统治 211, 225 — 227, 232, see also Prejadhipok, King 同样可以参见帕恰迪波国王
Shan 掸族 2, 10, 12, 26, 33, 36, 38, 40, 48, 68 — 71, 76 — 77, 79, 81 — 83, 85, 88, 91, 105, 116 — 117, 139, 166, 199 —200, 247, 250, 263, 269
Shan Rebellion 掸族反叛 199
Shanghai 上海 190
Shell Oil 壳牌石油 254
Shwebo 瑞波 15
Si Saowaphak, Prince 西骚哇帕王子 92
Si Sin, Prince 西辛王子 92, 93
Si Sudanchan, Lady 西·素丹赞女士 78
Si Suriyawong (Chuang Bunnag), Chaophraya 西·素立牙旺(川·波纳), 昭披耶 93, 167 — 170, 176, 180 — 181, 183, 206
Si Worawong, Phraya 西·瓦拉旺, 披耶 93 — 94
Siam, Gulf of 暹罗湾 19, 52, 97, 132, 190, 203, 245
Siam language 暹罗语 173
Siam order of monks on Ceylon 在锡兰建立一种僧侣的暹罗次序 112
Siang Khwang 川圹 9 — 10, 72, 141, 154 —155, 181, 187
Sichuan 四川 11, 15
Siem 暹 41
Siem Reap 暹粒 124, 140, 143, 146, 191, 245
Silkworms 蚕 52
Silversmiths 银匠 36
Sima(Nakhon Ratchasima), Müang 西玛(呵叻府), 蒙 19
Singapore 新加坡 148 — 149, 153, 163, 167 — 170, 178, 192, 198, 204, 260, 304
Singburi 信武里 53, 114
Singu, King 钦拘国王 126
Sinhalese 僧伽罗 52, 70
Sinhalese Order 僧伽罗秩序 65
Sino - Japanese War 中日战争 243
Sino - Siamese 中暹 96, 213
Sino - Thai 中泰 204
Siphiphat(That Bunnag), Phraya 西披帕特(塔特·波纳), 披耶 162
Sipsong Pan Na 西双版纳 9, 15, 25, 33
Siribunyasan, King 西里本耶讪国王 117, 125
Sirikit, Queen 诗丽吉皇后 296
Sirindhor, Queen 诗琳通皇后 297
Sisaket 四色菊 143
Sisavangvong, King 西萨旺冯国王 198
Sisophon 诗梳风 191
Sithiporn Kridakara, Prince 西提袍恩·克立达卡拉王子 227
Sittang River 锡当河 77
Siva 湿婆

Sivalinga 湿婆林迦像 23

Sixth Reign 第六代统治 211, 220 — 222, 226, see also Vajiravudh, King 同样参看瓦吉拉伍德

Slavery 奴隶制 48, 173, 177, 201

Smallpox 天花 54

Sming Htaw Buddhaketi, King 斯弥陶・布达克提国王 113

Smith, George Vinal 乔治・韦奈・史密斯 93

Snguon, Prince 斯恩王子 146 — 147, 156

Social Action party 社会行动党 290, 294

Social criticism 社会批评 226

Socialism 社会主义 226, 266, 267, 290

Solar eclipse 日食 176

Somboon Rahong 颂蓬拉宏 305

Song 颂 236

Song Tham, King 宋当王 92 — 93, 95, 110 — 111

Songkhla 宋卡 58, 72, 97, 100, 102, 135, 141, 143, 155 — 156, 246, 302 — 303

Songsuradet (Thep Panthumsen), Phraya 颂苏拉德(特平・攀都姆森), 披耶 234, 236, 240, 242

Sorasak, Luang 琅・哨拉萨克 102 — 103, 108

Sorcery 巫术 5

Sot 索 41

sotapanna 须陀洹 127

Sotikakuman 绍提卡库曼 117

Souphanouvong, Prince 苏发努冯王子 273

South China 南中国 98, 110

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东南亚条约组织 262, 269

South East Asia Union 东南亚联邦 254

South Vietnam 南越 278, 290

South China 华南地区 203

South Indian 南印度地区 39

South East Asia Command 东南亚最高司令部 250

South East Asia League 东南亚联盟 254

Souvanna Phouma, Prince 梭发那・富马王子 273 — 274

Spirits 酒类 171

Sri Ayudhya 室利・阿育陀耶 259

Sri Indraitya, King 室利・因陀罗迭多国王 41, 45

Sri Lanka 斯里兰卡 137

Sri Wisarn Waja, Phraya 室利・威萨恩・瓦加, 披耶 230, 235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221

Stalin, J. V. J. V. 斯大林 290

State Council 国家委员会 240

State Department 外交部 251

Stevens, Raymond B. 雷蒙德・B. 斯蒂文斯 230

Strikes 罢工 266

Students 学生 287 — 291, 293, 296

Students abroad 国外的学生 225

Stung Treng 上丁 147

Süa "King Tiger", King 苏阿 "老虎国王", 国王 109

Süa pa 苏阿・帕(所谓的野虎兵团) 212

Succession Law 继承法 297

Succesion 继承 8, 56, 92, 110 — 111, 114 — 115, 163, 211, 220 — 221, 223

Succesion crises 继承危机 94

Suchinda Kraprayoon 素金达・甲巴允 305

Suddhasoma 苏陀萨玛 26
Sudhammavati 古称的金地 26
Suffering Prince 受难的王子 26
Sukhothai 素可泰 22, 31, 35－48, 51－53, 57－60, 65－69, 76, 80－81, 91, 117
Sulaiman the Safavid 沙阿, Shah 萨非王朝苏莱曼 100
sumana 苏马纳 65
Sunthon Phu 顺通蒲 158
Suphanburi 素攀武里 18, 22, 39, 44－45, 48, 53－54, 56－58, 62, 78, 88, 102, 114, 117, 154
Supreme Council of State 国家最高委员会 223, 230
Supreme patriarch 主持方丈 202
Surasakmontri (Choem Seng － Xuto), Chaophraya 素拉萨克蒙特(朝姆·僧-须韬), 昭披耶 220
Surasi(Bunma), Chaophraya 素拉西(波玛), 昭披耶 125－126, 128, 134, 139－140
Suratthani 索叻他尼 280
Surawong (Won), Chaophraya 素拉旺(旺), 昭披耶 176
Suri(ya)wong 素立(亚)旺 177
Surin, Prince 苏林王子 151－152
Suriyamarin, King 素立亚玛林国王 115, 117－118
Suriyentharathibodi, King 素立耶塔拉迪波迪国王 109
Suriyothai, Queen 素丽瑶泰皇后 78, 80
Surnames 姓氏 215, 282
Survey Department 测量部 195, 206
Suryavarman 苏耶跋摩 17, 24
Suthammaracha 素塔玛拉查 93
Suthat, Prince 素塔特王子 92, 94
Suvanna *Khom Kham* 素万纳·考姆·卡姆 25
Suwannaphum 索旺那普 143
Switerland 瑞士 233, 238, 254, 270
Syam 暹族 13, 24－25, 41
Syam Kuk 暹罗人 24

T

Ta－li Lake 大理湖 11
Tabinshwehti, King 德彬瑞蒂(莽瑞体)国王 77－79
Tai 傣族 1, 2, 9, 17, 21－26, 28－31, 33－44, 46, 48, 50－53, 55, 60, 63, 76, 79, 81, 86, 104, 107, 115, 120, 122, 166, 243
Tai cultural identity 傣族文化身份 2
Tai family of languages 傣族语 系 2
Tai Lü 傣禄 36, 38, 66, see also Lü 同样参看泐族
Tai Yuan 泰原语 36, 40, 65, 76, 83, 85－86, 105－107
Tak 达府 41－42, 44, 48, 80, 82, 117－118, 123, 132, 139
Takhli 塔克里 278
Taksin, King 达信(郑信, 又名郑昭)国王 122－131, 139, 141, 145, 148, 277
Tambralinga 单马令(今天的泰国洛坤—译者注) 15, 24
Tan Malaka 陈马六甲 225
Tapioca 木薯 283
Tariff autonomy 关税自主 219

Tattooed 刺字文身 5, 138

Tavoy 土瓦 73, 91, 95, 98, 101, 116

Tay - son rebellion 西山反叛 139

Telegraph 电报 183

Television 电视 305

Tenasserim 丹那纱林 73, 91, 95, 98, 101, 116

Teochiu Chinese 潮州华人 124

Textile 纺织品 52

Thai Rak Thai(political party) 泰爱泰(政党) 307

Thai Sa, King 泰沙国王 109 - 110

Thai troops 泰国军队 278

Thai - U. S. relationship 泰美关系 262

Thailand, Gulf of 泰国湾 18, 20

Thak Chaloemtiarana 塔克 · 乍露提拉纳 271

Thaksin Shinawatra 他信·西那瓦 307

Thalang 塔朗 134

Thamma (Bunrot Bunyarattaphan), Chaophraya 昭披耶 · 塔玛(波老特 · 波亚拉特攀) 132, 134

Thamma(palace department)皇宫部 151

Thammasakmontri (M. R. W Sanan Thephatsadin), Chaophraya 昭披耶 · 塔玛萨克孟提(萨南 · 特帕特萨丁) 260, 290 - 293

Thammasat university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 260, 290 - 293

Thammathian 塔玛添 108

Thammikarat(a Lord of the Holy Law), Thao 塔密卡拉特(神圣法令里面的一个贵族), 陶 199

Thamrongnawasawat, Luang 銮 · 塔荣纳瓦萨瓦特 253, 257

Thanat Khoman 他纳·柯曼 270

Thanin Kraivichien 他宁 · 该拉威谦 293, 296

Thanom Kittikachorn 他侬·吉滴卡宗 264, 270, 276, 280 - 281, 285, 287 - 288, 291, 296

That Luang 塔銮 82

That Phanom 塔帕侬 22, 82

Thaton 萨通 26

Thawi Bunyaket 塔威 · 波雅克特 251 -252

Theater 戏剧 215

Thep Sing 特披辛 106

Thepkasattri, Princess 特帕萨提公主 80 - 81

Thepphiphit, Prince 特披披特王子 123

Thesaphiban 特萨披班 194, 196

Thianracha 提安拉查 78

Thianwan 提安万 226

Thihapatei 提哈帕特

Thiphakorawong(Kham), Chaophraya 昭披耶 · 提帕考拉旺(卡姆) 167, 169

Thipphanet, Phraya 迪帕奈特, 披耶 105

Third Reign 第三代统治 149 - 151, 155 - 156, 158 - 159, 192, 226, 248

Tho 土族 6

Thoen 滕县 106, 139

Thoeng 汤 66

Thommoreachea, King of Cambodia 托摩拉嘉, 柬埔寨国王 109, 112

Thonburi 吞武里 123 - 126, 128, 145, 182

Thonburi period 吞武里时期 131, 132

Thong 通 92

Thong Chan 通赞 56
Thong Duang 通端 125
Thong - in Phuriphat 通因·蒲立帕特 240, 254, 257
Three Pagodas Pass 三塔关(三塔山口) 18, 78, 88, 117, 132, 134-135
Three Seals Law《三印法典》130
Tiang Sirikhan 提昂·斯利坎 240, 257
Tibet 西藏 11
Tibeto - Burman Languages 藏缅语言 11-12
Tiger Cubs "虎子"组织 217
Tin 锡 245
Tipitaka 巴利大藏经 70, 129
Tobacco 烟草 243-244
Tojo 东条 248, 249
Tonkin, Gulf of 东京湾 278
Tonle Sap 洞里萨湖 15
Toungoo 东吁 77, 90, 91, 113
Toungoo Dynasty 东吁王朝 116
Tourism 旅游业 283, 302, 304
Trade 贸易 3, 6, 138, 152
Trade, foreign 对外贸易 304
Traffic 交通 301
Trailok, King of Siam 崔洛克，暹罗国王 60, 63, 67-69, 72-73, 85, 128
Trat 达叻(桐艾) 189, 191
Trat Noi 达叻·诺伊 108
Treasury 金融 182
Trengganu 丁加奴 125, 135, 143, 152, 156, 170, 180, 192, 248

U

U Tapao 乌塔堡 278
U Thong 乌通王 53, 54
Ubon, monthon 乌汶，圈 202
Ubon Ratchathani 乌汶 140, 143, 147, 186, 188, 199, 240
Udayadityavarman, King 优陀耶迭多跋摩国王 24
Udon 乌隆 279, 282
Udong 乌栋 140, 146, 147, 157
Umangasela 乌蒙赛拉 25, 26
Un Kham, King 乌卡姆国王 187
unarut 137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252, 262, 274, 294
United Shan States 联合掸族王国 248
United States 美国 160, 162, 169, 189, 217-218, 245, 247, 249-251, 253-254, 256-269, 261-262, 264, 266, 270, 273-274, 276-278, 280, 287, 294, 289-290
Universal compulsory primary education 全民义务初级教育 203, 238
Universal military conscription 普遍征兵制 195
Universities 大学 233, 272, 284, 292
Uparat 副国王 88, 110-111, 113, 136, 138-139, 141, 143-146, 151-153, 161
Upland Tai 高地傣族 10, 48
Uprising 起义，暴动 113
Urban population 城市人口 301-302
Uthaithani 乌泰他尼 114
Uthumphon, King 乌图姆蓬国王 115, 118
Uttaradit 城逸 41, 42, 123

V

Vaisnavite 毗湿奴教 23

Vajiralongkorn, Crown Prince 哇集拉隆功，皇子 292, 297
Vajiravudh, King 瓦吉拉伍德国王 211－221, 223, 231, 281
Vajiravunhis, Prince 瓦吉拉伍海斯王子 211
Vella, Walter F. 薇拉，沃尔特 211, 220
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 凡尔赛和平会议 218
Vichy 维希 245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皇后 185
Videha 毗提诃王国 33
Vieniane 万象 44, 48, 80－83, 117, 125－126, 136, 140－141, 143, 147－148, 153－155, 181, 186－187, 274
Vieniane, Kingdom of 万象王国 198
Vieniane Plain 万象平原 15, 19, 72
Viet Minh 越盟成员 262
Vietnam 越南 8, 10, 12－16, 19－20, 25, 28, 33, 35, 37, 51, 83, 139－141, 146－147, 154－158, 164, 169－170, 187－188, 245, 254, 273, 276－277, 294
Vietnam boom 越南的繁荣，暴涨 279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274, 277, 279
Vietnamese 越南的，越南人 2, 9, 13, 68, 90, 109, 112, 126, 140, 147－148, 157－158, 198, 218, 225, 254, 263, 293－294, 296
Vietnamese frontier 越南边界 10
Vietnamization 越南化 15, 280, 287
Village Scouts 乡村童子军 291－292, 296
Violence 暴力 305
Visainyarat, Chao 维萨因亚拉特，昭 140, 147
Visnu 毗湿奴 23
Vocabulary, court 王朝(宫廷)词汇 61
Vocational training 职业训练 272
Vongsa, King 冯沙国王 141

W

Wachirayan Warorot, Prince 瓦持拉延・瓦尧尧特王子 202
Wang, Krom(Ministry of the Palace) 王宫部 132
War Crimes Act 战争犯罪法 253
Warfare 战争 63
Wat Bowon 布翁寺 163
Wat Bowonniwet 布翁尼维寺庙 160－161
Wat Phrachetuphon(Wat Pho) 卧佛寺 158
Wat Samorai 萨摩莱寺庙 160
Wei－yuan 威远 37
West (Western) 西方，西方人 148, 162, 164, 166－167, 169, 172, 175－177, 179, 183－184, 191, 194－198, 202, 204－206, 217, 226, 240, 244, 247, 266, 279, 289
Westernization 西方化 51, 276
White Tai 白傣族 10, 41
White, Samuel 塞缪尔・怀特 101
Wiang Chaiprakan 旺・猜帕甘 26, 28
Wichaichan (also named "George Washington"), Prince 威猜赞(也以"乔治・华盛顿"来命名)王子 176, 178, 180, 182－183, 211
Wichitwathakan (Vichitr Vadakarn), Luang 銮・威集瓦他干 242－244, 270－271

Wild Tiger Corps 野虎兵团 212－213，217，220
Wilson，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218
Wisetchaichan 维塞特猜赞 114
Wisutthithewi，Queen 威素提特薇皇后 81
Women 妇女 3，173，216，238，298－299，303－304
Wong，Müan g 王，蒙 33
Wongsa（M. R. W Sathan Snidvongs），Chaophraya 昭披耶·旺萨（M. R. W 萨坦·斯尼东）214
Wongsathirat，Prince 旺萨提拉特王子 161，167
Woolwich Military Academy 伍尔维奇军事学院 223
Worawongsa 卧拉王萨 78
World War Ⅰ 第一次世界大战 217
World War Ⅱ 第二次世界大战 241，250，277，281
Wu－man，"Black barbarians" 乌蛮"黑野人" 11

Y

Yamada Nagamasa 山田长政 93，96
Yaring 亚润 156
Yasothon 益梭通府 154
Yasovarman，King Ⅰ 耶输跋摩一世 15
Yawnghwe 永贵 77
Yi Ba 伊巴 34，37
Yo Chao 昭尧 147，153－154
Yom 永 134
Yommarat，Chaophraya 昭披耶·尧玛拉特 126，132，134，151
Yommarat(Bunma)，Chaophraya 昭披耶·尧玛拉特(波玛) 145
Yommarat(Noi Sisuriyaphaha)Chaophraya 昭披耶·尧玛拉特(诺艾·西素立亚帕哈) 151
Yommarat(Pan Sukhum)，Chaophraya 昭披耶·尧玛拉特(攀·素库姆) 238
Yommarat(Thong－in)，Chaophraya 昭披耶·尧玛拉特(通因) 132，134
Yong，Mong 孟雍 67－68，139
Yonok 如诺王国 25－26，33，39
Yot Chiang Rai 育清莱 69
Yot Fa，King 育华国王 78
Young Siams Society 青年暹罗人协会 179
Young Turks 青年土耳其党 286，296
Yung－li emperor 永历皇帝 105
Yunnan 云南 9－12，19－20，33，36，45，66，68
Yuwachon("Militant Youth")movement 育瓦冲("好战的青年")运动 239，244

Z

Zakharine，King of Luang Prabang 琅勃拉邦的国王萨卡林 198
Zhuang 壮族 2，6，10
Zuan family 爨家族 10

[General Information]
□□=□□□
□□=□□□□□·K·□□□□
□□=368
SS□=12410647
DX□=
□□□□=2009.09
□□□=□□□□□□